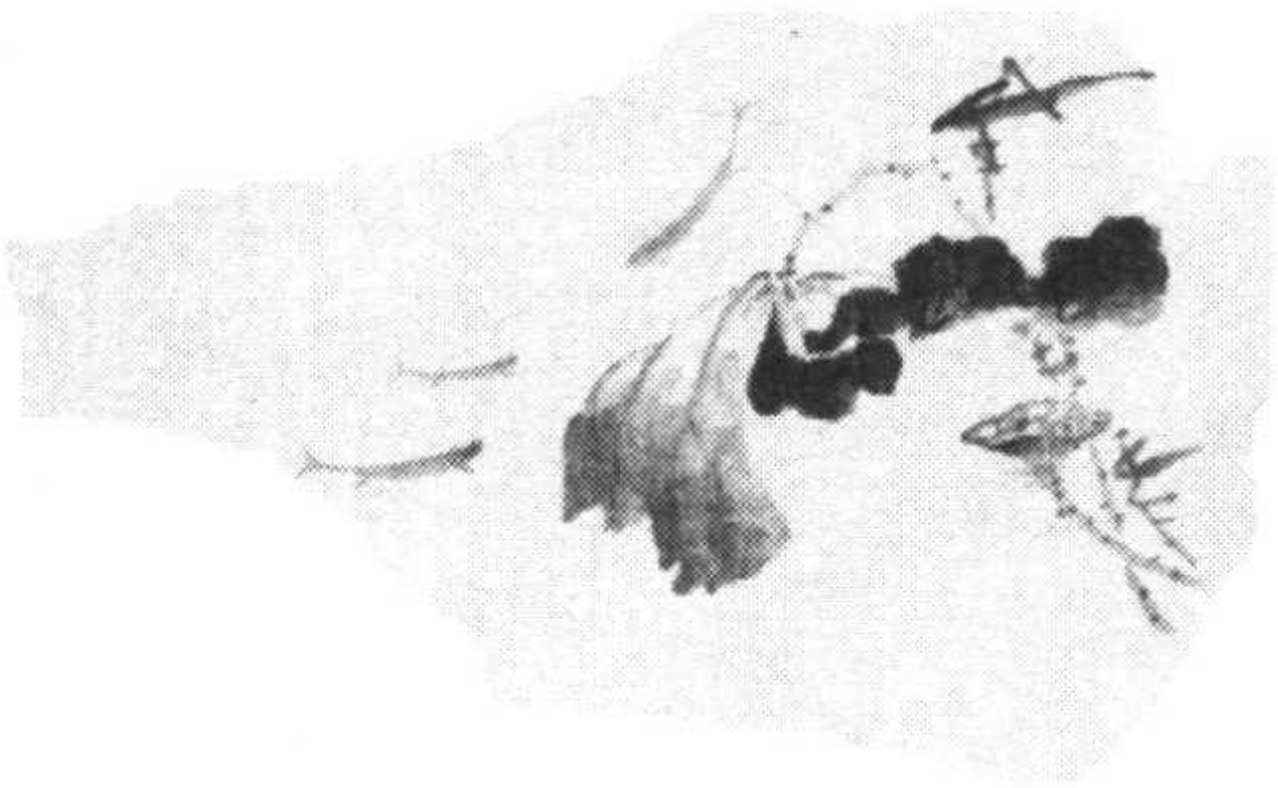
6336-4751-3

YINYU JI

银鱼集

黄裳 著



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 / 黄裳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5
裳作品系列）
N 7-5336-47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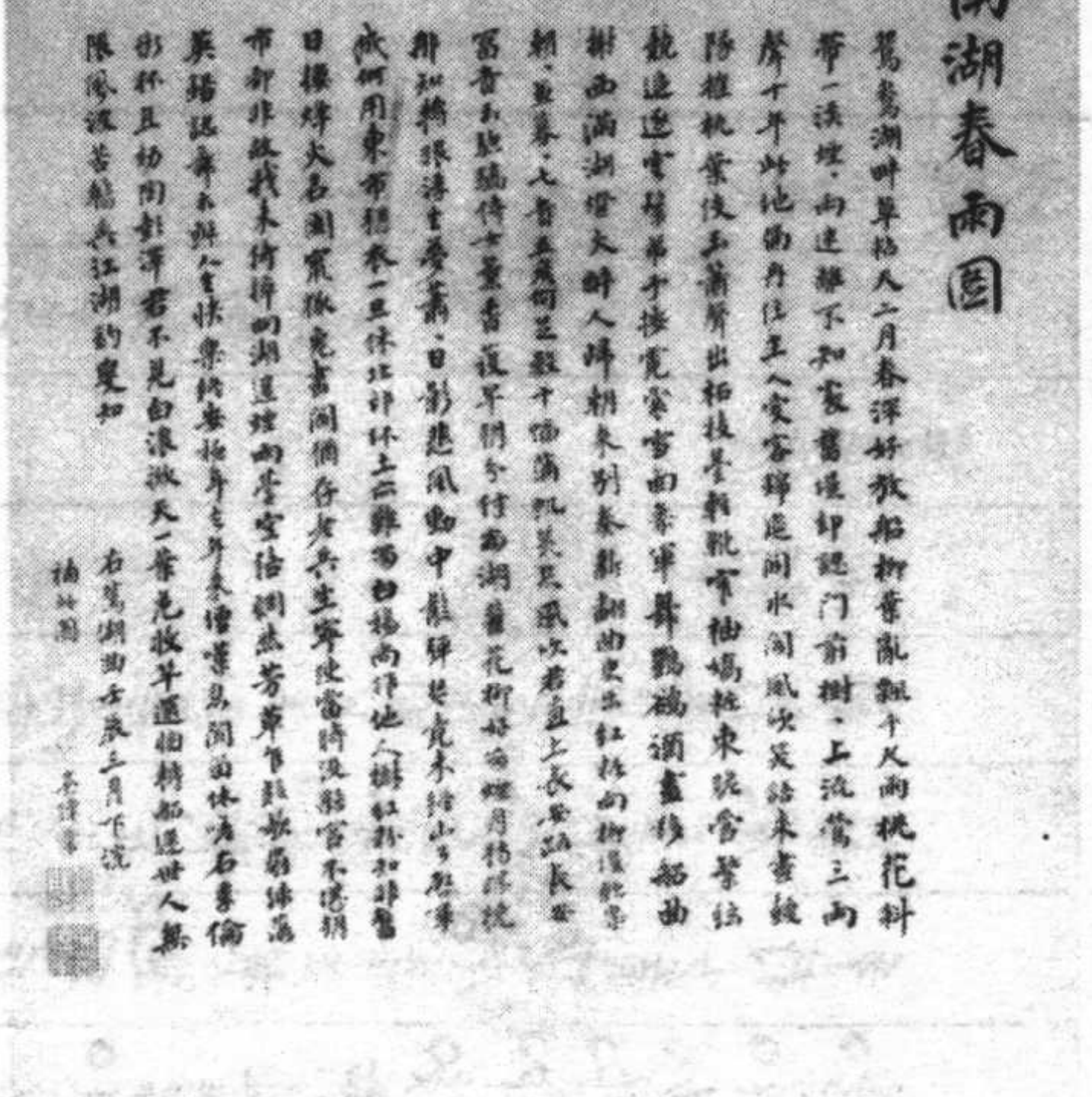
银... Ⅱ.黄...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I267
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149 号

编辑：唐元明　　装帧设计：张鑫坤
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址：http://www.ahep.com.cn
销：新华书店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本：880×1230　1/32
张：9.5
数：210 000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数：4 000
价：17.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黄裳　一九一九年生，原名容鼎昌，著名散文家、记者、藏书家、学者。一九四五年进文汇报社，任重庆、南京特派员、编辑、编委等职。曾任军委总政文化部越剧团编剧、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一九四〇年开始散文创作后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撰有大量散文、杂文、剧评、游记、读书随笔等。出版专集数十种，其中代表作有《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过去的足迹》等。译作有《猎人日记》、《一个平凡的故事》、《歌略夫里奥夫家族》等。举凡清雅书话、珍本题跋、山川风物、历史人事等，无不历历如绘、情理交织、文采斐然，反映了作者作为当代华语文坛一流散文大家的丰厚学养、卓著见识和灿然妙笔。

南湖春雨图



吳佳业制《南湖春雨图》

得張子古樂府
俾陶然之氣流
行天地間

瑯嬛文集

劒南陶菴張岱著

古樂府

荊軻七

荊軻爲燕太子刺秦王秦王拔圖出獻秦王
發圖之時而匕首見軻左手把秦王袖右
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起環柱走揆劒之
憂室不能即揆軻亟秦王倉卒不知所爲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西湖夢尋卷一

古劒蝶菴張岱著纂　男鏞式鏞式宣編輯
山陰曲轅王雨謙評定　鐫式貞

西湖總記

明聖二湖

自馬臻開鑑湖而繇漢及唐得名最蚤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豔矣至於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

馬臻開鑑湖原不從遊覽起見八百里肥饒不必與西湖較淡艷也

後稱美嫫母無鹽不在人間耶余笑而從之遂錄以助諸君子軒渠云爾

卧雲居士許自昌識

先君子詩集有咏情草百花雜咏卧雲稿霏玉軒秋水亭樗齋噫餘州行世咏情則冢初刻也凡先君子片紙隻字得之遺編破簏中罔不奉為拱璧而況寄情於吟咏者乎居常每恨生晚獨不及展誦咏情為一生父事忽一日玄圃陸師袖此草以示余不覺悲喜交集者久之嗟乎而今而後可釋憾於夢寐間矣殆將什襲以藏永之珍為先世之手澤敢復致有遺珠之嘆乎哉 時崇禎乙亥八年中秋六日玄圃陸師拜識

山陰未葉乃敬行春閣 康熙癸丑年先嚴選今留都徵序十三篇自為手訂謝擯歲甲子秋壁田已歸七年矣而後已歸田之年矣 閒居之海棠花前 拾靜

明万历刻《卧云稿》跋文

卧雲稿序

江左自六朝雄麗山川朗秀峭蒨之氣盡洩于江鮑徐庾諸君至今土石蒙潤卉木含芬一亭一榭咸被嘉名一壑一丘悉遺霸蹟亦既吐華敷藻

茂苑許自昌玄祐著

從軍行

少年意氣輕山嶽摘句尋章何足學橫梢指顧風雲生走馬射鵰自超卓鴈門關外單于來天子詔書頃刻催閨中兒女不解事一聞此言如死灰怒目叱咤盡辟易丈夫胷中有奇策昔日不聞山中行半夜射虎羽沒石單于知吾名閨

建吉錄序

予嘗讀易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而知自天命以止有一善更無惡對故止有一吉更無凶悔吝對所謂善之長者蓋不落於善者也自有善有惡王文成歸於意之動而爲善去惡之工夫便當急趨勿失即此日常間自安自便苟且依違之念若以爲無有大過而不知便是入迷途永無覺路嗟乎有生非善即利更無別徑可參半以行一舉足便宜危惕

明《远山堂文稀》稿本

保主

王元功

傳事

但曲有繁簡

趙子能爲生角即取國傳中能不支蔓作曲之宜未必十篇便屬勝場如此記每一人立脚處未定俟復有小調源者作其作無閒情之處恐著淨雜觀者

者劍

王元功

格善變詞善轉便是能手此記生旦通本不脫豪俠之氣而始終合者乃在一黎如大奇二其間聚散原不閒一劍此中似可省一二轉摺

、靈犀佩

王元功

大凡情緣一起必有一種大不快人意處爲之顛倒

明《远山堂曲品》稿本

曲品敘

予素有頑悞之僻見呂鬱藍曲品而會心焉其品所及者未滿二百種予所見新舊諸本蓋倍是而且過之歆嘖評於其末惧續貂也乃更為之分為六品不及品者則以雜調黜焉品成作而嘆曰詞至今日而極盛至今日而亦極衰學究屠沽盡傳子墨黃鍾瓦缶稿陳而莫知其是非予操三寸不律為詞場董狐予則予奪則奪一人而聚瑜不相掩一帙而雅俗不

不數人慮詞幟之孤標不得不獎譎同好耳世有知者吾言不與易也如或罪我吾亦任之

曲品凡例

一品中皆南詞而西廂西遊凌雲三北曲何以入品蓋以全記故也全記皆入品無論南北也

一文人善變要不能設一格以待之有自濃而歸淡自俗而趨雅自奔逸而就規矩如湯清遠他作入紫釵獨以艷稱沈詞隱他作入雅四異獨以逸

起句好

8

咏情草

茂死許自昌玄祐父

寄征衣

落葉暗蟲不語挑燈縫衣淚如雨妾心雖念君身寒君心未識妾心苦若還識得妾心愁猶勝沙場戰胡虜日照紗牕戶尚扃夜擁孤衾坐殘鼓暫憑魂夢到天山欲訴離懷不堪數郎征胡虜爲封侯妾獨凄涼竟何補西風江上鴈聲哀忍看霜滿庭前樹著衣若念縫衣人勿信秋

詠懷古跡

雲壑余懷著

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風流甲於天下喪亂以來多為茂草予以暇日尋攬古跡形諸歌詠以備採風然舉目河山傷心第宅華清如夢江南可哀其為悱惻可勝道哉

玄武湖

清顺治刻《咏怀古迹》

石巢阮大鋮集之著

衲子德　浩宗白較

早春至平等菴憶宗白遊吳

冬花繞巖曲孤錫向何飛楚嶠猩中秀吳雲鳥外

微林香開藥路龕碧積苔衣君夢如諳此何須破

夏歸

同楊順賢吳元起宗白循元牛首山關步禪

詩初先生壁間韵

湯老人扭揑則大雄峰頭

一喝三日耳聾是何音調

丁丑仲冬廿有三日

弟馬士英具草

明崇祯刻《咏怀堂诗外集》

明崇祯刻《咏怀堂丙子诗》马士英序

晉熙集之阮大鋮著

齊安退思杜祝進較

雨中同馬中丞瑤艸吳元起宗白循元

登牛首夜集

寒山何可陟落葉滿空林更聽巖間雨難登燈下心報閒資野酌給夢與鐘音軋軋慈烏語爲予此夕深

敘

向余從集之爲牛首遊集之有落葉滿空林句余亦有深機相接處一葉落僧前句今歲集之集其丙子

目　　录

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1）
张岱《琅嬛文集》跋 ……（10）
关于张宗子 ……（17）
关于余淡心 ……（25）
余淡心与金陵 ……（37）
关于吴梅村 ……（48）
《鸳湖曲》笺证
——吴昌时事辑 ……（60）
《〈鸳湖曲〉笺证》补记 ……（97）
吴梅村《南湖春雨图》……（109）
咏怀堂诗……（114）
海滨消夏记……（128）
不是抬杠……（139）
姑苏访书记……（150）
西南访书记……（155）
西南访书续记……（164）
读《一氓题跋》……（174）

生小说《红楼》……（182）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89）
关于“提要”……（200）
阿英与书……（208）
澹生堂二三事……（214）
《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238）
《天一阁被劫书目》前记……（258）
梅花墅……（271）

后记……（289）

绝对的散文家——张宗子

生于明末的山阴张岱(宗子),是一位历史学家、市井诗人,又是一位绝代的散文家,是我平素非常佩服的作者。很久以前就写下这样一个题目了,可是一直踌躇着没有动笔。我总是担心“绝代”两个字是不是有点“绝”了。后来又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论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与特色,这样说也许还是可以的。他当然不是空前绝后的,也不可能概括、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些都用不着多说。

严又陵曾为翻译提出过“信、达、雅”的三字标准,很久以来,人们对文学批评也提出过“才、学、识”三个字,作为衡量的尺度。我觉得直到今天这也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全面、科学的看法,而且也不只在文学批评中才适用。“才”,包括了才能、文采、写作的本领……这大约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学”就不同,通常只是狭窄地理解为读的书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不只包含了书本上的知识,还有更重要的生活知识的内容。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比起书本来更为丰富、深刻、生动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司马迁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识”当然是识见,即立场、观点和也受到前面两个条件制约

的见解、看法，也不是什么孤立的东西。有了这样三条标准，似乎就要好得多。因为它注意到了生活、实践这两个重要方面，并使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张岱，就将发现，他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写作上的才能，他的主要成就也正在这里。他的学问并不怎样了不得，就文化素养来说，大约也不过是封建社会中等文士的水平；不过他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平时非常注意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动态、人民生活、风俗习惯，以至食物、蔬果等许多方面，而且有加以欣赏、纪录的兴趣与勇气。这许多，往往正是旧时代的正宗文士所不屑一顾的。说到“识”，恐怕要算最差。只是在生活态度、美学思想等方面多少突破了封建文化的某些习惯势力。至于他的主导思想还不能不是传统的。三百年前发生的那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一次猛烈的冲击，确曾给像张岱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震撼，但到底未能给他带来怎样根本性的改变。

张岱出生于一个封建社会的“世家”。看他所写的“家传”，在官僚地主群中，张家还算不得是最阔气的，但他到底是世家子弟，是一位大少爷。他的曾祖张元忭是隆庆辛未科的状元。我曾得到过他所作的《不二斋文选》，不曾细读，只记得前面附有一张小像，是穿了官服的一个精瘦的老头儿。不知怎的，我总想张宗子一定也是这模样。张岱写过一篇《自为墓志铭》，非常坦率地承认他“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简直是极精确地勾勒出了醉生梦死地生活在那个封建末世的一切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形象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作为我们

了解这批高级寄生虫的一把有用的钥匙。曾经作过如此坦率自白的人，在晚明，我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

他的这些“生活经验”，全部写在他的两部著名的回忆录中了——《(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在五十四年前，《梦忆》就曾由俞平伯先生重印，是为“朴社重刊”本，根据的大约是伍崇曜的丛书本，是据乾隆甲寅仁和王文诰刻本重雕的。这原本我在傅惜华家中曾见到过，好像也流传得非常少了。我后来得到的则是道光二年王文诰重刻巾箱本，却也刻得很精。在二十八年之后，王氏又重刻此书，可以看出他对《梦忆》的赏识与珍重。

《梦忆》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所说的那些内容，是一个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忏悔录”。它的价值所在，是给后世的读者留下了晚明社会生活一个侧面的真实而生动的速写、纪录。这无论是《武林旧事》，还是《东京梦华录》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张岱后来写下了《石匮书》，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但他在写《梦忆》时，却没有写历史或地志的“雄心壮志”，因而挣脱了那些传统的束缚。张岱实在是三百年前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他写的那些速写、通讯、报告，都是很短的。少者几十百字，比较长的如《扬州瘦马》，也不过六七百字，却已将明末扬州的人肉市场的形形色色统统写了出来。他写出了那么一批特意赶到扬州来“娶妾”的大老倌，因而产生了一大批等待选购的“货物”——“瘦马”，这名目在唐诗中就早已出现，可见是一种有长远历史传统的风习了。随之产生的是一大批“牙婆驵侩”，“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他细写了从挑选、付费、送“货”上门的全过程。从全篇中我们看不出张岱是反对这种人肉买卖的，他似乎并不反对纳妾，但他对这种种的厌恶还是鲜明的。有时候忠实的“客观报道”，就会产生这样的力量。他细写了挑选

货色的全过程，用的是白描的方法，还记下了当时所用的口语。

>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哨哨"，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哨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了？"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

这不但介绍了过程，还写出了声口、动作。牙婆录音机似的指挥，"瘦马"宛转顺从的姿态，买主虽不曾正面写，作为背景人物，这一切就全都像活的一样。同样的情形，不是直到解放前夕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同小异地存在着吗？张岱还特别介绍了鉴定小脚的"经验"，不只说明他是"内行"，也暴露了他的低级趣味。

晚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在表现形式上是尽量采用新的句法结构、奇奇怪怪的形容词……作者们企图闯出一条新路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但有时就不免流于怪诞、艰涩，如《帝京景物略》中的有些写景文就是一例。但在张宗子这里却并不如此。他力图简洁，但显得平易；苦心铸辞，却不失自然。特别是他用这样短的篇幅，写出如此丰富、生动的内容，是值得佩服的。

同是写伎家生活的还有一篇是写出身于南京低级妓院的"朱市妓"王月生。她虽然出身于"曲中羞与为伍"的朱市，连同辈也看不起，但因品格容貌的出群，终于成为头等的红倌人。张

岱写这个女人，只抓住“矜贵寡言笑”这一特点，用两三件小事，就把人物写活了。全篇三百二十字。

这是一位无论费尽了姐妹、帮闲们怎样的心思、手段也无法使之一笑的少女。但她却喜欢吃茶，天天都要到闵老子（一位著名的茶道专家）家“啜茶数壶”，并在那里与知心朋友会晤。如此看来，王月生的“矜贵寡言笑”就并非生来的怪癖。文章结尾说有一位“公子”，和她鬼混了半月之久，“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颊，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噻涩出二字曰：‘家去。’”寥寥五十几个字，公子之恶俗庸愚，帮闲的无聊凑趣，一场果戈理笔下才会出现的闹剧，一霎时开场，一霎时又收了梢。而王月生这人物，却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了。她终于开了口，但只说了“家去”两个字，可这中间包含了多少内容啊！王月生怎么说，又能向谁去说呢？

张岱是秦淮河上的常客，他对这种生活是非常熟习的。但也只有他能在热闹中看出闲静，喧笑中发现眼泪。他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敏锐的眼睛。

南京雨花台附近的报恩寺塔久已焚毁了。三十多年前我还看到过扔在废墟上的一角琉璃瓦残余构件，现在恐怕连废墟也将无从寻觅。但张宗子看到的却是完整的原物，他称之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这确是惊人但异常贴切的定义。永乐窑的瓷器现在已经成为宝贝，这塔却正是永乐时烧出的特号琉璃窑器，一座不折不扣的“大”古董。像高明的漫画家一样，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则是读者自己的事。

有时候他也爽性地说出结论来。《二十四桥风月》篇说扬州

夜晚的景色，涂脂抹粉在茶馆酒肆之前“站关”的可怜的卖春妇。“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这些可怜的终于找不到主顾的女人，挨到很晚了，“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张岱有许多写西湖的名篇。他的看西湖，也绝不与别人相同。《湖心亭看雪》一文说：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湖心亭是许多人都去玩过的，可是有多少人看到过张岱这里描写的景色呢？描写西湖风景的人也可谓多矣，可是谁又曾用精炼至极的笔墨如此凸现地勾画出山水的精英？

张岱从不花费大量笔墨写风景，他写的风景又总是充满了动态生机的。《闰中秋》篇写他在绍兴与许多朋友夜里在蕺山亭吃酒看戏，直到四鼓方散。“月光泼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云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炉、鹅鼻、天柱诸峰，仅露髻尖而已。”

张岱说过两句话，他自己非常得意，曾屡次提起：“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初看似乎有些偏激，但细想却颇有意思。那下半句简直就否定了所谓“足赤”的“完人”，即“伪君子”，可谓“伤心悟道”之言。其实这些也无非是平平常常的道理，谁又没有或多或少一点个人癖好呢？张岱自己是个爱玩的人，已在为自己写的《墓志铭》里

做过老实的交代。他喜欢玩的事物真是非常广泛，在这些领域内他是个真正的内行，有很高的欣赏水平。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事物既是封建地主阶级荒唐享乐的表现，同时也是通过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封建文化的精华。

张岱喜欢看戏，也深通戏剧艺术的每个方面。他家从祖辈起就养着戏班子，他的亲戚祁彪佳也是爱看戏并收藏了丰富剧本的戏剧评论家。《梦忆》中谈到演剧的文字不下十篇之多，中间有许多珍贵的戏剧史料，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受到研究戏剧史的学者应有的重视。

他记崇帧二年夜半在镇江金山寺演出“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记一个老地主朱云崃训练家蓄女乐的方式方法。记他祖父自己创建的私家戏班，先后有“可餐班”等六个之多。其中“吴郡班”中演员有王畹生，是与柳如是同时有名的人物，王玉烟的妹妹，李因有赠畹生诗在《竹笑轩吟草》中。《刘晖吉女戏》篇则记录了明末即已出现的舞台布景切末：

> 如唐明皇游月宫，叶法善作(场)。场上一时黑魆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幔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

这是非常珍贵的早期舞台装置的精确记录。三四十年前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天香庆节》等戏，大致也不过就是如此，也许还没有这里所写的精妙。而场上多重幕的使用，在明末也早已

开始了。

张岱记女演员朱楚生与姚益城“讲究关节、妙人情理”，演出《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剧，“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虽然没有举出具体实例，但艺人进行舞台创造的艰苦，读者是可以领略到的。

《过剑门》篇写他以戏曲行家的身份，在演员中拥有的威望；《冰山记》记魏忠贤败后，他删改重排了一时涌现的“十数本”反映同一斗争题材的剧本，并取得成功的故事。不只显示了当时运用戏剧艺术进行政治斗争的热潮，也说明他自己对上演这种“现代戏”的饱满热情。张岱和阮大铖是朋友，他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这和《续幸存录》的说法有些相近，是带有回护意味的恕词。他对阮大铖训练的“家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着眼点不只放在剧本上，更着重的是场上的功夫。“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还指出在每本戏中安排了“龙灯”、“紫姑”、“走解”、“猴戏”等不同关目的创造性，实在应该算是一篇有内容、有深度、在戏剧史上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评论。

这里只是约略触及了张岱有关戏剧的记述与见解，此外还有许多方面，他都观察得细致，领会得深刻，传达得巧妙。他是个市井诗人，他的回忆录不愧是晚明社会文化风俗史的出色评述，同时又是一束绝美的散文。

人们有时会误解张岱只是一位小品文作者，这是不确的。他晚年写下的《石匮书》，是具有一代国史规模的大著作，不必说了。他还有一部《史阙》，煌煌六大册稿本，也不能说是小品。在

序文中他说明了自己的史学见解和文艺见解。他认为流传的正史是不完备的，于是“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他这种为正史“剔牙缝”的工作，是有效的。不只往往能揭出历史真相，也提高了文学感染力。他举出两例说明这种见解：

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摸（摹）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余又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征，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

这是很高明的文艺评论见解，他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付之实践了。这样做需要写作才能，是不待说的；但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忠实态度。这些张岱也是做得好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张岱《琅嬛文集》跋

书友郭石麒向曾以虞山沈氏旧藏书介以归余，颇有佳本。大抵皆爱日精庐张氏、旧山楼赵氏故物。近又以数种来，却少佳册。前又遇之市中，怀中出原单见示。知别有抄本《塔影园集》、《琅嬛文集》，已为范某取去，即嘱其取归。前日过市，见此《琅嬛文集》，系八千卷楼故物，宗子手稿，不禁狂喜。今春，余于“传薪”获宗子《史阙》手稿六帙，尚为待刻之本，剪贴毛订，所用纸与此册全同，写手亦出一人。是同为手迹，可无疑义。《史阙》六帙，出于会稽山中，深藏密锁，几三百年。此册则不知何时，流入武林，入泉唐丁氏。八千卷楼书散，又未随楼书俱入盗山，流至常熟，有“翁同龢观”印。今又散入市肆，并归余斋。书缘之美，何可言耶？《北平图书馆目》中有《张子文粃》若干卷，亦称稿本。不知与此书异同何若。他日凤城观书，当一决此疑也。余旧好宗子文，然所获无佳本。今春偶得《史阙》稿本，又得康熙凤嬉堂原刊本《西湖梦寻》，王见大刊巾箱本《梦忆》，今更得此，是所藏可谓富矣。辛卯六月半记。

右凡五卷。自古乐府至五言律，通得诗三百又五章，宗子手稿本也。尚有散叶，夹于卷中。用黑格纸，与所藏《史阙》手稿六

帙，用纸全同，手迹如一，手稿确无可疑。原订一册，止于五言律，疑非全书。归八千卷楼时，即已如是。丁氏亦未甚重之。书面题“集”字，又“别集”“国朝”字样，皆楼中藏书旧式，末钤“八千卷楼”楷书小朱印，亦不入《善本书志》，惟丁氏全目中有之，杂厕于清初人别集中，只著“抄本”字样，盖不知其为手稿也。卷端亦只“曾藏八千卷楼”一印，皆以通常写本视之之证。丁氏杭人，于乡贤著述，茫昧如此，是不可解。光绪中《琅嬛文集》曾有刻本，有文无诗。只古乐府曾刊入之。所据当是别一抄本。丁氏书光绪中由端午桥购归江南图书馆，由杭州载之江宁，入龙蟠里。名书重器具无恙，惟词曲类及其他零星小册，颇有流失。当是端方幕府中人，择取精本，据为己有；或端午桥以之赠当国大老，皆不可知。此种书余得经眼或入藏者，凡六七种。如清初内府写本《麒麟阁》四册，开花纸精抄。有红色小纸题扮演角色名字于人物表下，曾在安乐堂之书也。又清初竹纸黑格精抄本《曲谱》二函，亦内府写本。又淡生堂抄本《对床夜话》，有祁旷翁手跋及吕晚村、张宗楠藏印。是皆铭心佳品，虽曾得之，然终不能守。又尝见明初黑口本吕岩集，为九峰旧庐物，未之收也。又于石麒许得崇祯刻阮大铖三集，原刻精绝。与此册皆有翁常熟观印，颇疑即当日端方持赠翁相之书。诸书皆曾有传抄之本，流在人间，实为八千卷楼中精骑，余得见而收之，书缘墨福，何可言耶？得此书前六月，于“传薪”得《史阙》稿本六巨帙，用纸与此全同，然皆经剪贴作帐簿状，当为宗子手稿长编原式，手迹与此正同。后得道光中刻《史阙》六卷，跋云所据为蝇头细字书，亦不言抄本抑稿本也。宗子著书，明末付刻者未见，《西湖梦寻》刻于康熙末年，余亦收一原刻，板心有“凤嬉堂”三字。张氏子孙家贫，不能刻先人遗稿，《梦寻》之刻，亦赖友人之助。然遗稿颇有传抄副本，其

蝇头细字本，当即此类。传世亦非仅一二本。昔日尝于诸家藏目中搜宗子稿本得七八种，皆可踪迹。其原稿之确然无疑者，只此册及《史阙》六册耳。此册中诗之有纪年者，断手于康熙九年；又知宗子当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得年必在七十四岁以上。集中数及《石匮书》撰作事，又方物之咏多至数十章，老饕习性如见。家破之后窘迫种种亦时见之诗中。“舂米”、“担粪”两章所写，最见性情。遗民心事，更处处流露。此集即子孙力能刊刻，亦不敢也。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无与抗手，诗实未佳，然可征故实。《石匮书》有盛名，然实不足与他家私史比肩。此集中有诗及《名山藏》，以为秘册，《石匮》一书多据之，可知当日所见，亦不广也。余藏此书逾十年，前四年始通读一过，曾撰长跋，后亦迷失。今为补目，聊记一二。多凭记忆，未能详也。时戊申中秋前七日，试尺木堂造研经校史之墨书。

以上是我写在《琅嬛文集》卷前的两通旧跋。原书竹纸黑格，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单边。以诗体分卷，每卷前有大题，不书卷数。次行属“古剑陶庵张岱著”。卷中校改甚多。有圈点，有评语，出别一人手。又有钩乙删削之迹，书眉有书“选”字“删”字者，有题“诗砾”二字者，这应该是宗子拟编未就的另一诗集或选集的名目。收藏有“曾藏八千卷楼”白文方印，“翁同龢观”朱文长印，“左翁寓目”白文方印。

这个诗集稿本收“古乐府”、“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诸体诗，可能是个残本，以下应该还有“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诸体。只有“古乐府”部分曾刻入《琅嬛文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六)》中曾提到的一九三五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琅嬛文集》，就是据光绪刻本标点排印的。标点者刘大杰。鲁迅指出，在《景

清刺》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
>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询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询。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鲁迅在这里所批评的乱点古书，自误误人的事例，是极确的。恰巧作者张岱的手稿就在这里，不但有改句，而且有作者自己的圈点、断句，都在证明着鲁迅说得不错。此外，用原稿对照排印本，就还有一些错误。

“清旦伏铅刀以朝”句，“旦”原稿作“坦”。

“有顷，默然而前”句，“默”原稿作“黯”。

在叙罢景清被剥皮之后，张岱写道：“械系长安门。上寝梦清环殿追劫之。”标点本在“上”字下断句，也大错了。这样一来，不但将景清的尸体移到了“长安门上”，同时也使我们胡里胡涂，不知道睡觉和做梦的到底是谁。

“赤其族。掘夷其先冢籍里。”这一句也是莫明其妙的。查原稿，原来漏去一个“其”字。应该是：“掘夷其先冢。籍其里。”

才对。

此外，还有两处排印本并不错，而新版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却印错了。那就是“跃而询”、“王且询”的两个“询”字，都应该是“询”。“询”者骂也。原稿里写得清清楚楚。

由此可见，版本校勘之学还是不可不讲的。粗制滥造的标点书的出现，重要的原因固然是标点者的工作态度与学力都不够理想，底本的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原书充满了错简、误漏的句子，标点者即使用尽心机也无能为力，不作任何声明也不加任何标点符号，留下了使读者猜不透的古怪的长句，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作法。如果尽量作了校勘的努力还不能解决，那就应该注明疑有误漏，使读者明白。

自从考证学被不分青红皂白加上了“繁琐”的徽号以来，许多人不敢作考证了。版本学就更不必说，好像只是一群“雅人”或“遗老”、“遗少”酒足饭饱后所干的无聊营生，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一切都是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前提，正与不可想象把钢铁联合企业建筑在沙滩上一样。

关于张宗子的著作，多年来一直留心查考，只是见闻寡陋，只知道有这样一些：

《四书遇》，不分卷，六册，明山阴张岱撰。明抄稿本。末附寿王白岳诗手稿二纸，有马浮题识。

《古今义烈传》，八卷，四册。明山阴张岱撰。旧抄本。首有祁彪佳序。以上两种见《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按此书有天启刻本。

《陶庵梦忆》，八卷，二册。有乾隆五十九年仁和王文诰刻本，大板。又有道光王见大（文诰）刻巾箱本，题《梦忆》。

《琅嬛乞巧录》，稿本。（《鄞县通志·文献志》著录四明张氏

约园藏书）

《石匮书》，未分卷，八册，稿本。

《夜航船》，二十卷，观术堂抄本。

《陶庵对偶故事》，二卷，稿本。

《琅嬛文集》，不分卷，四册，稿本。与刻本不同。（以上四种见《鄞县通志·文献志》著录朱氏别宥斋藏书）

《石匮书》，二百二十一卷，五十一册，明张岱撰，抄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善本书目》著录。

《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张岱撰，传抄本。原缺九卷，最后附“别传”阙。见《贩书偶记》。

《史阙》，十五卷，道光甲申刻。

《琅嬛文集》，六卷，光绪丁丑刻。

《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不分卷，乾隆刻。

《快园道古》，原刻《西湖梦寻》“凡例”中著录。又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三曾摘录九则。

《西湖梦寻》，五卷，康熙丁酉凤嬉堂刻本。

《张子文秕》，十八卷，抄稿本。竹纸，黑格。版心上有“琅嬛文集卷□”，下有“凤嬉堂”，皆刻板。书眉上有评语，与《梦寻》格式正同。大题下三行云：陶庵张岱著，白岳王雨谦评，雪瓢祁豸佳校。卷前有“年家社弟曲辕王雨谦撰并书”之序，“同学弟雪瓢祁豸佳撰并书”之《琅嬛文集序》，次目录。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

《张子诗秕》，五卷，版式同前。前有“庚子夏五潞溪识字田夫雨谦撰”序；“己丑重九日小弟弘顿首题”序；“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自序。

《文秕》、《诗秕》诸序后皆有撰者朱印。此书为平妖堂旧藏，

有“鄞马廉字隅卿所藏图书”朱文长印。

以上根据手头保存的笔记少加整理，粗陋在所不免。诸书只记抄稿及最早刻本。凡辗转重印之本都未记录，但其中也有重要的本子，如《陶庵梦忆》有一九二七年北平朴社的重刊本，俞平伯校点。这是近代流行最广的一个本子，许多人是通过它开始接触《梦忆》的。

张岱是出现于明末清初那个时代里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作者。在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中，他既有遗民的共性，也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他的散文写得好，在晚明诸家中是非常突出、有着自己风格的作者。他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观察事物也有自己特有的方法。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明显的近代气息。他的生平、身世、遭遇是形成这种特色的根据，我觉得很有加以研究的必要。通过研究，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及文学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

关于张宗子

张宗子著作以《梦忆》流布最广，文集至光绪中始墨版，传世亦稀。十余年前先后得《史阙》、《琅嬛文集》二种，皆张氏手稿。前者出于越东山中，后者则丁氏八千卷楼旧物。叹为双美。

宗子平生著述甚夥，其曾于生前墨版者，只天启中刻《古今义烈传》八卷一种。他书不传。甲乙之际，国破家亡。遗稿藏于家，子孙无力刊刻，亦不敢刻也。康熙季年始刊《西湖梦寻》五卷于粤东，是为家刊最早之本。（宗子他种著述，略见《琅嬛文集》跋，今略。）又有汉阳朱氏乾隆中抄《评东坡和陶诗》一册，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见会稽周氏《旧书回想记》）。又《快园道古》一种，则见于《梦寻》原刻《凡例》。年来浏览所及，仅乃得此。今《琅嬛文集》卷一存自撰诸书序文，尚十余种，（《自为墓志铭》所著录自撰诸书，尚有《张氏家谱》、《明易》、《大易用》、《说铃》、《昌谷解》、《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等。）恐皆无从踪迹矣。

光绪丁丑刻《琅嬛文集》，为湘潭黎培敬刻，所据则会稽王惠藏本。王氏跋云："余束发时，读书于山阴余浣公侍御家。检其藏书，有《琅嬛文集》一帙。蚊脚细草，蟫蠹襭襮，盖张陶庵后裔世传而尚未付雕者也。余见而攫之，五十年来，藏之敝箧。"跋作

于道光戊戌，知其得书于余氏大观楼，当在乾隆末。而郑刻《史阙》跋文亦言所据原底为蚊脚细草之本，意此皆当日清抄底本，余所藏二种则草稿也。独怪大观楼本，何以无诗？宗子曾有《琅嬛诗集序》，意必已另编，只纳《古乐府》一种入《文集》中耳。

宗子撰著最显者为《梦忆》、《梦寻》二种，皆作于甲申以后，以遗民而追忆前朝盛事。时家已陵替，窘辱之余，缅怀少年贵盛往迹，文字悲凉，可方《武林旧事》、《东京梦华》，然其晚年生涯，人多不知。此诗稿所存此类资料甚富，尤以记清初江南变乱情状为有史料价值。集中有甲申以前诗，而大半为国变后所制。最晚之作为庚戌十月诗。庚戌为康熙九年，宗子年七十四矣。（《绍兴府志·宗子传》云宗子卒年九十三。）

宗子《自为墓志铭》，自论平生，极痛切率真，文字亦佳。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二人。其略云："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因自为墓铭，其忏悔心情，与遗民心事，俱跃然纸上。《琅嬛》一集，大抵皆可为此两事做注脚。此集幸而未刻，亦幸而深藏密锁几三百年，遂得逸出禁网。岂非不幸中之大幸。宗子自叙其诗，言少喜徐文长、袁中郎、钟伯敬、谭友夏之

作，亦尝学之，然终当自具面目。今观此集，则诚非徐、袁、钟、谭之诗也。其诗之所抒写，大略为如下数事：记乱后生活，记撰朱明国史，记诸方美物。贯串其中者，遗民之心事也。甲申以前作多不佳，然亦有数端可采。五律有《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有句云："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是可见当日清流议论初非一律，盖不仅夏氏《幸存录》于圆海有恕词也。又七言古诗之《寓山士女游春曲》、《闵汶水茶》、《曲中妓王月生》、《祁奕远鲜云小伶歌》、《柳麻子说书》等，皆可为《梦忆》注脚。五律有《咏方物》三十六题，皆以老饕而作诸物董狐者。

宗子为山阴祁氏姻娅。宗子仲叔联芳，字尔葆，号二酉生。祁彪佳于日记中称为"母姨"。乙酉彪佳自沉死。子理孙、班孙谋兴复故国，终以破家。祁、张皆山阴大族。祁氏家败以此；张氏之陵替，其故事不得甚详。然国变兵燹固覆败之一主因也。集中多有避兵之作。最早在丙戌，乙酉后一年也。其《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五古云：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住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乃有孙宾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焦饮及酸虀，遂与数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一住过三春，两月生明日。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上人日不来，携灯话促膝。与之商古今，侃侃具绳尺。开士有心人，偶尔隐缁笠。一日缘山行，乃为人物色。姓氏落人间，不复能隐匿。剥啄叩僧寮，来往如络绎。仓卒去庐山，康乐逃莲席。不及别远公，时时在胸臆。戎索政自

苛，搜罗遍荒僻。恐以累檀那，凤起不留革。何日得升平，扶笻到山泽。再过虎谿头，笑言常哑哑。

宗子诗以五古最富，亦最佳。语言冲淡，意则深挚。读此，可知于密迩越城山中，尚有百余僧众聚居之大寺，乃得闲窗著史。然避居亦大不易。宗子偶山行，遂为逻者所见，搜索日至，遂不能不更避居他所。临行慌促，竟不及与远公一别，留诗以谢，其词甚苦。当日网罗之密，遗民之不遑宁处，即方外丛林亦非净土也。

其后更有《和贫士》诗七首，小序云："丙戌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午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以寄剡中诸弟子。"其句有云："清飙当晚至，岂不寒与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腹饥徒煮字，樽空耻自斟。岂无长安米，苟得非所钦。丹厓与白石，彼或谅吾心。""天柱既已折，杞人复何忧。行吟在泽畔，吾将见吾俦。幸不惭死友，此心何所求。"此诸诗大抵作于离萧寺别居之后，即酸藿焦饭亦不可更得，诗境乃益凄苦，禾黍之思亦益炽。死友者，祁虎子辈也。其后更有《和〈述酒〉》诗、《和〈挽歌辞〉》诗，遗民悲愤，洋溢行间。《和〈述酒〉》云："空山堆落叶，夜壑声不闻。攀条临绝巘，人过荆莽分。行到悬崖下，伫立看飞云。生前一杯酒，未必到荒坟。中夜常堕泪，伏枕听司晨。愤惋从中出，意气不得驯。天宇尽寥阔，谁能容吾身。余生有几日，著书敢不勤。手勒大明（胸抱万古）字，悲凄思故君（凉失所群）。易水声变徵，断琴奏南薰。竹简书日月，石鼓发奇文。王通抱空策，默塞老河汾。灌圃南山下，愿言解世纷。得与豺虎远（所之不合宜），自来（与）鱼鸟亲。若说陶弘景，拟我非其伦。"此诗上有评语，句中有改字，俱出另一人手。其所改字（在

括弧中)皆意在避忌也。常见清初人集之当时刻本或后来翻本，句句恭谨，毫无触碍，然其人实为遗民，其事颇不可解。见此遂恍然悟。苟此书而刻，原稿不存，则张陶庵亦不过一通常失意之文士耳。更何由见其时代精神？此稿本之可贵也。

《和〈挽歌辞〉》句云："张子自觅死，不受人鬼促。义不帝强秦，微功何足录。""身虽(既)死泉下，心犹念本(千岁如一)朝。目睹两京失(岁月除)，中兴事(心竟)若何。匈奴尚未灭(平生不得志)，魂亦不归家。"所改字更大失本意，虽意在避祸，然甚非君子爱人以德之道也。

其下更有长古《孝陵磨剑歌》(题下小注，"丁亥七月十六日项里记梦")，撰于顺治四年。词更慷慨。此诗托言纪梦，实为遗民心事之真实写照。即当日陶庵确有此梦，其造梦之因亦彰彰明甚。孝陵为朱明帝王陵寝之在江南者，贰臣如陈之遴且曾献计清廷，掘之以泄王气；而遗民故老则以瞻拜孝陵为不忘故君。清初人集，往往见有此作。于此，故国故君乃于遗民心目中混而为一。

宗子诗中喜道其著明史事，屡屡言之不倦，有《借董伯音〈名山藏〉，送还致谢》诗，何乔远书非为甚僻，称为奇书，可见当日得书之艰。董氏避乱，惟携此一书与俱，"身外无长物，一书实空囊。囊重仆且痛，暴客睨其旁。探囊皆失笑，酸子溷我行。"离乱之际尚以破书为性命，为暴客所笑。其事可笑，实更可悲。又有《读查伊璜三说》诗。继佐撰《罪惟录》，宗子实曾见之，颇致钦敬。其言曰："古来作史有几个？字字皆拾龙门唾。自出手眼惟君能，廿一史中参一座。"亦推挹甚至矣，结句云："折简殷勤招及余，他年留作楮先生。"似继佐曾邀宗子共订其书者，惜不能详也。其《毅儒弟作石匮书歌答之》诗则于嗟老伤贫之外更殿以壮

语："白水真人在海隅，中兴有日定还车。班彪只许完《前汉》，范晔还成《后汉书》。"白水真人谓刘秀，其指残明诸帝，彰彰明甚。其《石匮书》之作意，则具见《读郑所南〈心史〉》诗中，诗后半曰："此书无他奇，止是骂鬻鬻。藏匿不使知，此骂有谁暴。直至今日开，骂毒亦不毒。余与三外老（所南别号——原注），抱痛同在腹。余今著明书，手到不为缩。书法凛冰霜，皦皦如初旭。论余及所南，疏密真不遫。余遇胜祥兴（帝昺年号——原注），昆阳自当伏。愿为《前汉书》，《后汉》尚有续。"结句亦以班、范二书为言，盖言明祚必不当斩，更有中兴之日也。

集中诸诗所记晚年家破后种种情事极详。向只能于《梦忆》、《梦寻》序中知其梗概者，今乃能进而得有更多了解。有《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诗："我年未至耆，落魄亦不久。奄忽数年间，居然成老叟。自经丧乱余，家亡徒赤手。恨我儿女多，中年又丧偶。七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四孙又一笄，计口十八九。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斗。昔有负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二妾老如猿，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日出不得脯，未明先起走。如是十一年，言之只自丑。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断其炊，取予不敢苟……儿辈慕功名，撇我如敝帚……阿堵与薦剡，均非尔所有。不若且归来，父子得聚首。挈瓶往灌畦，捕鱼编竹笱。四儿肯努力，储粟自盈缶。酌酒满匏尊，进为老人寿。温饱得一年，一生亦不负。胜以五鼎烹，哭我荒山阜。"此诗至佳。向之为田舍翁者，今并半亩亦无之。十一年来，惨淡偷活。老人慎操守，不欲出而营求；诸儿乃不堪清贫，思入麟凤之薮，宗子乃谆谆劝谕，使之归来，言婉而情深，一片家常话，却说得如此恳挚，所以难也。惟不知诸儿果曾徇老人意否？此诗之次即有《仲儿分爨》诗，所

写贫状更甚于前。

至甲辰(康熙三年),遂有《甲辰初度,是日饿》诗。困窘之余,乃不得不躬亲农事,其中有《舂米》、《担粪》二诗,描绘甚详。非若世之所谓田园诗人以"躬耕"为口实者,乃真有所历而知其中甘苦也。更能作忏悔语,回首少年纨袴生活,但有愧怍。其《舂米》诗云:"……余生钟鼎家,向不知稼穑。米在囷廪中,百口丛我食。婢仆数十人,殷勤伺我侧。举安进饔飧,庖人望颜色。喜则各欣然,怒则长戚戚。今皆辞我去,在百不存一。诸儿走四方,膝下皆哇泣。市米得数升,儿饥催煮急。老人负臿来,睡米敢迟刻。连下数十舂,气喘不能吸。自恨少年时,忤臼全不识。因念犬马齿,今年六十七。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膂力讵能加,举杵惟於邑。回顾小儿曹,劳苦政当习。"此诗而出之三百年前张宗子手,不能不叹为难得。然无一番天翻地覆之历练,亦必不能作此等语。此有关宗子思想转变之重要资料。《梦忆》、《梦寻》时,虽有家国之感,尚多流连光景。至此,乃能更进一解。可与《自为墓铭》并观。

宗子于奇贫至窘之余,尚不减其诙谐之态。有一诗曰《种鱼》,因贫而读致富书。得种鱼之法,买鲵千尾,畜之水滁,典衣买舟,募一老人打草,并致牲醪赛神,已罄所储,未得寸息,终乃澈悟曰:"我昔无陂泽,鱼税不到余。高斋只听雁,一卧自于徐。谁信陶朱术,烦我多起居。夜半徙然省,开囷纵所如。"

又一诗题曰:《见日铸佳茶,不能买,嗅之而已》。《梦忆》卷三有《兰雪茶》一条,即道此名茶。日铸者,越王铸剑地,其茶以欧阳永叔品题而有名。宗子精心焙制,锡以嘉名,未几,一哄如市。至是,竟无钱买,只能嗅之。诗作于顺治七年,其后半云:"今经丧乱余,断饮已四祀。庚寅三月间,不图复见此。瀹水辨

枪旂，色香一何似。盈斤索千钱，囊涩止空纸。转展更筹蹰，攘臂走阶址。意殊不能割，嗅之而已矣。嗟余家已亡，虽生亦如死。前身爱清华，事事求其美。今乃对佳茶，见猎又心喜。象箸而玉杯，长此安穷已。学取蔡君谟，此心不得侈。”

以上所揭数事，皆此集中特色。亦关心近古文学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甲辰大暑重校记

关于余淡心

我的知道余淡心(怀),是在很早以前读了《板桥杂记》的时候,恐怕比接触《桃花扇》还要早一些。开始对他发生更多的兴趣,则是三十多年前无意中从无锡孙氏“小绿天”买到他三种著作以后的事。三种著作中的两种是和南京有关的,还有附在后面的淡心儿子宾硕的《金陵览古》,更是纪录南京旧迹的专著。高兴之余也不禁觉得可惜,如果早些见到此书,那么在游览南京和写《金陵杂记》时,就将有更多的知识,也更有趣味了。我在这本书的扉叶上写下的跋文中说:

> 去岁(一九四九)余游金陵,宴胡小石先生于秦淮。酒酣,谈白下旧事甚悉,《板桥杂记》中故实,历历可数。《东山谈苑》稿本藏其家,为清抄底本而淡心手校者。于避清帝讳处浓朱满之,遗民心事可见也。又尝见有山水一幅,中杂坐名士闺流,一少年坐太湖石上,风神绝世,裘葛都丽。襟袖之侧小字书余怀二字,知是渠小影也。事关作者,因更为补记于此。

这是极可珍重的知识。小石先生久住南京，他是诗人、书法家，又对历史文物有浓厚的兴趣，他的腹笥实在渊博得很，他所知道有关南京的故实真是太丰富了，可惜没有写下来，也没有人想到加以纪录。“抢救材料”的说法是十年动乱之后才开始风行起来的，在当时，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以后，我就开始留心有关余怀的故事，搜求他的作品，辑录他的诗文。收获不多，但终于也有了一本小册子。可惜后来“迷失”了，想重新写起很不容易。现在姑且搜寻记忆，描下一点简单的轮廓来，当然是极不完备的。因为目前也还没有翻检群书那样的余裕与可能。

我所知道最早注意余淡心著作的是蒋生沐，他在《东湖丛记》卷五有《余淡心著作》一文，他说：

> 余淡心(怀)《江山集》，今所见者凡四种。一、《平生萧瑟诗》，有虞山某某(按当是钱谦益)序，吴郡叶(襄)序，及余自序；一、《三吴游览志》，则吴骏公(伟业)序之；一、《枫江酒船诗》，则姜如须(垓)序之；一、《梅花诗》，亦自序。

《江山集》是总名，不分卷，收小集若干种。这里的四种是蒋生沐见过刻本的；此外还有就是“马二槎上舍藏有澹心手抄《玉琴斋词》”，就是澹心手写、吴梅村手跋、曹楝亭收藏的所谓“三绝”本，后来归八千卷楼，曾由盔山精舍影印。蒋生沐又说：“澹心著有《味外轩稿》、《板桥杂记》、《茶史》；曹倦圃侍郎(溶)《静惕堂文集》中有《题澹心杂录序》一首，则其所著当不止此。”连同《秋雪词》，全是蒋生沐没有见过的。这中间《味外轩集》(不作“稿”)也是一个总名，其下有许多名目。

《秋雪词》收入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中，有康熙金阊绿荫堂刻本，大题下属“下邳余怀曼翁”，收词四十三阕。中有《玉琴斋词》未收之作，也有不少异字。后附吴伟业、龚鼎孳评语，吴评其实就是《玉琴斋词》的前序。

《板桥杂记》异本最多，但我始终没有见过清初刻本；《茶史》及《补》我曾有康熙刻本，后来失落了。

此外，余淡心的著作还应该有：

《妇人鞋袜考》（法式善《陶庐杂录》著录，在王晫《檀几丛书》中）。

《砚林》（在《昭代丛书》中）。

《集翠裘》（戏曲，周亮工《复余淡心书》说“读广霞君《集翠裘》，觉马致远乔梦符一灯犹未灭也”）。

《余子说诗》（康熙刻钱岳《锦树堂诗鉴》前有余淡心序，有“余方弱冠。著余子说诗……”语）。

《鸳鸯湖》传奇，陈其年为撰序，在《湖海楼集》中。

《东山谈苑》，稿本，有盔山精舍影印本。

《汗青余语》（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邻初言，余淡心所著有《汗青余语》，部帙甚广，皆记明末党局事。此书当极力求之”）。

钱谦益顺治十三年作金陵绝句三十首，有两首是赠余怀的，诗后小注有“淡心方有采诗之役”语，知道余怀选过诗，不过不知名目，也不知曾否付刻。

去年在北京图书馆，得见余怀著作的原刻数种，非常高兴。这真是人间未见之书，淡心诗集的清初旧刻，不但未见藏家著录，连禁书目都不载的。书刻得也极精，可以毫不迟疑地断定，是汲古阁的开板，虽然没有留下刻书牌记也不妨事。可以作为

旁证的是，我所藏的淡心《七歌》，也是《江山集》之一，小字写刻，卷尾就有“琴川毛氏汲古阁镂”牌记一行。可见《江山集》诸种，都是托毛子晋代为付雕的。人们习知汲古阁刻的大部头书，如《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家词》、《六十种曲》等等，却很少知道毛子晋还常代朋友刻行著作，分量虽然不大，数量却很不少。这当然不是为了营利而刻，有些种甚至还要承担不小的干系。这往往都是明遗民的作品，在新朝当局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东西。这种代刻的书，有一些写样与汲古阁的通常风格不同，别有一种韵味，如姜埰的《敬亭集》、杨补的《怀古堂诗选》等即是，凡有所见，都是可贵的异书。这些书不但毛斧季，就是陶湘的《汲古阁刊书目》中也不著录。我想毛氏刻这类书的时间也并不长，只在甲申前后数年之间，文字之禁还未盛行之际。毛子晋一死，他的儿子就不再有这种魄力，也没有此种雅兴了。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几种是：

《五湖游稿》三卷（疑不全，佚后二卷）。八行、十八字。版心上有“江山集”三字，中跨边题“鸳湖卷之一”字样，下叶数，最下是“五湖游稿”四字。现存“鸳湖”、“石湖”、“泖湖”三卷。卷端的题属是“江表余怀淡心氏著”，“鸳湖”一卷的自序题“寒铁余怀澹心氏识”，这“寒铁道人”的别属，此外只见于钱谦益《金陵留别诗》的诗注中。目次最后下角有“老树庵藏书”五字。每卷前有门人吴炳台等和“男玄霸鸿客编次”两行。从这里可以知道余鸿客原名玄霸，后改宾硕。

《甲申集》八种。汲古阁刻。八行、十九字。版心下有“海幢偶编”四字。八种分别是：

《茂苑诗》，有自序。

《武塘诗》，有自序。集中武塘十友，人各一诗。“十友”是钱

尔玉、钱尔斐、钱彦林、沈文火、曹子顾、钱仲芳、曹子闲、倪曼青、钱漱广、钱不识。

《西陵诗》，有与潘嘉客《湖堤夜步》诗，嘉客是著名墨人。

《山阴诗》，自序中说："余以五月一日闻国变，五月五日渡浙江，山阴道上，又以夜卧竹舾而过之。"有《经徐文长故里》一题，小注："文长宅今为土谷祠。"

《明月庵稿》，有自序，有《遥望燕都洒泪而作》诗。

《拟古诗》，有自序。

《拟〈古诗十九首〉》。

《律鬻》，有自序，有《呈黄石斋先生》二首。

《甲申集》是一六四四年所作。余怀五月初一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立即动身逃难，渡钱塘江到了越中，大约不久就又回到南京或苏州来了。那时弘光小朝廷已经袍笏登场，他又有许多老朋友参加了政府，秦淮河上又恢复也许还更超过了旧日的繁荣。此时他也许觉得这难逃得似乎有点太快了。不料没有好久，清师进逼，小朝廷立即崩溃，这次他就只有再逃难。好像这中间曾很吃过一些苦头。但不要好久，慢慢地一切好像又恢复了正常。所谓《五湖游稿》就是他在"避地"中所作。在《鸳湖中秋诗》前有一篇小叙，他说：

> 辛卯（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八月，寄居萧寺，木樨满院，风气高寒……忆己丑（一六四九）中秋，遁迹海陵之隅，庚寅（一六五〇）中秋，飘泊虞山之下……余亦五年四处见中秋矣。

这是甲申以后五六年中他逃来逃去的纪录。不过我们也不

该过于天真，把他的逃难生活想象得如何困苦，就在《江山集》前同里林佳玑所撰的序中就说：

> ……今淡心所至，车马溢闾巷，征歌选妓，画舫留连。乐事既多，篇什遂众。岂江南之人好事异于古耶？抑淡心之才过于数子耶？不然，淡心故布衣，何所艳若是……

这就是当年余淡心“逃难”的真相，他是把秦淮河上的生活照样搬到了嘉兴、苏州、青浦……的。当然，这一切也许比不上南京，而流离迁徙的生活也是不安定的。正如吴梅村在哀悼董小宛的诗中所描写，种种不如意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于是就产生了今昔之感，也就是作诗的材料。这中间自然也有家国之感的成分在。不过当我们读诗的时候. 必须先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在这里，才可望透过雾障，获得较为真实的理解的吧。

余怀是一个“布衣”，但却并不寒素，我怀疑他的家庭可能是因经商从老家福建迁住南京（当时的留都）的，而且已经不只一代了。方文《涂山集》卷六有《余先生六十》一诗，题下小注“澹心尊人”，诗作于辛巳（崇祯十四年），前面的四句是“瑶岛移来自八闽，却依京国寄闲身。书藏万卷儿能读，酒泛千钟家不贫”。淡心的父亲看来也是一个“布衣”，同时也是个风雅的富翁。甲乙之际，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但淡心还是维持着放歌纵酒的生活，他在南京、苏州好像都有庄园住宅，又有许多朋友，都是有名的文士，其中大半是遗民，但也有新朝的显宦。关于他晚年的生活态度，前引林佳玑序中也有所描述：

> 今淡心豪情逸韵，能与人往来，所游领略辄去，不以衣

食累诸公，焉往而不得志哉！

这就是余淡心晚岁适意生活的写真。也是他得以周旋于草茅野老与大人先生之间无不如意的秘密。这就需要有必要的、个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虽然经过铁蹄的践踏，但到底还没有落到赤贫的地步，不过比起甲申以前的好日子，到底是差得多了。《板桥杂记》和大量的诗篇的产生和所持的基调，大概就是如此。

余怀大约生于万历四十四年（作于康熙七年戊申的看花诗中有“唤回五十三年梦”之句）。甲申时二十九岁。《甲申集》和《江山集》应该算是早期的作品。我得到的《七歌》也是《江山集》中的一种，只两叶。大题是《效杜甫七歌在长洲县作》，可以看作淡心的代表作品。它的不能得到流传，是一些都不奇怪的。现在就抄在这里：

有客有客字船子，平生赤脚踏海水。身经战斗少睡眠，功名富贵徒为尔。自比稷契何其愚，非薄汤武良有以。呜呼一歌兮歌激昂，日月惨淡无晶光。（其一）

我生之初遇神祖，四海苍生守环堵。旌旗杳杳，三十年，金铜仙人泪如雨。皇天剥蚀国运徂，况我无家更愁苦。沟壑未填骨髓枯，河山已异安所取。胡雁翅湿犹高飞，百尺蛟龙堕网罟。呜呼二歌兮歌声寒，林木飒飒风漫漫。（其二）

小人有母生我晚，幼多疾病长屯蹇。生不成名老何益，蚩尤夜扫兵满眼。吁嗟亡国甲申年，二竖沉沉婴圣善。呜呼三歌兮歌思绝，鹁鸽昼叫泪成血。（其三）

有妻有妻珮璠玖，十年为我闺中友。两男一女未长成，索梨觅栗堂前走。汝病数载事姑嫜，伶仃憔顿供箕帚。岂知豺狼入我户，使汝惊悸遂不寿。呜呼四歌兮歌转悲。饥乌夜夜啼孤儿。（其四）

我有敝庐东门侧，后种梧桐前挂席。数椽风雨门长闭，四壁清静苔藓碧。自从戍马生疆场，使我苍黄丧家室。我行去此安所之。渔樵无地鸡犬迫。旧雨今雨花不红，新人故人头尽白。呜呼五歌兮声乌乌，浮云为我停斯须。（其五）

有友有友在远方，或称少年或老苍。遭乱化作长黄虬，碧血潇洒盈八荒。王室风尘此亦得，明明落月满屋梁。呜呼六歌兮歌最苦，春兰秋菊长终古。（其六）

有弓救日矢救月，帝阍未开晨星没。词客哀时双泪垂，饥寒老丑空皮骨。何时东海翻波澜，暂向西园采薇蕨。呜呼七歌兮声啾啾，吞声忍恨归山丘。（其七）

这样的作品，不但在晚明，就是在中国诗史上，也是可以占得一角地位的吧。这一组诗大约作于甲申以后不久，感情的发抒似乎不曾受到任何束缚与抑制。一个在明朝最后的三十年度过了少年时光的知识分子，在一场美梦惊醒以后，投入了战斗。虽然我们不知道那详情，但从陈其年为余鸿客《金陵览古》写的序中，也多少可以知道他们父子在这场巨变里的心情和行事（顺便可以指出的是，陈其年写的是他所拿手的骈体文，全篇之中几乎全用金陵的历史故事组成，但事事都切合着现实，起了很不平常的效果。这是表达一种难言之隐的特定巧妙方式，不应当作一篇美丽的四六文空空放过）。受尽了苦难，也干脆否定了自己

空疏不切实际的抱负与梦想。他在诗里直白地写出了“亡国”的字样，提出了恢复朱明的口号与希望，透露了遗民的心愿。他哀悼、怀念老母爱妻亡友，他们都是为“王事”而直接间接牺牲的。他的感情是真挚的、痛切的。

清初魏耕、朱士稚、钱缵曾合选的《吴越诗选》卷七中收入余怀的一首《醉时歌》，可能也是同时的作品：

一月二十九日醉，醉时不觉天地碎。神仙烟舄逸空江，天姥轩皇悉狐媚。昨夜扁舟下洞庭，枇杷晚黄草麦青。故人留我南窗卧，脱衣露肘嗟飘零。传来直北旌旗赤，千山万山血凝碧。野哭邻鸡有好音，起舞有谁同今夕。忆昔皇舆败绩年，吞声忍死不敢前。乡里小儿皆得势，白头老翁无一钱。陵树苍苍云气深，侧身西望泪沾襟。流离每恨草间活，去住彼此伤人心。

此诗大约与《七歌》同作于南都倾覆以后，淡心避地苏州之际。魏雪窦对此诗的评论有“荡胸割眦”的字样，是说得对的。

清初抱经楼刻《十五国风删》。姚佺、张明弼、姜埰选定的《诗源》初集“越二”卷中有俞汝言《远游》一诗，诗后淡心附注说：“《远游》，为予作也。雨雪之情，努力之怀，沨沨翼翼，俨然未散。”此诗为淡心游嘉兴时汝言送别之作，看诗语，《江山集》中的《平生萧瑟诗》此时大约已经写定了。

余生足着远游屐，踏遍吴越苍苔山。丝竹常携安石妓，鸣弦激管岩萝间。有时独往万峰顶，搔首扪天痛哭还。我怀十年未相见，何意车驱循海甸。倾囊诗句谢玄晖，平生萧

瑟同卑贱。鸳湖秋水如碧玉，山楼清眺散晴旭。醉眠携手此一时，尧祠单父追前躅。沉吟三月别我旋，雪花片片风扬天。乾坤黯惨忽无色，鼋鼍歊浪鱼龙颠。熟视不测造化意，离合出入关重玄。余生欲前不得前，白门景物还凄然。楼头鸣筝小妇怨，香篝绣被寒无眠。棹头挂席独西去，梦到支机锦石边。

这诗和林佳玑的序文都为我们提供了余淡心“逃难”生活的某些真相。这与《七歌》中所写看似矛盾，其实是并不奇怪的。生活于晚明的文士，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复杂矛盾统一的存在。

方文《涂山集》卷七有《寄怀余淡心》一诗：

西华桥畔昔为邻，一日花间醉几巡。别上凤台三岁客，忘归虾菜五湖人。兰芳过雨谁同臭，竹箭经霜始见筠。回首蒋山云物变，青袍无数泪痕新。

此诗作于甲申以后第三年(丙戌)，时淡心已离开南京，别居苏州，因有颈联两句。诗中回忆过去在金陵结邻时看花饮酒的旧事，感叹沧桑之后的变化，称赞了故人的峥嵘晚节。

淡心住在苏州的时间似乎很久，曾与杜于皇、龚孝绪等同祭三原韩诗，时在康熙初年。见张贲《韩圣秋先生哀辞》(《白云集》卷五)。又曾游嘉定，参加侯大年等欢迎宋荔裳举行的诗会，刻有《明月诗简》二卷。康熙二十一年又曾到海盐去访汪森，《裘杼楼诗稿》卷五有《壬戌秋余淡心访予武原》诗，后附原倡。淡心与汪森、汪文柏兄弟都有交往，在海盐还曾与涉园主人倡和。淡心诗有“吴门忽遇周笪谷，说道相思已十年”句。笪谷是周筼(青

士)，是汪森华及堂中的上客，淡心就是由他的绍介来访的。在苏州时还为钱岳的《锦树堂诗鉴》、为震泽许振兴的《得闲草》撰序。到了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淡心还在苏州两次参加了尤侗招集的揖青亭诗会，座中的贵客是苏州织造曹寅。这时淡心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行辈最尊。大约就在这时曹寅请他为《楝亭图》卷作画题诗，淡心草草应命，连上款都没有留，属名是“旧京余怀”四字。诗写得也颇诙诡，“赏心亭子说秦淮，今日风流让署斋”。这是说今日“旧京”“风流”已为曹氏父子这些新贵占尽了。“谁咏君家华屋句，白杨风起恸西州。”也不是什么好话。这使我们今天也还能想见这个老头儿落落的姿态。曹寅不是白痴，但却表现了恢宏的气度。在他看来，能得到余淡心一幅诗画，其实就是很高的成就了。这以后我就没有再发现过有关淡心的诗文记事，也不能知道他终于何年。

新出版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收入瞿鸿禨《余谈心先生巾箱图，图为恽、杨合作》一诗，有这样的句子：“……持示巾箱图，淡心淡于菊。言从武夷顶，栖隐青溪曲。过江风景异，山带前朝绿。怀古立苍茫，诗成唾寒玉。幽情建业钟，独寐槃阿轴。惟髻与蓬头，妻儿从耕牧。西亭为写真，南田为画屋，弧标夐三绝，仙骨无由俗。出处各薰莸，骥尾惭芝麓……”可知这是杨晋、恽格合作的一幅画，当是淡心中年以后的画像，不晚于一六七三年。画中人还有龚孝升，他与淡心是“眉楼”中的旧识，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不过却被瞿子玖奚落了一通，这是作诗时在“遗民”这一点上发现了与余淡心的一致性，顺便大发其遗老感慨的结果。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　记

偶读陈援庵论吴渔山生平文，知道余怀曾为《墨井诗集》作序，因找出康熙飞霞阁刻《墨井诗钞》翻阅，果然在卷首看见，“壶山外史余怀题于松陵道上风雨舟中”的《〈写忧集〉序》。陈先生说：“康熙元年渔山丧母后，频客吴兴，有《写忧集》，即余怀所序者是也。”可知此序当作于康熙初元，也就是余怀与墨井频相过往的时期。余《序》说：

> 今年五月，同游霅溪。观其《写忧》一集，襟情闲放，气调苍凉。拊掌吟咏，想见其解衣磐礴，放笔写直干时也。诗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噫，忧从中来，其何以写之哉！

淡心比墨井早生几二十年，视之如小友。援庵先生说：

> 渔山明之遗民也。生瞿式耜之乡，永历之亡，渔山年三十矣。《墨井诗钞》托始于无端曰：“十年萍迹总无端，痛哭西台泪未干。到处荒凉新第宅，几人惆怅旧衣冠。”渔山盖有隐痛也。

从这里可以知道《写忧集》所写与淡心序中所说的“忧”的内容实质，也就是他们之间友情的基础。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补记

余淡心与金陵

三十多年前(一九四六)在南京作记者,曾经写过一卷《金陵杂记》。那正是“和谈”紧张之际,每天晚上发专电总要弄到两点钟左右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出去乱跑。手里只有一本《金陵古迹图考》。居然还想做考证,写文章。朋友们不但佩服我的精力旺盛,也惊叹我的胆大妄为。今天看来,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后来见书渐多,也愈益失悔当时下笔的鲁莽,总想好好聚集资料,重新改写,不料三十年过去了,一个字也不曾写出,现在是连那本《金陵杂记》也失落了。

就在写《金陵杂记》的四年之后,在上海买得了一册书。是四种著作的合订本。前三种是余淡心(怀)所作,后一种则是淡心的儿子余宾硕的作品。都是清初雕版,而版式各各不同。其中三种都是与金陵有关的,而且从来没有著录过。谈金陵遗事,恐怕没有比余淡心更出色的了罢?一卷《板桥杂记》从小就是我的爱读书,常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一起翻阅。真的很难描画我买得此书时的欣喜之情。

这是孙毓修“小绿天”的藏书。孙氏书散,陈列在一个古董商人的住宅里。我去看过几次,摆满两间房子的藏书,使我望洋

兴叹了。多谢书友郭石麒，他在书丛中找到了这本书送来给我。在旧版如林的情况下，能赏识这不起眼的清刻本，拔而出之，是非有特异的识解不办的。

余怀，字淡心，莆田人。别号有“广霞”、“无怀”、“寒铁道人”等。流寓江南甚久，看他的著作的题属，或曰“江东”，或曰“江表”，或题“云壑”，或属“旧京”，已经不再提起故乡的福建，这与越人的张宗子却自属“古剑”，使人疑其为蜀人的情况是相似的。他的身世一直不大清楚。他在明末的南京，是很活跃的人物，至少是在文酒、狭邪场中是如此。有他著名的《板桥杂记》为证。但他不像“四公子”那样出身高门巨族，也不怎样热心参加政治活动。如著名的“南部防乱公揭”好像就没有他的签名。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功名。他在《戊申看花诗》中有一句“唤回五十三年梦”，戊申是康熙七年，上推生年当在万历四十四年。

余淡心是一个典型的明遗民，有浓烈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感。

他的《七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组诗。不仅透露了作者生平的某些侧面，诗中散发的极浓重的家国之痛，在同时作者中也是十分突出的。甲乙之际产生的诗歌不为不多，但又有哪些篇章能与之相比呢？

这一组诗的写作当在甲申、乙酉之后不久，正在清师南下以后。看“身经战斗”之语，似乎余怀也曾参加过抗清的活动，但详情已不可知。在经过“天崩地陷”的大变动以后，旧有的一整套“理想”破灭了，信心丧失了。因而痛感前人非薄汤武，也未始不可理解，成为千载以上嵇阮的知己。这是封建士大夫阶层非常特异的幻灭心情。“我生之初遇神祖”，说明他出生在明神宗万历时。他是余氏的幼子，幼年体弱。他生有二男一女，此时尚在

童幼之年，他一家都流寓江南。结缡十载的爱妻死于战乱之中，是受到敌兵或乱兵的惊吓成疾死去的。他在江南曾有田宅，此宅当在金陵。诗作于长洲，可能是逃难中的客居。“其六”悼死友，无疑是在甲乙之际以生命献给故国的战士。看他说“碧血”，说“王室风尘此亦得”可证。诗人对他们的感情是炽烈沉挚的。“其七”，“有弓救日矢救月”，明显地说出了恢复故明的心愿。虽然遭到极惨重的家国之变，但并没有失去恢复之望。他希望“何时东海翻波澜”，而今天的采薇生活，也只是“暂时”的。果然，在这以后不久，郑成功、张煌言、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直抵京口。他的愿望似乎要实现了，但不幸这只是昙花一现，诗人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

《咏怀古迹》一卷，清初刻本。七行十七字，白口单边。版心上记书名，下有“浣花草堂”四字。题“云壑余怀著”。前有目次，末附《钟山纪略》，卷尾有大字篆书牌记一行：“浣华草堂藏书。”虽然没有汲古阁的字样，极可能也是毛氏代刻。全书淡心手写上板，风姿与《玉琴斋词》正同。卷首大题下有小序四行：

> 金陵六朝建都之地，山水风流，甲于天下。丧乱以来，多为茂草。予以暇日，寻揽古迹，形诸歌咏，以备采风。然举目河山，伤心第宅，华清如梦，江南可哀。其为悱恻，可胜道哉！

全书共二十九题：“玄武湖、石头城，谢公墩、冶城、新亭、邀笛步、麾扇渡、木末亭、孙楚酒楼、乌衣巷、胭脂井、凤凰台、桃叶渡、二十四航、周处台、青溪栅、台城、朱雀航、临春阁、雨花台、劳劳亭、景阳楼、帝王庙、功臣庙、白鹭洲、莫愁湖、陈三品石、羊昙

别墅、马粪巷。”每题下有小记并七绝诗一。往往平仄两用韵。如《乌衣巷》诗：

年年花发旧乌衣，燕子于今归未归。南渡衣冠犹自可，荆棘铜驼愁杀我。

小记多记故事，也间有考证，如《石头城》条引唐人诗“一片降旗出石头”，“潮打空城寂寞回”句，然后说“则当时城滨大江，今已变为平陆矣”。《新亭》条记：“吴城西南十五里……宋孝武入讨元凶劭，柳元景筑垒新亭，今石子冈是其处。”《木末亭》云：“在雨花台东最高处。上有方正学先生祠，祠祀先生及景公清像，下有宋忠襄杨公墓。”《乌衣巷》云，巷“去长干寺北不远”。《周处台》云：“台在城南鹿苑寺后。”《青溪栅》云：“青溪即今珍珠桥河一带。”《劳劳亭》云：“在城南十五里新亭陇上。古人送别，皆在此亭。李白云，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帝王庙》云：“在鸡笼山之阳，中祀伏羲、神农至宋太祖十四帝。从祀风后，力牧至岳飞等三十二臣。旧传塑元世祖像，像堕泪，遂撤之。”《功臣庙》云：“在钦天山侧。祀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等六王及都指挥冯国用等十五人。”《陈三品石》云：“台城千福院在县东北六里。院前有丑石四，各高丈余，即陈朝三品石也。”凡此所记，大抵都是明末清初的情景。三十年前我曾去过其中一些地方，大抵也只是保留了一个名目罢了。淡心所著也往往有徒立一名，旧迹无存，作诗以寄感慨的。如结末一题《马粪巷》：

王僧虔世家此巷，人多宽恕，至王志尤厚重，不录人过。东坡云，人称马粪诸王为长者，而视胡广赵戒如粪土。

簇簇人闻马粪香，江东风俗美诸王。莫言此巷无寻处，处处皆成马粪场。

这条马粪巷显然是找不到的了。但不妨仍记下一段故事。“处处皆成马粪场”，所写正是清兵南下之后，金陵城内，处处战马，遍地狼藉的情景，这不禁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所写景界虽有动静的不同，意境则是一致的。对待历史遗迹，有时不宜过于执著，持比较超然的态度较为恰当。淡心是能理解此中消息的。

《咏怀古迹》大约写在南部倾覆后不久，比《七歌》少晚，淡心三十岁少过的当口。这以后，淡心的生活情况不太清楚，他家住金陵，但经常往来长洲三吴之间，在苏州好像也有园宅。十几年前，曾在清初人集中辑得淡心作品（包括为人所撰文集序文）不少，可惜都失落了。今天能记起的是钱牧斋《有学集》中《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组诗中有关于淡心的两首：

钟山倒影浸南溪，静夜欣看紫翠齐，小妇装残无个事，为怜明月坐花西。（原注）寒铁道人余怀居面南溪，钟山峰影下垂，杜诗云半陂已南纯浸山也。

淡心《钟山纪略》小序说：“余所居南谿陂岸之东，有钟山影，峰峦倒垂，若石钟乳，余朝夕徘徊其上，不能舍去，盖不能不再拜稽首于钟山也……”可以参看。为什么要再拜稽首，那是因为孝陵就在钟山脚下的原故。牧斋又一诗：

河岳英灵运未徂，千金一字见吾徒。莫将抟黍人间饭，换取君家照夜珠。（淡心方有采诗之役）

钱谦益这一组诗，作于顺治十三年。他自乙酉在金陵迎降，成为贰臣，不久就回家闲住。这以后，曾银铛北上一次；逮系江宁一次（顺治五年）。出于投机取巧的本性，他和远在桂林的瞿式耜与近在江浙的张煌言、张名振、郑成功都有联系。当时的许多明遗民与钱的关系是颇为微妙的。大抵是形迹上有过从而实际上有界限，可能是认为他虽老而无耻，但还有可以利用之处吧。钱、余之间，有过过往，但我们看不到淡心赠钱的诗，想来他是不肯使这个名字留在自己的诗文集中。

但这两诗使我们知道，淡心丧偶之后又曾别娶。此外，他又在干着“采诗”的工作。这也是当日盛行的风气。今日所知，清初出现的诗选、词选总集之类就有数十种之多。但淡心所选则未见，也不知曾墨板否？事实上这是借诗简往还取得联系的一种手段，所选的作品也以抒写时世之感、亡国之痛为标的。

当时另一个有名的贰臣，久居金陵而又是文坛老宿的周亮工，也与淡心父子有相当密切的交往。《赖古堂集》卷六有《从余鸿客乞竹，淡心躬送至，甫种值雨》诗，又有《复余淡心书》（在卷二十），略云：

读广霞君《集翠裘》，觉马致远乔梦符一灯犹未灭也。纯用本色，绝去纤巧。广霞君不屑与世人斗巧争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风气耳。

于此，我们又知道淡心曾有传奇曲本《集翠裘》之作，不但传

本，就连那名目，今天也几乎无人知道了。

过了二十年之后，淡心又有《看花诗》之作。

《味外轩集戊申看花诗》一卷，康熙刻本。题“江东余怀无怀氏著”，九行，二十字，版心上题《味外轩集》，下侧书《看花诗》。前有自序，略云：

> 余以戊申二月，从吴郡返金陵。日偕二三老友，乘兴寻花，城南城北，江山佳丽，凡有花之地无不到，种花之人无不访，养花之天无不出。以及僧房野店，废圃荒村，一花一树，无不载酒携笻或乘小车，坐卧其下，徘徊不忍去。凡两阅月，得诗百首……古人不得志于时必寓意于一物……予之于花，亦寓意耳。已耗壮心，遣余年，兴之所至，凡淋漓倾倒，颠狂跌宕之处，又一寓之于诗。迩年以来，颓焉自放，深恶排比饾饤之学。而最爱白香山、苏东坡、陆放翁，出入必以自随，谓之岁寒三友……少陵云，别裁伪体亲风雅，放翁云，俗人犹爱未为诗，诚不敢不三复斯语。

写这一卷《看花诗》时，是甲申以后的二十四年，淡心已经五十三岁。此时南明永历帝已经被杀，恢复朱明的最后希望灭绝了。“文字狱”的暗影已经袭来，庄氏史狱就发生在一年以前。淡心的“颓然自放”，就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面的一种态度。尽管是看花吃酒，也依旧掩盖不住遗民的心事。不过比起《七歌》来，那到底是颓唐得多了。这一百首当中，确有不少可读的诗，现在介绍几首如下：

> 三年不见白门花，今日重过处士家。弱柳疏篁相间处。

晚风吹鬓一枝斜。(二月四日,同杨炯伯、胡致果。)(第一)

赢得春晴几日闲,南山游遍又西山。吉祥寺里花如雪,笑我归来两鬓斑。(第九)

黄芽白笋酒三升,古木丛中露塔灯。痛饮狂歌今日事,最销魂处是金陵。(第十二)

遥思邓尉千株雪,梦里瑶台第一人。老气苍茫压桃李,十年三度秣陵春。(第十六)

五十年来老病愁,江山佳处几回头。齐梁旧事风吹去,柳叶梨花恨未休。(第二十三)

尽捐尘累学长生,湖海元龙气已平。此地好修杨许业,洞霄提举是功名。(古乌龙潭)(第二十八)

我已胸中一事无,只因花鸟费功夫。江山风月闲为主,不学知章乞鉴湖。(第三十)

且住为佳是故乡,鸭头新绿柳初黄。花村犬吠无人到,曳杖敲门看海棠。(第三十一)

云台麟阁总成灰,惟有春花岁岁开。此是野人真受用,不妨明日抱琴来。(第三十二)

台城草荒连覆舟，猘儿不留留仲谋。此恨漫漫似江水，十年空白老僧头。（观象台）（第三十五）

江天如画可怜春，发兴看花有几人。一片红云落杯酒，六朝佳丽总伤神。（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七）

侥幸今春不负春，同游同赏绝风尘。唤回五十三年梦，长作羲皇以上人。（第五十八）

棠花开尽又梨花，燕子春波蹴尾斜，何处绣帘弹锦瑟，美人寒食又天涯。（第六十六）

白头老伴卧花茵，芍药栏前少一人（忆炯伯也）。

不是怜花不痛饮，杨花扑面不成春。（第九十）

如果排比一下这一组诗的诗注，可以大致看出金陵一地的游赏处所，大似以赏花为经的一份金陵导游。又可以知道当日同游者的姓氏。

从戊申二月四日起，作者的游程从“城南”开始。这里有永兴僧舍、南冈、宝林寺。其次是“城西”，有古祥寺、张园、虎踞关。其次是“友人园亭”，《青溪》一绝云：

尊前绛雪舞冰绡，海上仙云堕砌娇。欲问先生旧游处，青溪栅口赤阑桥。

这是与《板桥杂记》有明显关涉的一诗。悬想当日秦淮河

畔，长板桥边，旧日曲中，已有成为私家园宅者矣。其次为杏花村，有瓦官阁、凤凰台、万竹园。其次为丛霄道院、古乌龙潭。

又其次为“城中”，有驯象门、芙蓉山、“致果书斋”，其次为观象台。按余宾硕所记：“鸡笼山高二十丈，后临玄武湖，晋元、明、成、哀四帝陵并在山阳。明洪武中更名钦天山，山麓建十庙，朱垣缭之，连绵一里。山巅作观象台。”可以为淡心诗作注。

“桃李纷纷白下门，一湖碑水位东昏。斜阳不照齐梁树，只送飞花入破垣。”（第三十四）下面，即前面所录“台城草荒连覆舟”一首。其次为清凉山。诗题有《饮汪翁家杂花下》，又莫愁湖、冶城山。其次为“马园”。其次为南冈。有雨花台、松风阁、“前山松下”、“陈原舒山居”、木隐园、“周豫石池亭”等境，皆“城南”也。其次“北山”，张宗特园海棠。其次“金陵寺”、“朱本固园”。第五十五诗诗题是《一路看花到祖堂，憩石谿精舍》。看花的游程至此结束，盖已在三月底了。

同游者则有杨炯伯、胡致果、钱季水、应子山、陈徙侯、万餐云、淡心的长子位、顾徐公、陈原舒、周豫石、张宗特、张敦玉、唐祖命、钱湘灵、黄子中、邓木上、朱本固。其中胡致果，名其毅，是十竹斋主人胡正言的次子，也是著名的印人。胡正言的“印存玄览”里也收有淡心名印。手头无书，除钱陆灿（湘灵）外，其他诸人一时无法考索，但我怀疑其中可能有几位是画人。淡心往来的就是这样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物，几乎一个达官贵人都没有。

余淡心著作与金陵的关系，始于《板桥杂记》，终于《戊申看花诗》，以后不知还写过什么。也不知道他卒于何年。康熙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他还和曹寅等人过苏州尤侗的揖青亭看菜花（见《艮斋倦稿》），其时淡心已经是七十七岁高龄了。淡心曾

为曹寅题《楝亭图》，属名是“旧京余怀”四字。并无上款，表现了很巧妙的不即不离姿态。所谓“旧京”，可以是指朱元璋时代的金陵，也可以是指南明弘光时代的金陵。仅此两字，也可见淡心遗民的风骨，他就这样满不在乎地写在江宁织造大人为先人求题的卷子上。这是我们今日所知他在笔墨上和金陵最后发生的关涉。

一九七八年

关于吴梅村

三百年来，吴伟业（梅村）是曾为许多人所喜爱的诗人，也留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他的成就是突出的。与他并列为“江左三家”的钱谦益、龚鼎孳就都比不上他的烜赫，更无论稍后的王士禛辈了。这原因是值得认真思索的。梅村在诗歌创作上是有新的创造的，表现得尤为鲜明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他尝试引进了一种更新鲜、更接近读者的方法。音调的转折，色泽的艳丽，咏叹的低徊，都不是过去古诗中常见的。似乎可以说，这是《长恨歌》与《春江花月夜》综合、熔铸以后产生的新体。如果只用这方法表现传统的平庸感情，那无疑就将成为一种新的“宫体”，一种格调不高的东西。可是现实生活拯救了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他自己的平生际遇与充满胸中的啼笑不敢之情，吸引、迫使他写了许多记人、记事的历史长篇，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史诗”的色彩，同时也使他得免陷入“宫体”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在许多评说吴诗的议论中，我总是不能忘记龚自珍的话：“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诗前有小序，他说：“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中叶，梅村诗在士大夫人家中的地位与受到欢迎的程度，已经成为代替《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的“高级通俗读物”了。龚自珍说，他活了三十二岁，“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并说这些他都“明知非文章之极”，并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明知不是“上品”但还是不能不喜欢的心情，我想同样的矛盾也会普遍存在于许多读者心中。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

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将全部力量都花在艺术分析上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作家的颇不多见。但在吴梅村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反常的现象。包括他自己在内，他的同时朋辈、晚辈都从政治上对他说过许多话。而真正说到吴诗艺术地位的好像并不多，龚自珍是很有见识的一例。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与时代历史分不开的。这似乎正是一个好例，可以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政治而生活在真空里。因此在论文论人时，就不能孤零零地只看一个方面。那是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努力都得不出应有的结论的。对吴梅村当然不应该是“例外”。

三十年前我曾自不量力做过一件艰难的工作，为梅村的《鸳湖曲》写过一篇“笺证”，文章的副题是“吴昌时事辑”。我用的是笨办法，把耳目所及能够搜罗到手的有关材料都聚集拢来，按时序、事件安排在原诗章节之下，试图阐述作者的作意，并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史实真相。郑西谛、吴辰伯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并借给我许多史料。就在这一次我开始明白了

晚明史籍的浩瀚；尤感困难的是因当时党社的纷纭复杂，出于不同集团成员之手的记录论述的难于爬梳、判断。也正是这时候，开始对吴梅村这个具体人物发生兴趣，觉得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某些传统的、习惯的看法并不那么可靠了。这以后，见书较多，时时发现旧作的缺失不完，想重加订补，还不曾得到这样的余闲。不过有一种印象却也日渐明晰。对吴梅村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人比起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而明白，梅村为了替自己辩解所作的种种姿态，都瞒不过当时人的眼目。但随着时代的迁移，旧闻的零落，这些却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这实在是值得憾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像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幛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

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像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

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了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濠梁徐麟吉（日驭）有《黄园陪李银台公凯先生话吴梅村故事》七绝四首（康熙刻《北山诗钞》卷十一），其中的两首是：

太白承恩第一班，那知有诏放还山。沉香供奉无消息，自按霓裳教舞鬟。

讲幄晨趋近至尊，犀庭日表梦犹存。山中曾记山僧语，赢得袈裟满泪痕。

长洲陈叶筠廷望《含翠轩诗钞》有题《秣陵春乐府》四首。其前二首云：

凝碧池荒衰草深，开元词客动哀吟。鼎湖一去龙髯远，南内犹歌夜雨淋。

荆棘铜驼废寝园，澄心烟冷欲黄昏。春花秋月潺湲泪，怨入声声杜宇魂。

陈廷望的遗集是康熙中“孝慈堂”主人王闻远所刻。徐、陈都是清初人，和梅村没有什么交谊，他们本身也都是名姓不彰的人物，著作从来无人称引。他们的话是可以代表不存任何偏见的“公论”的，虽然比起“五不肖”来已经温婉得多了。可惜的是他们口中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化为难以捉摸的韵语，但感慨所寄，还是清楚的。

这情形到了清代中叶，就已起了相当的变化。在遗民故老中间传说着的“故事”逐渐泯灭，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定型。这里举昭文孙原湘的《题吴梅村集》诗作例，在《天真阁集》中：

麦秀薪薪四月寒，著书只分老江干。龚生故里方持节，江令新朝已拜官。东海生桑春烂漫，西山采蕨兴阑珊。彦回不肯中书死，脱屣妻孥事本难。

幕府征书取次催，春风重上郭隗台。露霑天仗新池柳，花落宫衣旧井槐。故友半为袁粲死，内人犹识沈郎来。苦收金粉归诗笔，抵得兰成一赋哀。

孙原湘作了大量的诗，他的集子有一尺多厚。一般说来，见解还是明正通达的。如他写的《媚香楼歌》结尾说：“气节何论男与女，楼中如花霜可拒。君不见，天津二月桃花开，又见侯生应举来。”这样的见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难得的，好像比起今天的有些人也还要清醒些。不过到底时间隔得久了，真相逐渐模糊。他责怪吴梅村的只是不该作了“二臣”，但却将那原因主要归之于“幕府征书”。这样的意见一直到今天，还统治着许多人的头脑，正是又奇怪又不奇怪的事。

我曾经介绍过仁和王曾祥的一则《书梅村集后》，他说：“其

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王曾祥是房樊榭、杭堇浦、吴尺凫、赵谷林的熟朋友，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素养，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乡里旧闻。他的这些话是不能忽视的。在我看来，怕要比官书里的官话以及梅村自己的有些话都更值得重视。同样的话，陈廷敬所撰梅村的《墓表》中也说起过，作为《墓表》，是经过家属的同意的，不可能是随意的猜测、诬陷。梅村有一篇《与子璟等疏》，是相当于遗嘱的文字。历数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和种种艰危困苦的处境，写得哀恻动人。结尾说：“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此疏写于逝世前一月，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作的“总结”。话虽如此，其实是写了给天下后世人看的，并不只留给家属的遗言。在这里梅村回避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复社筹划周延儒再相，其二是他应召出山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要回避，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这两次都是政治投机，而遭到了同样惨重的失败。要进行政治投机，那就绝不可能是个人的行动。这两次政治活动，所凭借的基本力量是复社，重要的关系人是吴昌时与陈之遴。梅村还写过一篇《复社纪略》，同样也是态度暧昧的，也不曾透露他自己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发表的当时就引来过计甫草的批评。王曾祥的另一节“书后”说：

人臣不幸，运遭阳九，事艰任巨，盖有刺心不足以自明，刎颈不足以称责者。若乃金门诸彦，兰台群英，靡柱石之倚，罔爪牙之托。而燕失故垒，欲傍谁飞；龙去鼎湖，相从不反。非志之易遂、节之易完者欤？梅村当英妙之年，陟清华之地。论所蒙被，可云渥矣。曾无独固，更事圣朝。所作诗

文，颇多哀怨。感禾黍于秋风，述沧桑于世变。羁縻煎迫，重有所拂。然而失贞之妇，擗抓故夫；二心之仆，号咷旧主。徒增戮笑，谁为信之！嗟呼，孤忠日月，已表层楼；故国衣冠，空怀死友。鲁连蹈海之辞，介子焚山之语，眡其生平，何相戾也。或言梅村老亲在堂，未宜引决。夫求生害仁，匪移孝之旨，见危授命，实教忠之义。苟其不然，隐黄冠于故乡，受缁衣于宿老，身脱维縶，色养晨夕。惜哉，梅村迹乍回而心染也。

王曾祥这些话，今天看来，可能过于陈腐了。但这也不好责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文士。在他们看来，民族气节与忠于皇帝原来就是一回事，忠君与爱国也是不能分开的。王曾祥对吴梅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是实事求是的。在当时，吴梅村真的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他做的是闲官，不为皇帝殉葬也不会受到苛求；去当和尚道士，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许多遗民都已这样做了。重要的关键是梅村的言行不一，所以一切慷慨激昂的正面言辞，在明眼人看来就都成了笑柄。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心染”一点，我觉得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曾祥指出了吴梅村实在是个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物。

吴梅村是复社党魁张溥的入室弟子，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七岁，他一开始就是复社有威望的骨干成员，天如门下“十哲”之一。崇祯三年，与张溥、吴昌时同举乡试。四年又得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成为周延儒的得意门生。在复社中的地位声望急遽升高。是五年虎丘大会中的风云人物。张溥与梅村同年成进士，授庶吉士。第二年，就回到家乡，全力经营社事，不再回到北京，把颇有“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到首都，在政治舞台上安

了一只棋子。从此京师掀起的一场场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吴昌时不但参加了，而且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都与复社和张溥紧密相关。几年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曲折离奇的故事是说不尽的。

崇祯十二年己卯，梅村转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不久黄石斋予杖信至，梅村又冒险援救。这事是写在《与子璟等疏》里的。这时，复社的处境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陈子龙《自撰年谱》记，崇祯十年周之夔到北京告密，说张溥等谋反，“则以黄纸大书石斋师及予与彝仲、骏公数人之名，云二张辇金数万，数人者为之囊橐投之东厂。又负书于背，蹩躠行长安街，见贵人舆马过，则举以愬之……”这是从敌对者眼中看到的梅村与张溥的关系以及他在复社中地位的旁证。负责情报与政治活动的吴昌时从北京向党魁张溥发来了火急的建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以张溥为首的决策核心一直都留在江南，梅村正好参与了机密，这从他在《复社纪事》中透露了吴昌时密札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

> 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张溥）曰：“虞山（钱谦益）毁不用，（文）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

接下来就是周延儒再相与吴昌时一起事败赐死的一幕。梅村在《纪事》中也有所记述。不过拿来与大量野史记事加以比较，可就简单而轻描淡写得多了，最后只以“事具国史”四字了之。梅村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不过他不想说，和他在写《鸳湖曲》时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他的《咏拙政园山茶花》。这比起吴昌时一案是更新的、当今皇帝所定的“钦案”，他

又哪里敢说、肯说呢？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山茶花诗和《赠辽左故人》等诗，他写下的“生儿真悔作公卿”、“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这样的诗句，是从心底感到绝望以后产生的愧悔，比《贺新郎》里表现的感情真挚得多。他没有责难吴昌时、陈之遴辈政治道德的败坏，只是惋惜他们的政治投机没有幸而成功。

正常的政治活动与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是有原则区别的。只要举出“宜兴(周延儒)再召”的二三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复社核心人物采取了怎样的手段。这一切，梅村都是参与了决策，知道其底细，并未表示反对，并在回忆录中加以回避的事实。

周延儒其实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参与执行过迫害东林、复社的勾当。再次捧他出山，完全是形势的需要而非政治上的契合。参加决策的重要人物有钱谦益；给吴昌时的指示和密札七封是教人熟读以后，割成碎片，藏在败絮中间，混进北京以后再用“蓑衣裱法”连缀成篇，送达权要的(《社事始末》)。活动经费是用招股的办法筹集的，出资者竟包括了阉党骨干分子冯铨、阮大铖。“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方域父)、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烈皇小识》)据《谈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他们对周延儒也提出了一旦复相后就要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的条件。例如阮大铖就提出起用马士英，为自己出山铺平道路。党魁张溥就更为严格。《霜猿集》有诗云：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附注：

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董事长”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总经理”不免要感到极大的为难。矛盾总是要解决的，而且竟很快地解决了。“溥还娄东，一夕暴死。”据一种野史说，还是吴昌时下的毒。《霜猿集》：

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附注：

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孟心史校订补注本）

这是野史，不过我相信这些故事是不大可能编造出来的。这其实是极好的题材，可供诗人写出一篇出色的七古歌行，但梅村没有写。运用了这样的手法于政治斗争之中，搞“统一战线”连阉党余孽都包括了进来，称之为政治投机好像还不足以尽其极致。

自从开始接触晚明史以来，遇见了大量的野史笔记，真是浩

如烟海，读了使人头脑发胀。不过读野史又是有趣的，它往往能在漆黑一团中闪出几道微光，引导人们走向并靠近历史真实。这样的启示在正史官书中是很难找到的。为了读一首诗花掉几个月的时间，也并不一定得不偿失。经过努力，得到的知识、启示与理解，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作品。人们会从中发现作者的才华与聪慧，凑巧还能窥见他们的“狡狯”。诗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写下一些“谜语”，好像决心不愿人读懂，但我想这也并非他们的本意。果真如此，又何必留下文字的痕迹呢？梅村苦心经营写下“其词甚艳、其旨甚悲”的诗篇，说到底还是希望人们真正理解他的心事，也就是“旨”。如果反对寻求“诗旨”，徒赏其“悲”，那与称赞一盏新茶只是“热得好”有什么两样呢？看来这恐怕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鸳湖曲》笺证

——吴昌时事辑

远在两年前，到嘉兴去玩了一次，回来写了一篇《鸳湖记》，投稿给一家杂志，不料这杂志关了门，我的一万多字的文章也就没有下落了。几次想重写，都因为没有时间、兴致而不果。去年吴辰伯先生南来，又提起此文，说写出来算了。半年来胡乱翻书，又收集了不少材料，而且读读晚明野史，也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看看那种腐败的政治，文人的丑态，社会的大变动，一件件都新鲜得很。因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缺稿，想想索性就把这文章改成“笺证”写出来，虽然从来不曾写过考证的文章，自己预感着这篇《笺证》一定要离题不近，然而这些也都只好不去管了。

最初引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的，当然是吴梅村的这一首诗，这诗在梅村集中虽然没有《圆圆曲》那么出风头，不过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而且我还感到，《鸳湖曲》在情感上表现的浓挚与凄凉，都要比《圆圆曲》来得重。一个不过是“家国之感”，另一篇就更还夹杂了“身世之悲”。陈田在《明诗记事》（辛签卷二十二朱隗诗里）注说：“鸳湖主人，嘉兴吴昌时也。昌时名在复社，

颇为东林效奔走，官吏部郎。通厂卫，赃私狼藉，电发不斥其名，梅村《鸳湖曲》亦多哀愍之词，盖诗人忠厚之遗也。”我很怀疑这所谓“诗人的忠厚”，中国的文人，有时候是颇不忠厚的，尤其在发生了“门户之见”的时候，要“忠厚”，也还是为了“门户之见”。

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启甲子。合吴郡金沙檇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丰章、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钟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旃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

这个应社里，包括了二张、二周和吴来之。有的是儒林重望，也就是在野的党魁（后来的复社）；有的则走入仕途，作政治活动，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晚明一局政治的幕后策动人物，几乎都在这里了。这个应社后来经张溥、周钟，吴昌时等的推广而变成了“广应社”。张溥《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广应社再序》结尾说：“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在这最初的应社里，那目的是在“尊经复古”，“五经选义”，根据张溥的《五经征文序》（《七录斋集》存稿卷三）张天如主《易》，而吴昌时则是主《书》的。

吴伟业（梅村）则比较晚一辈，是张天如的弟子，《梅村家藏稿》后面的年谱卷一里，天启二年，梅村才十四岁，就为张天如赏识了，“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做了他的学生。过了两年张天如将应社推广合并而创举了“复社”，梅村也就入社，“为入室弟子”。这位先生比起学生来，大了才不过七岁。

到了崇祯三年，梅村年二十二岁，省试中式。他写的《复社

纪事》里说："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先生，榜发，维斗裒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吴梅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是得意的。他自己和老师（张溥）都高中了，前辈吴昌时也是同榜，成了同年。还有不少社友也中了，于是就举行"金陵大会"。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鸳湖曲》的作者和诗里主人的一段并不浅的渊源。

诗云（根据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有异字用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校）：

> 鸳鸯湖畔草黏（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语（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在这里，我想多少要提一下这个"鸳湖"。

三百年前的诗人的描写，和现在嘉兴的南湖光景大约相去不远，如果说少有变迁，我想也许是那湖更荒秽了，粘天的水草更多了，简直使荡舟的人觉得不胜逼仄。那个"烟雨楼"却还好好的，不过也已经是后来重修过的了，我坐在楼上凭槛喝茶，看眼前的一片浓绿，阴森得很，那树真是很高大，总有几百年的寿命了。莺声不曾听到，却看见无数白鹭在树上飞起飞落，有时候也叫上一声两声。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就指的是"吴昌时"，竹亭是他的花园的名字，至于这竹亭与烟雨楼的关系，现在也无法知道。

竹亭在当时是江南的名园，是有名的园亭塑手张南垣的杰作。吴梅村有《张南垣传》(《家藏稿》卷五十一)："张南垣，名涟，南垣其字，华亭人，徙秀州，又为秀州人……其垒石最工……其所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虞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

阮葵生《茶余客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大抵都称赞他的假山叠得好。在烟雨楼的后面，现在还保留着好一片假山，十分曲折而灵巧，这种小品园艺，使我们可以想象旧时士大夫阶级的剥削的成果，是怎样侵夺了别人的产业、幸福，而造成一己的佚乐与享受的。吴昌时在没有做官以前是绅士，在做官以后则是乡宦，明朝的乡绅的豪纵是有名的了。像钱牧斋、董其昌、瞿式耜这一批人在乡下都是豪纵不法的。现在我们只看吴昌时。王肱枕作《蚓庵琐语》里说："吴昌时官吏部，大营甲第，侵越比邻曾生基地以筑垣，曾生往争之，昌时漫应之，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竟不让还。"

李清撰《三垣笔记》，卷中有一则：

> 吴都谏麟征为余言，昌时居里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贽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贽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

对于地方官的态度，还是这样，更不必说什么老百姓了。这些"名士"们就在这种"湖山胜地"大作其"文酒之会"，梅村另外有一首悼吴昌时的诗，题目是《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这一批"复社"同人，就是时

常在这里听戏、饮酒、作诗的。《鸳湖曲》：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萧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酒尽移船曲树（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这一批文社的社友们就是这样地作乐。吴昌时的好客，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当时人的集子里面一定还留存了不少记载，我却只能找到有限的一两篇，应社最初的发起人朱云子（隗），有《咫闻斋稿》。陈田的《明诗纪事》里，选录了他的一首诗却正可以拿来应用。

《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记歌》：

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徐徐邀入翠帘垂，扫地添香亦侍儿。默默愔愔灯欲炮，才看声影出参差。氍毹只隔纱屏绿，茗垆相对人如玉。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记穷情醒清癖。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归时风露四更初，暗省从前倍起予。尊前此意堪生死，谁似琅琊王伯舆！

徐电发（钒）也有一首《鸳湖感旧》：

曾说荒台舞柘杖，而今空见柳丝丝，不因重唱《鸳湖

曲》，谁识南朝旧总持。

他在《本事诗》里记：

鸳湖主人，禾中某吏部也。吏部家居时，极声伎歌舞之乐。后以事见法，南湖花柳散作荒烟，东市朝衣变为蛱蝶，故吴祭酒梅村《鸳湖曲》有‘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之句，余亦赋《鸳湖感旧》云。

在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里面，也留下了几首诗。《诗稿》卷二《同孟宏、孟朴、君伟、来之登烟雨楼次韵》两首：

水气连空绿，晴洲高处幽。无山飞鸟静，有佛古蘚浮。平满归群木，苍凉上一舟。云生感慨出，此日荻芦游。

烟泽恣凭阁，高岩响带淙。澌流趋壑缓，林月照人双。鱼出春深草，钟声雨后牕。问吴犹地接，门外即三江。

《七录斋集》卷二还有《同来之、孟宏、孟朴、君伟龙渊晚眺次韵》三首，看诗里面的景物和同游的人物，大抵也是在鸳湖所作，第三首：

白成一片暗千山，平地欺狂鱼鸟间。群水合时渔艇乱，百花静处寺门闲。月中荇藻人归夜，楼下笙歌酒上颜。唱别不离高塔影，折来云树美人湾。

其余两首里的断句，像“鱼凫队里看娇舞，芦荻声中惜醉

颜”、“萧萧非雨余空阁，切切新丝怯旧颜”，都可以看出这些名士纵情声色、醉态朦胧的影子。这正是吴昌时极盛的时代，“名士”不足过瘾，“选文”更不是目的所在，看到当时朝政的紊乱，又清楚地摸着崇祯皇帝的多疑心理，于是跃跃欲试，抓到一位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来做一笔政治上的买卖了。

《鸳湖曲》第三节：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崇祯一朝，宰相一共换了五十个人，这在过去的历史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例子。傅节子、李慈铭等都替这五十位宰相开过名单。皇帝既然如此多疑而不专，内阁如此频频更调，在政客看来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买空卖空的。

思宗初立，把阉党清算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做得彻底，还留下不少地下潜伏的分子。当时，内阁里几乎是清一色东林党的天下，皇帝更怕手下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结党，所以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把官儿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金瓶里面，焚香肃拜，用手一抓，抓出谁来就是首揆。这方法虽然可笑，然而在皇帝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这时候东林的代表人物正是绰号唤做“天巧星浪子”的钱谦益，钱的作风是充分表现了过去中国士大夫的贪愚跋扈的弱点的。他想包办，弄点手法，在“抓采”以前把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都除去了。这自然使温、周大不高兴，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个机会，反咬一口，借考官受贿案的题目劾谦益，在皇帝面前对质时，又特别招出谦益以植党营私，正巧这是皇帝最怕的一点，于是，谦益一下给打了下去，黑了半辈子，在明朝灭亡以前再也不能起用。

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拼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复社这时候就把一员大将，大家认为是有点“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进北京，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一着棋子。张溥《七录斋集》诗稿卷三里有一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著书二万经方盛，买绋三千调更孤。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撤重围让汉儒。

虽然说的是“典文”，然而实际的意思却在末一句，想抓回内阁的大权，好好地干一下子。

这时候温体仁又弄下手法把周延儒排挤掉了，朝廷上掌权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打击东林党人。文震孟、姚希孟都被挤掉，更把文震孟的亲信郑鄤害死。关于这案子，用出了政治上最阴险也最残酷的手段，说他杖母淫妹，弄得他不齿于“名教”，死了都“不得超生”。

这时候，吴梅村、吴昌时这一批复社小辈，只是隐忍地在北京等机会，敌党的铁腕还轮不到他们的头上。等到温体仁一失势，张至发一上台（张是体仁所荐），吴梅村马上就对他开了一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在崇祯十年。张至发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家伙，远不及温体仁的手段厉害，吴梅村这一疏简直是“打落水狗”。可是在年谱上却也留下了一句好听的活，“直声动

朝右”了。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

> 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以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珰”——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珰”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了如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

> 宫中凡令节，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

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齿不呈微索问，娥眉欲蹙又温存。本朝家法修清谧，房帷久绝珍奇荐。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就正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罢。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间在北京做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

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

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部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妙用也。(《三垣笔记》)卷中)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纸必先知。先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归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

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巧妙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言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于是吴仪部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都谏耀家见之。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又记一事：

仙居过邑侯周谋乃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予文举一稟云，所送尊翁宅内，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来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报告了上去：

……国观密以闻，于是阁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声气赤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衙，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拟，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狯，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但不闻贪秽声。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三垣笔记》)

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抄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

韩城薛国观官佥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司，谓是国观所为，深

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划，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耽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贸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

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

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像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地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疚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

窃窃自疑，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丘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笑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

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间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

（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

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笑，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议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

> 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来，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烈皇小识》卷七：

>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

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做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巳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傣(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注云：

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像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

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

注云：

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

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箫鼓之余，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一些“祥和”措置，像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洲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绋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余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

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注：

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

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秘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心地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

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戡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

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于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吴昌时就借此机会做一笔生意。此外卖官鬻爵，不但贪，而且还不讲贪污的信用，干没别人的贿金。《三垣笔记》卷中：

予与吴都谏麟征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征曰：彼非独余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己，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初刘某入闱，昌时以其子密托之，刘某恐后为己累，以蓝笔重加圈点，而以墨笔抹，托言大主司吴翰林国华所为，已询之国华，非也。故恨。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

贪污又在官僚中引起倾轧，彼此利用御史互相弹劾。监察官竟成了他们政争的工具。

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又徐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三垣笔记》卷中）

同时他跟周延儒来往得极密，在这中间有多少文章，政治中枢不在皇帝宫中，而是在相府里面的。

> 予一日与某同籍谒周辅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见。一长班耳语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径入后宅矣。予问之，其一铨曹，一仪曹，一兵曹，一同乡闲署也。予归而叹曰：吾师必败矣。他且弗论，安有以趋热铨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议者。不数日败。铨曹者吴选郎昌时也。（《三垣笔记》卷中）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

> 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注：

> 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昌时一心想做吏部官，《烈皇小识》说他“醉心吏部，诚得一日称吏部郎，虽死无恨”。于是就去缠住延儒，“必欲得而后已”。不过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例子。“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匪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均见《北略》）。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郑三俊，是有名的正直

人，当然不肯，就“问乡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荐于上。盖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而三俊不知也。”(《北略》)对于吴昌时的利用郑三俊，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

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皆奸人也。一附黄翰林道周，一附郑冢宰三俊。人欲击鄤，恐累黄公；欲击昌时，恐累郑公。(《三垣笔记》)

旧例吏部由别部调者不过主政，天启时赵冢宰南星在部，始调兵部邹员外维琏于吏部，时犹大哄，若以礼部正郎调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自吴昌时始。予邑吴辅甡与密，讽之曰：闻文选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后辈无先者，公或以稽勋验封带管文选如何？昌时正色曰：天子欲为天下得人，故特简一文选，况目前铨部诸君皆予手援，彼后辈也。未几竟败。(《三垣笔记》)

一旦有了掌管全国官吏升黜的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想树威，使监察官的台省对他不敢批评，《玉堂荟记》记：

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榜样，又以劲敌太多，将致他变，故但取人数广众以劫之，方自喜其算无遗策，而不虞人之有烦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

时自昌时，各有主意，绝不相谋而事适相凑，在太宰不失为君子之疏，而昌时为狡猾，为无赖矣。

这里写昌时利用皇帝和郑三俊的个性的地方很清楚。第一次发动，就和本省的言官们冲突起来：

吴铨曹昌时既破格调，思以奇策坚上意，且箝制台省口。春季例转，皆自己出。吏科吴都谏麟征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并未商也。科五道十，几两倍旧额，盖因上疑台省横，屡旨申饬，且恐他日有指摘，则以例转挟忿为言耳。时浙江同乡诸公集议，本省新吏部昌时，麟征、彪佳皆往，咸努目视。惟向侍御北诟谇尤力，几饱以拳。（《三垣笔记》）

《烈皇小识》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末一段却较详：

及是日，科道齐集，援集例相责，昌时怙过，绝无引咎意，御史某不胜其愤，提所坐杌搏之，昌时仓皇而出，且曰，若奚为待我如此，我当尽例出诸御史，诸御史闻之咸怒发上指，与昌时有不两立之势矣。

昌时驱除言官的企图，还要推给郑三俊：

吴铨曹昌时欲破格外转科道，谓吴辅甡曰：惟此一着，可为郑太宰三俊结知主上。甡曰，不然，大臣以休容为度，当保全言路，予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开，后此不肖者驱逐言官，必借郑公为口实，恐忠良之士，皆为寒心。昌时

不从，甡复言之郑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后以昌时意坚，仅留二人，余皆外转。然昌时计甚巧，皆择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恶伤其类，人有同情，故一时众口交沸。识者皆曰：昌时之祸，从此始矣。（《三垣笔记》）

到这时，昌时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正如《明季北略》所说，“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了。

《鸳湖曲》第四节：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坯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吴昌时、周延儒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大家都说昌时“贪墨”，“贪墨”自然也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不是致命伤，“弄火的人总要被火烧死”，吴昌时凭借特务太监的关系，玩弄皇帝，摆布同官，结果却仍旧是失败在特务太监的手里。

关于贪墨的一点，我想不能不叙述一位在当时颇为特别的人物，是官僚政治发展到近代化的一个好例。这个人就是周延儒、吴昌时的经纪人董心葵。

关于此人，《谈往》有专章记载，还有佚名氏所作的小册子《董心葵事记》，也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行述。

董心葵是无赖出身，“武进人，农无力，商无本，工无艺，士无学”。还好赌，平生有一句“名言”：“你见吾有银百万，与天子坐讲金华殿也。”到北京流浪，跟一个刘篦头合住在一起，这位刘篦

头从前侍候过魏忠贤，借机会发了财，后来又给魏忠贤弄死，董就占了刘家，发地得到三千两藏金，就此发迹。买了一院大宅，整治一新，结交宦官戚畹厂司珰卫，设赌局，买卖试题，挽回厂审，简直成为一个贪污代理事务所。后来又包办内廷衣饰买办。周延儒更把一切卖官卖法的生意托他经理，赃银也寄放在他那里，成为道地的“官僚资本”。孟心史先生记董心葵和周延儒合作的事说：

延儒之贪，何所不至……武进董廷献为延儒客，为之开三市，卖金卖珠卖人参，于京师各张一铺。又以大珠三十颗，畀董为识，以当牙筹。凡士大夫进千金者，董以一珠归之。竟三十珠，再发再进，周而复始，一月中不知凡几。

这事见刘銮《五石瓠》，刘也是东林人物，这话应是可信。董心蔡这时已经成为道地的半官半商的“社会贤达”了。于是在边患紧急之际，皇帝召百姓陈言，董也就遂了他几十年前所许下的大愿。《谈往》：

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祯帝御文华殿，敕凡献策陈言，直入无禁。布衣董廷献亦得亲承圣语。

又记：

赐坐赐点，问修练储备四事外，州县有司果否实效，作何堵御，趣勤王兵？心葵虽无奇策奏进，亦称臣拜飏，曲尽温和。

着实出了一次风头。

延儒、昌时虽然声势赫赫，可是言官们说闲话，还是免不了。“廿四气”之说本来是市井流言，后来连谏议章奏里面也出现了。行人司副熊鱼山（开元）也出来弹劾周延儒，而且还是皇帝授意的。昌时却硬要让他删改奏章，几乎弄巧成拙：

熊司副开元请对。意在攻周辅延儒。故请屏人。诸臣请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请退则谕止之。故开元不能畅所欲言。上命开元具本，盖欲其直发延儒之过，延儒心疑，托吴铨曹昌时至开元寓，故开元疏中所言，半为昌时勒删。上怒，谓其阴阳两可，几欲置之死。（《三垣笔记》）

……已再讯，开元遂尽举阁臣私语以对，大约皆指周辅延儒守不洁，而吴铨曹昌时所言亦供入疏内。疏上，发阁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三垣笔记》）

为了让谏官们少说话，把吴麟征调了来做掌垣，不料吴却耿直得很，并不肯听延儒的指挥。《罪惟录》传九上：

……以麟征代章正宸为掌垣……时朝廷稍厌严苛，欲试宽大，以责近效，不次用人，麟征独以为不可……于是相君遣所亲信部郎吴昌时邀密语，麟征不应。相君曰，举之适自厄矣……已而疏劾垣臣廖国遴杨枝起，亦连昌时……

当时的特务头子缇帅骆养性，延儒是抓住了他的阴私以后

加以利用的：

> 缇帅骆养性有阴事，宜兴刺得之，以挟制骆使为己用。往来传递者昌时也。养性时有厚馈，宜兴不受，昌时竟隐匿焉。养性以此饮恨刺骨。（《烈皇小识》卷八）

同时吴昌时更因特务内部矛盾斗争而和骆养性加深了怨毒。《三垣笔记》：

> 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密。及骆金吾养性以楚人继，尽革孟明诸厂役与昌时相通者。昌时怒，欲除养性，以己心腹代。适朱侍御国昌疏纠养性，养性所费几及十万方解，或云周皇亲奎力，周辅延儒亦有易养性意。故养性并怒焉。

内监们看见延儒的气焰，心里也不痛快，有一次皇帝召对，赐给延儒座位，大珰跪而进茶，延儒公然受之，这就使太监们大不高兴。《烈皇小识》卷八：

> 内奄王之心颇不乐宜兴，曾向宜兴云：我们才力有限，还求老先生包容。闻者危之，而宜兴不以介意。

后来要叙军功，王之心想安插两个私人进“叙功疏”，延儒不答应，王于是就揭发了他。

最后发难的是御史蒋拱宸。《三垣笔记》记这事的经过颇详：

上召对知推，俱以圈点为高下。蒋侍御拱宸初得圈，自负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会有觊科者，谋之吴铨曹昌时，时北兵新入，昌时言于周辅延儒，示意张司马国维，于是荐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视诸郡城守，谓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题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时复嗾当路以拱宸监赵督光忭军，时范督志完尽调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诸守口甚疏，拱宸惧获罪，促光忭战，战辄大败。昌时又致书光忭，劝以催战罪拱宸，光忭不从，以书示拱宸，合疏上闻，谓往日以不战挫，今以战小挫，未可深罪也。会昌平内官以大挫报，上怒，时拱宸疑昌时嗾之，故冒险发通内诸款，昌时激之也。

蒋拱宸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不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是会全部失败的。于是就找皇帝所最忌讳的事来作题目。果然，猜疑的崇祯帝紧张起来了：

蒋侍御拱宸劾吴铨曹昌时有通内数款，闻上日置案前亲阅，阅讫纳袖中，不令内官见。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诸疏真草相半，此独楷书，止一画带草耳。黄侍御耳鼎亦有疏纠，在拱宸先，独不下。

皇帝一起疑心，不信任了。于是人家就都起来讲话，正好像一个拖日子的病人，一旦有点外感，就百病俱发。《烈皇小识》卷八：

先是，御史祁彪佳、贺登选各疏参吴昌时紊制弄权，给事中郝绸疏劾吴昌时、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内阁票拟机密，每事先知。总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时、仲琏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蒋拱宸疏论昌时入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累累，万目共见。即如南场一榜，非其亲戚即以贿赂，皆昌时为之过付……末又指通内一事，时缇帅骆养性细刺昌时与延儒通贿诸款，具事件上闻。诸奄亦尽发延儒蒙蔽状，复遣缇骑逮延儒对勘，而三俊以举用昌时，引罪回籍。

皇帝这一次真是怒极了。据《明季北略》所说，审讯吴昌时的时候，连案桌都推倒了。这正是明朝覆亡之前最后一幕政治高潮，在薛国观以后又杀了第二个大臣。《三垣笔记》：

上御中左门，召蒋侍御拱宸与吴铨曹昌时对质，命锦衣卫备刑具。昌时初诋拱宸监军时，匿失机不奏。上诘之，拱宸对多支饰，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诘昌时通内各款，昌时坚执不认。命锦衣卫加刑，吏科吴都谏麟征奏曰，臣闻祖宗朝刑人不于朝廷，昌时罪无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国体。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顾，不能尽法耳。时昌时足夹几折，不胜痛，嗷嗷曰，臣俱承认便是。遂下狱……

《烈皇小识》又记当时审讯的详细情形：

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与定王同讯。呼昌时前，诘其通内。上声色俱厉，昌时辩祖

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蒋拱宸面质，拱宸战栗匍伏不能措一语。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对质也。昌时始终不为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上即命内侍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澈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阁臣口塞，叩头而退。内侍遂进用夹，两胫皆绝，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锦衣卫狱。昌时已不能行，卫役负之以出。进见卫帅骆养性曰：请受刑！养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后审。越数日，卫审一如廷鞫，语不稍屈。乃刑其两家人，亦终无所招。后有旨送法司，咸谓有生机矣。不数日而斩决之旨下。（卷八）

其实皇帝的意思是早已决定的了：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兴得罪之始也。迨吴昌时廷鞫后，始令催来候旨，明乎罪因昌时。故诸臣言昌时幺麽小吏，上曰，昌时是幺麽，难道周某也是幺麽？厥后刑部拟罪，舍昌时而专言封疆，明系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则有之矣，岂宜兴一人之罪？且视师不过末一段事，始终封疆者，自有其人，与宜兴何与！及至旨出，则又不言封疆而言机械。机械者，罢内操，撤厂卫，皆机械也。此内珰所日夜文致于上前者，至此亦不觉流出笔端矣。（《玉堂荟记》）

所谓机械，《崇祯长编》中所抄的上谕里是有的：

帝言：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

那位出过风头的董廷献，在这次廷鞫里也串演过一次好戏：

又问董心葵，延儒得银起用为几人？曰，不记也。时御案有搢绅一部，自上掷下，则福建道施元征一叶向上，启奏曰，福宁道施元征是也。（《北略》）

皇帝发怒到了什么程度，真是跃然如见。蒋拱宸说的话莫明其妙，皇帝喝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帝愤恨，推倒案桌，迅尔回宫”（俱见《北略》“审吴昌时”条）。

现在看了这位猵急的皇帝的举动，不但愚蠢，而且简直有点好笑了。

吴昌时斩决之前狱中的种种，活埋庵道人徐树丕少有记述，见所著《识小录》卷四“癸未大狱”条：

吴昌时吴江人，号来之。以礼部郎调吏部郎。郎之不调久矣。此举实骇人观听。初为宜兴幕宾，前相薛国观之死，昌时实构之……宜兴再召，昌时以风影之说吓人财甚黪。一手握定朝局，恣睢淫佚，无所不至。其系狱也，知上无宽宥意，写字付家求金屑，屑字乃作薛字，其神乱耶，抑鬼使之耶……

《鸳湖曲》第五节：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这位复社的重要分子，晚明崇祯一朝党争政变的幕后操纵者的结末是够凄凉的。崇祯皇帝的下一步当然是“抄家”：

帝谕……周延儒、吴昌时赃银，炤勅谕内数日勒催呈解。（《崇祯长编》卷二）

好像这也并非太坏的理财法门，先让官儿贪污，然后抄家入内。恶名是人家的，积聚所得却总跑不了，入了“国库”。昌时身后，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被别人包占了。《霜猿集》：

吏部茶箱玉琢卮，青鬟小事各分司。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幼女思。

注：

延儒引吴昌时为文选司，卖官鬻爵，赃私百万，昌时疾，各官入卧内，有青鬟五人司茶，皆绝妙姿也。茶卮皆羊脂玉琢成，受以乌金盘。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

孟心史先生据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蒋录宁完我参折，说：

“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不过《明诗记事》辛签中录胡山《烟雨楼》一首，里面却说昌时还有儿子，不过因为避祸改名亡命了：

……独有贤豪负时彦，七省五侯交托徧，遥持启事致山公，共羡人伦归水鉴……转向回天咳唾间，翻云覆雨须臾变，卿相趋朝尽过门，监司候宅稀留燕……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孤儿亡命移名氏，槁葬归魂送夕阳……

一般人对他身后的批评，更是刻毒无情，姑举一例。李清记：

予差竣返扬州，适吴辅甡以遣戍归。与同郡郑进士元勋、乔侍御可聘就饮。予先至，首言昌时反复状。谓近读锦衣卫招，见昌时口供，云公称蒋侍御拱宸贤，夫拱宸以纠昌时通内故忤内，称其贤者似与谋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甡正色曰，不然，此骆养性憾予，肆行捏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元勋至，不知予先有言，又言昌时媕阿状，往得罪周辅，委跎蒲伏，顿头不起。甡又正色曰，不然，此嗔昌时者所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可聘至，又不知予与元勋有言，复备言昌时贪横状，某处纳贿若干，某事纳贿若干，言尤力。甡讶曰：乃尔！宴罢，甡先行，予述予言告郑，又述予与郑言告乔，笑曰，三至投杼矣。（《三垣笔记》）

只有他的老朋友吴梅村念念不忘，在集子里还留下一首《鸳

湖感旧》：

落日晴湖放棹回，故人曾此共登台。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梅村集没有编年，此诗不知作于何时。查《年谱》顺治八年壬辰，梅村在嘉兴万寿宫住了一些时候，草完了他的《绥寇纪略》，也许是这时重游鸳湖所作的。距离吴来之被杀，已经十年了。复社同人，死的死，投降的投降，做和尚的也有（熊鱼山），梅村痛定思痛，写下了《复社记事》，痛切地检讨了一下，可是我们在他的诗文中间，所能发现的斥责实在远不及惋惜来得多。他大概还是以为如果张溥不死，局面一定会大大两样，而不致糟到这种样子的。

我不懂诗，然而喜欢读《鸳湖曲》，觉得它的确包含着浓挚的情感，不仅只是哀悼逝者，而且还夹杂了作者的身世之痛，确是“诗史”。虽然为了种种原因，写得十分晦涩，让我说了这些话来解释。至于我自己，结束了这两年来悬在心上的一件工作，把乱书一推，也真好像赶开了这一批三百年前丑恶的政客、恶魔，使它们无法再来纠缠我的清梦，自己觉得也真是十分痛快的事。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夜十二时

《〈鸳湖曲〉笺证》补记

《鸳湖曲笺证》发表(一九四九)后,历年读书,又常遇到有关吴昌时的记事,随手摘录为一卷。几次想补充改写《笺证》,都没有能完稿,后来竟连摘录的材料也失去了。现在根据模糊的记忆,检阅手头的存书,少加梳理,联缀成文,算是一则"补记"。

(一)吴昌时与祁彪佳

在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那场政治斗争中,和吴昌时处于对立地位的重要人物中有祁彪佳。王思任撰《祁忠敏公年谱》在崇祯十六年癸末条下记之:

吏部吴昌时,依附正人,窃声气。时方营入选司。适帝命台省敭历藩臬后始入卿寺,昌时即借以訾訾台省。旧例,外转者二,昌时顿增至八。先生(彪佳)曰:"上意在练材,非外之也。余首篆,请身先之,可破重内轻外积见。然行之宜渐不宜骤,恐骇观听、伤国体。"昌时阳唯唯应之。故事,台

员升转，必由掌道牒送。昌时竟疏推六员。先生曰："本朝掌故，自此隳矣。"遇昌时于朝，面叱其招权骫法。昌时又阳谢之。先生遂连疏言昌时奸邪状。举朝素慑昌时，见先生廷叱，皆咋舌走。时先生方以疏留掌院刘公，为帝所忌。及闻累疏参驳，愈危之。然帝之疑昌时，亦自此始。

在祁彪佳的日记《癸未日历》里记载这次斗争的始末更是详尽。三月十六日条记：

时铨司过索衙门例转，欲立岸崖。予乃邀蔡培自、甘慰萱请吴来之力言于端门之下……值吴来之至，以会推南大司农少司马、新设江督、沅抚、楚抚、秦抚五缺来商，予又与力争。衙门之外转，请以身当之。其言甚厉。

开始的时候，关于外转的事，昌时还是和彪佳商量的。因为说不通，就独断独行起来，连招呼也不打了。六天之后：

毛禹老于绝早邀晤。乃知先一晚于首揆处以推转台员，与吴昌时力争，甚觉愤愤。且以为来之不关白吾衙门，行且具名推矣。（《癸未日历》三月廿二日）

又两天后：

最后吴来之至。予因早从毛禹翁座上见太宰书，允科道陆续推升。以为出来之之调停，方语谢之。而不知其反复变幻，绝不闻之。予衙门竟已推至六员也……晚饭后至

冯邺仙寓，则同乡先后共集矣……适来之至，余乃面折之，直叱其立威招权之状，渠唯唯谢罪耳。（三月廿四日）

两天以后，彪佳就草就了疏草：

归又作一疏，言升转咨送之因，与吴来之反复把持状。（三月廿六日）

《还朝疏草》（壬午·癸未）一册，祁彪佳撰。远山堂绿格写本，彪佳手定。其第十四至十六三疏都是参吴昌时的。第十四疏：

掌河南道事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俸一级臣祁彪佳谨题，为优升圣谕当遵，院臣职守宜辩，据事直陈，仰乞裁鉴事：

窃照迩者时艰日甚，干济需人。我皇上特涣明纶，令科道官酌量才品，升授监司。仰见圣明甄植臣工，先资敭历，与以展布之地，不阻优崇之阶。澄叙流品，即所以长养人材。睿虑至深且远。臣奉谕之后，欣跃祗遵，两具堂具自请外补。盖欲尽破内外之见，共矢效力于疆圉耳。顷闻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扬言于外，谓衙门御史，顿有外转六员。内惟二员经堂官毛士龙与臣商酌咨送，其他四员则绝不知也。部院职掌相关，凡有处分大案，皆得会同看议。未有升本衙门之御史，不关会于本衙门之堂官者。自此职掌废矣。夫衙门之职掌，乃朝廷之纪纲。职掌废则纪纲亦紊。使守法者有旷官之辱，必致旁挠者弄排陷之权。臣等虽欲不争执之不可。且国家设立六部，各有司存。而又设立言官，得以

纠参六部。乃关系之重大，弊窦之滋多，莫铨司若也。今言官之升除，使台长不得操权衡，掌道不得商可否，惟听司铨者一手握定，百端把持。嗣后言官将胁息俯仰，嗫嚅趋附，惟铨司之命是听。铨司即奸弊杂出，尚谁敢言之！此他日乱政之阶也。盖昌时之为人也，反复多态，机变无穷。以偷寒送暖之情怀，作造械推波之行径。惟是依附正人，猎有虚誉。一旦窃身要地，深恐发其隐私。以故汲汲皇皇，图钳束言官之策。初则到处招摇，云欲为内转者复功升劳升，是借皇上之爵赏以欣动言官也。继则逢人恐喝云，必使外转者有十人八人，是又借皇上之磨砺以怵吓言官也。其意使冀内转者昵于欣动之术；使惧外转者胁于怵吓之威。便可钳口结舌，恣其惟所欲为矣。如此招权怙势，必将纳贿行私。在冢臣秉破格引用之公心，在铨司逞巧借牢笼之故智。臣甚为铨席惜之。敢因申明衙门之执掌，并以直抉昌时之肺肠。伏候圣明裁鉴。若臣才智庸阑，职业不修，以致激扬之署，数百年相沿法体，自臣掌道而顿隳，另当具疏认罪，恭听俯赐罢斥。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题。

这是一通很重要的奏疏。它将揭开这场斗争序幕的背景与矛盾的焦点全部揭露了。当时复社捧周延儒出山的种种手法与内幕，当然在奏疏中不便点穿。御史虽然可以风闻入奏，但小道流言是不能写进奏疏的。祁彪佳处处抬出皇帝的招牌，而且注意不去碰伤首辅(周延儒)，他运用合法的武器进行斗争。但他指出了吴昌时的全部企图，都是为了恐吓、打击言官，这一条却真的击中了皇帝的要害。崇祯是个察察为明、猜疑成性的皇帝，

他最怕的是受骗。打击言官就是企图闭塞他的耳目聪明，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果然，奏疏递上去以后四天，就在“四月初一日奉圣旨，‘已有旨了。本内招摇恐吓，果否确情，着吴昌时自行回奏。该部知道’”。

其实吴昌时这样做，当然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这是全部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必然是和周延儒一起商定的。周延儒被捧上台，原有事先协议的条件，那就是在政府中搞清洗，换上复社中的夹袋人物。要进行这样的大换班，必将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大矛盾、冲突。而御史衙门的叽叽喳喳，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与阻力。吴昌时之所以干冒破坏祖宗成法的危险取得文选司郎中，就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言官，为大换班铺平道路。所以才恩威并用，使出种种手段来。还可以看出的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政府中监察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制约与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是不同政治派系进行斗争的有力工具。矛盾有时缓和有时激化，全依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也要看皇帝的权威与作用在政治上的比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祁彪佳在这以后为同一问题还上过两道奏疏。三月廿八日的第二疏是前一疏的补充，列举了吴昌时挟持挑构的实证，还向皇帝揭发了吴昌时的言论。“其对臣言，‘我初入铨部，若不做此篇文字，此后便行不将去。’是明明欲立威于言官，以逞其险心辣手。”祁彪佳还要求，“臣可与之誓心沥血，共质于圣明之前”。这第二疏（三月二十八日）也在四月初二日批了下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第三疏是与第二疏在同一天送上去的。这是一件公疏，“为铨司紊制弄权，臣等旷官废职，合辞引罪，恭请圣明处分，以重台纲事”。他和毛士龙等一起请求罢斥，以掼纱帽要胁。崇祯也有点生气了，说：“宪臣具疏，奉旨已明。祁彪

佳等不必合词陈奏，该院知道。”至此，崇祯已经下了决心，要对吴昌时（还有站在他背后的周延儒）开刀了。

在祁彪佳日记《癸未日历》里还有几条有关的记事：

> 知吴来之已奉部院看议之旨矣。（六月二十九日）
>
> 邀王掌道会议，勘吴来之事。（七月初五日）

初七、初九两天又记“商撰吴来之勘议稿”。到了七月廿四日，“上御中左门，讯吴昌时案，别有纪”。可惜这篇纪不可见，这一幕是真正的戏剧冲突高潮，也是崇祯的个性与心情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大暴露。在野史中有些记载，但只寥寥数语，得之传闻，比起祁彪佳的现场观察差得远了。

祁彪佳在同年八月十六日出京，九月二十三日抵清江浦，正好碰上“周挹斋（延儒）被逮抵此”。却不便通一刺。祁彪佳到嘉兴是十月初十日，“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这就是不久前被自己打倒，接着又被处死了的政敌的故宅，它就在烟雨楼的左近。短短的五个字所表现的心事真能抵得上一篇《鸳湖曲》，虽然两位作者持有的是截然相对的立场。

祁彪佳在嘉兴停了几天，走访了为吴昌时起造花园的张南垣，不遇。又找到他的家里。终于把张南垣的儿子请到绍兴，替自己布置了“寓山园”。在造园这一点上，祁彪佳与吴昌时是没有分歧的。

（二）吴昌时与钱谦益

《恸余杂记》一卷，题“天壤孤臣史惇”作。中有“钱谦益”一条，论晚明党局政争，有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薛国观之死的来龙去脉是：“韩城（薛国观）故凶手，又黩货。既不能如乌程（温体仁）之矫廉，即主眷亦不固。故吴来之（昌时）挥金十万，打透内中线索，欲为牧斋翻局，而卒不能。乃说司礼曹化淳，以构杀韩城勾帐。”

这是不见于其他野史的记载。说明东林（其实也就包括了当时的复社）最初的计划是想请钱谦益出山，只是办不成，才用杀薛国观“勾帐”。三百多年前的这笔政治交易，简直就和近代政治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一般无二，读了是使人吃惊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条例证，我看也不妨这样看。过去好像只有手工业、工商业中的事例才能被引用，我想是不免有些狭窄与简单化了。史惇又说：

> 牧斋既百计不能，涿州（冯铨）又断断不可，求其两可而软美者，宜兴（周延儒）乎。东林以宜兴为决不敢拗，南党亦以宜兴为决不敢背。故宜兴再召，天下之人谓是“两边抬出”云。

这一节也是分析得极好的。周延儒不过是矛盾调和的产物，是一名傀儡。他的命运是紧紧捏在复社手里的。扮演着有如敌伪政权中日本皇军顾问那样角色的人物就是吴昌时。

这样，钱牧斋的双重身份，政治活动经费的主要投资者、内

定了但未得实现的未来“首揆”，是进一步明确了。这对我们深入理解晚明政局的这场大斗争很有帮助，同时也明白了钱谦益与吴昌时的关系。

钱牧斋《有学集》有《西湖杂感》诗二十首，作于顺治七年庚寅（一六五〇）。其中就有为吴昌时而作的：

> 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惟王粲，东阁西园一罫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

不曾在政治上有过深深的结纳，像吴昌时这样的“黑人”，牧斋是不会为他写下这样一首悼诗的。虽然他不敢直书姓氏，只称之为“延陵君”。“东市朝衣”的用语，在梅村《鸳湖曲》里也是出现过的。在重按这一局已覆的残局时，钱、吴之间大抵也没有多少距离。

牧斋写得更为沉痛的是紧接着的一首《感叹勺园再作》：

>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乌衣燕少家。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

牧斋以夷门宾客自喻，可以看出两人间关系之深，也使人想起梅村“死生已负侯嬴诺”之句。这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典故，他们写的也都是政治诗。

有趣的是陈寅恪教授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此诗，还指出了其中含有另外的内容：

> 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柳如是）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嘉兴）养疴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河东君之访半野堂，亦预定于此时。职是之由，勺园一地，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惮一再赋诗，殊非偶然。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中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一〇二九页）

陈寅恪先生衰年病目，抛十年精力写成《柳如是别传》八十万言，那精神首先就是令人钦敬的。草草读过一遍，深感此书的特色与价值，除了种种题中应有之义外，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从或一视角、一定程度上勾出了明清之际政治生活、社会风俗史的轮廓。当然这还是一幅粉本，是未完成的画稿。其中有待论定加工、经营敷彩的地方还很不少。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缺陷也是难以避免、克服的。但到底给了我们一幅神采跃然的草图，使人们有可能大致窥见那个时代的面影。我常想，历史上有一些突出的人物、著作，因其特有的代表性与广泛的联系性，如能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结实的传记或研究著作，那将是无比的历史著作。其丰满、深刻与生动将非任何现有的史学著作类型所能达到。人物不一定是帝王将相，著作

也不必属于正经正史。柳如是不过是个妓女，但她就完全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传记的主人。吴昌时，应该说也是有资格的。从陈先生的著作中，使我得知，陈子龙《平露堂集》中诗有“欲问故人新奉使，朔云边月近如何”（自注：“时吴来之使山右初归”）句，又证以柳如是约略同时诗“同向秋风摇白羽，愁闻战马待单于”。陈先生于是说，陈子龙诗注“盖指与吴昌时共谈当日边事也”。至于柳诗，“岂谓吴来之昌时，由山西归松江后，便先访问卧子，因至河东君（柳）处耶？俟考”。又在论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之第二十五通时说：“至河东君此次在禾（嘉兴）养疴之处，颇疑即吴来之昌时之勺园……盖河东君至迟已于崇祯八年乙亥秋间在松江陈卧子处得识吴氏。”这许多，就是我过去所不知道也从未想到过的。而这些又正是我们了解钱牧斋在吴昌时“见法”六年以后，路过嘉兴还一再写诗追念亡友的心情的重要依据。即使陈先生的有些讨论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是确说，还应该“俟考”，还是不能忽视其参考价值。

钱牧斋崇祯十三年十月曾游嘉兴，有一诗《题南湖勺园》。《别传》说：“（寅恪案，光绪修嘉兴府志壹伍古迹门贰秀水县‘勺园’条云：‘一名竹亭。在澎湖滨。吴吏部昌时别业。’牧斋此诗结语云：‘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扶策上溪桥。’当更有所指，不仅谓烟雨楼也。）”这时昌时正在北京，筹了巨款为牧斋的再度出山积极活动不成，以薛国观赐死（在六月）“勾帐”，转而计划抬出周延儒之际，牧斋的心情自然是复杂的。

陈子龙刻行的巨制《皇明经世文编》，据陈寅恪先生的评论，“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这是说得不错的。它其实是一种理论建设和鼓舆论、造声势的重型武器。宋征璧在书前“凡例”中

提到素材搜集时就说："张讱叟、吴来之、朱闻玄邮遗集于齐鲁燕赵。"可见昌时在北京不只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也不放松理论宣传资料的收集、输送。卓人月《蟾台集》卷二，有一篇《吴来之行卷序》，是为昌时中式的八股文刻本而作的。略云："居无何则友人吴来之者已裒然得志于旧京而来过我。叩其所自出，盖黄元公先生也……时来之复为余述，先生之门自维斗以下，凡为名士者累累。且曰，元公师非俗吏也，愿见子久矣，盍见之……"简单的几句活，就活画出吴昌时拉拢名士联结声气的手段。

计东《敬亭集》有《上太仓吴祭酒书》（卷十），对梅村的《复社纪略》不客气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计东的意见是说复社诸君子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不应负党祸、亡国的责任。非常不满于梅村在《纪略》中提到了周延儒一案："似党人亡国罪状与复社相终始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这种闭起眼睛只图为党社洗刷的意见是徒劳而可笑的。但他也不能不提到吴昌时，"且首劾宜兴大罪者，即熊鱼山先生。鱼山即复社盟主也。宜兴（周）平日之不留意社事可知矣。被劾鱼山之后，不得已，以吴来之为鱼山门人，使求补牍中不胪列其大罪，以摇惑主听。于社事何与哉！于党祸何与哉！"正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终于否认不了吴昌时这位"复社表率"、"周门四君子之冠"的地位与作用（张鉴《冬青馆集》乙集卷六《书复社姓名录后四》）。

吴昌时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一个争气的儿子。陈寅恪引据徐阐公、张苍水等五家著作指出"来之有子名祖锡，字佩远"。但未引全谢山的《吴职方传》（《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其实这是一篇详尽而又写得声情并茂的佳传。

"吴职方祖锡，字佩远，别号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钮。浙之

嘉兴县人也。吏部文选郎昌时子，而为世父贵州按察使昌期后。职方既贵公子，妇翁则少詹事徐汧也。”谢山说他在崇祯末年就揽结剑客士豪，讲求出奇应变之学，又准备勤王之旅。就在这时，吴昌时被杀了。在说到昌时一案始末时，谢山只是说：“吏部故东林复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门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时昕夕出入首揆门。颇任喜怒。以持铨事，遂为祁公彪佳所纠。”这是论及吴昌时的难得看见的平恕之词，可以看出谢山对吴昌时的同情，好像也不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儿子也就因而原谅了做父亲的过恶。昌时被杀以后，“资产入官”。但南都陷后，“时职方资产四万在嘉兴库中”，还并没有落到精穷的地步。但吴祖锡上了降将陈洪范的当，把四万两银子全交给他作为反清复明的军饷。结果只落得逃来逃去，先后到过云南与东南沿海，依旧“如醉如魔，总求一得当以自慰”。祖锡有一个儿子，瘐死在狱中。妻子和自己只能四处逃亡。但得到人们的掩护，没有被捕。他还动员过郧阳十三营出师救滇，无效。又曾想到缅甸，没有去成。最后死在山东。

从全谢山论吴氏父子事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在百年之后考虑这些历史旧事时，态度更冷静也更客观了，有可能站得更高点，看得更远些。从全局论定人物的功过，也多少能摆脱同时人不可避免的强烈的爱憎感情，达到更为平实的结论。这并不能说明全谢山缺乏家国之感，正相反，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得也非常大胆。只能说，他的思想、考虑历史问题的方法，更冷静也更成熟了。

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

吴梅村《南湖春雨图》

十七年前因事避地鸳湖，登烟雨楼，呼茗独坐。时方首夏，楼外巨树参天，绿荫如幕，不见日色，即湖光亦不可见。时有白鸟结群而飞，作长唳，益增空寂寥阔之致。瞑坐间偶忆梅村《鸳湖曲》中“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之句，感叹久之。历三百年，景色固依然如昨也。归沪即检《家藏稿》读之，苦不能尽知诗旨。靳荣藩注及吴翌凤注，亦只言为吴昌时作，余未详也。乃搜群书，为作《笺证》。后无意中得见梅村《南湖春雨图》轴真迹，为之狂喜。此过云楼顾氏物，今在上海博物馆。纸墨明净，焕如新图。尤难得者，梅村于画幅上方手录《鸳湖曲》全诗，行楷端丽，如此长题，殆未易见。字句与通行本间有微异，向余仅能据《家藏稿》与《集览》诸本校字者，今乃更得一作者手写本。是可喜之又一事也。

梅村能画，但不常作，亦无意以此名世。然此图则极用心，一树一石，皆董法也。如掩去题识，以为董思白合作，必有信之者矣。

此图所写为吴吏部竹亭无疑。惟亦不必以实景视之。江山平远，烟渚依稀，此皆江南一隅实境。岸上横一短桥，精室二，其

后缭以短垣，丛竹茂密。更起一小冈，有阁翼然。其制颇丽，有飞檐，有阑槛窗槅，有帷幔，高树蔽之，即此草草点染，亦可见当年昌时园林亭榭之胜。虽时移世换，陵谷变迁，固犹依稀在梅村心目中。更右折，树木中隐见一塔，其后又有殿阁。南湖多塔，此不知何指，竹亭故址，今亦不知其处。祁彪佳《癸未日历》(崇祯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记："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过陆宣公桥北，观项氏园……暂泊于三塔湾。"时昌时弃市已两月，彪佳方自北京南归，途过嘉兴也。(按癸未三月，彪佳疏控昌时，后终奉旨看议，彪佳更与会勘之役。此日行经吴之故园，遥望而已。知当日心情亦甚复杂也。)以祁氏经行诸处推之，则竹亭必在南湖之畔，密迩烟雨楼，而位于去三塔寺道上。画幅右侧有冈阜，上有一亭，后亦有竹。或即所谓竹亭。吴氏园为明末叠石名家张南垣所构，上引彪佳日记，其前一日有访南垣于西马桥，晤其子张轶凡记事。祁氏寓山园，即倩轶凡为布置之。画幅右下方有高树双耸，特秀挺，为全图眼目，位置恰在门首泊舟之处。则"旧堤却认门前树"也。图中烟峦云树，都含雨意，远山之上，更有重云。极有层次，间用浓墨点染，精神俱出，景物繁复，而不伤壅塞，佳制也。

梅村于诗后题"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吴伟业"，下钤二印，"骏公"(朱文)，"吴伟业印"(白文)。右上方有押角朱文长印"灌隐"，则梅村别号也。按壬辰为顺治九年，去昌时见法恰十年。而诗云"十年此地扁舟住"，则《鸳湖曲》之撰，亦必在此年(或少前)，诗成更补以图，则此处所题者当是初稿，而《家藏稿》则为最后订正之本。

梅村于顺治九年寓嘉兴万寿宫，撰《绥寇纪略》。第二年癸巳春，禊饮虎丘，九郡人士至者几千人，奉梅村为宗主。同声、慎

交两社合盟，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其盛殊不亚于崇祯五年张西铭虎邱之会。是年九月，即“奉召”入都。士论多窃议之，虽有“实非本愿”之说，亦未能为人所谅，且有“江浙五不肖”之目，然三百年来，论者多倡为“原心略迹”之说，盖既爱赏其才华，复昧于个中委曲，遂生此矛盾之论，苟以当日情隐，钩稽发复，则不可解者或非终不可解也。

梅村之“应召”也，出之儿女亲家陈之遴之推挽（乾隆中杭人王茨檐说）。之遴固无耻之尤，早事新朝，而得贵显。梅村之出，何必迟之九年？是必有故。弘光覆灭，江南余烬犹有余燕。义师亦彼伏此起，清流正论，尚彰彰在人耳目。此时而出，非颜甲千重如钱牧斋者不办。梅村固尚不至此，且欲姑待以观世变。乃顺治七年，瞿式耜、张同敞死难桂林，南天一脉，岌岌垂绝。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之遴方结党擅权，欲以南人集团排去涿州冯铨徒党，亟欲借梅村文社宗主之声望以为招徕，而梅村亦跃跃欲试，失之于崇祯者安知不收之于顺治？所以毅然而出，更无反顾，孰意入朝未几，之遴即以结交内侍，遣戍辽左，梅村旋亦铩羽南归。其事与崇祯一局，如出一辙。吴昌时、陈之遴亦后先“辉映”。梅村则各赠之一诗，前者有《鸳湖曲》，后者有《拙政园山茶花歌》，事之相类，宁有甚于此者！

夫然后可以读《鸳湖曲》而探其微意矣。

梅村之撰《绥寇纪略》，其意殆以朱明实亡于农民之起义，必综其始末，知其教训，以为它日鉴诫。其于此际撰《鸳湖曲》，岂未能忘情于吴来之，抑复社一局之旧梦，徘徊胸臆，未能尽去耳。

方张溥之居林下也，谋起复周延儒以攫中枢政柄。其居间奔走者，吴昌时也。昌时固复社健者，居铨曹，号“摩登伽女”，有“妖气”之目。已先杀薛国观，更谋起周延儒，集巨赀以为活动之

费，每股万金，阮大铖、冯铨、侯恂（方域父）皆“股东”也。手眼通天，其法门为通内、通珰、通厂。通内者结田妃也。尝于江南采“象生花”进之妃，为崇祯帝所知，大不怿，梅村《永和宫词》所谓“私买琼花新样锦”即指此。通珰所以通内，通东厂锦衣卫，则并皇室之特务机构亦操纵随心，然其败亦在此。终致中左门亲鞫，用夹棍，两胫皆绝。不数日斩决旨下。延儒亦赐死。至此复社一局乃全败。

梅村之论此案也，有二语：“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无一言及昌时恶行，但归之于操纵乏术耳。于此知其“应召”再出，且先之以社盟大会，踵昌时故迹而不悔者，非无故矣。

梅村尚有《鸳湖感旧》一律，小序云：“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疑亦作于壬辰。有句云：“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亦“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意。

陈之遴《素庵诗钞》末附诗余，有《江城子》，题《鸳鸯湖感旧》，其词云：“鸳鸯湖上水如天，泛春船，此留连。急盏哀筝催月下长川。满座贤豪零落尽，屈指算，不多年。　　重来孤棹拨寒烟，罢调弦，懒匀笺。交割一场春梦与啼鹃。不是甘抛年少乐，才发兴，已萧然。”此词不知作于何年。起句与《鸳湖曲》只异数字，其间必有关涉，感慨亦正同。岂与梅村同游所赋耶？“交割一场春梦”云云，陈、吴对十年前一局之看法也。

昌时身后，《霜猿集》有记，云：“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二女思。”（注：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录》录宁完我参折：“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

《明诗纪事》辛签录胡山《烟雨楼》诗，有云："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孤儿亡命移名氏，稾葬归魂送夕阳。"则昌时尚有子，避祸亡命，故邸封闭。至清初，此园似仍籍没入官，更无新主。"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犹存老兵坐"，殆是当日实况。《家藏稿》作"画阁偷窥老兵怒"，意梅村重游此园，尝拟重登旧游画阁，而上坐老兵，怒不许窥。"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鸳湖感旧》)既不许入而窥园，遂亦只堪于画舫中遥望而已。

梅村手写《鸳湖曲》，与《家藏稿》校，颇有异字："草(粘)天"、"千尺(雨)"、"队(摧)"、"云鬟(弟子)"、"曲(榭)西"、"七贵(五侯)"、"玉骢(骄)"、"(待)归桡"、"(成)何用"、"(犹存)老兵(坐)"、"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凡有括号处均是异字)。其中有初稿本字，后经改订者；亦有董刻误字者。余每喜取清初旧刻集部单本或总集与后来刊本对校，种种异字，或可知文心之细，或可见避忌之状……大堪吟味。因跋此图，并记之。癸卯残腊。

咏怀堂诗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在南京做记者。记者生涯是忙碌杂乱的，不过有时也有难得的空闲。一天下午在城里闲走，晃到了清凉山脚下的龙蟠里。有名的国学图书馆就在这里。走进去看时，只见“逃难”归来的大批藏书，都一叠叠用麻绳捆起，堆在地上，还没有上架。馆长柳翼谋老先生和一些馆员正在忙着整理。他给我看了许多宋元旧本，顾校黄跋，告诉了我八年抗战中间这许多善本辗转舟车、流离颠沛的故事。后来我向他打听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的阮大铖《咏怀堂诗集》，柳先生叹息着说，馆藏旧书中，宋元本缺佚倒很少，但明本却损失严重。这阮髯的诗集已经不知下落了。就连馆中新印的本子也已被人偷出去当作还魂纸卖掉，没有多余的可供出售了。

我当时住在离秦淮不远的地方，每次经过总免不了要想起《桃花扇》的故事；后来还在城南偶然发现了一条“库司坊”的小巷，据说就是当年曾被老百姓呼为“裤子裆”的阮大铖的故居所在。那么，咏怀堂的故址应该也在这里了。因此想找一部阮胡子的诗集看看。这个愿望，在六年之后无意中实现了，在上海买到了阮诗三集。

这是徐乃昌的旧藏本。计《咏怀堂诗集》四卷;《外集》甲乙部;《丙子诗》二卷。都是崇祯中原刻。《诗集》前有扉叶,题"吴门毛恒所梓行"。叶灿序第一叶版心下有"白下毛升梓"五字,与《外集》版式如一,当系同时所刻,时在崇祯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年)。《丙子诗》是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年)刻,《自序》说:"其称诗,遂自崇祯乙亥后,系曰《咏怀堂某年诗》,而后仿此焉。"《丙子诗》后尚有《戊寅诗》(只下卷)、《辛巳诗》各二卷,有新排印本。

奇怪的是我得到的《丙子诗》二卷也是八千卷楼的旧物,卷前有"钱载"、"箨石"二印;"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印;"翁同龢观"印。此本没有随楼书一起运往南京,我估计是被人抽下作为"礼品"送给翁常熟了。图书馆排印所据则是丁氏旧藏的另一残本,只存卷上;后来又据丁初我的传抄本下卷补印,作为补遗。丁初我是常熟人,他的传抄本根据的大抵就是翁同龢见过的这个本子。

现存的阮大铖诗,还有一种《和箫集》,二十年前在宁波发现,是明刻白棉纸印本。《外集》乙部有《别退思》诗,诗后小注说"和箫予寓黄诗稿,为退思所题"。看来这个集子刻成尚早于诗集四卷。《丙子诗》卷前属"齐安退思杜祝进较",就是此人。

三十多年前在龙蟠里,只匆匆将《咏怀堂诗》的新印本翻了一下,记下了几联断句和卷前影印的名人评语,回来写了一篇《金陵杂记》。因为文中引了无想居士(王伯沆)的话,"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曾招来过一通斥责。二十多年以后听到《和箫集》发现的消息,又曾设法去买下或传抄。这次的后果更为严重了。终于被揭发,判定为对一个历史上的大坏蛋寄予了爱慕与同情。可见三十年来,人们的意见其实并无多少变化。当某人被判定为坏种之后,他的著作、言行……就不必也不许再去深

究，只要记住贴在他头上的标签就好了。这是很方便的办法，又能避免由于读了坏种的诗文自己也会随之变坏的危险。似乎也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老脾气。不过我看办法并不高明，采取了这种对策，坏种并不会少下去，而且还会多起来。老花样会不断照样搬用，连改头换面的手脚都可以省掉。人们只能在重新吃了一通苦头之后，最后省悟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其实是和陈年旧货并无明显区别的“新坏种”。

为什么会经常不断地出现这样的悲剧，我想可能就为了人们激于义愤或别的什么原因，把历来一切坏种的著作和言行录都毁弃、封存，不再过问，终于淡忘，没有吸取必要教训的缘故。

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这道理是大家都承认的。把坏种统统赶下舞台，或只留下几个贴着标签并无血肉的对立面，这有利于剧情的展开、结束，是无疑的。但这样一来，正面人物就无论如何也演不成戏，即使勉强演出也不是戏了。这个简单的、明白无误的道理，十分遗憾，恰恰正是人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

鲁迅先生晚年手订文集，总要写一篇“后记”，有时这“后记”还是颇长的。好像当年就曾有人讥笑过，鲁迅的编印文集其实不过是为了一条尾巴。可见这办法一实行就立即为论敌所注意并引起了痛恨。鲁迅的“后记”就是着重介绍评论所及的事件、人物的言行和社会背景，“立此存照”，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作意的。今天看来，这办法的好处是显然的，它免去了后来的研究者许多考订与争论，也堵死了恶意曲解、诬蔑的途径。试想，如果看不到这些反面材料，那么“两间余一卒”的鲁迅，不就和唐·吉诃德有些相像了么？

这就是我一向主张不可忽视反面教材的理由。

细想一下，“小人无不多才”这话是确有语病的。因为这并

不是事实。应该更正为凡是不平常的坏种，总有一定作恶的本领与能量，没有这条件，就不可能闯出大大的乱子来。也许这里所说的“才”，只是指文采而言。那么这种例子历史上也很不少。唐诗人中的沈佺期、宋之问；宋代的孙觌、方回；明代的严嵩、赵文华就都是好例。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的时代，这种“才子”往往就较多地出现，因为这时考验往往是更为严酷的。

方虚谷（回）的选本《奎瀛律髓》是很有名的，不过并不高明。这是一部作律诗的教科书，评选的方法则是恶俗的、教条主义的。首先，他认为诗人和别的人才一样，可以用某种机械的方法培养出来，这就是荒谬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方回曾写过一些好诗。大抵也因为名声太臭了，方回的诗集一直只有极少的抄本流传。我第一次接触此公的作品，是在抗战中间的重庆。那时学校有一些存书，受了水湿，在运动场上摊开了吹风。这中间有一大批商务印书馆版的《四库珍本》，其中就有方回的《桐江续集》。在那下不完秋雨的长江边上，读了“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真是使人不易忘记。后来读周密的《癸辛杂识》，才进一步得知这位“诗人”的真面目。

> 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似道），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别集》上）

真是没有法子想。方回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羞耻概念的奴才。这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争议。阮大铖饱读诗书，大概也熟知并佩服方回的手段，在数百年后几乎全同的时会依前法照办不误了，还有了新的发展，也确是没有争议的事实。看来这里似乎也是有着一种传统的，正如韩愈所说的“道统”一般，传来传去，连绵不绝，是否这以后就“无传焉”了呢？实在也难说得很。

陈寅恪的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有一节论及阮大铖：

>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阮）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寅恪先生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他承认阮大铖是坏种，但却欣赏他的才华。同时还提出东林人物在南明一局中的斗争策略问题，叹息他们没有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给阮胡子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贤如黄梨洲也未能突破当时清议的局限，给了阮

大铖以过分的斥责。这些意见，其实也并不新鲜，寅恪先生又曾引及并认为“颇为公允”的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的话，就代表了当时清流人物中的另一种看法。夏存古说：

> 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

照夏完淳的说法，连阮大铖的党羽崔魏，也是冤枉的了。阮大铖虽然以魏党余孽，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废置不用。在安徽故乡和南京一带闲住，但从他的诗集中看，交往之中也颇有东林中的人物，有些还是抗敌殉难的名臣与未来的遗民义士。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杜浚、方文、王思任、葛一龙、茅元仪、杨补、纪映钟、顾与治……都是曾与游宴倡和的诗友。他们中间，就颇有发出同情阮大铖言论的人物。如以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有名的王思任，就说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詈，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春灯谜》序)这甚至是说魏阉一案也“渭泾倒置”了。张宗子(岱)是《石匮书》的作者，是对晚明政局党争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自己见解的史家。他的《与李砚翁》一书，鲁迅曾经引用过。张岱主张具体分析，不能把东林说得毫无缺点，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鲁迅指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题未定〉草》)这是直到今天，也还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见解。张宗子也是阮大铖的朋友，曾称赞过“阮圆海之灵奇”的。《咏怀堂戊寅诗》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入山相访》诗，张岱《琅嬛文集》稿本也有《阮圆海祖堂留宿》诗，这是崇祯九

年阮大铖避居南京城外的祖堂山时，宗子往访彼此投赠之作。张岱的诗是：

牛首同天姥，生平梦寐深。山穷忽出寺，路断复穿林。得意难为画，移情何必琴。高贤一榻在，鸡黍故人心。

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萦虑，尊前费揣摩。

阮诗中也有“亦有同心侣，遥遥问薜萝”、“我法尊龙性，时情忌凤歌”之句，可以约略知道他们在献花岩畔夜谈的内容，他们谈到了政局斗争，而张宗子的同情是在阮大铖这一边的。张、王（思任）都是越人，他们的意见可以部分反映浙党的政治见解。

称赞阮大铖诗的人是不少的。寅恪先生的父亲、名诗人陈散原在《咏怀堂诗集》书衣上写下的评语是：“芳絜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丙辰（一九一六）惊蛰，散原。”章太炎的评语是：“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诐不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戊辰（一九二六）孟春，太炎。”胡先骕在长跋中甚至称之为“有明一代惟一之诗人”。这些评论主要都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而且一致提出了“不以人废言”的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分卷》的拟目里也列入了阮大铖的名字，不过是列入“清传奇杂剧作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诗。

《咏怀堂诗》的风貌也确是与王、孟、储、韦相近，阮大铖自己

也时时道出了他对陶、谢的崇敬。奇怪的是，此外他还佩服着一个谢翱羽。有的评论说他的成就高出严分宜，也应是事实。其实严嵩诗学的功力又何尝低于大铖，不过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一个是盘据政府几十年的权相；一个则是十七年（崇祯一朝）窜身草莽。这样他们虽然同样披着一件悠闲澹远的外衣，但面目到底不一样。内心委曲是很难掩盖的，即使有绝大的本领也困难。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十四首“还山诗”，作于天启甲子，“还山”就是“归隐”，这是几千年来士大夫十分钟爱的题目。他们都熟练地掌握了祖传的两套本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应付“穷”、“达”两种不同处境。认真考虑一下，就会明白这似乎是矛盾着的两面其实不过是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却只有一个。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归隐”，其实不过是避风头，是为出山作准备。历史上大约是有真正的隐士的吧，不过并不多。写这样的“还山诗”，照例还可以发一点小小的牢骚，如“不才明主弃”之类，但文章的结穴总要声述自己对皇帝恩情的感激，好像皇帝一直是死活拉住不放要他帮忙似的，现在终于放手了，使“遂初之愿”终于得到满足，又哪能不感激。这是这类诗的一般规格，是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

阮大铖苦心经营写下的这十四首诗，确是文采斐然，不愧佳作。太炎说他最长五古，律诗少逊，七言尤次。这十四首全是七言律，却写得着实不差。像“拂袖行吟归去来，草堂猿鹤莫相猜。云霄自愧无修翮，雨露谁为弃不材。”“十年小草溷风尘，五斗于人太苦辛。削木为鸢应是幻，以蕉覆鹿定何真。”“腐草为萤难自照，长霄与鸟幸高飞。人生岂必皆朱轂，下泽乌犍策亦肥。”这些句子，确是深合还山诗的要求的。虽有怨气，但却不多。又如：

“星占处士山中卧，影弄婴儿世上名。但使榆关销战斗，何妨花坞有深耕。”就是在说，虽已解组归来，也还惦记着东方的边患，立意也是极好的。不过要想完全掩却胸中的心事，到底不容易。“圣世何尝分蜀洛，野心长此托巢由。”“宦海惊涛迷象马，名场孤注夺枭卢。”“任有网罗及鸿渚，谁将柯斧指龟山。”这些，就并不隐讳地揭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还山”的真正原因。阮大铖万历丙辰科中会试，不久居忧还里。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一直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也是他接近东林的关系人。天启甲子，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但因东林人物意见不一而未能如愿。这时阮大铖立即转而投靠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但只一月，就告归“还山”了。这是他背叛东林投奔阉党的开始。

明白了这背景，再来读“还山诗”时就可以领会得另一番滋味。他“还山”之时，曾对亲近的朋友咬牙切齿地说：“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果然，第二年左光斗就和高攀龙、杨涟等一起下狱论死了。他们都是反对大铖出任吏科都给事中的。

阮大铖这时又回到北京任太常少卿。但几个月以后，又自请“还山”了。这回告退的原因是看出魏忠贤的日子不长了。他每次到忠贤那里去献殷勤，总要用“重赂”向门房买回名刺。这样后来追查阉党余孽时，并抓不到他任何白纸黑字的把柄，这一手实在“高明”，是古今同类“英雄”万万不及的。

崇祯改元，大铖在家里准备了两本奏章。一通专劾崔、魏；另一通则分前后两个阶段指出东林、阉党各有应负的政治责任，一并送到北京杨维垣处，请他看准气候选一本上奏。这一手也是新鲜的创造，为前史所未有。大铖以光禄卿三上京华，大约也只几个月，又被劾罢官。第二年定了“逆案”，十七年中一直不得

翻身。

十七年中，阮大铖先是住在故乡安徽，后来农民起义军打了过来，就逃往南京。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同和尚相与，集子里留下的是晚明士绅“风雅”生活的写照。来往得最多的是会试同年此刻丢了官在金陵闲住的马士英，此外还有许多名士、贵官。阮大铖在诗里有不少“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一类的句子，说明他念念不忘以“边才”起用。当时边患、“内乱”如火燎原，许多人都以此“起废”了，这就是他忽然热中于谈兵说剑的真正原因。《丙子诗》下有《岁晏柬南高冏卿》诗：

离居何必赋招魂，农圃如今道亦尊。鸡肋久捐尘外梦，鸱夷况有眼前樽。一林明月碧如此，六代寒山青不言。多少军烽连野哭，牛衣飒沓亦君恩。

诗确是写得漂亮，也并不脱离现实，但什么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呢？另一首《张金吾以书见讯赋答》就说得明白多了：

人事已如此，安危仗有天。谁移元祐碣，一为勒燕然。谣诼皋夔窘，凭陵蜀洛坚。不然边徼火，何以烛甘泉。

在无可奈何之中，阮大铖将国事之坏完全归罪于东林的门户之见。他想翻案，想“立功”。十七年中，几乎没有片刻放弃过这种意念。可以说，“南都防乱公揭”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

阮大铖和周延儒是旧友，《戊寅诗》下有《寿周相国挹斋五十》诗两律，《辛巳诗》上又有《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六律，都是逢

迎拍马之作，读了会使人肌肤起栗的，不过这中间自有一段故事。

崇祯十四年，在籍的周延儒被召再度出任首辅。许多晚明野史都说这是复社党魁张溥活动的结果。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宜兴再召》说："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氏侯氏两家，又奔走而灵线索，庶常张溥天如、祠祭主事吴昌时来之也。擘画两年，征召之绋始下。"《霜猿集》诗注说："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孟心史校记云，一本"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又说："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这二十万两活动费，采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筹款法，有的野史说股东之一就正是阮大铖。大铖送延儒入京诗第五首说：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这里盼望延儒为自己翻案并起废的意思是刻露的。《阮大铖本末小记》说：

宜兴相公周延儒，为髫年昵友。既回籍，大铖时过其家。延儒与约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铖遣候，以金杯为寿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举杯酹者三，仍令持归，语使曰，"饮此如与尔主面谈矣。旧约不忘。但今兹之出，实由东林，先与我约法三章，第一

义即尔主也。归语尔主，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俟其以边才转荐，我相几图之，必得当以报耳。”使归，大铖以为无踰马士英者，遂以士英请。延儒入，即拔士英为凤督。

这就是马士英起用的经过，自然也就是弘光一局马、阮合作的张本。

阉党冯铨也是阮大铖的密友。张岱《石匮书后集》《马阮列传》说：

（大铖）与涿州冯铨称莫逆，醵多金力图翻案。特以先帝蓄怒党人，坚执不允。家居以诗酒自娱，多作传奇，寓言解嘲。

利用戏剧进行政治宣传，应该说也是阮大铖的一种“创造”，他是早于康生三百多年，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据吴瞿庵跋大铖《双金榜》说：

按圆海曾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后附魏党，为刘蕺山（宗周）所劾。魏败，坐逆案削职。此词当是坐废时作。记中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以东洛喻东林，以东粤喻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番鬼者魏也。佽飞窃珠，亦窥窃神器之意。“迕讦”一折，意谓己与蕺山同属攀龙门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

这里所说颇有些“索隐派”的气味，不过也并非毫无影响。因为在晚明运用戏曲进行政治斗争甚至私人攻讦的风气是颇盛的，张秋水所说《绿牡丹》（不是“粲花轩”本）的故事就是好例。阮大铖的另一本传奇《牟尼合》，董康曾据明本复刻行世。后来王孝慈又收得明末刻本，发现《伶调》一折两本内容不同。董本的内容是程咬金、秦叔宝庆贺尉迟敬德生辰；王本则是内官牛承恩等庆贺旧内史裴寂生日。王氏的判断是：

> 是时南都久忘国耻，每耽戏剧。阮制诸曲，固以之自娱，亦兼以媚诸貂珰……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独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

这不只是版本学上的一种故实，也说明阮大铖在以戏曲为政治服务时会玩出怎样奇特的花样。这是过去的戏曲史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王渔洋说阮大铖曾用绫绢朱丝阑精写《燕子笺》送给弘光帝，野史又曾记阮大铖降清后在营中为清军将领唱曲：“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从新主子口中获得“才子”的称赞，大概是曾使阮胡子为之欢欣鼓舞的吧。

现存阮大铖的编年诗集，只到崇祯十四年辛巳为止。这以后的几年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期，忙是比过去忙得多了，但诗总还是作的吧。也许不等编好、付雕，清兵就已渡江，终于来不及出版。果真如此，那可是太可惜了。

我们虽然不能读到阮大铖辛巳以后的诗，却能从野史中知

道他的许多故事。应该说，用行动为自己勾勒出的脸谱，其真实、生动就绝非没有“达诂”的诗所能及。在弘光一局中阮大铖的种种表演是人们熟知的；后来摇身一变，以“才子”的身份，归顺大清，直至“为王前驱”，死于仙霞岭上。这许多，钱秉镫曾据当年目击者的口述，写入《阮大铖本末小纪》，附于《所知录》之末。这是极有益的野史，能找到原书的读者都应该好好读一下。

四十五年前鲁迅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里不但指出了鉴别古今一切人物的好方法，也是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有效手段。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海滨消夏记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这两年，我是在乡下度过的。先是在奉贤，后来又移居宝山，都是上海市郊滨海的地方。下乡的目的并非避暑或休养，一肩行李之外，只能背一只小小的旅行包，因为要徒步好几十里才能走到住处，所以随身带些什么是必须仔细斟酌的。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首先考虑的就是食物，如面包、饼干之类。此外，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带了。不过每次我总要忍痛塞进一本书去。这就更需要仔细斟酌。小说是不合适的，本子厚，可是一下子就读完了。大部头的著作也不行，这必须只是一小本，但却耐读的书才好。我先后带去过两本书，一本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另一本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效果很好。这两本书都需要细嚼慢咽，因之就耐读；同时，这又是像青果似的很有余味的读物，能引起许多思索。当时曾在卷尾书眉写过一些笔记，记下了一些感受，也附带记一些琐事。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重新翻翻也还是很有趣的。

我在《宋诗选注》的卷尾写了一段题记：

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携此册来海滨。得数日闲，读毕

之，颇除岑寂。此书颇佳，如一《宋诗话》，其妙在此。书初出版，攻之者纷纷而起，皆以为资产阶级思想白旗，必拔之而后快。然作者自有识见，援引之富更非纷纷论者所能尽知。今日见夏承焘文，乃盛称之，颇得其中辛苦。才八月耳，风向乃逆转如是，真只能“说与江湖钓叟知”耳。为之慨然。己亥六月廿九日午后记。

我想，这种奇怪现象，在当时，怕不只是我一个人感到莫名其妙的。

在柳永的《煮海歌》后面，我也写了一点题记：

今夏来奉贤海滨，常见盐民劳作。于海滩上聚土为墩，中有深穴，下复瓦缶。海潮涌溢，辄浸墩旁土，乃层层刮之，作圆形，以水牛曳具，层层削去，复之墩上。更取水冲之，别于墩侧洞中取卤。以竹木为小床，卤水即灌注床上。曝日既久，盐粒晶晶出矣。异于煮海者，不须烧耳。盐民挑巨桶，奔驰烈日中十数里，始运一担归，辛苦如此。以视柳诗，则赵宋迄今，盐法固少变也。定海余亦曾往游，却未访盐场，不知今作何状矣。非此古志仅存，谁知柳三变固尝留心民间疾苦者耶？己亥立秋后一日，晨起读书钱家桥畔，危坐胡床，驱蝇作记。

我当时的工作是在海边筑堤。住处在钱桥镇外，在农民家里借了一间堂屋，安了四只床。每天四时半起床，赶到镇上早饭，然后挑了粪箕，扛着铁锸向海边工地出发。要走半小时才能到达。这地方是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盐滩，看不到一棵树木，连小

草也没有。地面是一片雪白的盐花，和像龟背一样崩裂的纹。附近只有一些疏疏落落的盐墩子，像烽火台似的插在那里。我们不停地用铁锩装满了泥土，挑到面前逐渐高起来的大堤上去。工作四小时后午饭，饭后有半小时的休息。饭是从镇上挑了来的，我们就坐在炎炎烈日之下进餐。饭后，到哪里去休息呢？上下四方都是火辣辣的阳光，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盐墩四周有一圈一尺来宽狭狭的阴凉。睡下去时头部还是遮不住。不过不要紧，可以用草帽盖在脸上。就这样躺在那里，睡是睡不着的。于是就有机会仔细观察这盐墩，觉得很有意思。“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增成卤。”柳永写的正是这样的操作方式，是直到今天还活着的古老生产方式，这是不能不引起我的感慨的。就是这感慨，十年后曾被当作对社会主义农村的诬蔑而受到了批判。这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其实，当时我们担心的却是另外的事情。有一天，将近收工了，正是“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时候，忽地不知从哪里来了漫山遍野放牧归来的一大群水牛，它们欢快地、放肆地从我们好不容易叠起的大堤上走过，一下子就把堤面踏得七零八落了。

柳永此诗收于厉鹗的《宋诗纪事》卷十三，选者是查引了原书的。我觉得这正是《选注》的一个特色。不只是靠了几部通行的宋诗选本、总集，就来下手。编成小小一本《选注》，事先要读大量的素材。这样就产生了与过去的选本面貌迥异的新的著作。但很少读者能察觉因此付出的劳动。柳永，过去我们几乎不知道他还能作诗，更不知道他除了整天和女伎鬼混之外还曾留心人民的疾苦。真是很不公平的事。在《宋诗纪事》中，此诗原题是《鬻海歌》，不作《煮海歌》，虽只一字之差，但却包含了另

外的，也许更为深刻的含意。此外还有一个副题，《为晓峰盐场官作》，好像也可以加一点校记。

回忆我的题记是坐在胡床上写下的。钱桥夏天的苍蝇真是厉害，简直毫无顾忌的一群，不停向人袭击，没有办法，大白天也要把帐子放下，躲进去才能得到片刻的安静。自然，这样一来，是更加闷热了。

《选注》收孔平仲《禾熟》一诗，是写水牛的：

> 万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

那两年在乡下，有很多机会看到水牛，秋收的场面也不只经历过一次，因此觉得这诗实在写得好，我曾作题记说：

> 此诗佳甚。近来多见水牛，种种姿态，皆可入画，亦可入诗，然无此新意亦不能警策也。历来画人书家集最易混入前人之作，《瓯香馆集》别下斋本尤繁富，多出《毗陵六逸》本几倍，误收之诗必不在少。近人赵尧生集中亦误收前人诗，患其为人作书录旧诗而不著姓氏也。

下面的话是因钱先生指出南田集中曾收入此诗只少有异字一点而发的。

在陈简斋的《早行》诗后，我写道：

> 在钱桥时，每归沪，辄昧爽即起。行三官道中，炊许天尚未晓也。一路稻田弥望，曲水石桥，都从朦胧中过。此早

行诗，真能写出其中意境。己亥立秋晨坐后圃塘边记。

在乡下时，每两星期有一天休假，可以回沪。加上来往“路程假”，也只有两天。因此每逢休假前夕，不到半夜就睡不着了。小包是隔夜整理好的，摸黑下了床，推门出去大抵仍是满天星斗。走过镇上，看到茶馆里的服务员也只刚爬起来，披了件衣服睡眼朦胧地在灶前出灰。暗黑中走在村边田里的小径上，软软的，草上满是露水，没好久鞋子就全湿了。走过三官时天刚发亮，这里有大大小小许多石牌坊，有些还雕得异常精致，大约是些节孝坊，我是一回也不曾停下读过牌坊上的刻字。虽然是在赶路，但下意识里似乎还在作梦。这样，读了陈简斋的“寂寞小桥和梦过，稻田深处草虫鸣”，是不能不为之叫绝的。

在杨诚斋的《插秧歌》下，我说：“此诗作于八百年前，恍如写目前景物。诗之伟绝乎？抑人事之恒久而不变也。”

我曾坐在脚盆里或小凳上拔过秧；也挑过一担担湿漉漉的秧束来到滑得像浇了油似的田埂上，将秧束一把把扔在弯了腰倒退着插秧人屁股后面的水田里；也听说过抛秧的种种规矩与禁忌。插秧时节，遇到雨天，下面赤了脚，上身却“随例”披着一件旧棉衣，“雨从头上湿到胛”这样的滋味是多次尝到过的。奇怪的是从来不曾觉得是在吃苦，相反感到的是非凡的兴奋、有趣。我想，能赶上参加这种古老的田间操作是幸运的，因为这一切迟早都将成为过去。

《宋诗选注》里也收入了不少我极感兴趣的“儿时读本，老大重逢，如遇故人，别有情味”的诗。这些曾收入《后村千家诗》中的作品，如“绿遍山原白满川”、“黄梅时节家家雨”，在村居的煤油灯下重读，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诗人说“乡村四月闲人

少”，刻画的正是一种繁忙的农村生产风景，就是移来描写今天的农村，也没有什么不合适。不过这意见在前些年却说不得，“英雄”们指责我这是混淆了封建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想判我以“反革命”的大罪。这确曾是毫不夸张的事实。

在读《选注》中陆游的《病起》一诗时，我曾突然悟到，柳如是有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一诗，正无疑是受了放翁此诗的影响，连韵脚也几乎全同。这一点，仔细研究了柳如是的身世与作品的陈寅恪教授也没有提到。现在据顺治冠山堂刻《名媛诗》把柳如是的原作写在下面：

>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放翁的“春尽江南尚薄寒”，“年来触事动忧端”，和柳诗之间的隐约承继关系是明显的。“名花零落雨中看”化为“翠帐容颜独自看”，而“志士凄凉闲处老”也正是“画堂消息何人晓”的同义语，分别只在作者身份的不同。

一九六一年春暮，我从奉贤移居宝山乡下。这地方在“一·二八”抗日战争时期曾是著名的战场，附近的小镇上还遗留着当年战后未曾清理净尽的断瓦颓垣。我们仍旧借住了一间农家的堂屋，门外就是小河，后面还有杂植的花木，环境比住在奉贤时好些。在这里，我读了陈援庵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从每卷后面所写的题记中，还可以约略记起当时乡居的影子：

> 辛丑端阳前四日，坐雨读竟此卷。时积雨连朝，屋前小

溪几将溢出，雷雨犹不止。田畴一望弥白。麦黄梅竟延至七日之久，居城市人不能知也。葑溪寓客漫记。

那一年不知为什么多雨。下雨天不能在大田里作生活，这在我们则是难得的休息。可以坐下来看看书。晚上窗外是一片此起彼落的“蛙鼓”，显得环境分外的幽静。有时提了铅桶和电筒随了小孩子去河边摸螃蜞，不一会就能捉得满满的一桶。隔壁的农民一次在住处附近的河边潭里捉到一条四五斤重的黑鱼，他并不走开，说，黑鱼总是成对的，这里一定还有一条雌鱼。果然，没过半小时，他又捉起了另一条，一起拎回家去了。有时候雨少停，我们就去摊田。这活路是要赤了脚，肩了铁锸，来到刚耕过放了水的田里，把翻起的土块摆弄平整。我写下的另一条题记是：

辛丑四月二十七日，晨窗讫此卷。时方摊水田归，泥浆满衣，天又微雨矣。

这是从水田里回来，没有换衣服也没有洗脚，在等候吃饭时写下的。这时腿上的泥浆逐渐干却，引起了一阵阵痒，一搔，泥块就一片片脱落下来了。

这中间，我又接受过一件新任务。收下的三麦，因为一直下雨来不及脱粒，就一起藏在鸭棚里面。这是很长的一排地下室似的窝棚。白天夜里都要人看守，还得留心麦子的变化，防备它发霉或出芽。到了晚上，我就带了这本《表微》睡在鸭棚里，借着手电筒的光翻读。

辛丑芒种后二日，守麦于鸭棚。中夜大雨，雷电时作。倦极思睡，而蚊扰不已，蛙声鼓噪，漫记。

辛丑五月初二日，午后暴蒸热，飘风细雨，自鸭棚归，芒刺满身，读至此。

就是这时的纪事。这实在非常狼狈，不彻底洗浴并换上干净衣服，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那种“芒刺在背”的可恶感觉，但在当时，也只好算了。

援庵先生这本《表微》撰于抗战中（一九四五年）的北平。这是一部历史学名著，不过我几次翻阅总不能不醉心于他的文章之美。援庵先生使用的是文言文，造句又极其简炼，似乎毫无铺陈文彩，但他写下的正是成就极高的散文。我一直有一种感觉，按照今天的通常概念，散文的范围已经狭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仿佛只有某一种讲究词藻、近于散文诗似的抒情写景之作，才可以称为散文。其实按照过去的传统，无论中外，散文的门类和风格都非常繁复，并不如此单一。即以史学著作而论，我们就曾有不同风格、色调的散文名篇在。记事、论议……即使是科学性很强的著作，也完全不妨碍它成为美文。《表微》卷前有一篇一九四五年的《小引》，卷后有一九五七年用语体写的《重印后记》。两者都是在说明著书的本旨，但写法不同。那篇《小引》一直是我爱读的一篇美文：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惟胡氏复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

开头这一节，闲闲写来，似乎是与全篇很少关系的“闲文”，又明白如话，没有任何搔首弄姿之意。但正是这一节，将一位爱国的老学者闭户索居，看来寂寞，其实非常炽热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艰窘生活写尽了。下面写他读《通鉴》的感受，对胡三省的评价，著此书的用意，虽然隐曲，其实已经异常明白。《小引》的结尾是：

> 《鉴注》成于临安陷后之八年，为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之成，相距六百六十年，亦在乙酉，此则偶合者耳！

这也是一条闲闲的尾巴，也完全是史学家的习惯口气，但添上这么两句之后，正如王静安所说：“境界全出矣！”

今天我们读此文，还不能不佩服援庵先生在一九四五年的北平，写下这本书和这篇《小引》的勇敢。

《表微》共二十篇，作者几乎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集中阐发了有关民族气节的问题。《本朝》、《感慨》、《臣节》、《出处》、《边事》、《夷夏》、《民心》、《生死》这些篇都是与此直接相关的，其他诸篇也时时不忘此义。在墨板的当时，这书确不愧是战斗的檄文。一九五七年重印时，作者谦逊地说：“书中有不少幼稚及迂阔的言论。”这在一九六一年我初读此书时，好像也同意并接受了作者这些意见。事过境迁，讲气节，特别是充满了封建臭味的《臣节》，似乎也确是有些“迂阔”了。不过后来我又逐渐省悟，这种理解，其实倒是显示了自己的迂阔与机械。在饱看了五花八门的卖论取官，出卖同志向上爬……的丑恶现象之后，不能不翻然憬悟，时代前进了，“气节”却并不因之而跌价报废，还是着实应该讲下去的。自然，内容是会有所不同了。不然的话，恶性发

展下去，是连民族、国家、正义这一切都会一古脑儿被败类们卖掉的。即使这样的败类终于是少数，也大意不得。

援庵先生所辑的“精语”之中，有许多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通鉴》：“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胡注：“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欠大伸，岂不快哉！”陈先生说：“以‘解人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胡）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这里说的就是“解放”的古义。后来在《治术篇》里，又引徐温的话：“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这说明封建社会的某些人也多少明白安定局面的重要和取得的办法。他又引《通鉴》所记晋穆帝永和二年，“石虎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觐，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语”。胡三省把这看作比周厉王监谤，秦始皇禁耦语还要凶残的办法。援庵先生则以宋事加以说明：“秦桧之持和议，忠臣良将，诛除殆尽。又兴文字之狱，许人告讦，凡私论朝政，皆贬窜之。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少涉讥议即捕治，以塞士夫之口。桧之法，石虎之法也。”他在这里指出的，正是三四十年代旧中国的现实，还点明他们使用的是衣钵相承的祖传老法。这和他在《出处篇》的结尾引用司空表圣诗“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痛斥汉奸，读了都使人捏一把汗，他竟逃过了敌伪的“捕治”，真是一种奇迹。

在论唐代理财家刘晏、李巽的优劣时，援庵先生指出胡三省在这里指斥的就是元初的卢世荣之辈，并引当时人的话，“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危万民之命，易一世之荣，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将见民间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

危利害之机，殆有不可胜言者”，加以说明。援庵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但他关心民族存亡、人民疾苦的心是天下所共见的。不能不说，这里表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优美品质，就在今天也应该花大力气继承、恢复、发扬，看来也并非“迂阔”之论吧。

在那难忘的，不平凡的两个夏天，我读了这两种书，至今难以忘记，因作《海滨消夏记》。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

不是抬杠

去年读了姚雪垠同志论《圆圆曲》的文章，曾写过一篇小文，记下了自己的一些读后感。不久，又读到姚雪垠同志的新作《评〈甲申三百年祭〉》，在最后三节里，顺便回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除了声明他的“论点难免有不周密和不完善之处”以外，从所列举的有关“陈圆圆传说”的九条“矛盾”看，是依旧坚持着前说的，同时也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我想，这大约是不能勉强的。许多意见既然过去都已说过，也用不着再重复了。最近看到经过作者校订、补充，重新发表在《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五期）上的《评〈甲申三百年祭〉》，果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他说：

> 黄裳同志在反驳我的文章中，不同意我说吴三桂在崇祯末年不可能到北京，所说的都是抬杠的话，看来很俏皮，但是他并不能就历史科学说出一句有价值的话。历史是科学，靠证据说话，不是抬杠。

这里所指责的真是义正辞严，使我不能不惊醒，检查自己。

我尤其同感的是他的结论。是的，历史是科学，要靠证据说话，不应该是也不能容忍抬杠的情况出现。

当然我也想说明，在我的文字中，虽然时有“俏皮话”出现，但这并不等同于开玩笑。不只在上述那个具体问题上，在《陈圆圆》全文中，也没有任何不经过慎重思考、不负责任的话。我非常希望读者不因此而发生误解，使严肃的讨论化为一场打诨与趣谈。

我是不会做考证文章的。平常看书，也很少作笔记。遇到一个问题，只能临时求助于头脑中存留的印象。近来记忆力又大大衰退，看过的书几乎立即成了朦胧的影子。讨论历史问题时也只能采取“有啥吃啥”的方法。那就是说，手头有什么书就利用什么书。这实在是很不可取的不认真的态度。例如，讨论陈圆圆的问题，谈迁的《国榷》应该是重要的参考文献。不幸旧有的一部已被抄没，又懒于跑图书馆，因此就没有能利用此书。如果我当时设法找到了《国榷》，那么在吴三桂是否曾在崇祯末年到过北京的问题上，就用不着说什公“俏皮话”，立即有了姚雪垠同志所要求的“史料证据”。

给了我这知识的是北京大学同学朱则杰，他的文章发表在半年前出版的《文史知识》上。他指出，《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五月，就有“丁未，宴入援总兵吴三桂、刘泽清、马科等于武英殿”的记载，与《崇祯实录》的记载全同。这真是一句顶得上若干句的“史料证据”，无论“俏皮话”或别的什么话在它面前都将不起作用了。

朱则杰同志说：“《国榷》一书，也是姚先生十分熟悉的，不知为什么偏偏没有注意到这条材料。”是的，对我说来，这也是不好理解的疑团。尤其不可解的是，时间过了半年，姚雪垠同志在修

订、补充，重新发表他的论文时，依旧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也同样不可能”，并再度郑重要求提出“史料证据”来。

为了改正过去的不认真，昨天总算设法借来了一本《国榷》，亲眼看到了上面引用的那条材料，这才放了心。不料，却又发现了另外的怪事。姚雪垠同志说：“我认为下面的史料所云陈圆圆到了宁远，比较合乎情理。”下面引用的是《国榷》卷一百中的一节话：“先是，十六年春……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拷之酷。”这一节话在《国榷》卷一百的结尾处，从“又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前岁游南京”开始到“拷之酷”为止，一起不过九十余字，并无姚引的二百余字之多，也不曾说什么陈圆圆遣送宁远“已死”的话。

这实在是奇怪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国榷》是中华书局用张宗祥的校本排印的。张氏根据的则是蒋氏衍芬草堂、丁氏八千卷楼、四明卢氏抱经楼等几个旧抄本汇校写定。应该说是比较完备的足本。姚雪垠同志所据，不知是否更好的旧抄足本，不好贸然断定。在没有得到解释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也是一件怪事。

姚雪垠同志说：“我在《论〈圆圆曲〉》的文章中，考证《圆圆》写作的时间，陈圆圆故事从开始出现到传奇化的过程，以及陈圆圆故事的本身矛盾，我的论点可能不够严密，但我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方法是科学的。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姚雪垠同志没有具体指出。他又说：“不管陈圆圆是否病死宁远，或随吴进关而死于昆明，我都不相信陈圆圆同大顺军有关系，也不相信吴三桂是因为陈圆圆而投降清朝。”也许“核心”在这里，但不知道可的确。

回忆我写那篇《陈圆圆》，最早的契机恰恰是因姚雪垠同志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而引起的。我曾举出过一些例证，说明姚雪垠同志对史料的运用，不能不使人怀疑颇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他先是有了一种见解，然后就去寻找能够证明这种见解的“史料”。包括错误百出的《甲申传信录》那样的书在内。看到“已死”两个字，就干脆而彻底地宣称陈圆圆在一切矛盾尚未展开之前就已死掉了。至于大量的有关陈圆圆的文献，好像是并不存在的。这方法自然简单而痛快，但却很难说是“严肃”与“科学”。

姚雪垠同志在引用同一条史料、同一人的声述时，有时就出现了奇怪的只取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的现象。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却并不声明。现在经过驳难，总算是有了一点解释。说过杨宛、陈沅曾同时见系于刘宗敏的全谢山，被指为“得自辗转传闻，不应作为信史看待”。那么《甲申传信录》是作者亲身经历、亲自调查的报告书么？作者有没有在宁远看到死去的陈沅的尸体？为什么姚雪垠同志对这书要寄以如此的信任呢？“某一塘报稿”不被注意的“简单回答”是“我目前还认为那些史料不是确凿可靠的”。没有理由，只有结论。“塘报”是三百多年前的一种情况汇报的公文形式，是一种文献实物，不同于“传闻”，也不是因三百年后的讨论预制出来的证件。为什么不可靠？也许今后我们会听到更为充分的理由。

类似的情况决不是偶然的。甚至连并不艰深的吴梅村诗，也往往作了古怪的解释。我们决不应怀疑姚雪垠同志读诗的功力，但要注意他何以作出与众不同解释的原因。

总的情况似乎是如此的。三百多年前出现过大量的史料，其中有确凿无疑的“实录”，也有“传闻”，还有“文学创作”。姚雪垠同志就是用上述的种种方法，和这些白纸黑字的“史料”抬杠。

九条“矛盾”，很少不是定为“不合情理”而引伸出来的推论。这算不算是就历史科学说出了有价值的话呢？

照我简单的头脑看来，研究历史问题，结论应该从大量充分的史料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获得，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有利、不利的史料都应受到重视，只有经过分析、研究才能决定取舍。“不相信”、“不认为”这一类充满主观色彩的词句出现在严肃的论文中是不合适的。判断一个人的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惟一标准也只能是实践而不是宣言。

姚雪垠同志正面阐述的许多治史应取的态度与方法，看来都是非常正确、无可非议的。奇怪的是他在实践中又往往忘记了它们。

例如，姚雪垠同志曾在讨论李岩的问题时强调说明，“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是不行的。不过在谈到刘宗敏与陈圆圆的关系时，就把陈圆圆这个有名的女人看成是比硝镪水还要可怕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沾惹，不惜想尽一切办法为刘将军辩诬。但据野史所记，曾为刘宗敏所掠的还有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家媳妇等一大批别的女人，姚雪垠同志就都置而不论了。这就是说，名气小或无名的女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掠取，但陈圆圆则不行。从这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出，在姚雪垠同志看来，女人中间是分着等级的。有的能旋转乾坤，有的就只能与草木同腐；有的“艳名”昭著，有的没没无闻；有的不妨随意玩弄，有的就该“敬而远之”。总之，不只她们的“个人作用”天差地远；在同样受到污辱、迫害时，她们应得的同情也是有等差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呢？这和姚雪垠同志声明坚持的不相信吴三桂降清是为了陈圆圆的观点怎样合拍得起来呢？

历史论文与历史小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同样要受到作

者历史观的制约。在论文中为刘宗敏洗刷辩诬，目的也是为了创作小说的方便。刘宗敏是大顺农民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是一个英雄。在历史记载中如有强加于他的诬蔑不实之词，是必须推倒的。但他终究不是一位毫无缺点错误的“高大全”的“英雄”，也是事实。无论大顺军的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作为一位军中主将，进城以后，如此对待妇女总不能说是不必重视的“小节”。我不想推论姚雪垠同志的作品曾否受到“三突出”那一套创作方法的影响和这种影响有多深。但从他为刘宗敏“辩诬”的热情与手法看，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至于这种创作“方法”与“理论”的得失，实践早已提供了结论，用不着多说了。姚雪垠同志曾义愤填膺地说，许多“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几句话说得非常明白，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可爱的“素朴的革命感情”。凡是对刘宗敏（也就是大顺军。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了刘宗敏“个人”在姚雪垠同志头脑中的“作用”与分量）的“诬蔑”我们就要反对，就要洗刷，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则是次要的，不必多费心思。这确是一种“可爱”的素朴的感情，可惜并不科学，也得不出理想的果实。

姚雪垠同志责怪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有些话说过了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值得慎重考虑，也应该加以说明。提起《甲申三百年祭》，我总是立刻记起文章发表之后在重庆立即引起的反响。当时那些反对此文的论客大概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就和崇祯领导下的覆亡前夕的明朝一样吧。这和姚雪垠同志发表于一九八〇年的文章是怎么说都牵不到一起去的。我的意思只是说，一篇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出现以后，往往会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赞赏或反对。反对者也不一定都是站在同一立

场上的。例如，不赞成给革命者脸上抹黑的意见就是来自截然相反的阵营中的一种反对意见。这种观点及论据直到今天依旧是有势力的。他们不赞成“灭自己的威风”，理由是怕“长他人志气”。应该说确是单纯到了可爱的程度。历史真实是无情的，难道一床锦被就能遮盖得了么？遮盖的结果往往是加快了发霉变臭的速度。

姚雪垠同志又说：“关于郭沫若同志应该不应该‘摸’李自成和刘宗敏的‘屁股’，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口口声声要摸‘走资派’的屁股那样，以及郭沫若同志在一九四四年就预见到全国解放那么快，以及解放后我国的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这都不是对待学术问题的话，我不想与黄裳同志讨论。我只谈我对历史著作和政治宣传的基本看法。”

姚雪垠同志虽然说他不想讨论这种够不上“学术”资格的问题，但他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不该‘摸’”。这次在重新发表前进行修订时，加上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句，就使意思变得更为清楚。那就是说，时代虽然隔了二十多年，郭沫若因为曾有此一“摸”就使自己化为“红卫兵”；李自成、刘宗敏因曾被“摸”过也变为“走资派”。而我因为说了一句“摸屁股”的“俏皮话’，也就变为“四人帮”论客那样的角色了。这都是清楚的。

由此可见，在姚雪垠同志看来，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贴打倒“走资派”的大字报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是主张应该“摸”的，理由俱如前述。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废话，因为这种“辩论”确也没有什么学术气息。

我反复想过而终于没有想通的是，为什么一位作家不能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作出自己的估计，而这种估计又不允许是正确

的呢？难道只有算命先生才有这种权利么？

任何时候社会上属于不同政治集团的个人，是随时随地都在估计政治形势的。譬如，对于抗战能不能胜利，抗战初期有过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的估计就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全然不同。姚雪垠同志抗战中到过重庆，辗转于后方，我看就是相信抗战必胜的一种表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后来不是逐渐跑到南京去了么。至于抗战胜利到来的迟早，人民和反人民力量的对比、消长……这些问题人们都是关心的，也都有自己的估计。对人民的军队，是希望她永远不脱离群众，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还是盼望她腐化变质，失败崩溃，人们也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我真不懂，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在这些重大的政治形势估计上，有人可能作出基本正确的判断。有什么理由剥夺他们这种权利？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已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推荐给人民，自然不是为了引导群众都来钻研晚明史，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因为文章提出了对人民斗争至关重要的历史经验。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就是指此而言。

预见这事物，恐怕是有的吧。坚定的信念，加上科学的判断，就会形成正确的预见。在这里，信念也是科学的产物，和求神拜佛得来的迷信完全不同。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没有对前途的估计，他还活着作什么呢？在这里，对不许人们有正确预见的这种见解，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因而也没有办法同意。

姚雪垠同志说，“要推翻我的判断必须从整体上推倒”，又说，“希望反驳我的文章时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读了这些话使我感到异常惭愧。晚明史籍浩如烟海，我只是读过其中的几本，有的不过是一点零碎、片段的知识。因此只能写下

一些枝节的意见，没有动摇什么完整体系的野心，也说不清“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所说的往往都是姚雪垠同志不愿讨论的算不得“学术”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核心问题其实倒应该在这里。

最后，不能不对郭沫若同志的评价问题说几句话。因为姚雪垠同志有“黄裳同志的文章中所明确表白观点和态度，与我们今后应如何对待《甲申三百年祭》很有影响”这样的话。我在《陈圆圆》一文中提到《甲申三日年祭》，是因为姚雪垠同志在《论〈圆圆曲〉》中为刘宗敏辩护而批判了郭老对刘宗敏的看法。我明确地表示了我的观点和态度。不过我不想被指定为郭沫若的辩护人，更不想反对人们指出郭老的缺点、错误。我想不管是谁，就如被视为“偶像”的郭沫若同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也要受到公正的批评，没有任何理由为之回护。郭老的治学是有缺点的，有时甚至有很大的缺点，因而导致不小的错误。如《李白与杜甫》那样的作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些近来在学术界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最有力量的批判，无过于摆出颠扑不破的论据，并加以清楚有力的说明，而不在于重复大量的斥责。郭老已经逝世，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的失误更审慎地作出公平的判断，因为被批评者已经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可能了。姚雪垠同志在《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对郭老的指控，粗略的估计有近三十处，而事无巨细，在每一条后面都有一段“小结”，指出他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从“轻于相信……草率论断”、“捕风捉影”、“穿凿附会”、“凭‘假使’空发议论”、“全是空活”、“舍本逐末”、“读书粗心、即兴命笔”……到“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为‘以论代史’、‘以论带史’开了风气”、“和严肃的历史科学家们所持的态度和治学方法背道而驰”、“离开实事求是，单凭

主观随意的抽象假设”……看了这些“结论”，人们难免产生一种印象，郭老已经完全失去了研究历史的起码条件。姚雪垠同志在文末又说：“我们批评《甲申三日年祭》，丝毫不减低对郭老另外一些著作的高度评价。”这怎么可能呢？有着那么严重的缺点毛病的人，能写出另外一些值得“高度评价”的著作来么？真能出现这样的奇迹么？

我觉得学术争鸣最好的办法是明确地说明自己的意见，指出对方的失误，尽量避免使用尖刻的词句。自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但不可不努力以赴。“结论”性的话最好少说，结论由读者来作效果会更好些。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给对方“定性”，不但异常吃力，效果也是不理想的。这只是一连串尺寸不同的“帽子”，要求每顶都尺码合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很可能发生这样的“喜剧”，难保没有几顶飞回来落在自己头上。例如，姚雪垠同志指出郭老运用《明季北略》时引书卷数有问题，下结论道：“倒是可以证明郭沫若同志读书不细心，连卷数和题目都未看清，当然谈不上辨别史料的真伪了。”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也有些失之空泛、不够准确，因之也就减低了科学性么？姚雪垠同志自己就曾误将沈榜的《宛署杂记》算在孙承泽的名下，难道我们可以据此就下结论说他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么？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的并不只一件两件。

郭老是个有浓重诗人气质的人，表现在学术研究上格外触目，犯的错误也很不少。诗人并没有犯错误的特权，凡有谬误都应一一指出，以正视听，这是没有丝毫疑义的。不过在批评时，慎重一些，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也是必要的。姚雪垠同志责难郭老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就进行研究，只靠一本《明季北略》就发议论。在今天看来，这确是有点荒唐的。不过也要想想抗

战中在内地的得书之难。当然可以辗转借阅，不过也并不容易，也不可能求得大致的完备。从抗战中住在内地的一些学人的论著，可以看出这个普遍的缺陷。即以今天的条件论，我们研究晚明史到底掌握了现有史料的百分之几，也很难说。在这方面，谦虚一点没有坏处。对前人未能摆脱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应该寄以同情，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不足的同时，不一定表现出可笑的优越感来。我相信世间一切事物，总是后起者超越前人，将来超过过去与现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未来的青年学人看来，很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不予体谅，毫不假借，他们将说出使今天的学者、作家无地自容的话，这是想想都有些可怕的。但我相信，未来的青年一代必不如此。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姑苏访书记

最近应朋友之约到苏州去住了两天。苏州过去我是常去的，照我旧有的经验，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里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里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如元大昌酒店里各种下酒的零吃、包子和面。至于园林之美倒还在其次。荏苒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色基本上已不存在了。

住在大井巷，出门走上大街不远就是怡园，现存唯一的一家旧书店就在对面。我每次来苏州总要去坐一坐。这里有些店员还是过去的老相识，承他们的好意，每次都被让到楼上去坐一下，我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几种书来看看。这种享受，在全国说来也是不易获得的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这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总共不过十来叶，可是用的是旧纸，大字仿宋写刻，墨光如漆，前面还有一张高翔画的金农的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冬心先生诗集》前小像的旧板，不过后面的题赞却换了方辅题、杨谦写的篆书。关于冬心自刻书的纸墨之精，徐康在《前尘梦影录》里曾经讲起过。他说，这种自刻书用的是宋纸，印刷用墨取的是捣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块。在中国

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经过百十年安定休息，经济上升，文化繁荣的面貌。《画竹题记》的用纸，是一种深黄色极厚实的竹纸，帘纹很细，还夹杂着一些未能融解的植物纤维，是一种较粗的古纸。我不敢断定这是否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去年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冬心先生续集自序》，用的也是同样的旧纸，可见徐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金冬心以画著名。不过他的文字写得也是很好的。写在画帧上面的小诗、自度曲、题记，刻在砚石后面的铭文……都有一种突出的特色。中间往往吐露了诗人画家的思想、感情。我常常感到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金农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他也只能发发那种特定的牢骚。不过时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刺激也是事实。在《画竹题记》中随便摘取一条：

>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窥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来，画老竹数竿，在大石罅。石作飞白者一，作鑿黑者一。下有败棘，有恶草。不意幽林绵谷中伏处此辈也。画毕掷笔太息，自解不得。吾当搔首问青天耳。

这些话说得也够露骨的了。因为是题在竹石的画幅上面，看画的人也大抵随口称赞一句“高雅，高雅”，没有引起注意，遭到迫害，实在要算他运气。

冬心的作品曾有过多种翻刻，算不得孤本秘籍。不过能偶然得到作者自己刻印的原刻本，还是使人高兴的。除了雕版印刷史、美术工艺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譬

如《北平笺谱》，有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本和只有编号的再版本带给读者的感受就大不同。这是往往要被人们说成是“玩物丧志”或“古董家数”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才能有随之而来的绚烂文化。在这里，我是赞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的。

这次他们也取出了几种书，不过非常失望，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两本旧拓的“兰亭”，有程瑶田的题跋，是旧山楼的旧藏。闲谈中间，知道他们现在是以经营新版古籍为主的了。下面的门市部里确也陈列了大量的新书，这中间，不必说是有着不少各种版本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好逑传》、《捉鬼传》、《儿女英雄传》……的。这后一种，有一家书店的版本还题作《侠女奇缘》。这几种书，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里都大量地供应着；如果不是专营“古籍”的地方，就还有各种翻译、创作的“奇案”、“女尸”、“推理小说”、惊险样式之类的作品！老实说，这种“繁荣”的景象，看了是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与寂寞的，就像在沙漠上看到一丛丛仙人球、仙人掌之类的多肉类植物一样。

至于线装书的货源，那确是少得多了。这自然是他们改营新书为主的基本原因。不过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三吴一带到底还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遗存虽已不多，但并非绝无仅有。苏州市图书馆仅有的两部宋刻书就是近年来他们收集的。附近地区请他们去收购藏书的人家也还不少，不过因为经营方向、人手……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已经使他们长久以来放弃了这方面的业务了。

闲谈中听到了很多故事，都是不易忘记的。他们有一次在乡下发现了一屋线装旧书，已经邻于霉坏了，里面很有些善本。向县机关提出来，进行了整理。但不许由新华书店收购，当作宝

贝又堆在另一间房子里。后来再去看时，许多书都残失不全了。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白虎通》，只剩下了两本。另外两本说是院子里的谁煮饭没有引火的东西，抽去当了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作笑话来听。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麒、杨寿祺、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做这个工作，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来的。至少写出像李南涧的《瑠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做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目前，就很自然地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管。他们虽然同样要与书打交道，但业务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用新华书店现行的经营方针进行一刀切的管理是不妥当的。正如世医、儒医、兽医……虽然都有一个医字，却万不可误会他们干的是同一行当。望文生义在这里只能引起误会，造成损失。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

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接班人的情况好像也不乐观。不要好久，人们把家藏的宋版书送到店里，也无人能加以辨识、处理的情况必将出现。更不必说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古典文献了。当然，宋版书送到书店里的事现在是很少了。但也不能说今后就完全没有可能。宋刻宋印的苏诗，就是由藏书者的后人送到苏州书店里的。当然，这是极罕见的情况。书店因此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与经营《三侠五义》所得完全不能相比。不过文化事业毕竟不是一般的营利事业，这里不好用一把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读者呼吁“从废纸堆中抢救古书画”的来信，就报告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县的文化馆里有四千多册古书画（这句话有语病，照例画是不能论册的），管理的人员说：“这些书画是从县公安局收集来的。前段时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古书画当废物烧掉，不知毁了多少。他们不是故意毁书画，而是不知古书画的重要。”当地另一位在法院的同志说：“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有啥用?！我们机关里还有一堆。你若是要，到我们单位去拿。”

这事发生在湖北竹溪县。可以证明我从苏州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仅见的，倒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公安局和法院严格说来不能算文化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也是不宜过分责难的。不过我们必须设法从速改变这种状况，则是无疑的。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

西南访书记

得到一本《一氓题跋》，翻阅一过，看到有两处涉及与云南有关的著作，很感兴趣。牵连想到了一九五六年的西南之行和一路上访书的种种往事。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当时所见的一些旧书不知今天是否依旧无恙地藏在图书馆里。访书中也曾引起过一些零碎感想，当时没有来得及写下，似乎也还可以补记一点下来。

那次的旅行是从重庆开始的，后来到了成都，又去了昆明和大理、芒市等一些地方。每到一处总要去找找旧书店、看看图书馆，如果是有这样的地方的话。西南一隅的古文化遗存比起江南和中原地区来相对地要少一些，特别是书籍，在过去公私藏书的目录里著录得很少，因此也显得特别名贵。例如以收藏明刻方志著名的天一阁，按早期的书目，浙江一省的省、府、县志几乎没有什么遗漏，但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这些省份的方志，就只各有寥寥的几种。不用说，像宋刻《临安志》、《四明志》那样的古本更是没有看见过。按照明代的规制与习惯，地方官都有纂修刻印当地方志的责任或风气。刻好以后版片就藏在衙门里。书并不发售，只是存档并送给上司或同官。如果自备纸墨，

通过关系，也可以请求刷印。祁承㸁在家书中就讲到过他托人刷印了某几省志书的事。范钦是兵部右侍郎，搜集起来自然更为方便。天一阁中的方志，绝大多数都是嘉靖一朝所刻，这也正是范钦在兵部做官的时期，有些书直到今天还没有装订过，依旧保留着印刷初毕的形态，就都是明证。顺便说一下，像这种保留着散叶或仅只用绳捻订起，或保留着明代包背装、原装的书，如非过于敝坏，是不可轻易破坏原式、重加装裱的。周叔弢先生在跋述古堂抄本《李公文集》时说："余尝谓书之精神在纸光墨采中，非极渝敝，不可轻付装潢，况世之能手如钱半岩者又不可多得邪？"说得是极对的。有些蠢人，一书到手，不问情由，一律重新装裱，还自命为做了极大的好事，其实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范钦利用职务便利搜集了大量全国各地方志，自然是做了一件好事，比起同为大官却不肯做这种"蠢事"的人来说，他算得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名人。

北京图书馆编著《中国版刻图录》一书，序言和说明，多出赵万里先生手，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印制得也精美的图谱。我觉得其特色之一、也超越了过去的同类著作的是，开始注意到刻书的地域性。过去的版本研究，只是注意到时代前后的一面；到了王国维作《两浙古刊本考》，才开始把过去笼统地称为"浙本"、"赣本"、"建本"……的方法进一步精密化。不过他研究的还限于"古刊本"，明本就不予论列，更不必说清刻和近代的出版物了。但这只有在今天的条件下，才可能作进一步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想认识我国雕版印刷历史的、完整的面貌，只了解纵的历史演变是不够的，还必须作横的了解与研究。而研究明代雕版地域性的绝好素材，我以为要推方志为第一，它所提供的是可靠的资料。限于体例，《版刻图录》所收的方志不多，而在其他许多

刻本地域性的推断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疑点。

例如张岱的《西湖梦寻》，刊刻地区《图录》在说明中定为“山阴”，想来这是根据张宗子的籍贯和“凤嬉堂”的家刻样式确定的。但在原书的“凡例”（张岱的孙子张礼）中却说：“是集为从弟濮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爰授之梓人，锓以问世。”那么这书可能是粤中刻本了。但到底还是不好下结论，这里最好还要有雕版风气、纸墨……等方面的旁证。

《图录》说明在宋刻本《春秋经传》下说：“（刻工）吴孚又补刻耿秉本《史记》。耿本《史记》刻于广德郡斋，而刻版皆出杭工，因推知此书当亦杭州地区刻本。”利用宋本书多有的刻工姓名来推证刊刻时代、地区，也是一种科学的好方法，不过这也会带来困难。杭州的工匠怎么会跑到江南东路的广德去做工的呢？所以还是把它算作了杭州地区的刻本。雕版工人当印刷业有了进一步的商业性发展时是会增加流动性的。杭州离广德又很近，他们是完全有可能临时被招请来工作的。像这种不易明确解释的问题，到了商业性的出版事业有了更大发展的明清，就更为普遍地存在着了，我们就必须寻找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一氓题跋》著录了明刻丽江土知府木氏所撰诗四种，确是非常难得的佳本。一九五六年的冬天，我在昆明翠湖图书馆古色古香的小楼上看到从丽江木家收集来的几种木氏著作时，曾经引起了非常的激动，不只因为这是我在云南看到过的最旧的雕版书，还为它雕印之精美而惊叹。同时也感到这是边疆与中原兄弟民族中间文化往来、融合的实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这些书是：

《雪山诗选》上、中、下三卷，嘉靖写刻本。前有杨慎序，后有杨跋。序撰于嘉靖己酉。共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六个部分。八行十六字。这是用一种黄粗皮纸印成的最初印本。《云南丛书》所收的《雪山诗选》应该就是根据了此本。卷前有赵藩的印记，估计是较早从丽江木家流出的。

《万松吟卷》，中宪大夫木公撰。嘉靖刻，九行十五字。有嘉靖癸卯杨慎序，后有同年自跋。刻印精美与前书全同，也有赵藩印。

《玉湖游录》，丽江木公恕卿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有贾文元嘉靖乙巳序，张含序，后有自跋。太和李元阳批点，雕印同前。

《仙楼琼华》，丽江木公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杨慎序。

《雪山始音》上、下卷，丽江木公恕卿著。张志淳序（嘉靖二年），嘉靖刻，八行十五字。这也是写刻本，但字体古拙而较小。

《隐园春兴》，雪山野人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前有嘉靖元年自序，后有嘉靖六年自跋。书前有“隐园春兴班”两页，刻工古朴，文字在似可解似不可解之间，后面还有“子张子译而毕之……”的话，看来似乎原本用的是本民族的文字，是纳西族还是白族或别的什么文字，就不知道了。

《雪山庚子稿》，丽江木公著。嘉靖刻，八行十六字。李元阳序，张含志。大字写刻。

《万松吟卷》，中宪大夫木公撰。万历以后宋体字重刻本。八行十五字。前序则是原版的后印本。

《芝山云荩集》四卷，“丽水解脱道人木增生白父著”。崇祯刻，八行十八字。周延儒序（天启癸亥），张邦纪序，傅宗龙序。几篇序文的作者属名之前都列有长得吓人的全部官衔，卷前在作者之后写着“华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阅批点；毗陵周延儒挹斋父、燕山张邦纪瑞石父参订；昆明傅宗龙括苍父校正。”这是晚明流行的刻书风气，请全国、本省的名人来参预校订。丽江虽然远在滇南，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感染，可见木氏家族这时又进一步接受了更深的汉文化。但坦率地承认诗篇曾经过董其昌的“改阅”，倒还是保存了可贵的质朴的。

《明丽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龙松鹤生白六公传》（卷上），冯时可撰。《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卷下），蔡毅中撰。崇祯刻，竹纸蓝印。崇祯十三年的“敕谕”则是朱印的。这里记下了木氏的世系和木增的全部作品名目。

《云荩淡墨》存卷三之六，木增辑。崇祯刻，八行十八字。这是一个残本。书前还留下了几行题记：“书得自丽江木家，不全。存三、四、五、六四本。似明末清初版。不忍留在乱纸堆中，故亦检出。祝又祥十一月十三日。（章）”

这就是我在翠湖的图书馆中看到的全部木氏家集，共十一种。这最后一种是类似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卷三是记花草的，所引书有丘文庄《群书抄方》、《养生诀录》、《云仙杂记》等。也抄了许多史传中因果报应的故事。卷六则是“释庄义”，是高头讲章式的读本。水平不高，但可以看出木家受到汉族文士的影响之深，他的府第里也应该有着一个相当丰富的图书馆，如果保留到今天，将是不下于天一阁的一座藏书楼。早在正德前后，木家

就已经收集汉文书籍了。

按照通常的习惯，这一批木氏家集无疑是要定为明嘉靖至崇祯中云南的丽江刻本的。其中有一两种写手、刀工也确是非常古拙。不过就绝大部分刻本看来，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是出于最纯熟的苏州地区的写样、雕版工人之手的。例如吴曜、黄周贤这样的写手、雕工所刊印的书籍，与木氏家集所显示的正是完全一致的嘉靖中吴开版的典型风格。尤为奇怪的是，木氏家集印刷用纸是一种特制的黄皮纸，这种纸只有正德嘉靖前后苏州地区的出版物偶有使用，如华氏、安氏的铜活字本书十九就都是用的这类纸，它与典型的云南皮纸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氓题跋》又著录有《张愈光诗文选》，这书的嘉靖刻十卷本用的就是一种典型的云南棉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这里所说的云南产的皮纸的特点是极突出的。它比不上"越中"所产的白皮纸的细净漂亮、颜色雪白，纸色是微黄的，映光看去，没有淘净的楮木碎屑还往往存在，但它的坚实也不是江南的棉纸所能比拟。这部《张愈光诗文选》是曹倦圃的旧藏书，后归明善堂，八行十七字。赵维垣序。这才是典型的滇刻滇印本，与木氏家集诸种完全不同。

看来，要科学地断定书籍的雕版时代和地域，是还可以借助印刷用纸这样的辅助条件的；有时，辅助条件也可以化为主要条件，如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木家是土司，又世代好客，结交中原文士。他们自然也可以不远万里从江苏请来写手、雕工，运来印刷用纸，在丽江刻印。但我总觉得不大像，还是把文稿寄到苏州刻印来得方便些。云南自然也有刻工的，但比起苏州地区来，就粗率得多。在土知府看来，是不够理想的。木家祖孙的这种

心理状态，就与现在有些人的看待“洋货”相类，这是不难理解的。可以作为旁证的是，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木增条下说：“又尝于叶榆崇圣寺得《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延僧赍付苏州雕版，置嘉兴楞严寺。”这就说明木家确曾派人到江南刻书，可知所刻必不只佛经一类。

其实照我看来，明代中吴地区的雕版水平固然已经达到甚高的境地，一些精致的写刻本，确也美妙非常，可以当做书法范本了，但它代表的正是江南的水软山温的那种风调，并不足以压倒、取代滇中刻本雄健恣肆的风格。有一种嘉靖刻的《杨升庵诗》，就是阮元在《天一阁书目》中所说的“书用六行，字俱行草”的那一本，刻工极为朴茂，我怀疑这是用杨慎手写的诗稿上版的。笔画的锋棱转折处依旧保留着刀痕，这似乎不如中吴刻本的细腻圆转，但却极好地传达了行草书的气势、风貌。在明中叶以后的雕版中，这是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少数继承了元刻风气的明初精椠外，正嘉以还已经极难看到这样的刻本了。至于所用的皮纸，正是扯也扯不断的“与绢素敌”的那一种。此外还有一种《高峣十二景诗》，也是杨升庵作，嘉靖滇中刻本，七行十五字。全书只有四叶，是近于颜体的写刻本，也刻得极为浑朴。这可能是升庵当时刻了投赠朋友的“诗简”，他也寄给了木公索和，那和诗就保存在《雪山诗选》里，但原倡的五言六句却改为五绝了。

现在转录杨升庵原作第一首《翠岩晚霭》和木公的和诗，也许可以看出这位木知府在大诗人影响之下掌握汉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金碧染峰端，岚沉暮霭宽。趁虚穿翡翠，刻竹坐琅玕。

海气如圆窒，分明入画难。（杨慎：《高峣十二景诗·翠岩晚霭》）

日暮翠屏开，俄看触石来。海光分缥渺，林影共徘徊。（木公：《雪山诗选》。原题是《升老简来，命作高峣十二景诗，续书于后》。杨慎在这第一首诗后的批语是，“此首绝佳，绘出翠岩景也”。）

明清以来，版本目录学者在鉴定版刻中已经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程。最早也最习见的一种办法是全凭个人经验的“目验”。有名的藏书家或老书贾，一书到手，往往一眼就能断定这是何时何地何人所刻……自然也有许多失误，但一般说大抵是正确的。不过他们赖以作出判断的根据却说不出，他们凭的仅只是经验，并不曾加以分析、总结，上升为理论。后来人们逐渐试图摸索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宋元本的行格表出现了，刻工姓名也有人进行统计了，还出现了“留真谱”、书影之类的参考图录。这就多少有了一点科学性，不过限于条件，见书不多，粗陋是难免的，因而科学性也就不高。也有人注意到古书的用纸，他们说，宋版书“纸白如玉”，不能算错，但也不免过于笼统了；他们也注意到宋纸的帘纹，说有“×指阔”，或者说“宋纸于明望之无帘痕”（沈子培引张丑说）。当然也都是粗略的说法，但这总的趋向是正确的，是从实际、实物出发的。可惜进步不快，闲言闲语也不少，什么“古董家数”、“玩物丧志”之类的话常常能听见。即如章实斋那样的学者也不能免。其实版本学是一种科学，是不能忽视的。不讲版本的学者很难说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至少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近来研究古纸的人多起来了。关于灞桥纸到底是纸还是

布？造纸术是不是蔡伦发明的？……争论颇为激烈。这当然是很好的。传世晋唐书画的纸质也经过了初步的鉴定，“澄心堂纸”、“剡藤纸’，这些名目也有人进行推测了。这许多都是很好也很必要的工作。不过迄今仍有大量实物存世的古书画、图籍，使用的都是用全国各地生产的纸张，从宋代开始，也有了千年上下的历史，却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果将这些资料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测定，那就不只能对书籍、书画的鉴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对造纸史的研究也是极有意义的基础工作。有许多精妙的古纸，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制作了，甚至连名色都说不清楚，实在是值得遗憾的事。我们曾经有过洁白如玉的宋纸，也有染了各种美丽颜色的古纸；有罗纹旧笺，也有绝无帘纹的桃花纸，明代盛行的棉纸。细分起来，该有多少个品种，恐怕至今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被视为印书低级品的竹纸，花样就更多了，其精粗美恶也大不相同。大量的实物可以供研究者利用，甚至为了化学分析而取样，也没有多少困难，不比古书画，只能靠眼睛观察。谁能从《平复帖》或《伯远帖》上撕一块纸角来进行科学测定呢？

有时候弄清了较近事物的状况，会有助于认识更早的同类现象。像造纸手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我们今天看起明刻本来，以经历的年岁论，差不多就和黄荛圃的看待宋版书一样。可是我们还多少保留着黄荛圃的观点，认为明清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值得重视的，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够古。老实说是一种时代的错误。

西南访书续记

坐落在昆明翠湖公园中的图书馆，是一个很幽静、很可爱的地方。抗战中住在昆明的时候，曾经到这里来过，至今还依稀记得那小小的庭院，进门处由群花组成的篱落，和几楹古老的木结构楼厅，这一切过了十多年似乎完全没有变化。小院中的山茶正在盛开，艳丽、火红，在只有昆明才有的阳光底下，是一片三月的阳春，事实上却是一九五六年的岁暮了。

在书楼上，我花了两三个下午，读过了百来种馆藏的善本。在我，这真是一种享受。“善本”，是有着种种不同的涵义或理解的。这里并没有也不该有一把绝对的尺。在这里，没有宋元刻，没有明抄或旧活字本，也没有时髦的词曲或插图书。最旧的本子也许是“思溪藏”和元明刻的零本经卷，中有三宝太监的“发愿文”，是他印了送给五华寺的。不过这里的一些有关滇南的图籍，则是别处找不到的，有些则是孤本。来到一处地方，能看到这许多带有浓重乡土色彩的藏书，真是使人高兴的事。

这里有两种康熙刻的担当的诗集。《倘园集》八卷，题“滇中唐泰大来著”，收自万历丙午起诗。前有李维桢、陈继儒、董其昌序引。八行十八字，刻得极为拙劣，用皮纸印，确是滇中刻本，这

里收的是他还不曾出家以前的作品。另一种名《橛庵草》七卷，题“鸡山僧通荷担当著”，康熙刻，行款同前。卷一诗起崇祯壬午，有自为序跋，时担当七十六岁。

《云南丛书》中收有《担当遗诗》，不但不全，刻得也太坏了。担当是明清之际著名逃禅的遗民，是诗人也是画家。抗战中在重庆看到过胡小石先生手写的一副诗轴，那是一首自作的六言诗，“总角簪花旧院，白头泼墨橛庵。鸡山烟霞绝世，归来何必江南。”印象极为深刻，到今天不忘。在那个时代，读到这样的诗，是不能不使人激动的。诗人来自江南，来自担当和尚少年时曾盘桓过的秦淮河畔；在诗里却夸说云南鸡足山的风景，简直可以代替魂梦里的江南故乡。但诗人知道，读诗的人也明白，这其实是替代不了的。

关于“簪花旧院”故事，就在《翛园集》里：

> 云鬓恼新霜，不分娇花放。佯羞采嫩枝，插在儿头上。（诗题：《余年十三，在金陵。湘兰老马姬采花为余簪鬓，戏呈》）

集中还有一首《西湖怀古》，却是能写出少年唐大来的心事的：

> 春去犹闻春酒香，湖山千古想钱唐。西泠倩女情楼小，南渡忠魂墓草长。枉把十年教歌舞，难将一棹载兴亡。渔家不改游人老，桃柳含愁对夕阳。

馆中又有旧抄稿本《孙髯翁先生诗集》，这是昆明大观楼著

名长联作者的诗集，未见刻本。集中有《咏担当》诗："剩水残山聊尔尔，那有闲情称画史。但将白眼送浮云，也似黄鸡归故里。六朝新样秣陵秋，百尺鹅溪一段愁。寄与江南阮司马，庞家居士自风流。"

又有《吊担当上人》诗："黑水青天外，苍山古雪边。儒生而墨者，酒客亦诗仙。杖锡来鸡足，春花叫杜鹃。画中三两笔，仿佛义熙年。"都是珍贵的有关担当的资料。

一般认为，明刻书以崇祯刻本为最晚。又有所谓弘光刻本，那是指甲申乙酉之际刻于江南一带的书，算是颇为名贵的东西，原因是时间短促，出版不多。但永历刻本却还不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还有"吴"纪年刻本、洪化刻本，则是吴三桂反清以后所刻书；秦王刻本，是永历中所刻。这些云南地区刻印的书，过去几乎没有受到藏书家的注意，更不曾见过实物。这次却在翠湖的图书馆里见到了。

《升庵年谱》一卷，周四年刻本。刻甚精，八行二十字，完全是典型的康熙刻本风格。版心下有"高峣藏版"四字，前有升庵小像。周四年即康熙十六年丁巳，时在三藩反清起事之后四年，战事在江西、湖南一带进行，昆明是后方，依旧歌舞升平，为杨升庵建祠，祠成又刻年谱，序里详列倡议、捐资的同官姓氏，有云南按察使来度、左布政宗彝、右布政丁浴初等若干人。三藩定后，这书必不能免于焚毁的命运；如按册查拿，"从逆余党"将一个也逃不脱。这样，可以知道这仅存的小册之可贵了，实在要比书虽不存仍留记载于禁书目录者还要可贵。再过了两年，就又有《三教经》一卷之刻，《三教经》者，《孝经》、《四十二章经》、《道德经》也，刻版极类万历刊本，颇精，七行十六字，皮纸精印，前有"洪化己未岁长至日灵武夏惟修序"，应该称之为洪化刻本了。〔按：吴

三桂于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称帝,国号周。戊午(一六七八)死,孙世璠立,改元洪化。凡四年,己未为一六七九年。〕这是三藩变后在纸墨上仅存的余迹。记吴藩事的野史则有《胜国遗臣臧否传》二卷,皮纸黑格旧抄本,版式狭长,有如账簿。前有作者史淮序(康熙四十七年)。这是以吴三桂事为终始的晚明野史,近于"剿闯小说",应该也是可珍的史料。三十多年前我访问翠湖图书馆,目的是想搜集有关吴三桂在云南的历史记录,没有什么收获,也许这些书当时还不曾入藏。今天人们又开始议论吴三桂,也对有关云南史地种种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就不能不希望地方上的出版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重印一批重要史料。这些珍本,确是不应让它以孤本仅存的方式酣睡在图书馆里了。

可以与丽江木氏媲美的是清初姚安土知府高奣映(白族),他的名著《妙香国草》的康熙原刻本也收藏在图书馆里。只要看他的题属,"古庐陵高奣映雪君父著",就能知道他的汉化之深,并对汉文化有怎样的兴趣了。同校门人也仿效了师傅,在题属上用"古坪"代替"石屏"、"螳川"代替"安宁"。这书采用的是诗话的形式,大量地介绍了大理一带的古迹、风俗、传说……是时代较早、网罗较备的重要地方风土志。像"武侯水南战处"、"唐天宝战士冢"、"上关花"、"风孔"、"雨铜观音"、"蝴蝶树",就都是当地著名的风物、旧迹。

云南远处西南边陲,中原文士极少来游的可能,他们过去不肯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总是尽量把见闻记录在自己的诗文著作里。早期的著作如《云南行记》、《炎徼纪闻》等留存的虽不多,但却无例外地显露了猎奇的倾向,也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差异。从明代中叶算起,有关云南的著作有几个时期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杨升庵,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因获罪远谪

云南，居住了很久，给当地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杨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士集团，其中有不少是兄弟民族的文士。他们之间的交游和倡酬，使当地的文化面貌迅速与中原地区靠拢，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影响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前后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南明永历在滇黔之间一直维持到一六六一年，有相当数量的明朝臣民随同南来。永历覆亡以后，有的人就流寓当地，有的做了和尚。他们带来的是更为完整的汉文化体系，从政治设施到军旅、文事、宗教……都是中朝的仿效、模拟。这是云南进一步向中原接近的另一重要时期。三藩乱后，清朝并未放松对边疆的控制，云南与内地的往来也更为密切。从晚明直到乾、嘉，重要的著作如徐霞客的《游记》、王昶的《春融堂杂记》，一直到桂未谷的《札朴》，都是很有特色的作品。至于清初人的诗文集中有关云南风物、民俗的记载更是所在多有，有关永历的野史也留下了许多种。这几乎全是中原文士的著作，而像《妙香国草》这样白族文士对乡邦风土的记述与吟咏，就是十分少见而可珍的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折本。棉纸，朱印。后有草书跋语，题“永历乙未冬秦王书”。有“秦国之章”朱文大方印。这是永历时秦王孙可望的刻本，也是滇刻中一种别格。

孙可望旧是张献忠的部将，绰号“一堵墙”，是永历一朝后期的支柱人物之一。但因与同是献忠余部的李定国发生矛盾，导致内部力量分化，最后叛降了清朝。翦伯赞旧作《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成于一九四〇年。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论文中指出永历一朝是寒族与缙绅的混合政府，后者执行的是分化“闯贼”余孽的政策，因而导致败亡。这自然是一种分析。但孙可望的种种行事，见之于晚明野史中的，也是不可忽略的历史真

实。鲁迅曾据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介绍过孙可望的剥皮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的千方百计要永历帝封自己做秦王的经过，也是有名的故事。他还拒绝接受“平辽王”的封号，理由是“二字王”没有“一字王”来得风光。乙未是永历九年，是他已经杀了陈邦传父子、剥了李如月的皮之后三年，秦王已经做定做稳了，这是他极重视也极得意的事，于是刻佛经时就以秦王名义写跋、钤印，规格与明代诸王的藩府刻书一般无二。这虽然只不过是一册释典的小册子，其意义却是别有所在的。

图书馆藏书以旧刻集部书最多，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记滇僧的著作，有不少这里还保存着原刻本，可能都是援庵先生未见之书。有一种《何蔚文年谱、诗话》，后附传奇三种。书为康熙抄本，每种传奇都有作者的题词。三种传奇的名目是《缅瓦十四片》、《插一脚》、《摄身光》，这都是研究戏曲史者未之前见的。《缅瓦十四片》一种应该是写近事的历史剧，题词云：“缅事目击，乃日久亦恍亦忽。错舛且忘，如忆往梦。偶填词得《缅瓦十四片》，真长歌当哭也。若以漏多瓦少，又略补益。然猿听三声，已不禁泪下，那得再。”何蔚文生于乙丑（天启五年），康熙三十八年卒，是崇祯、永历、康熙三朝和三藩事变的亲历者。

《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不分卷，道光刻本。九行二十四字，全书共五十叶，前有图十一叶。刊刻极精。题“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抚云南等处地方吴其浚集，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梓”。又前人所著《滇南矿厂舆程图略》二卷，图也极精，不下于芥子园诸种。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云南矿产、冶炼工艺、地方经济、科学技术的资料。所见科学技术图籍的旧刻本中，这要算是极精的一种，可以看出清代后期所达到的水平。书极罕见，未曾著录。《贩书偶记续编》有同一作者的底稿本《弹谱》一卷，《弹弓新编》

一卷，有道光辛丑序，可见他对图谱之类是很有兴趣的。

一九五六年冬昆明市上还有零零落落的几家旧书店，比起成都和重庆还多少热闹一些。在五华山下的马路上，所谓“逼死坡”那块石碣的对面，就有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每天从旅馆出来都要经过，走进去看看，和书店主人谈谈，知道了一些昆明书市的情况。据说一九五三年左右，昆明市上还有很多旧书，经他的手卖出的明刻本就有万把册，被一位刘某买去最多。其中有一种《腾越厅志》，万历刻，白棉纸印本。像这样的“善本”是看不见了，不过我也买到了一册康熙时人的诗稿，前有名印曰李含和，号金沙，和著名诗人阚祯兆是朋友，诗集保存了大量吟咏云南风土的篇章。这自然是不见著录的地方文献，后来送给了翠湖图书馆使它与同时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作伴。

光华街上也有一家旧书店，书很整齐，但没有什么别致的东西。最名贵的也只是清初写刻本如《渔洋精华录》之类。书店主人还介绍我到另外一处地方去看书。这并不是书店，在一个大院落里的几间屋子里装满了旧书，我觉得仿佛走进了一位学者的书斋。据说书都是抗战后期联大教授们卖掉的，有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则是复员时带不走，才留下来的。书都很整齐，当然并没有什么版本书，不过有关社会科学的古代典籍参考用书是相当完备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东西，是许多老年、中年的知识分子，间关万里，辛苦从北京搬了来的。最后却不能随主人一起北归，留在了滇南。我望着满箱满架的这些旧书，不禁惆怅了许久。

一九五六年昆明市上最有意思的书店，大约要算近日楼附近，云瑞西路的一家了。在广场一边有一排双层的木屋，这里是一排小店，店堂内部几乎转不过身来，他们的货色就都摆在门口

木板架起的摊子上。这里也有一家旧书摊。木板上胡乱放着最破最烂的旧书，特点是大半是皮纸印本，又几乎全部蛀过，书页前后蛀得蚊帐似的透明了。门口摆着的不过是样品，店里阁楼上还顶天立地地塞满了这样的破书。

可以猜测小店里的货色不是来自昆明市上，极可能是从外县运来的“废纸”；它们也不是从藏书家手里流出，或外省读书人带来，全部是地道的云南刻本，我想上楼去看书，主人慷慨地答应了。他说只要不怕脏就行。

我在阁楼上看了半天，走下扶梯时两手墨黑了。选出的书中间记得有一厚本皮纸旧抄的“杜诗”，后来寄给了成都的草堂；又一本是雍正刻的《云龙州志》残本，皮纸印本，翠湖图书馆没有此书，就留给了他们。此外《云南通志稿》和《云南备征志》的残册，也都是原刻皮纸印本。

关于云南的旧本方志，现存最古的也许是《景泰云南图经》了，原本旧藏丁氏八千卷楼。此后有正德《云南志》、万历中谢在杭的《滇略》，都不是本地人的著作。由本地学者纂修的地志名著是大理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据图书馆里的同志见告，这书的原刻本三十年代发现于北平，当时索价二千二百元，后为天津任凤苞买去。龙云向任要来了一部晒蓝本，托商务印书馆排印了五百部，送掉了一些，剩下的都堆在五华山上，经过火烧，剩下来没有几部了。此书原刻在日本的尊经阁和早稻田大学都各有一本。

我想，全国的地方图书馆和出版社，实在应该把认真收集、保管、流传当地地方志的任务担当起来。这是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也是为子孙后代设想的迫切任务，也是纂修新的方志的重要基础工作。翠湖图书馆印过一本馆藏全省方志目录，虽然旧

本不多，残本不少，但他们殷勤访求的心情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做的是寂寞但却重要的工作，人们将越来越深刻地领会这工作的重要意义。

来云南之前经过重庆、成都，也都到图书馆和书店去访问过，看到过一些很有特色的好书，这里来不及一一记下了。我只想说一点有关西谛藏书的故事。

一九四八年顷，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郑西谛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用荣宝斋格子纸写成，大约收入二千种上下线装书。后面还有长跋，历数收集这批书的艰难经过。书店的人告诉我，郑先生托他们卖掉这批书，价钱并不太贵，已经有一位在四川经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郑西谛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正在印几种大部头的图谱，又买了许多唐俑和参考书，天天为还债发愁。政治压迫又日益严重，他已经开始为离沪远行作准备。在这种情境中卖书是不奇怪的。这批书中有一大批明刻本，虽然并非孤本秘籍，但治学的人被迫卖掉藏书，总是使人难过的事。不久前为了给吴梅村的《鸳湖曲》作笺证，我向他借得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陈子龙的《几社壬申合稿》，刚刚用毕还掉，不料也见于这本目录中间。这就使我很不舒服，总想能设法为他保存下这批书才好。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就东奔西走，凑借书款。最后凑齐的那天下午，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银元，还跑到河南路的马路市场上去向摊贩换成纸币。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赶到书店，已经上灯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币值猛跌，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这真使我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提了钞票去换回银元，那就连一半也捞不回来，同时实在也失去了奔波的兴趣，在不得已中下了决心，用这笔已经不算钱的钞票选购了十来种旧书，嘉业堂

寄存在店里的旧书。这笔书债直到十年以后才最后还清。那本西谛手写的“书目”也押在债权人那里。这样，当一九五六年我在重庆枇杷山上的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批曾想赎买而终于未成的“纫秋山馆行箧书”时，是不能不感到意外与激动的。《西谛书目》早已印行，我想，这批书目如作为“外编”增附其后，就像《天一阁书目》之有内外编一样，好像也是可以的吧。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写毕

读《一氓题跋》

这是一本非常美丽的小书，拿到手上引起由衷的欢喜。无论版式、装帧、印刷都是出色的。翻开目录，果然发现了许多极有兴味的旧本书题跋，而且立即读完了。说读完，其实也并不是很仔细的，不过是泛览一过而已。吴翌凤有一块藏书印刻着“枚庵流览所及”六个字，我一直很喜欢，觉得他确实说出了一种读书的方式。当然这不是普遍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却是我自己一贯采用的方式。得到一部文集，总是先挑选“书后”、“跋尾”这一部分看，至于放在卷首的那些大文章，十之八九倒没有通读。这是我的一种坏习惯，多年来一直如此，很难改变。

《一氓题跋》也收入了一些序文，有些过去也曾读过。序比跋一般要长些，内容也不同，因此要放慢一点来读。后来在读这些序文时，心情逐步沉静下来了，最后是肃然地掩卷，读旧书题跋时那种轻松的情绪消失了。这时，我觉得自己最初的印象改变了，这并不是一本“小书”，其实应该如实地说是一本“大书”。

这些写于不同时期，为不同对象所作的序跋，当然并非有意组织的系统论文。不过作者所接触的方面是广阔的，同时对每一方面都认真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意见大致可以分作两个部

分。一种是实在的、扎实的探讨与评论，看似平易，其实是积多少年探索玩味所得，因而符合实际，有说服力；另一类则是一些新鲜、独特的意见，与对时弊和某些不良倾向的针砭。而无论是哪一类，都毫无例外地饱含了对人民、国族的挚爱与激情。有些则是美丽的诗，如为《江山如此多娇摄影集》所写的序，就是一篇壮美的诗。

作者讨论的对象，包括了治印、书法、绘画、素描、插图、木刻、摄影、造园、版本、女工、交子等许多方面。不只反映了兴趣之广，也说明了爱恋之深。大革命失败之后，作者曾一度从事左翼文学、社会科学活动，是这方面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转徙于不同的战斗岗位，但始终没有忘情于此。在国外工作时，曾搜集革命文献；在初解放的东北，还留意收集旧书；对成都的杜甫草堂，也时时关心并为之罗致了许多文献藏品……这一切都是业余的工作，照老话就是“好事者”的行径了。可是我们今天多么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事者”，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立，也决不仅仅是文化领导部门的事情。

作者在《后记》中说，他一九七九年后写的几篇序文，“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借此发点议论是有的，自以为好处还不至有‘应酬气’”。这是一个发誓不搞唯心论，“违心论”，严格遵守存在是第一性的作者所达到的境界，这其实倒也是很有意思的。写于《江山如此多娇摄影集序》后十四年的《阿英文集序》依然是一篇壮美的诗。不同的是从壮丽的河山转向了风流的人物，文字也更为深厚、激越，这是增添了十多年新的实践经验的结果。在回顾故友的生平经历时，没有回避什么，但也绝不忽视历经奋斗、牺牲所取得的胜利。“未来不再是作者经历的苦难和忧郁的时代，将只能是绚烂多姿、光华夺目的时代。”这是真实的、科学的

因而也是极有说服力的结论与展望，是我们必需十分珍惜并力争得到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色，出现于作者的许多篇章之中，形成了一种基调。《重读总司令的诗》，实在是一篇重要的新诗话，精确地表述了诗和诗人的关系。既说明了有怎样的作者才能有怎样的诗篇；也说明了读者在读诗的时候往往也正是在读人。同样的主题在过去的诗话中也不是没有人触及，但有谁曾用存在第一的原则把问题讲得这么使人信服、这么好呢？

过去在《花间集校》卷前读过作者对《花间集》版本源流的研究，知道他在这方面下过怎样的功夫，得到了怎样的成果，同时也领略了一种崭新的研究作风。第一，在没有看到实物之前，不下任何疑似的论断；第二，在作者眼中，宋本与明本，甚至是晚期的坊本都是研究的对象，毫不存在重古轻今的势利观点。这是与旧时的版本学者截然不同的，显示的也正是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邓拓书法选序》中关于中国书法的流变、特点、与它的成为一种艺术的美学分析，几乎全是作者自己的见解。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极少借助于大量的旧有的书法艺术理论，那中间有许多简直是邻于玄妙而不可知的东西。创见并不一定就成为定论，但远远胜过重复神秘的套话则是无疑的。

作者很喜欢在文字中随时发一点议论，也许这些正是最能引人入胜的所在。例如在论工笔画时提出的“提倡工笔，反对繁琐”的意见就是极对的。明朝的家具浑朴而清新，到了清朝，雕了又雕，刻了又刻，就成为讨厌的事物。这情形在晚明版画向清初宫廷版画转化的过程中也是存在的。据说翁方纲到了七八十岁，春节中还能在一粒米上写下工整的“天下太平”四个小字，算做一件“美谈”。可是碰到能刻出整篇《赤壁赋》的名手，也只能一败涂地了。不过实在也不能理解这种东西的艺术性到底在

哪里。

作者慨叹“可惜的是这些年(在美术上)都不讲基本功了”，这意见曾在几处反复提到，又说“这些年学风不好，要么懒散，要么乱窜，踏实下苦功的学风还没有普遍起来”。这都不是仅只存在于美术上的问题。我们仿佛可以清晰地听到老人焦虑希冀的声音。

从明代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派在诗坛上的消长变化看出了“事充于极，则适成其反”的迹象；由《瑶华集》而论及清初词风的特色与重要性，以及清中叶、晚季词风的变化脉络，都是很有特色的议论。扩充、深入下去，都将是很好的研究课题。说陈毅同志“写了不少风景诗，但决不是田园诗”；从齐燕铭同志的遭遇总结出“气数就是脱离轨道的历史”。这些深刻、富于哲理的话都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作者在《避暑山庄图序》里更痛切地指出了几乎已成为普遍事物了的风景、文物破坏现象：“我们一方面一口一个劳动人民，但对于劳动人民在建筑上的勤劳和智慧所创造的东西，却不给以应有的尊重……不能把眼面前的事也完全推到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了事。爱护我国过去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民族历史的艺术财产，正是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社会主义。什么封、资、修，说不上。”这些充满激情、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是非常动人的。当然，作者也在一些地方表现了他的幽默调侃与欢欣。在跋《玉簪记》时他说：

> 川剧《秋江》一出，驰誉京华，京剧仿之，列入海外演出节目，遂大为欧陆观众所欢迎。《玉簪记》以此翻身，岂不怪哉！

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他在用明活字本校嘉靖本的《陈思王集》，大概也和鲁迅当年在绍兴会馆里抄古碑差不多吧。可是在寂寞校书中间，天大的喜事发生了。于是在跋文中写道："校读中北军已收产、禄，欣喜无量。"我想无论是谁，读到这里都会为之破颜一笑吧。

中国古版画的逐渐变成"宝贝"，大约始于三十年代前后。这以前，当然是公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为文人学士所看重。不过，真正的杰作自有其不可掩没的光芒。纯正的版本学者如缪荃荪，也破例在藏书记中著录了一二种明刻的小说，而且特别指出那图绘的精工。可见学者们嘴里不说心里却实在喜欢的情景，已经存在了许久。版画身价的逐渐抬高终于成为旧书市场中头等的热门货，是由于郑振铎、马隅卿、王孝慈、傅惜华诸位的大力提倡与搜求。价钱飞涨了，仅存的遗物也借此多少逃脱了毁灭的命运，这也是有一弊也有一利的一例吧，归根结底，还应该算是利多弊少的。掌握了实物就要开始研究，在这方面，鲁迅和郑振铎实在是开山与奠基的重要先行者。他们合作编印了《北平笺谱》，翻刻了《十竹斋笺谱》，鲁迅逝世后西谛主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从立意、设计起，鲁迅都有过重要的贡献。《鲁迅书简》中寄给郑振铎的许多通信，就颇为完备地说明了先生关于中国古版画的许多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在《一氓题跋》中《陈老莲水浒叶子跋》中作了归纳。三十年来关于古版画的资料流布和研究工作，也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但论规模、论深度都还没有更多超过西谛先生四十年前达到的水平，这是应该使后继者感到惭愧的。结合实际需要，选择重印一些有代表性的版画名作，认真撰写序文，就原作的版本源流、艺术成就进行探索、分析，这样的工作，是重要的，是填补中国美术史空白的必不可

少的工作。

收集资料的工作是辛勤而艰难的，研究、勘对起来也决不轻松。特别是版画艺术风格的分析，画家刻工分工合作关系的探讨，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的追寻，从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对一系列问题的解释……这许多，在《一氓题跋》的有关篇章中都已涉及并提示了相应的方法、途径。这一切都将是新的研究的可靠基础。工作必须是踏踏实实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空疏。最近看到一篇论文，引用鲁迅、西谛通信，介绍鲁迅有关复印《十竹斋笺谱》的意见，把先生有关《雕版画集》的话也一并抄入，仿佛《笺谱》中曾出现过《浣纱》、《焚香》、《柳枝》等图像似的了。这样的疏失却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题跋》中说到的书，以杜诗、词集、版画为多。作者在书前书后随手写下的小跋，读来特有兴味。正如《后记》中所说，这些小跋对作者说是成果，对读者说是参考资料，也不一定每条都要细读。但偶遇自己曾经接触过的品种，就更觉得有趣，也随手在书眉记下一点读后感。现在就按原书次序写下，作为一点余兴。

明刻有关西湖的插图书，还有一种《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万历刻本。原书十二卷，我只得残本一册，存卷七之十二，图已不存。但日本的薄井恭一曾藏有全书，在《明清插图本图录》中选印过二叶。《昭庆大佛图》与《岳王坟庙图》，都是风格别具的版画，不知其余诸幅有无十景在内。据说在《湖山一览图》左下方有“武林吴熹写，新安黄尚中镌”字样。因知此亦新安诸黄所刻，尚是早期作品，没有后来的那么繁缛工丽。

“杜诗通”条谈到张綖，其所著《诗余图谱》三卷，我曾有正德嘉靖间刻一本，刻极古朴。署名作“高邮张綖世文”。又有万历刻一本，赠郑西谛。

丽江木氏所著家集，我在昆明图书馆曾见原刻多种，已在另文中加以记录。据原本，《芝山云荳集》不作《云迈》。

聂先、曾王孙辑，康熙金阊绿荫堂刻的《百名家词钞》，我曾先后买得残本三种，最后始得叶玉虎旧藏全书，共一百家。残本亦存总目，溢出全书外者尚有米汉雯等若干家，估计当日所刻当超出百二十家以上。尤可异者，有一人词而集名内容完全不同者。如吴秉元词，一本题《摄闲词》，一本则作《慎庵词》，内容全异。

武塘柯氏刻《绝妙好词》，箧中有两本。一康熙乙丑柯氏原刻；一吴枚庵校清吟堂刻。对比之下，二书同是一版。高江村得柯氏旧版，铲去“小幔亭重订”一行改题“清吟堂”，抽去柯崇朴大字序，自增一序，吞吞吐吐，书就算是他刻的了。

《弹指词》有乾隆家刻二卷本。初印，扉叶尚存，题“曾孙顾图河、宗海、安淮、倬汉重镌”，钤“积书岩藏板”朱记。又有雍正姚平山刻三卷本，狭行细字，十行，二十一字。遗经堂藏板，有雍正甲辰杜诏、姚廷谦两序。其先当尚有杜氏所刻一本，未见。乾隆本可能是据贞观定稿上板，曾取校清初词选总集诸本，发现改动极多，有全阙只存一句者。

《栖香阁词》二卷，梁谿顾氏文婉著，道光四年山阳李氏闻妙香室校刊。文婉是梁汾的姊姊，嫁侯晋。卷末有无锡孙燮跋。文婉诗已先刊入《梁谿诗钞》，词为家藏抄本，由李宗昉刻成于江西。前有宗昉妹文媛序。此与顾贞立《栖香词》不知是否一书。

《帝京景物略》，崇祯七年刘侗大字序刻本，卷中缺失所见诸本并同。于奕正尚有《天下金石志》，崇祯壬申刻，早于《景物略》两年，亦八行十九字，版式全同，当是一时所刻。前有金铉、于奕正二序，又刘侗“略述”。这是他们合作撰述的第一种，至于继

“帝京”之后的金陵一略则因于氏病逝终于未能完成。三十年前曾于嘉业堂得《天下金石志》一本，孙国敉藏书，朱笔校补几满。孙氏于扉页题“同社于司直送，伯观”一行。卷后有葛正笏二跋，翁方纲亦有跋并以绿笔批记数条，甚精。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

生小说《红楼》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关于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听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的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孙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有些失之艰深，但他

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良带了一本宣纸印非常阔气的木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像“抓周儿”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像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一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

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像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像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做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

“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

不能要求广大读者都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知道这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账，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褊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资材。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

那些混账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写定“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彩、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眼前放着一本很大很厚很漂亮的书，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很喜欢这本书。对它的学术成就进行全面的评价，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不过可以说说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

一九五〇年一月底，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在这以前，我托朋友请他给我写过几张字，通过一两次信。他寄来的与杨金甫、张充和在一张很长的纸上写的章草现在还在手边，那是一九四六年夏天他们住在颐和园霁清轩时写的。在另一张属名上官碧的字幅后面，他写了一段小跋：

黄裳先生远道邮佳纸索书，为用李福寿笔涂抹，竟成墨冻蝇。复检旧纸经意一书，拙陋益增，始知婢学夫人，大不容易，仍只宜用起码价钱小绿颖笔，在公文纸上胡画，转有媸媚处也。因检习字一纸相寄。从文。

这多少可以看出《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在抗战胜利回

到北平后的生活情趣痕迹。但两年以后又在北京相见时，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得那是一个风沙满天的严冬，已经快吃午饭了，我在午门右侧旧“朝房”(?)改成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他。房子很大、很冷，里面放了许多张办公桌，他就坐在其中一只的后面。桌子上堆放着很多书、纸片、碎瓷块、破泥人……正像一个荒货摊。他从椅子上站起，听我报出了名字，又转达了住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对他的问候，他激动起来了。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但说了许多。接着就一定要拖我到他家去吃炸酱面，而且反复说着炸酱面如何好吃，就像在小说里进行细致的描写似的。他穿得很单薄，围上一条围巾，我们就一齐走出了午门、天安门，跳上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好半天，才来到交道口。他住着两间小屋子，开门进去，家里没有人。他自己动手，烧开水、下面，搬出碗筷，请我吃炸酱面。吃完后立即动身依旧乘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回到天安门去上班。在这整个匆忙的过程中他一直不停地说话，内容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但那好像好久没有了谈天对手似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此外，我觉得放心了。一个习惯于描写世态人情的小说家一下子来到午门楼上，整天与古物打交道，能行么？我发现他行。他不但习惯了新的生活与工作，而且立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他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著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他写小说，写不是小说的文章，都持相同的态度，一种老实、认真，几乎达到可笑程度的态度。我相信他会很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并且会做出成绩来。

沈从文是著名的小说家。在读中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了。我特别喜欢他的并非小说的作品《湘西》。这本蓝皮小书，我先后买过三次。现在手中留下的一本是一九四四年湘桂

战局紧张时在已经变成危城的桂林街头买到的。书里的《常德的船》……都是我非常喜欢、反复读过的。七年前我给作者写信时还提到我喜欢这本小书的心情。这是一本地理书，或曰地方志，但与旧地方志可完全不同。我常想，全国各地都有这样一本“方志”才好。这是一本风俗画册、人物像册，它不是小说，但作者运用的还是那种方法，和写《湘行散记》差不多的方法。

我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感觉就和读《湘西》一样，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相似的满足与悦乐。

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体现的唯物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像这样的著作，过去的学人是常常称之为“札记”的，水平高的就会成为小型论文的集合体。其间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得到贯通，就自然形成完整论著的雏形。读者欢迎这种新鲜的、丰富的、结实的论文合集，而厌弃一切只有大架子，内容却陈陈相因或空虚无物的“豪华建筑”。

这是一本开山之作，尽管还不完备，有待丰富补充，但到底有了第一本民族服饰史的研究著作了，过去我们是没有的。

这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惊人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作者为我们掀开了这座伟大殿堂的小小一角帷幕，使人们得以多少窥见其神光陆

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这必将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的激情。

祖国的文化遗产如此丰富。但经过多少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不肖子孙的破坏毁弃，愚妄者的排斥贬抑，已经濒于危险的境地。作者辛勤拂拭，叹赏摩挲，追溯本源，旁及支系，试探着摸出了一条路，总结出某些经验。他的工作不是孤寂的，得到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和同志的支持帮助，终于做出了成绩。这一切本身就是值得欣喜咏叹的。一切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非常有希望的，经得起无论是什么样的风雨，我们有强盛的生命的力。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时会感受一种“左右逢源”之乐，它会诱使你翻出另外许多本书，对读、思索，并享受“左图右史”的愉快。三十年前我们有了郑振铎编著的几种历史图谱；更早些我们有过《读史方舆纪要》，近来又有了新的《历史地图集》。这许多著作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编写的。它们都是开创性的著作，但也无法使读者完全满足。这本《研究》则是从前人的踪迹上所迈出不小的一步。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小，指的是篇幅，不是指内容含量。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历代注家纷纷猜测，“小山”是“眉山”，也许是“屏山”，都不能使人满意。《研究》说：“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经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有‘小山重叠金明灭’，即对于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而咏。”“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作者据唐人诗词、文献、

《捣练图》、《宫乐图》、出土实物，作出这样的论证，是可以使人信服的，也许是可以“破千古之惑”的。

杜牧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写七夕夜晚闺中生活小景，人们一直以为这大概是团扇那样的东西，历来的画家也大抵都这样画。但不免还是怀疑，这未免太大了一些，扑蝶（如宝钗）还可以，扑萤怕将劳而无功。作者就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画有这种“轻罗小扇”，其实是有些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品中有大量历史、风俗资料，一向受到历史学家重视。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是其显例。但在《研究》中接触尤多，且多据实物及形象材料加以论证，更为亲切。白诗：“平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装。”作者根据近年大量出土材料和诗文形容结合互证，说明世人发笑的原因。作者的研究还能通观整个时代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指出唐代社会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给予妇女服装的影响，又怎样从前期的活泼健康变为后期病态的过程。元和时的“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颦”，大约就是“啼装”的本意了。白居易并不是头脑僵化的诗人，但他是看不惯这种“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的“时世妆”的，说这是“非华风”的。这就说明，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的问题，在唐代就曾经出现过了。

怎样将见于“舆服志”一类文献记载中的大量名色，与图画实物、陶俑……中的形象材料，一一拼合，避免差误，是非常细致繁难的工作。作者做到了胆大心细。他勇敢地判断，坚决的认定。不能想象这中间就必无差误，条条都是定论，但我们将为有

了这样的初步的轮廓而高兴，这是走向更为完密准确的基础。作者在《研究》中写下许多篇独立的小论文，随时发表研究的心得、见解，但没有综合考虑，加以总结。其实他提出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应如何正确估价实物、图像反映历史真实的程度；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作品中必然会有的夸张失实可能；如何判定文物产生时代的上限与下限……这些都是会引起热烈讨论的有趣问题。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现衣服飘带或马匹鞍饰，为了制作和保存的方便，对实物原貌是有所改变的，有时就和绘画中的描写有所差异。又如艺人在创作中，是容许也可能有所夸张、删略的。怎样理解、利用他们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真实性呢？又如，时代较晚的艺术家在表现早于他们时代很久的现实生活时，忠实性是会有程度的差异的。正如今天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衣冠依旧基本是明代的一样，明代刻书中出现的大量插图，不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也基本上是作品产生当时的面貌。但这并不排斥有袭用前代画稿、纹样的可能。这一类的情况是纷纭复杂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作者在碰到这些问题时都有相应的讨论和判断，是值得深入探讨议论的课题。

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服饰，这就要求将形态万方、彩色斑斓的实物用文字再现在纸上。需要散文家的出色才能，不只是忠实的再现，还得写出事物活泼泼的情趣。这是常规的科学研究著作所不易得的特色，全书有大量美丽的插图，而文字之美，却使读者感到姿媚转胜。

现存的大量文物，都以不同情况出土或发现于全国不同地区。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对种种复杂情况都作了认真的对比判断。他论敦煌、论南唐、论西蜀各章，都显示了这种特色。如他

说到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有一节分析：

> 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像稍后孟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

这种平实的、鲜明的分析在《研究》中到处可见。作者在感叹劳动人民的惊人艺术创造之余，总是同时见到封建主的荒淫无耻。在分析研究上层人物的服饰之外也尽力反映农民、猎户、船夫、手工业工人、兵士、奴仆等下层群众的衣着与生活面貌。由于文献遗存的限制，分量上容有参差，但作者并没有把书写成一部贵族服饰史。

作者希望致力于奠定新文物学的基础，希望打破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全书实际上也以这部分创见最多，估计展开不同意见争论的机会也必然最多。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见解时是勇敢的、痛快的，毫不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但应存疑时还是存疑，因而也少有霸气。这样的学风，也是值得欣赏的。

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六十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书画是形象的艺术，通过笔

墨的表现手段形成不同的风格，同时也对客观现实做不同反映。两者都无法摆脱时代历史的痕迹，因之也应该成为鉴定的主要依据。服饰、器物、风习……都是应加郑重考虑的因素，但过去注意得是不够的。《研究》则集中注意于此，对一系列传世名画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有分量的新看法。这就使研究的范围扩展得更开，不是“服饰”一端所能局限的了。

相传为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作者认为“或系北宋摹唐旧稿”，“原作即便出于唐人，时代也应比阎立本晚些”。对《职贡图》，认为“或宋人拟作”。旧传张萱作《唐后行从图》，作者认为“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盗出国外传世本，时代且更晚。定为张萱名迹，实赏玩家以耳代目，人云亦云，殊不足信。”在讨论《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提出当时贵重马具的“金银闹装鞍”，详作说明，并用以证明旧传北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就因全不懂得“五鞘孔制”，因而造成错误。又说：“元初画马名家赵子昂父子所画诸马，鞍具还采用五鞘孔制。事实上元代早已废除，画中反映，恰好证明传世诸作均临摹唐人旧稿，而非写实。”这是很精当并带普遍意义的意见。

传为唐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是研究鉴定家注意集中的著名作品，出现过不少论文。《研究》后出，但讨论最为详密，援据更为丰富。提出的两点看法也是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作者认为“必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以后，可能即成于降宋以后顾闳中辈，但不可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举出的论据包括了画中人物的宋代特定礼节——拱手示敬；与南唐降宋官吏初期一律服绿这样的细节，可见作者心细如发，思考细密。如集合论许多名画时代的片段，即可看作一卷出色论文。

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

这是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话，表示了他对新方法的信心，也清醒地看到，在这方面一时恐不易取得一致，还有待于更长时间的讨论与辩难。这其实正是《研究》的整体精神。

进行这一类的研究工作，通常感到困难的是，时代远的，材料苦少；时代近的，又惟患其多。因此在比例上就难免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状态。如明清部分就显得过于缺略了，也是许多人感到不满足的重要意见。希望这一状况能于不久将来得到弥补。文献遗存的丰俭是相对的。明清两代遗物看似丰富，但具体使用起来，也不一定就能够用。时日既迁，今天视为丰瞻的，可能明日也会化为窘乏。这是不能不要求研究工作加紧进行的。不应使人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慨叹。作者论及《红楼梦》中所举各种衣着式样，丝绸名目，如“凫靥裘”、“雀金泥”等，因所见当时实物多，体会深，说得就极有意思，远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可及。作者又说：

《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京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可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式样。这十二个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中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

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的情形。

这个问题就提得极好,也是至今未能引起多数《红楼梦》研究者注意的。其实故宫就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伟大实物仓库,可惜至今未作有效的发掘。

作者半年前有一信,还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近常在故宫博物院出版之《紫禁城》,见尊文谈旧戏。其实故宫尚保存得有十七八世纪戏衣数千件,一说八千件,在世界上真可称“洋洋大观”。又康熙乾隆南巡图卷中有几万种演戏场面,均值得设法一一看出,若依据此等世界稀有材料,用一二年时间写一部大书,印十来本图像,在世界上亦必成一种伟大无比工作。

信是用毛笔写的,写成后又用铅笔在信纸旁边作注:

似以康熙三十五年第五次南巡图为最重要。燕子矶场面极壮观。

且注明某某机关地区班子。还有江宁织造署图像十分重要。

一说到文物,就“如同小孩穿新鞋,过新年的一般”,立即激动起来,即使是活到了八十岁也依然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本大书实在应该重排出版,以普及面貌出现。即使附图

简单些也好，这样必将在学术界、文学界、戏剧电影界……引起更大的反响，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顺便也可加以增补，并改正少量错字。如《重屏会棋图》的说明，“南唐李煜”，但历代著录都指中坐者是中主李璟，是名句“小楼吹彻玉笙寒”的作者，李煜的父亲。像这类小小误排，还有一些，都应该改正。

祝愿从文先生身体健康，工作如意，在创作和研究中作出更大的成绩。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关于“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在学术上有高名的著作。虽然“成书仓猝，纰谬百出”（陈垣），但在有清一代却没有谁敢直率地指出它的错误。偶有议论，也大半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因为书是“钦定”的，不好随便说长道短。但错误到底是错误，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煌煌数巨册，就是有代表性的发覆之作。余先生所不曾指出的错误，还不知道有多少。

《四库提要》还有应该指出的更为重要的一面。因为是“钦定”的，它的编写就必然要以封建道德为最高指导思想，以统治者的利益为评判准绳。因此而产生的编写思想上的问题，恐怕比学术性的错误还要更严重若干倍。对此，人们也早已有所觉察并作过一些批判了，但至今没有进行过系统、彻底的清算。

不过《四库提要》到底不失为一部空前巨著。在它以前，虽然也有过《郡斋读书志》之类的著作，但论规模，论深广，都是远远不及的。过了二百年也还没有能代替它的新著。因此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是不得不利用它。过去有许多号称“博古通今”的学者，其所以使人惊佩的原因，就是熟读了《提要》，好像真的读过那许多书了似的。当然，这是经不起认真盘查的。但如果不

是拿来炫耀自己，作为打开知识面的泛读，那还是有好处的。何况今天的读者也大抵不再相信它的“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的权威性了，真的不过是“仅供参考”而已，那么这确也到底不无好处。

提要是紧跟着目录而产生的。读者不满足于只有一张书单，还希望多少知道这些书的大致内容、写作水平与正确程度。这是文化发展繁荣以后必然提上日程的要求。人们关心的是各种书籍所传播不同知识的科学性，在思想上和内容上的可信赖性。在研究者看来，这要求就更为迫切。他们希望知道知识海洋的粗略蓝图。过去做学问的办法是写札记，后来进步了，改为作卡片。但以个人的努力，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在这里，乾隆皇帝也有他的贡献，也许比他更早的先朝皇帝们早已创造了这种集体创作的方法了。但他的组织工作做得规模更大也更细密。他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辑班子，动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通力协作，定期完成。这种动员集体力量进行的协作，不能不说是文化建设上的一种重要先例。即使是封建王朝的皇帝，也明白这种方法的必要性。

好的提要应该就是好的书评。但要求比书评更为完密、谨严。在今天，好像还不容易提供一种理想的模式，一切还处于摸索之中。这里需要百花齐放的方法，由不同作者根据不同需要，写出各有特色的提要来。理想的模式，应该从大量同类著作中比较、鉴定而最后产生。过去也不是没有人做过这种工作，也有过出色的成果，都是很好的参考资料。

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是这方面突出的著作。陈先生是史学家，他写这书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佛教史籍的。此书撰于抗日战争中沦陷的北平，“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这

是两条基本前提。这又是为课堂讲授而写的讲义，因此所选皆习见之书。以上都是使作品具有特色的重要原因。这不是为佛教徒写的，而是使普通读者获得必要文化史常识的入门书。但作者以非凡的学养、功力做这个工作，他用“牛刀”来“割鸡”，如此灵巧，真是擘画分明，完全没有空话、废话，同时随宜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包括《四库提要》的错误。学术水平是很高的。

陈先生的方法大致是对每一书先后讨论其版本源流，体制内容、特色与优缺点，作者略历，本书之流行与在史学上的利用，纠正前人有关的错误缺失等等。这中间有些内容是过去的著作也曾注意到的，但往往失之于轻忽，远不及“概论”之谨严。《四库提要》也常常指出书中的失误与缺点，但多半是枝节的、随感式的。作为学术著作就缺乏必要的分量。陈先生又指出《四库提要》的一种根本上的弱点，“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也是发人深思的。《四库全书》是在收缴天下藏书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实在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系统的访求，要求它反映历史的源流与完整面貌是困难的。这一点很值得引起注意。在过去的研究著作中，有时会出现一种缺点。他们援引的历史文献是繁富的，僻书秘典是多的，但往往忽略了通常习见的基本史料，常常漏掉了属于常识范围内的内容。这是一个时期以来重视异书孤本但忽略基本读物的风气带来的偏差，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是值得注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据所藏所见清初别集六百家，就作者生平、著作内容，写成《书衣杂识》。这实际上也就是提要，不过没有陈援庵书的眉目分明而已。邓先生也是史学家，所以他的书也是史学著作，并非文学史的专著。他选诗的目的也是“端资纪事”，并声明“但以证史，不敢论诗”。这书也是“因书著目”的，这六百家还不能显示

清初作者的全貌，但主要的诗人大抵网罗在内了，经过融会贯通，作者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疾苦、政治斗争以及知识界的思想变化获得了一种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他的史学见解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但作者来不及将这些见解写成完整的论文，只以“提要”的形式孤立地出现于各家之前。细心的读者是可以摸索出其中的脉络的。

作者有许多“发挥”，都是对明清易代之际纷纭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所得，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但这许多也并非定论，有一些，还不免带有陈旧迂腐的遗痕，多半表现在文学评论上，有许多套话与不着边际的议论，限于篇幅、体例，他所选的诗也往往不尽确当。

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都是根据客观实际的研究获得的产物，不同之处只在表现形式。两者都必须忠于客观现实，对主观分析也应有必要的自信。不能任意涂改客观事物，也不能为了迎合某种需要而修饰甚至改变自己的见解。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产生虚假，在科学上没有存在的价值也不会有欣赏价值。

例如邓之诚先生论金圣叹时，引据甚详，对这个世界观异常复杂的人物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也并未下什么结论，凡有所见，都采取商量口吻，我以为是写得很好的一篇提要。在六才子书的问题上，既指出了金圣叹可能受到李卓吾的影响，又指出他的评点的影响似乎更超过了李卓吾，这都是很平实的看法，说不上是什么“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在学术研究上，坦率地说出哪怕并不完整甚至错误的见解，比起照抄照搬通行的“定论”来要好得多。错误可以通过讨论纠正，而“定论”的重复却只能扼杀生机。

邓之诚先生还有一本小册子《桑园读书记》，则是一本别有

特色也更正规的“提要”著作。作者在一九四一年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了半年。以后就过着“罢讲闲居”、“闲门忍饥，不与人事”的日子。这小册子里所收四十五篇读书记，就是这时的作品。他读的书很杂乱，除了经部以外，史、子、集都有一些。比起《纪事初编》中的“小传”部分，这里的札记就更详细，有时还摘抄了作者认为重要的材料。作者在自序中说：

解题之作，始于晁陈。至《四库提要》，辨体例，纠谬误，而愈精矣。其荟萃事目，以备遗忘者，则为“类事”。二者各有藩篱，若不可合。妄意以为若为叙录，当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较切实用也。

这里所说的意见是很对的。“提要”的重要性，说得也非常明白。总之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帮助读者尽可能广泛地掌握知识，同时还提示研究的门径、材料的来源，是使浩如烟海的书本活起来的有效办法。李时珍作《本草纲目》，使人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中草药，它们的性能、疗效、产地……便于人民加以利用，从而造福人类。同时不致使珍贵的药物埋在山谷间，烂在田野里。“提要”之于书籍，也是可以起相似的作用的。

《桑园读书记》的特色，照作者的话来说，是“几几乎合提要札记而为一矣”。这是一种方法，与之相对，成为两个极端的，好像可以举出鲁迅为许世瑛开的书单。鲁迅只举出了十二种书，有的附有简单的说明，往往只一句，可谓要言不繁，但也不是随便说的。这是繁简两个极端。在这中间还可能有许多不同形式。但主要的是不要说空话。至于表示的意见是否正确，举出的实例是否确当，这都是可以商量、修改，逐步使之完善的。

张舜徽有《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收书六百家。不局限于清初，更不限于诗集，应该是更有价值的提要著作。不过由于作者的兴趣所在，是“文字、故训、声韵”之学，因而注意之处遂多偏重于朴学一端。作者虽然同意张之洞在《辅轩语》中的意见，承认清人别集在考史、版本等方面内容之重要，但还是往往略而不论，遂使提要的必要作用难于体现。如对周亮工集中杂文部分，认为“尺牍皆言凌杂，题跋但品书画，皆非亮工撰述之精华”；论徐乾学集中讲纂修书史例考，购书故事等内容，说“则皆当日随手掇录、未加润色之作，乃亦采以入集，颇嫌其滥”。都反映了作者所持传统观点。在论及纳兰性德与徐乾学的关系时，作者看不到当时政局党争等复杂历史情况，只就纳兰上乾学书执弟子礼甚恭谨，就下结论说“宜乾学哀其早夭……又为刊布其遗文，百计以传之”。这种只接触表面现象的研究方法，是很难达到知人论世的要求的。

邓之诚说：“有人每得一事出处，自诩发明；而薄之者则谓‘固在书中，俯拾即是’。皆不免过甚。书贵细读，尤贵慎思，始不遗不漏也。”

这些话也说得很好。如果我们把提要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消灭那种可笑的拌嘴，这其实正是过去文人相轻的典型事例。而要作好这工作，细读、慎思又是必不可少的。

“提要”似乎也可以有高低两种标准。能在技术上完成各项为读者提供方便的任务就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低标准了。如果要更理想，就必须要求对不同著作做出确当的评判，从思想上作出评判。这在学术上是更高的要求，也是过去这类著作普遍存在的缺点，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曾有意识在这方面进行努力，但分量不多，而且偏于提倡爱国主义的方面，这是作者著书

之日时代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今天看来也还是很可贵的。如在《景德传灯录》条下，引晁氏读书志原文后又加以发挥说："晁氏之意，谓政治混乱之时，有气节之人，做事固不易，说话亦不易，只可出家，做和尚去，此禅宗所以盛于五代也。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

这一节议论的出发点当然在于提倡民族气节，但确是说出了很好的史学见解。

又如论《历代三宝记》，指出在《通鉴》出现之前，南北朝的宋齐梁陈还被普遍看作是"偏霸"、"闰位"而非正统。《三宝记》则不然，它的纪年是"尊齐梁而黜北魏"的。同时指出："清人勇于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

这里议论的出发点也是宣传爱国主义，作者在后记中也有"看法与今不尽同"的话。但他所指出的事实，与揭露四库馆臣的动机，却是尖锐的。

另外的一点，版本问题在过去的提要中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这是必须说到的重要内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为版本而版本，目的依旧在于向读者专家提示最佳的资料来源。邓之诚很重视古籍的搜求，但他的书在这方面也还不够谨严。有许多清初人的诗集，他所据的并不是原刻，往往是选本或后来的翻刻，但不加以说明，因此就减低了学术价值。陈垣是重视版本的，这也为他提供了极大的研究方便。他论《弘明集》的版本说："以今本与《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后所增入，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

梁皇帝'，当是僧祐原文，称武帝者，后人追改也。"这话是不错的。我所见《弘明集》明人皮纸黑格写本，有会稽钮氏世学楼藏印，是早于明代嘉兴藏、吴惟明两刻的写本，就正作"大梁皇帝"。梁释僧祐所编的佛教文选，在提到当时的统治者时是不会径称之为"梁武帝"的。

中华民族有极丰富光辉的文化遗产，虽然历经种种灾难残毁，迄今仍旧有大量的遗存。我们不能听任其继续遭到毁弃，也不能依旧冷落相待，必须尽快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有益作用。文献也不只是书籍，档案、金石……也都应包括在内。这一切都应该系统地全面地摸一下底，使我们的人民、读者、研究家心中有数。首先得有一本账，一本目录；接下去就应有一本好的提要。只有索引是不够的，有许多文字只看题目作者是完全不能猜到那内容的。提要的编纂当然是比编写目录更为艰难繁重的工作，但在我们国家里，动员集体的力量，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任务是完全有可能完成的。我们的先行者曾提供了一些样品，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显示了某些缺点。这就是基础。相信我们必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建成辉煌的大厦。

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

阿英与书

《阿英文集》在作者逝世四年以后问世了。这本七十万字的文集收入了散文、随笔、回忆、序跋等部分单篇作品，篇幅较巨的创作与论著都没有选入。尽管如此，文集还是清晰地反映了作者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一展卷，作者的言笑，在革命道路上仆仆前行，伏案研究，南北访书的种种，都如在目前了。作者的文学工作涉及了非常广阔的方面，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战斗的轨道。作者是文学家，但首先是革命者。

我认识作者很晚，已在全国解放之后。虽然从三十年代起已经耽读他的许多著作和编著的大量书册了。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确认了在心目中存在了很久的印象，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而不可能是别一个人。他是前辈，是有威望的革命前辈和名作家，但在后辈面前却没有那种常见的架子。他有一种一下子就能把人们的心拉近的魅力，能立即给人一种安定感，只会有这一种而不可能是多种面貌的安定感。这真是一种罕见的可贵品质。

第一次看见阿英记得是在梅兰芳护国寺街的寓所里。他好像已经是梅家的常客了，非常随便地坐在缀玉轩的客厅里谈天，

后来又一起去恩成居晚饭。就在那一次我见到了一种奇异的场面。在我们就餐的小房间外面，饭店的走廊、门口，一下子就聚集了那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以至后来离开时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自动聚集起来的都是梅先生热心的观众，他们脸上都堆着欣喜、兴奋、幸福的笑。当我们跟着梅先生挤出饭店时，阿英轻轻地对我说："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后来我从梅先生和梅家友人口中常常听到阿英的名字。要安排演出节目了，写好了什么文章和发言稿了，要修改剧本了，还有许多几乎是琐碎的小事，人们总不会忘记问问阿英的意见或请阿英来谈谈。这种尊重与信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阿英还约我到他的寓所里去看过书。

他取出了一些明刻白棉纸印本来给我看。书的名目记不起了，反正并非什么罕见的秘本。但对其中的一部他特加说明，说是抗战中在苏北敌后抢救出来的，我却翻阅了许久。我想，作为藏书家，他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记得我曾告诉他，两年前在上海的书市地摊上曾发现了他所藏的大量新文学书籍，可惜没有可能为他买下。他也只是少少表示了一下惋惜的心情，接下去就说，书还是要继续买下去的。我想，他在买书上的锲而不舍、再接再厉的精神也是不寻常的。

后来是断续的通讯，最早是商量印行古版画的事情。从《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知道，他曾几次到傅惜华家里去看过碧蕖馆收藏的大量明代版画，这中间有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没有收入的许多重要作品。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设法尽快地印行、流布，于是就起劲地筹划编纂，并答应写一篇有分量的长序。这件事经过长久的努力终于没有成功。开始时我们都曾意识到这中间可能有人事的牵制，但终于过于天真地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

在今天这一切都不应成为问题。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阿英对人对事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纯朴的心。他是从人民的事业出发进行考虑的。这样一批珍贵的古版画，是应该尽快介绍给读者，还是加以抑制使之不见天日，还是像康生那样，索性掠归己有呢？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方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是一九六四年傅惜华编订的。基本轮廓还是当日拟议的面貌，但解题、选材、时代地域区划，历史、艺术分析的设想，木刻画发展的研究……这些方面，都不是原来没计的样子了。最可惜的当然是阿英没有写出的那篇总序，至于制版印刷，为了保持原作面目的一些设想和努力的没有完成，就更不用说了。

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阿英编的《红楼梦版画集》，则是这一次努力留下的仅有的小小纪念。

这以后在信里常常要我为他留心找书。关于汉画像石刻的，戏曲、小说、版画的，晚清的诗文集是他后期重点收集的对象。有一次还指定要找一些清末石印小说附插图的精本，老同文和点石斋的出版物。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视野的广阔和眼光的敏锐。他不跟在别人后面跑，采取了一条“人弃我取”的途径。他注意的是那些寂寞的、受到不应有冷落的区域。他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书市上进行“抢救”。书籍到手以后并不束之高阁或装饰书房，而是抓紧阅读、研究、选录、纂集，把三十年代开始编著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扩展、丰富，完成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等《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同时又完成了规模庞大的多卷本《晚清文学丛钞》。

这一大批文献汇编在近代史、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用

不着多说。开辟了这个重要研究领域的阿英的眼光和魄力真应该受到后辈的尊敬。《文集》中收有好几篇记述在上海买书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是可以与李南涧、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记》(前后记)并存的珍贵书林史料。文章中也记下过他收集晚明文集的故事，但更多的是他搜集当代、近代革命、文学史料的故事。他写出了访书的辛苦和得书后的欣喜心情。这种心情记述在藏书家的题跋中并不少见，可是阿英的抒写却不同。同样是激动、欢喜，但买得被禁毁追查的革命书报的心情到底和得到宋版明抄的意趣是两样的。

新文学史料的开始成为搜集研究对象，新文学出版物被当做版本书籍而受到重视，好像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热闹现象。人们看到这种研究工作在国外已经开展了许多年，并有了不少成果时，就更产生了不能再继续漠视不顾，必须加紧建设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资料收集保管机构，这对作家、研究家、出版者和广大读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让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到域外去寻找资料，这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现象不能再在今天出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这绝不应被放在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阿英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把这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以个人的努力编成了《史料·索引》一卷，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见识！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展了十六年的当时，阿英就看到人们对之产生了“三代以上”的生疏感，他对《新文学大系》的发刊的估价是“超过于翻印一切的古籍”之上的大事。他在一九三五年写《版本小言》，就将“新书”的版本价值拿来与旧书相提并论，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在今天，则正是高明的预见。在鲁迅逝世周年时，他写了《鲁迅书话》，谈到《河南》

和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的“书话”，阿英也是最早的先行者。

《文集》中的几篇访书记，写的是他在上海城隍庙、西门、浙东、苏常等地访书的故事，不但有文献价值，也是优美的散文。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过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表现的也依旧近于“冷摊负手对残书”那样的情趣；那么在《敌后日记》中所记在苏北新四军中的访书活动，意义就截然不同了。在烽火遍地、民族战争的战场上，那种迁徙无常、战斗频繁的艰苦环境中，在陈毅同志的直接关心下，阿英展开了困难的抢救、收集、保护书籍文物的工作。对祖国文化遗产炽热的爱，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所占的地位，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与行动直到今天还值得引为骄傲。

在一九四九年写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显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建设上雄伟壮阔的草图。规模的广阔，人才的众多，工作的气势……都使人为之神往。就在这群峰耸峙、万壑争流的情景中，阿英又和郑振铎等一起研究了有关文物管理组织等问题的设想，并很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新中国的文物工作就在这时奠定了基础。从旧社会的个人访书到新时代人民的文化事业，这是怎样的一种飞跃啊！

从《文集》的篇目中，我们会惊异地看到作者的兴趣是如此广泛，视野是何等开阔，他从新文学的创作研究开始，写下了许多闪烁着战斗锋芒的文学评论；在连续的战斗中尝试使用话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抗战烽火中开始注意通俗文艺的运用，从而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画片、西湖景、年画、相声、窗花……都受到注意。这种生气勃勃的研究兴致，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中期，从不少衰。作者在文化园地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年，经历了

风风雨雨、胼手胝足的艰难历程，有自己的辛酸与愉悦，可是从不想到放弃自己的劳动，他实在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阿英同志逝世已经四年了。有时想，他实在离开得太匆促，留下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来不及做完，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时时觉得他好像还走在我们前面，迈着稳重而坚实的步子。“闻鼓鼙而思将帅”是一句老话了，但我觉得放在阿英同志身上是很合适的。特别是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放在面前的时候。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

澹生堂二三事

明代浙东著名的藏书家，有宁波范氏天一阁与山阴祁氏澹生堂。两家都有藏书目录传世，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版本说明（天一阁目有略记版本者，但已是后出之作）。说这是缺点，但同时也正好是特点。因为这恰是与常熟派藏书家的毛氏汲古阁、钱氏绛云楼截然不同的所在。汲古阁有“秘本书目”，不但注明版本，同时还说明当时买价若干，抄费几何，那已经有些近于广告了。但我们自然也看重这种广告式的书目，因为它记得详细，便于参考研究。

范、祁两家书目没有版本说明，除了他们本来就无意于作广告之外，沿袭了过去的传统则是主要的原因。自宋人书目开始，大抵就是只记书籍名目，不记版本的。那时雕版虽然已经盛行，但到底历史不长，异本有限，不必详细说明，人们就会明白那是何地何人所刻。此外，宋版书在宋代，是新书而非古董，没有商业性的广告宣传的必要；而当时流传的书籍，不外抄、刻两者，不必记版本了。

范、祁两家藏书，也的确与毛、钱不同。他们不重视宋元版（祁氏所藏宋版，只见盘山精舍所存一种；范氏藏书中也很少宋

元旧刻)，也从不以书籍雕版之旧夸示于人，他们是从实用的角度收书的。看天一阁至今还保存了那许多明刻方志和登科录，就可以知道。方志，在明代以至清初，是不为藏书者所重视的，黄梨洲就视之为“弃货”，但收集起来却极困难，要千方百计向全国各地去搜求。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天一阁能收集到全国各地的方志，大致完备，是极不容易的；登科录就更麻烦，真不知道范钦花了多大力气收集了那么一大批。这一类书在毛子晋和钱牧斋看来，是完全没有收藏的价值的，远不如他们所藏的那些古董性质的旧刻、名钞为有趣。这是常熟派与浙东藏书家的明显不同之处。

我并不想贬低常熟派藏书家的身价，那是完全不能抹煞的；浙东故家藏书的特色与其价值，同样也是值得佩服的。浙东的学风一向重视史学，他们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收集资料，不能不说是很高的识解。清初文化统制严酷起来以后，读书人不敢再做史论，研究历史的也大抵钻进牛角尖里，考证细小的问题，不再敢于放眼看古今天下事了。三吴说经的学者盛极一时，浙派学人相比之下黯然无色。但就在这时，也还出现了像全谢山、章实斋那样的人物。我觉得这正表现了浙东人的那种风格，鲁迅所称引的明末王思任所说“吾越乃复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纳污之地”，看来就是这种作风的重要的出发点。范、祁两家藏书的特色，也正是表现了这同一趋向的。

二十年前，我曾就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故实，搜集过一些资料，加以说明，但偏重于祁氏藏书流散的经过，对澹生堂藏书本身很少触及。原因是资料不多，研究困难。不像天一阁的幸运，虽然历经劫火、攘夺、盗窃，至今还保存了藏书楼和不少藏书；祁氏则自经家难以来，没有好久，藏书就都荡为云烟。我从

公私书藏的目录里，仔细搜集，现存的澹生堂所抄、所藏的书，还不到百种，可见损失之巨。祁氏还留下一部书目，这是仅有可资依据的资料了。但二十多年前曾经得到过一些祁承㸁写给诸子的家书原迹，其中却还保存了一些资料，虽已零落不全，但少加辑录，也还可以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

关于澹生堂和藏书的一些史料

祁承㸁在家书里谈到藏书的地方颇不少，其中有一通是专谈此事的。这是天启三年承㸁在河南做官时所寄：

手启一通

藏书事宜书付二郎/四郎奉行

我一生功名富贵，皆不能如人。而独于藏书一事，颇不忝七八代之簪缨。此番在中州所录书，皆京内藏书家所少，不但坊间所无者也，而内中有极珍极重大之书，今俱收备。即海内之藏书者不可知，若以两浙论，恐定无逾于我者。以此称文献世家，似为不愧。只是藏书第一在好儿孙，第二在好屋宇。必须另构一楼，迥然与住房书室不相接联，自为一境方好。但地僻且远，则照管又难。只可在密园之内外，裁度其地。汝辈可从长酌定一处来。我意若起楼五间，便觉太费。而三间又不能容蓄。今欲分作两层。下一层离基地二尺许，用阁栅地板，湿蒸或不能上。只三间便有六间之用矣。前面只用透地风窗，以便受日色之晒，惟后用翻轩一带，可为别室检书之处。然亦永不许在此歇宿，恐有灯烛之

入也。楼上用七架，又后一退居。退居之中，即肖我一像。每月朔日，子孙瞻礼我像，即可周视藏书之封锁何如。而此楼之制，既欲其坚固，又欲其透风。须我与匠人自以巧心成之。但汝辈定此一处，可分付筑基也。发回书共八夹。内有河南全省志书二夹，不甚贵重，此外皆好书也。有一夹特于陕西三十八叔印来者。若我近所抄录之书，约一百三四十种，共两大卷箱，此是至宝，自家随身携之回也。我仕途宦况，遗汝辈者虽少，而积书已在二千余金之外，汝辈不知耳。只如十余年来所抄录之书，约以二千余本。每本只约用工食纸张二三钱，亦便是五六百金矣。又况大半非坊间书，即有银亦无可买处。故汝辈不但以体父之心，所当珍重谨守，即以物力计，非竭我二十年之心力，捐二十年之余赀，不易致也。今暂将发回之书，俱且放在大楼上，或东间、正间皆可，待我回，亲手入架，不可乱动一本。仍照我大楼两面厨式，共做六个。只用一面开，一面做定，不必两面皆门。高、大、阔皆与旧厨一样，可以合式摆放。惟止安一本书，即深止二尺可矣。如有寻干燥木料，即可动工做，盖做完又须加漆，待我回日可以整书也。此事全委在四郎料理。即动我新置五八舅内田租可也。要紧要紧！其后面新造侧楼，并船坊上楼板，皆须盘钉。而新门台及门柱之类，皆用灰布重油，使其焕然可观。而东西两面披水窗门，皆用两度黑油。此二事委在二郎专任之。其应用工料，四郎于自置田租内支用可也。此二项，俱须在十一月之内完。倘旦暮得幸转，急欲为收拾书籍之务。今各书安顿未得其所，真令人梦寐不能忘怀耳。俱毋得迟误，切嘱，切嘱！

八月十一日　父手示

书橱定用在十一月以前做完漆好，俟一回便要整书。其木料必须坚而干，切嘱，切嘱。

祁承㸁写过一册《澹生堂藏书约》，是有名的系统论述典籍收藏的专著。这封家书里的一些要点，在那里也大致接触到了。不过一是公开发表的著作，一是写给儿子的家书，在家书里，他的话要说得更真实些，更少装腔作势，也使我们更容易接触这位著名藏书家的心。

祁承㸁以“文献世家”自豪，自命为两浙首屈一指的藏书家。他认为，要使藏书“世守”下去，一要好儿孙，二要好屋宇。他还亲自订定了保管藏书的规章制度，又再三提醒儿子，特别指出这些书得来不易，价值若干，以引起重视。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难免不使人发笑的。这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常态。虽然，山阴祁氏还算不上地主阶级的上层。从其他一些家书所涉及的田产经营材料来看，他只不过是一个中小官僚地主，比起钤山堂那种“收藏家”来，是差得远了。

他在家书里表现出来的对书籍的感情，是浓挚的，远远超过了登徒子的对于女人和守财奴的对于财货。祁承㸁曾官宿州知州，磁州兵道，前后在河南住过不少时候，因此他有可能收集河南全省的志书，但这比起他在河南借抄的书，就又算不了什么。他没有细说借书于谁家，猜想起来有可能是明宗室的朱睦㮮万卷堂所储，这批书后来全部被毁，幸而由祁氏传得一些副本，不幸的是这些澹生堂抄本也十不一存了。祁承㸁是目录学者，他的抄书是有选择的，他认为极珍贵、重大之书，也不是漫为夸示。从今存的澹生堂抄本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远胜于流行本、保存

了不见于他本的佚文的情况，可见其所据底本之佳。在陕西的三十八叔是祁承勋，是一位选贡，时任陕西布政司都事（见《戊辰浙江恩贡齿录》）。从家书中我们知道他在十多年中间，抄了大约二千余册书。这都是在当时没有刻本或流传极少的书。这对我们估计澹生堂抄本的总数是个重要的根据，即使总数较此数稍多，大致当不出这个范围。当时抄书，每本的工食纸张，不过二三钱，但比起当时的物价水平，却也不能算是怎样低廉。这可以与汲古阁抄本的工价加以比较。不过澹生堂抄本中也有相当草率、出于“抄胥”又未经校对的本子，比起“毛抄”来，是有云泥之别的。抄书工价的差异，应当与这些因素有关，并不说明江南与中州生活水平有多大的不同。

这封信中所精心设计的藏书楼，应该就是澹生堂。也可能就是东书堂。我买得明刻《楚辞》祁氏藏本，书根题字就有“东书堂”字样。赵一清记乾隆二十年曾到山阴梅市，访祁氏故居大楼，为其先祖就婚之所，这就是东书堂。毛奇龄小时候也曾到过东书堂，从商夫人论诗。赵谷林（一清父）则在诗注中说：“先君（东白）尝假馆澹生堂，其时祁五先生尚存，藏书充五楹之楼，望若琅嬛秘府云。”（《爱日堂吟稿》）谷林《春草园小景分记》则说：“澹生堂藏书十万卷，悉人间罕觏秘册。又东书堂为五六两舅父诗坛酒社、名流往复之所。”这样，澹生堂是藏书的五楹大楼，而东书堂则是楼前的大厅。

就在这通家书之后，承燦尚有一信，更详细地安排了澹生堂的兴造。他对起造日期、时辰，以及动土平基、定磉、放阶沿、竖柱、上梁、穿架、开柱眼等都仔细斟酌。许多迷信程式，在他看来都是“第一要紧”的事。

下面一节说：

门台之前，须留余地，此是正理，汝言甚可从。但厅屋前决无不用仪门之理，如面前无一墙，则两边皆不可用墙。近来宅子有如此散而不收者乎？造仪门而不用木椽，只如人家用石柱砖椽，此不过一墙耳。岂得以作层数算乎？若门台之必用两柱，大屋之止用五架梁，一皆如汝所言。但大厅在翻轩外，用十八扇透地风窗门装过，则仍用老廊六尺，决不用腰槛栏杆也。东边临河一门，不过为便于登舟上下，只小小二扇足矣。此皆临期可斟酌者也。

这一节所说，大约就是澹生堂大楼前东书堂大厅的原始设计了。

后面还有谈到买料的记事：

买建杉，已再三与何姊夫说了。须买三大船，作大小中三等买之。大约下价六七百金之间，发到家则八百余矣。又须买油杉与里溪百二十者三四甲，方足椽料之用。其树实可一期买，不可于柯桥零买也。

大料是第一紧要事，其砖瓦及石料，若发在百金之上，每人须再付数十金，总于寄回之内支用。

当时营造，已经有专营土木包工的商人，而且有经营十余年之久的，商人彼此之间又有颇激烈的竞争。承煠在信中说：

徐作我用之十余年，未尝有一毫坏我事。安可却之？即汝欲用马作，必须两家同起，决无专用素不效劳之人。潘

作可专令起门台，但与他说过，不好则前功俱不准，不如只安心专管西边侧楼一带及祠堂未了之事为妥。

我在这里抄了许多，并非发思古幽情，想给早已毁灭了的澹生堂考实、复原；实在是因为它保留了上好的经济史料。像起造澹生堂这样的楼厅，在当时大约需要一千二三百两银子。杉木要从福建买，而且要买山树。而当时的柯桥，是有木行这样的店铺的。木材砖瓦石料的比价，也说得清楚。土木营造包工商人的存在，作为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经营的内容，也为我们增添了新的知识。凡此都是一六二三年间浙东一带的情况。

就在这之后，承燦又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到澹生堂书籍事：

去年所发回书夹，可将毡条俱解去了，仍用油纸包好。决不可动我一本。今次发来夹板，亦可收好。盖以带毡则易蛀也。其澹生堂书橱中书，两年来不曾日晒，汝可略一看，或不甚浥湿，则不必开他；如蒸湿不堪，则须用心晒曝，然不可失一册一卷也。书橱可照大楼上样式，一体做六个，止用一面开门，后面做定不动。可于三月间买木做，须木干燥乃好。其阔大高低，俱照楼上橱。但只放一本书，可少浅三分之一耳。

我即回家，不过一月便行。城中亦不去交际。只有澹生堂中书籍，须用收拾一番。我书到，汝可即拣一好日，将新侧楼楼板俱细钉。仍买楮木数根，锯开令干，将一边壁橱移□侧楼处□截长补短之用，一时恐不凑手也，速速为之（十一月初九日付大郎、四郎）。

前者初转之后，本意必欲一归家，带家眷同赴任。且欲

将澹生堂书籍收拾在侧楼，以免蒸湿之虑（十一月十九日付大郎、四郎、五侄）。

这里说的大郎是祁麟佳，廪监，有《太室山房四剧》及诗稿《问天遗草》，早卒。彪佳为作序授梓。四郎是祁骏佳，甲辰年生，绍兴府学生，山阴县匠籍，崇祯戊辰恩贡。骏佳字季超，于祁氏兄弟中最为老寿。直到康熙二十年，还在祁承燦手抄校本《老子全钞》书前写下了题记："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有二印记曰"祁印骏佳"（白文方印）、"季超氏印"（白文方印）。这里的"辛亥"应为"辛酉"，可见老而善忘。季超后来学佛，写过《禅悦内外合集》，曾见稿本。黄梨洲说："祁氏藏书，自季超学佛，一切视为土苴，多半为云门沙门持去卖钱。"可见在黄、吕大担论斤、捆载而去之前，澹生堂藏书早已零落地散出了。他还有一种笔记曾为赵之谦刻入丛书中。

祁承燦在《藏书约》中有下面一节话：

然而聚散自是恒理，即余三十年来，聚而散，散而复聚，亦已再见轮回矣。今能期尔辈之有聚无散哉！要以尔辈目击尔翁一生精力，耽耽简编，肘敝目昏，虑衡心困。艰险不避，讥诃不辞，节缩饔飧，变易寒暑，时复典衣销带，犹所不顾，则尔辈又安忍不竭力以守哉！

看这话，他是懂得聚散无常的道理的。不过终于摆脱不下，还是不能不寄希望于子孙，至于大诉苦，想借此获得儿辈的哀怜，但终于无效。吕晚村在买得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之后写诗

示儿子大火：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笈，不抵当时装钉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祁氏参临济宗）。

诗写得颇为波俏，也显露了得意的神色。然而曾几何时，南阳讲习堂的藏书也灰飞烟灭了。吕留良父子的结末比祁家还更为惨酷。封建社会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努力挣扎，在阶级斗争的浪潮中显得十分微弱无力，碰上小小的浪花，就一败涂地了。

关于三百年前的一次矿工起义

祁承㸁是明代后期著名的藏书家，他的澹生堂藏书是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不幸的是，他的藏书在身后不久就几乎全部散佚了。这是在他的家族因参加抗清斗争而遭到残酷镇压以后的事。在他的故乡山阴梅市，有聚族而居的祁氏子孙。他们还珍重保藏着一部分先世遗书。这主要是祁承㸁本人和诸子若孙辈的稿本、文件，以及先世著作、家塾读本等等。这些书册，在清代都是干犯新朝大忌的东西，保存了三百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大约在四五十年前，《祁忠敏公日记》用活字印行了，那后面附有一份《祁氏遗书记》，就大略记下这些遗书的草目，但也并不完整。

我在三十年前曾接触过部分遗书，同时还看到祁承㸁给他

的家属的一些信件。信件是在不同时期寄给他的几个儿子的。祁承㸁本人一直在各地做地方官，家信里反映明代后期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社会问题的部分，是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其中较为完整的是他记述宿州矿工起事经过的部分。

一六二二年，也就是明天启二年壬戌，祁承㸁钟爱的幼子彪佳中了进士。承㸁这时正在宿州知州任上，彪佳留在北京等候考馆。五月十五日，承㸁离开宿州，六月十五日返抵故乡绍兴。七月初四日寄给彪佳一封长信：

我于五月十五日自宿州起行，至六月十五日抵家。经年之别，幸家中俱平安可喜，而祖寿伶俐尤可爱、可喜。但自四月廿二差陈宪文同徐元进京，至今尚不得回信。且自四月间得福建承差带书之后，又三月有余，不见京中家报矣。悬念何可胜言。我离任至徐州，而始闻曹州郓城之白莲教为乱。然亦止闻其端倪，未闻猖獗也。及至淮安而又闻邹、滕两县之乱，亦未闻如此其甚也。今自北来者，皆言邹、滕两县残毁之后，夏镇又遭焚僇之事，道路为梗。每念汝同姊丈、郑九华在京，真是食不下咽矣。汝之行止不知何据？即考馆一事，至今尚无消息。看此世界，几若鼎沸。何敢望华要之地，惟得汝安稳到家，便是如天之福矣……且今年又值苏息驿递之时，一概新科，俱无邮符。则汝之人从行李颇多，自雇夫马，恐劳费不浅。且此际道涂扰攘之时，决用慎重斟酌。宁可在京再看事势，以为迟速。倘考馆之期，果在八月间，则九月终旬，我定到京。汝待我入都，则处置邮符与汝，亦不为难。倘果在目下要行，必须由河南路为稳

妥。但目下遥传，宿州亦岌岌酿乱，则由河南者必由宿州，恐又不便矣。前二月间，宿州有煤徒三四千，几至倡乱。若此时我不以镇定处之，计策散之，万一率兵去擒剿，则其铤而走险，岂在邹、滕之后哉！数千人团聚不散之流民，只以二三白牌，密地晓谕，阴为解散，不动寸兵尺刃，所全流民及地方之生命亦多。此自入睢阳一段恰心之事。但恐人情未必尽知其中委曲，而近恐此辈又复啸聚，或都中有人说起我在宿州煤徒之事，汝可将颠末说明。特录事定之后，将人犯申详正法，以示惩创后来之意。其招审定案，付汝一看，则自知其详悉矣。（下略）

这封家信里透露的晚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是十分真实、逼露的。在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辽东后金大举入侵的“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京师已经变成边塞，山东、河南一带也是一片起义的烽火。什么考馆、做官，都已放在第二位，但求平安无事逃回老家，就是上上大吉。大厦将倾，树倒猢狲散，朱明王朝不可避免的覆亡命运，已经无情地由它的臣民公然宣布了。

信中提到的邹、滕民变，是当时的一件大事，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壬戌，天启二年五月条记：

山东巡抚赵彦报：“妖贼”徐鸿儒倡乱。鸿儒巨野人，以白莲教惑众，与深州王好贤、景州于弘志通密约，八月望日，三下同起。而鸿儒以他事先发，在卞家屯刑牲誓众。寄家梁山泊，据梁家楼为巢，攻郓城，知县余子翼遁，遂据之。曹濮骚动……

《国榷》又记六月庚午，起义军进攻邹县，后又攻滕县，“时括饷俱尽，至是无饷可给，鲁王捐资保城”。

七月戊申，“妖贼”据夏镇，掠粮船阻运。总河陈道亨告急，把总姚文庆集乡勇败之，运道复通。

这和承煤在家书中反映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家书里所提到的“苏息驿递”，同样也是当时一件严重的社会问题。那时甚至有人认为，明朝之亡就是亡于驿递，这当然是片面、肤浅的看法，但也可见问题之严重。

王季重有写给周延儒的三封“简周玉绳”（见《文饭小品》），也提到这个问题。周延儒是崇祯末年的首辅，后来终于被皇帝赐死了。王季重说：

不佞得南膳郎且去，无以留别。此时海内第一急务，在安顿穷人。若驿递不复，则换班之小二哥、扯纤之花二姐，皆无所得馍馍，其势必抢夺，抢夺不可，其势必争杀。祸且大乱。刘懋、毛羽健之肉不足食也。相公速速主持，存不佞此语。

又说：

刘掌科（懋）因父作马头，被县令苦责。其言罢驿递犹可；若毛御史在京置妾，因其妻忽到，以公祖轻与勘合，而怒室色朝，突发此议，则因戏起乱矣。驿递乃穷人大养济院，

穷人无归，乱矣。再语之相公。

毛羽健的故事又见于《秋灯录》(《昭代丛书》)：

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传至，立遣之。来速不及预防。羽健恚极，迁怒于驿递，倡为裁驿夫之说。

刘、毛的故事当时大概在士大夫中间流传甚广，也应是可信的。但将明朝的裁减驿递，归因于这种偶然因素，却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见识。裁了驿递，也的确给士大夫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他们失去了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交通工具及服务，不能不自己筹划，并付出可观的旅费，他们当然要加以反对。王季重不惮烦地两次向首相上书，他是看出了这种尖锐社会问题的存在的，并从而指出“安顿穷人”是对付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对策。应该说是有见解的。他对被压迫、被迫害的劳动人民也有他的同情。不过他终于不可能懂得，农民为什么要离开土地而投向驿递这样的“大养济院”；他的建议也不过是要使小二哥、花二姐们暂时保住安稳的奴隶地位与生活，不铤而走险而已。这当然又是王季重这样的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所在了。

裁驿递大约是崇祯末年的事。祁承㸁所说的“苏息驿递”，是为了地方上供给过往官员夫马的负担太重，采取的改良措施。

祁承㸁对他处理宿州煤徒斗争一事，似乎颇为得意。在给儿子彪佳的信中，曾多次提起。他在信里说：“此我自觉宿州潜散煤徒一事，颇谓平生一惬意事耳。”大约就在这一年，他把这事的前后始末，写成纪事，刻入《澹生堂外集》。

《澹生堂外集》，今存三种。万历、天启递刻本。题“山阴密

士祁承㸁著”。九行，十八字。三种的大题分别是：(一)《琅琊过眼录》，前有己未(万历四十七年)菊月自序。(二)《符离弭变纪事》。(三)《两游苏门山记》。收藏印记有“檇李曹溶”、“萧山王端履年四十岁后所见书”、“节子辛酉以后所得书”。卷尾有王端履手跋：

> 《澹生堂外集》，吾不知共有几种，所见者只此一册而已。此吾乡前辈遗书，子孙其宝诸。时道光乙巳夏六月望日，王端履敬识于重论文斋，年已七十矣。

三种之后，又有傅以礼(节子)手抄的《藏书约》一卷。卷末跋云：“己卯(光绪五年)端阳后一日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手录，浃旬甫毕。庚辰中秋前二日覆校一过，计改正二十余字。”

傅节子不知道《藏书约》也有原刻本。八千卷楼和郑西谛都曾藏有此书，保存了不少同时人的题序，这在鲍本中都删去了。

《符离弭变纪事》说：

> 宿、故汉甬上地，亦称符离。春秋为宿沙子封国。幅员颇辽旷。入国朝，为中都北门，绾毂九省。轩盖如云，轮蹄如雨点。民疲而惰，土磽而硗。无山林薮泽之利。民之艰薪更甚于艰食。故民间多并日而炊。去州之东北三十里为徐溪，由徐溪而入为宋疃，宋疃有山一带，土人所呼为白塔山者也。山中多石炭，不减燕市，州民向不知采也。万历乙卯丙辰间，二东大饥，流民载道，而宿与东郡不甚远，故流民往往十百成群，为谋生计，有至白塔山握(掘)草根者。土中得煤少许，试凿之，遍山皆煤也。流民则大喜，因取煤以献

于有山者。州民方苦薪桂，一旦得煤，以济晨夕，州民亦大喜。于是有山者称窑户。采凿称煤工，两相济也。当此时，取煤者仅数十人耳。仰衣食于山主，听役使于山主，供采办于山主，莫敢抗也。为日久，则行煤之地益广，取煤之利益多，而凿煤之人亦益众。其间黠有力者稍稍欲自雄，每事与山主相颉颃，而其隙遂开。久之，隙益深。山主乃相约，不以粒米升酒资煤徒，而复令市贩不得相贸易，流民始大窘。初犹就山主贷升米。贷弗与，则拥众而强索。因而遍及村落，即山主亦不能自由矣。夫强索与抢掠也，相去有几？州民遂哄然指煤徒为作乱，而赴余告变者无虚日。此正月二十六日事也。余默筹之，数千群逞之辈，临事一不当机，流祸地方者不浅。今欲制之于群逞之时，必须开之以谋生之路。姑外示驾驭，以安其心，而徐为散之策，此当机之着也。因择里老中为此辈平日所信服者二人，捧示谕之。谕意谓，宿方乏薪，赖煤以济。流民出力，土民出财，事固相须；但人众则嚣，众嚣则乱，必有法制，始为永图。今令窑户于流民中，每窑择窑长一人，十人为甲，甲长一人。每五窑则择居民之信实者为牙侩，以便贸易。一人犯法，州以飞檄责之，窑长如期捕解，少有阻格，即与同罪，此二月初六日事也。流民得谕皆心动，愿自相推择，列名以报。会居民吴应宾持钱向窑户宗楼市煤，以争价相竞。宗撒其钱于窑中，弗与煤也。又适有外商策一骑入山中，群恶少复烹其驴食之，于是州民与外商复绝迹不至，而流民益大窘。且自知与州民之衅不可解，益备臂棍、铁圈诸物以自卫，而州民更危其词以激予，此二月十一日事也。予知此辈敢于群逞，皆二三豪民与州民相挟仇者为之耳目，密布余左右，即案头一小吏，其

父戴朝儒尤其巨孽也。倘予出一言，即顷刻密驰，故每遇父老于公庭赴诉，辄佯笑叱之出，且故为大言曰，鼠辈安敢尔！果若是，吾当以一骑缚之来，不必良怖。时缙绅父老及僚属与卫弁，无不力言当率民壮乡兵扑灭及早者。余笑问曰，公知此辈为众几何？吾尝谛视之，其开采一窑，有用力而操槌凿者，有辘轳引煤而上者，有荷担而出之水次者，非得四十余人则不能以回环而举事。今开窑已至七十有余，计众当不下三千人。而州中民壮仅五十，即乡兵可荷梃者，亦不过百余，若以法制之常论，则一老卒怀尺符，数百人可摄也。若以事变叵测论，督数百勉强承命之役，捕三千畏刑逃死之人，彼将束手就擒乎，抑铤而走险乎？万一我有损伤，亵威裂法，固不可言；即能捕斩此辈，将筑京观以示威乎？抑上首功以希赏乎？夫纵而养乱与激而酿变，皆守吏之所必不为。余日来默默为调剂驾驭者，不遗余力而让能，特无奈利之所在，人为贲诸，流民惟有走死地如鹜耳。余料此辈断不能为乱，诸君无惶惑以摇人心，但道路流传，讹言蜂起，不可不白之当道。然余不欲张皇其事，具文以请，惟退而手自削牍，条三策上之。大概以开煤之衅，匪伊朝夕，法当擒治，事贵潜消。以职所见，群逞之流民，多方解散，使各还故乡，一意禁山，毋再令窥利。如此则既弭目前之衅，且杜后日之忧，是为上策。即不然而借天地自然之利，托宿民樵采之艰，听其开凿，而立以窑长，联以保甲，渐择其勤事者，量授牛种，使开垦荒地，令其有土著之思，此为中策。更不然而乞院道一旅之师，环而扑之，诘戎首而慑乱萌，此州民之所深快，然于此辈有锋镝之惨，而地方有玉石之焚，是为下策。而下策既有所戕戮，则事干题请，恐于上台亦有所未便。因

缄付飞骑上之。不数日皆次第得报可。自各台以及道府，一以解散为得策。而督抚漕台李公尤倦倦以奸人鼓煽为虑。若按台之意，则主于开采而榷其税，谓可以惠宿民也。惟操台以道远恐事难逆料，竟委州以便宜。云，事不可解，即令征兵于寿州。余藏其檄不以示左右，惟更令耆老申之以保甲，惕之以生死，又选民壮稍习事者，各率乡兵数人，但于邻近村落，往来巡缉，以防其四出为乡民毒。但勿令迫近，与之搏击，布置颇周。此二月十七日事也。然州民固惟恐流民之出而焚掠，流民亦惟恐州民之入而擒捕也，誓相团结，如蜂屯蚁聚，相持益坚。乃一二奸民，又日相鼓煽，正如督抚所虑。妖言四布，州民日揭匿名帖送州。余即公庭前立取火焚之。一切不以视。余心知其不能为大逆，而特无可散之机，因乘谒按院之行，出境数日，以宽此一线地。因严谕捕官并握卫篆者，此辈吾已有驾驭笼络之术，此行正急而示之以缓，迫而示之以宽。俟吾回日，定当贴首弭尾矣。断不可听州民言，轻捕一人，捕必有变。途中又更示以手札，谆谆为嘱。此二月二十一日事也。比余至泗上，由泗上复趋郡，而捕官与卫弁之飞报一日而三至矣。盖以流民乘余出，有入城探视者，为州役所物色。而乡民亦陆续捕送十余人，遂有浪传流民欲率众夺狱者。人情汹汹，四门皆昼闭，使客尽从城外度，而道路纷纷，谓宿州煤徒乱矣。此二月二十八日事也。余心知其不然，然不可不速回以镇定人心。遂一昼夜驰三百里，至州则东方已曙。即令尽开城门，听人骑出入。余乃退卧，至日中方徐徐出。随取诸人环列庭下，令州民皆得纵视。才一鞫状，皆叩头曰，死罪有之，然实不敢为乱。煤久不售，困饿弥甚。贷米而人不与，反为所

擒。余因问，若煤今何在？皆曰，煤置各水次，露积，可验也。余因转一机曰，强抢法自当死，然使遵法者坐视露积之煤而枵腹就死，非情也。今民既不售，吾官为鬻之。汝辈即以此为路费归乡可也。即不然，一遵前示，立窑长，联保甲，与土著为一体，亦无不可。但久聚而不散，情形涉于抗上，吾即以若辈数人枭诸市曹矣。即于案间取木牌四面用朱笔书之。大意谓犯法无可生之路，有煤无坐饿之理。今使里老诚实者四人，赍钱百余贯。某人见在煤若干石，给钱若干文。鳞次听给。愿归者即去，欲留者报名在官，分派各里中，酌与荒地，量授牛种，成熟之后，一体征租，见擒十余人，分别情罪正法，不以蔓延。即呼前所擒者遍视之，度其稍朴实者四人，命荷牌以往。复令小吏备诵牌中之语，令之记熟，流民中不识字者，即以所记熟者诵之。且戒之曰，斛煤若搀越，领钱若喧哗，即持归，一钱不发也。汝四人持牌，可遍传吾意，仍执牌以复我，我贷尔罪。若不来，吾有法擒汝。倘众人俱尽散，独留汝四人无益。即与之俱往，吾不问也。四人皆感激垂涕而去。余复戒里老传语居民，倘煤徒取道还乡，而敢逞忿擅捕一人者，罪弗宥。仍令执牌者先往，赍钱者稍后，将及山，流民望见牌来，皆色变惊起，已乃见四人其同夥也，色稍定，竟问牌中何语。四人各传余所命，皆欢呼，喜出望外。因问，赍钱者何在？四人指后来以柜舁者钱也。则又欢呼，益喜出望外。间有一二人指煤度多寡为授钱计。而其中稍黠者互相计曰，吾向者恐州主之不我宥，而又知居民之不我容，故宁聚而图生，毋散而就死。今日即吾辈再生之会，且居民之意不可测，不如乘散钱之际，可以脱身。初时二三人相率下山，众犹恐为地方所捕，徐之，知其

无阻也，又百余人继之。稍间，复千余人继之。未及晡，而流民之散已尽矣。此三月初一日事也。

以下承燦记他处理此事前后，对形势的估计和决策过程。并从轻处分了被捕诸人。他最后指出：

惟何兴、宗楼业以土著乃为煤窝，饮食寝处，皆其图利之资，一方不宁，两人之肉，腥臊不足食也。而事发远逃，又为无法。必欲严捕，以正常刑。其所积之煤，斛有二千余石，流民既弃之以逃生，安可听土民攘之以为利。当责牙行变价输官，以抵睢阳驿新增夫马之费，不必更征之民间，亦足少纾宿民之困……时余已有职方之命，而当道属以为地方善后计，绸缪相度，至蒲月方得离州。北至淮阴，则已闻滕县巨野“妖民”之变矣。追念当日，流民聚而不散，声势响应，必至震惊陵寝。即使锋镝之余，抱恨而匿草野，亦必构“妖民”以煽乱，宿之为祸，可胜言哉！语云，痛定思痛，余回首并州，益不能不怦怦心动矣。遂略识梗概于广陵舟中，盖壬戌五月之二十二日也。

《符离弭变纪事》所记天启二年宿州采煤工人聚众闹事的经过，在晚明民变史料中，是相当突出的。在有关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中，也同样是较为突出的。过去的研究者所引据的史料，从徐一夔的《织工对》开始，占绝大比例的往往是有关纺织业的记载。从商人活动的角度进行观察，农产品的米、棉、茶、糖……手工业品的铁器、瓷器、造纸、漆器……都是转贩营利的对象，在封建经济发展繁荣的过程中，这些行当的发展、壮大，也

必然会伴随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雏形，但这方面的资料很不充分。至于采矿方面的材料，也同样缺乏。

明代官私文书、史料有关矿冶的记载，较多集中于铁、铜、铅、锡、金、银、水银等类，只是到了后期，才较多出现了煤矿开采的记录，多半集中于山西、河南一带。在冶炼业中，燃料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煤炭在燃料中所占比重，却一直较低，官营矿业也少有煤炭的经营。它主要是民营矿业的一种，而且是分散的、微弱的。祁承㸁所记的也不过是在宿州符离集地方煤矿的初步采掘；所谓矿工，也只是被灾荒驱赶离开家乡的“流民”——农村无产者。作为矿工对立面的也只是一些据有山地的地主。爆发斗争的时间也很短，前后不过数月。但是原始的资本主义经营手段的各种形态，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在这里已具体而微地显示出来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付矿工斗争所采取的种种对策，也有详尽的说明。文字细致、生动，作为三百五十年前的一篇“社会调查报告”，虽然出于封建官僚之手，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作者是亲临其事的地方官，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待一切，但作为史料，出自第一手的原始纪录的价值，是无疑的。

作者的观察仔细，他记下了当时采煤的操作过程。有在井下操作的采掘工，有提升工具（辘轳），有运煤工。一口窑要四十多人合作进行操作。

煤矿最早发现在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初期采煤者不过几十人，过了五六年就发展到三千人左右。这说明纳入了商品经济之后，民营矿业得到的迅速发展——“行煤之地益广，取煤之利益多”。这时窑数也增加到了七十多个。这发展速度是值得注意的。矿工与有山的窑户之间的关系，虽然原始，但也无疑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提到工资，但“仰衣食于山

主”，实质上是一样的。劳资双方的矛盾积累起来而且逐渐扩大了，也必然出现了矿工中的领袖人物，就是所谓“欲自雄”的“黠有力者”。许多山主之间也采取了压制矿工的联合行动，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断绝生活资料的供应，同时还切断了商人采办煤斤的活动。矿工的“聚众闹事”，就是这样引起的。

斗争过程写得也很清晰。矿工之间的团结是紧密的。虽然在祁承㸁看来，“此辈惟团结如蜂蚁，且臂棍与铁圈，亦非临阵之物。”但统治阶级还是怕得不得了。宿州只有民壮五十人，乡兵百余人，如何对付得了三千名矿工？祁承㸁自己写出了他故作镇静、色厉内荏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的上峰督抚漕台等人的张惶失措，议论纷纷。这一切正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摇摇欲坠的朱明王朝的生动写照。

从祁承㸁提出的上中下三种对策，更可看出统治阶级的思想状态。他们惟一希望的是流民能各归故乡，矛盾暂时缓和，就算上上大吉。至于因势利导，发展生产，只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中策。那位按台大人，从开辟税源的目的出发，居然也赞同此议，但寡不敌众，“自各台以及道府，一以解散为得策”，终于放弃了。他们最怕的是组织起来的农村无产者，为了这个，是会放弃任何有利于繁荣发展的新措施的。这是长期来明朝中央政府争论不休的议题。他们总是担心这些“棍徒”、“奸细”、“矿夫冗役”难以控制，宁愿关闭矿山，以免生事。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决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等到封建社会晚期才出现的。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能为新生的生产关系幼芽提供成长的条件；也由于统治者的种种考虑而受到阻碍。从祁承㸁的叙述里，是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些因素的。

而最早的无产者没有经验，比较软弱，在统治者的摆布之下，斗争被窒息，团结被瓦解，那更是无足深怪的了。

从祁承㸁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最使他头痛、要花大力气对付的，是所谓“州民”，也就是地主豪绅的别名。他们中间与“煤徒”相结的二三土豪在衙门中安排了爪牙、耳目、“内线”；“缙绅父老”们则造舆论，起事端，施加压力，惟恐州官不采取镇压的“下策”。他们和那些山主串通一气，或竟是一伙。特别是“以土著乃为煤窝，饮食寝处皆其图利之资”的那些人，才是矿工们的直接的对立面。他们千方百计要州司马执行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政策，这正是当然的。这正说明了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的手法。而虽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员的祁承㸁，并未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也许就是他还不失为封建社会较好的官吏的原因。

《符离弭变纪事》也曾收入《澹生堂全集》。原书“迷失”了，无从对校。史贵初文，还是这初刻单行的别集比较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也更可作为研究依据。

附　记

春秋时宿国，在今山东省东平附近，与宿州之宿，并无关涉，疑祁氏误为一地。唐时宿州附近有甬桥，即埇桥，在宿州南，跨古汴水，为交通要道。“甬上”当指此。符离，秦时即置县，治所在今宿县东北；唐初迁治所于今宿县北之符离集；元和中再迁至今宿县县城，且于同城并设宿州。符离县废于蒙古时，独留宿州，今改宿县。徐溪，不见于今地图中。同治中胡林翼、严树森合刊《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中于宿州西北有徐溪名，云是宿州州

同驻地。其地实即今之濉溪口，亦即安徽濉溪县。地在州之西北而非东北，且不只三十里。疑祁氏误记。今濉溪县少北设淮北市，有淮北煤矿，当即天启中采煤之地。宋疃、白塔山，今地图中俱无之，只有宋町一名，或即一地。以上皆得丹枫老师指教，特附说于此。

《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

在距今三百十年以前，明崇祯甲申以后一年，南明弘光的小朝廷抵制不住南下的清军，金陵陷落了。福王北去，潞王监国。江南一隅陷入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吴越一带的人民，纷纷起来组织义师，向侵略者进行反击。特别在浙东，明遗民的活动就来得更为频繁而有力。这之间，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士大夫的倡导与鼓动，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

清军的统帅索罗（又称贝勒）在渡江以后，就进行收买、利用明朝旧臣的活动。想借他们的声望来收拾残局，巩固清朝的统治。有不少人就在这种局面下出来做了“二臣”，尽了替异族统治者铺平道路的作用。人民对这些人是仇恨、鄙视的。相反，对另外一些坚贞不屈的人则表示了最大的敬意，始终尊重、纪念着他们，把他们当做民族斗争的旗帜。

甲申、乙酉以还，在浙东一隅就出现了不少出色的人物。像张苍水就是毕生坚持了斗争，一直战斗到死的；另一些人则拒绝了清军的聘请，用自杀的方式表示了自己对明朝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对民族的忠诚。山阴祁彪佳就是殉节明臣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隆武在福建，追祭他和刘念台（宗周），予谥“忠

敏”，鲁王监国以后，赠谥“忠毅”，就连异族统治者也不能不顾及人民的意愿，对他进行了并非出自本心的表扬，乾隆中给了他一个专谥“忠惠”。这是后来有许多分歧称谥的原因。就连究心晚明史籍，想替彪佳重编遗集的傅节子，也还称他为祁忠惠公。这不用说是极不妥当的。他用死拒绝了敌人的征聘，却不料在身后却被迫接受了清朝的封赠，自己则完全失去了抗议的资格，真是比鲁迅先生所说“与其被混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更为严重的悲剧。

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是明代山阴名藏书家祁承㸁的儿子。生于万历三十年壬寅，十七岁中了举人，二十一岁成进士。以后在福建做过推官，在北京做过御史，在苏松做过巡按。在明朝覆亡以前不久又到了北京，参加了当时最激烈的政争，冒了极大的危险疏参吴昌时。北都倾覆的时候他正好在南方，就又参加了南都拥立的大计。又在危难之中重新抚按江南一带。弘光乙酉卸职家居，南京为清军攻陷，他在家乡和友人计划恢复的大计，黄石斋向潞王建议，让他出来做苏松总督，组织对清军的抵抗，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北骑即已掩至。家人朋友都劝他到杭州去见清军的统帅贝勒，保全一家的生命财产。可是他自己不肯，在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以后，终于在乙酉闰六月初六日五鼓，自沉于寓山花园的池水中了。临命以前手写遗书，词句安详而立场（民族立场）坚定，安排后事、劝导家人都入情入理，实在是值得佩服的。①②

他死后不到一月，东江就起兵了。他的弟弟、儿子都参加了抗敌的斗争。③④对殉国遗臣特赐祭葬。⑤这些抗争虽然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可是并不曾彻底扑灭了仇恨的火种。山阴梅市祁家成了大批志在恢复故国的人们的逋逃薮。他们不但在浙东一

带策动起义，而且和海外的义师也有着联系。这中间就有彪佳生前极为赏识的慈溪人魏耕，成了祁班孙极好的朋友。[6][7]

祁理孙字奕庆，祁班孙字奕喜，是彪佳的两个儿子。因为大排行的关系，被称为祁五、祁六两公子。父亲的殉国激起了他们为君父复仇的激情，和魏耕一起计划恢复的大计。活动失败了，不听长辈的劝告，依旧坚持下去，毁家纾难，毫不吝惜地呈献出了家族的财产。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一切措施，都抱着反对的态度，不承认新朝的正朔，不参加新朝的考试，认为这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对不顾名节热心利禄、死抱着时文不放的知识分子，是深恶而痛绝的。[8]

到了康熙壬寅、癸卯之间，祁氏终于被叛徒出卖遭到了破家的惨祸。详细的经过今天已经不能知道，只在全谢山的集子里还保存了大略的记载。[9]祁氏姻戚杭州小山堂赵氏也有过一些记述。[10][11][12]那结果是极为悲惨的。班孙被遣戍辽左，哥哥理孙纳了贿，得被放免，家里也完全破产了。[13]

由于当时“禁网尚疏”，班孙在康熙丁未逃回江南，却不敢回家，在吴之尧峰祝发出家。后来又主持毗陵的马鞍山寺，称呪林明大师。还不时与哥哥家族往还，不过这也只能在极秘密的方式下进行。因为家破虽已数年，但流言到底也还不少的缘故。[14][15][16]

祁家是有名的藏书旧家。澹生堂的藏书，在明代的浙江是和会稽钮氏世学楼、四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祁彪佳生前又做了不少增益，祁理孙也是喜欢藏书的，祁家三世藏书的数量和范围，都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藏家的。

乙酉乱后，祁家的藏书先搬到了化鹿寺。[17]直到康熙丙午之前，还没有大批的散佚，不过祁理孙因为佞佛的关系，晚年不大

注重，书籍零碎地被沙门赚去了不少。[18]大批的流散，是始于黄梨洲和吕晚村的大担捆载、论秤而出的那一次。[19][20]甚至为此还引起了黄、吕的争执，成为清初儒林的一段有名的公案。[21]吕、黄两位是道学家，所注重的大抵是经部和子部儒家之类的书，后来朱竹垞又到山里去看了一次劫余的藏书，就发现了为黄、吕所不取的元明以来传奇八百余部。这是我们所知有史以来私人收藏中最大的一个曲藏。[22]

祁承㸁《澹生堂书目》十二著录戏曲只有《古今杂剧》二十册，《名家杂剧》十六册，可是在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目录》里却著录了"《名剧汇》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杂剧》十四本（无目）；未订杂剧二帙（无目）；抄本《杂剧》十二本（无目）"（据郑振铎先生引文）。这虽然赶不上朱竹垞所见的八百余部之多，到底也比祁承㸁的收藏多了不知道多少倍了。这些新增的曲本，可以断定都是祁彪佳历年收集的。

祁彪佳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不是偶然的事。

他出生在一个有浓重文学艺术气氛的官僚地主的大家庭里。父亲是爱书如性命的藏书家，妻子儿女都喜欢作诗，对文学有着非凡的爱好。[23]从兄祁止祥更是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特别精于戏曲。[24]中表张宗子也是讲究演戏的。彪佳自己更喜欢看戏，平日所看的戏，都详细记在《日记》里。[25]他的弟兄中间，祁麟佳作有《太室山房四剧》（《救精忠》、《红粉禅》、《庆长生》、《错转轮》），祁豸佳作有《眉头眼角》、《玉犀记》，祁骏佳作有《鸳鸯锦》。彪佳本人也作有《全节记》、《玉节记》[26][27]和一些散曲。他不但喜欢看戏、作曲，而且历年还大批搜购曲本，在北京时曾经计划收买徐迎庆家藏的一批词曲，在苏州的时候，又和当时俗文学的大作家冯梦龙来往，访求当地曲家的著作。[28]历年收集，收藏了大

批的戏曲作品，[29]朱竹垞在云门山寺里看到的，一定就是彪佳的曲藏。

这一批曲藏的散失，是极可惜的。可是彪佳的两本稿本《远山堂明曲品明剧品》却保留下来了，它替这个曲藏保留了一个粗略的面目。两品所著录剧曲，共六百七十七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拿来和明代的吕天成、清中叶的姚梅伯和近人王静安的著录比较一下，保留了未经著录的剧曲达三百七十六种。《也是园旧藏古今元明杂剧》的发现，为元明杂剧（主要是元人）增添了一百三十五种孤本，那么《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发现，就为明人剧曲增添了更多的著录，虽然那原本大抵是失传了的。

祁氏《曲品》编录的方法和精神，都见《凡例》中。值得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他是很有文学素养的人，特别看重俗文学作品。这不只说明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著作，更足以说明他能够保留当时不为人重，因而作品散佚的俗文学作者的大量作品著录的原因。同时，他不但自己能够度曲，对曲律有很高的素养，更因为家里就有着演员，自己是也能导演的。所以他的批评，就不只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而且也是站在导演和演员的立场上的。

其次，他的著录尺度，要比吕天成宽得多，只要是少有可取，就不肯埋没作者的劳绩，这就保证了著录出色的丰富。

剧曲作者，在旧时代是一向不受重视的。在这两本著录里，却多少保留了撰人姓氏和一些零星的记事，这在我们也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

《剧品》是清录稿本，《曲品》则经过作者蓝笔墨笔两三次修改。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戏被作者抽去，又安排在另外的地方，虽然同在一品之中，次序先后也是几费斟酌的。这就完全可以说

明作者选择品评态度的严肃。

我开始看到明山阴祁氏澹生堂遗书是一九五一年冬天的事。

有一天，一书友郭石麒告诉我说，在杭州看到一部不全的澹生堂抄本书，价钱很贵，问我可要看看？我就请他把样本寄来。过了一个星期，书果然寄来了，是远山堂黑格抄本的尺牍底册，当时并没有重视，还了一个价钱，就把书寄回去了。

第二年的春天，郭君又来告诉我说，几月前所看到的抄本，现在还在杭州。那是杭州旧书业联营组织从绍兴买来的。绍兴的书商则是直接从梅市祁家论斤秤出的，的确是澹生堂的藏书。书不只一部，目前因为营业不好，那个联营组织要拆伙了，希望能把这批书卖掉，价钱则可以商量云云。

同时他还带来了一部活字本的《祁忠敏公日记》，翻开后面的《祁氏遗书记》来给我看。原来远山堂就是祁彪佳的寓山堂名，而那些尺牍底册也都记载在那里。这下子引起了我很浓厚的兴趣，就陆续买了一些，这里面有“聊尔编”格子的写本《易测》和《老子全钞》，是祁承㸁的手批阅本。有祁骏佳手订的《重编澹生堂文集》八卷底本，和一些别的残本。

从这时开始，澹生堂遗书就开始在上海大量出现了。绍兴的书商也直接陆续把书运到了上海。这时期曾经出现了澹生堂旧藏的万历以后的《乡试录》若干册，明刻精图的戏曲总集《柳枝集》、《酹江集》等，我却没有机会看到。原因是这些书很容易脱手，一般人都肯定它是善本的原故。

这个时期我所见到的是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祁氏藏书，如万历本的《指月录》是祁理孙（奕庆）和祁班孙（奕喜）的手批本；

祁骏佳的《禅悦合集》残稿等，我也都陆续留下了。

同时，旧书估人也到绍兴去访书，回来以后就通知我去看书。我则往往每次都几乎全部留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估人的顾虑，不致把认为“无用之物”的书册送进还魂纸厂。这样买来的书，自然祁氏藏本所占的比重是很少的，而且也包含了大量的普通书和残本。但是这中间也往往有一二好书，如祁承㸁手批的《通鉴前编》，祁班孙（奕喜）手批的《唐宋文钞》，残本《吴越诗选》（魏耕、朱士稚、钱缵曾选，顺治中冠山堂刻），后者包含了大量的明清易代之际诗人的作品，如吴梅村诗即有全集削去的作品，而祁氏群从的诗作，从商夫人景兰以下，所收也最多。

这以后，澹生堂遗书的价钱逐渐高起来了。注意的人也更多了。在一九五二年底，古董铺的估人拿来了祁彪佳《救荒全书》稿本十数册，毛订原装，手迹累累，而且每卷都有三次校读的年月题名，是著录于《祁忠敏公日记》的名书；此外就是启元社黑格抄本的《曲品》和《远山堂文稚》，还有祁承㸁致诸子手札原迹的卷子，明人画绢本江苏北部的《地域图》，以及远山堂抄本的《尺牍》等。索价甚高而且要合售。这批书在我手边放了两三个月，终于买不起。只草草抄下了《曲品》的大略，收进我自己一本《西厢记与白蛇传》，做为附录发表了。

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冬天，我又从第一次告诉我澹生堂遗书消息的郭石麒君那里买到了《明曲品》的稿本和另外一本《明剧品》，这真是使我大喜逾望的事。不料在已经残佚了的抄稿本外，还有原稿本；而且不只记录了明人传奇也同样记录了明人杂剧。这就有可能使我从事校录的工作，稍有余闲就用吕天成的《曲品》、高奕的《新传奇品》、姚梅伯的《今乐考证》和王国维的《曲录》加以排比、校录。陆陆续续，时做时辍，直到今年冬天，才

初步草完。同时因为发现了更完整的新资料，也就把《西厢记与白蛇传》的附录在再版时抽去了。一些朋友写信来问《曲品》全稿的，也没有一一答复，总希望早日将这不成熟的校录本公之于世，满足读者的期望。这中间也曾经有些朋友劝我不必出版这书，他们的好意是值得感谢的，可是我还是把它印出来了。由于学养的荒落，掌握资料的贫乏，这个初步的校录工作也只能做到目前的样子。为了提供学术研究的新资料，使这部湮沉了三百年，由于时代因素而“畏祸避仇不敢刻”、“遭难破家不能刻”的重要作品，在人民的时代里重见天日，因此也就放下了一切的顾虑。

以上是澹生堂遗书和《曲品》、《剧品》发现的经过。在这里也附带说明一下，不是想仰攀莞圃，做赏鉴家的藏书跋尾，有时为了说明事实，这原来也还有一些用处的。因此也就希望读者宽恕这里的饶舌了。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记

---

① 张岱《琅嬛文集》稿本，《和祁世培〈绝命词〉》：

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麦秀在故宫，见之裂五内。岂无松柏心，岁寒奄忽至。烈女与忠臣，事一不事二。掩袭知不久，而有破竹势。余曾细细思，一死诚不易。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志。十五年后死，迟早应不异。愿为田子春，臣节亦罔替。但得留发肤，家园总勿计。牵犊入徐无，别自有天地。

按：徐芳烈《浙东纪略》记：闰六月初五日（乙酉），原任苏松巡抚山阴祁彪佳养病里居，北兵至浙，以书来聘。公处分家政，作《绝命词》别宗亲曰：时事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犹是后念，未免杂于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浪贪余生！况生死旦

暮耳，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虽然，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予硜硜小儒，惟知守节而已。前此却聘一书，自愧多此委曲。然虽不敢比踪信国，亦庶几叠山之后尘矣。临终有暇，再书此数语，且系以一诗，质之有道。

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鼙鼓杂江涛，干戈遍海内。我生何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贽为人臣，之死谊无二。予家世簪缨，臣节皆罔贽。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欢然饮宴，无异平时。肃衣冠，投于寓园放生池柳树之阴，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颜色如生。

查继佐稿本《罪惟录·致命诸臣传》卷十二下，《祁彪佳传》引彪佳遗书曰："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十五年前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深心达识者，或不在沟壑自经。若余硜硜小儒，惟知守节而已。"遗诗一章曰："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我生胡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贽为人臣，之死谊无二。光复或有时，图功当时势。图功何其难，殉节何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按：遗诗当不只七韵，故书所引，各有缺略，当比观之。

② 商景兰《锦囊集》收《悼亡》诗二律：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③ 《鲒琦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忠敏死未二旬，东江起兵，恩恤诸忠，而忠敏赠兵部尚书，理孙赐任。祁氏群从之长曰鸿孙者，故尝与忠敏同讲学于蕺山，至是将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饷之。事去，公子之妇翁戒之曰，勿更从事于焦原矣，不听。"

④ 明山阴王茂远稿本《柳潭遗集·条陈浙西事宜疏（代）》（乙酉）："……臣熟思三月，每有端倪，辄以他挠。昨与镇臣郑遵谦、张名振，部臣钱肃乐，科臣祁熊佳细酌熟筹，业有头讫……"

⑤ 明山阴王茂远《柳潭遗集·为义兴军祭殉难祁中丞公彪佳文》："呜呼，当天地屯遭之日，属宗枋板荡之秋。洫血无戈，盟心有剑。留千秋之高碣，轻一死于清流。名岂不成，人其可惜。故自先生致命从容之日，即为吾党呼天

莫助之时。夫信国未亡，呼声南剑，绛侯尚在，左袒北军。假公逊志深山，留身今日，投戈奋袂，必不逾时。此逆虏之所魂消，而同盟借其袖领者也。乃夫天祐将来，叠山告殁，身归日月之傍，气有河山之壮。遂使缙绅之所未为，布衣于焉独任。呜呼，祖鞭未着，中流之楫影何追，宗泪频挥，渡河之呼声未远。”

⑥ 《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祁氏自夷度先生以来，藏书甲于大江以南，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慈溪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当，以为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则与之誓天称莫逆。魏耕之谈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饮，礼法之士莫许也。公子兄弟，独以忠义故，曲奉之。时其至，则盛陈越酒，呼若耶溪娃以荐之，又发澹生堂壬遁剑术之书以示之，又约同里诸遗民如朱士稚、张宗道辈以疏附之。”

⑦ 《鲒埼亭集外编·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赘婿侨归安。递充归安学弟子。后改名耕，别字白衣。又改名更称雪窦山人。白衣少负异才，性轶荡，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阴祁忠敏公器之，为遍注名诸社中……既丁国难，麻鞵草屦，落魄江湖，遍走诸义旅中。当是时，江南已隶版图，所有游魂余烬，出没山寨海槎之间，而白衣为之声息。复壁飞书，空坑仗策，荼毒备至，顾白衣气益厉。方张司马败北时，延平出海，大江路断。司马踯躅，计无所之。白衣遮道上书，犹陈金陵形势，招集散亡，入焦湖为再举计。语在司马《北征纪略》、屈翁山《成仁录》。司马既遁，当道颇闻白衣前策，游骑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潜行，望门投止。家大父《怀所知》诗有‘廿年热血埋鸳井，万里桑田寄柳车’之句，即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语连白衣。白衣遁至山阴，入梅里祁氏园。时忠敏子班孙谋募死士为卫，间道浮海。卒为踪迹所得，缚到军门，抗词不屈，死于会城菜市。同时与班孙匿白衣者，山阴李达、杨迁，并戍边外。”

⑧ 明刊《唐宋八大家文钞》二十八册，祁班孙手批阅本。有藏印曰“道僧”、“五云头陀”、“班孙印”、“班孙”、“奕喜印”等。朱墨笔圈点，每文后有评语，间

附记事，题属作“剩国子”、“剩国主人”、“喜道人”。《韩文》卷十有记云：“夏孟尽阅于平原楼，仲初因乱至梅市。”后题一诗云：“竹光楼转月来初，弃印虞卿漫著书。潦倒原因胡市异，复堪白马遍闲居。”下题：“无空子记四月晦日事。”《欧文·与荆南乐秀才书》后记：“宋时文尚近古，今之时文直废却一篇浑厚正大议论，方为合作。为功名者无可奈何，今日正可做一种有用文章，乃有一辈口说忠义，而以为废却时文无可言文理者，可羞可耻可恶之极。顺时二字，乐子受教多矣，吾辈亦受教多矣。”《欧文·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后题：“一味慷慨孤愤，真是范公幕下士。欧公以四六得进士，及第后即不屑为之。今人以时文得进士，则恋恋不舍，犹如贫儿得食，以为至宝。而不知世间止有一种大受用处也。况宋欧公犹是学时之际，今日处变革之时，已有欲翻然改图者，而反以言语惑之，真是道学中一罪人矣。余初颇有志作戒制举文说，奈卑不可以敌尊，贱不可以语贵。奈何，奈何。且今之虏秀才，必非不能时文者为之。使世间人尽不学时文，则虏庭无一文士，亦可为先朝争气。是当劝止之不暇，而反惑动者何也。不作时文，是其志必不欲为秀才矣。此亦一明睹也。”《欧文·集古录自序》后题：“予家自夷度公至于先忠敏，虽不能如欧阳公、王廷尉，然亦不为之下。阅聚而必散之语，使人惕然。祖父所遗而失之于子若孙，可不惧哉！至于兵火所加，亦将尽心于是，力竭而不足，则天之命乎。”

按：商景兰《锦囊集》有《坐剩国咏菊》诗，祁德琼《未焚集》有《坐剩国书室》诗，《锦囊集》更有《忆秦娥》词，题《初春剩国忆子》：“莺声咽，柳梢烟月梅梢月。梅梢月，谁家玉笛，十分凄切。迢迢子去伤离别，空亭寂寞愁心结。愁心结，梨花飞碎，香飘尘绝。”

按：此商景兰忆次子班孙词。剩国书室或简称剩国，班孙读书处。

⑨ 《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壬寅，或告变于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苕上乃其妇家，而山阴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啸聚。大帅亟发兵，果得之。缚公子兄弟去。既谳，兄弟交争承，祁氏之客谋曰，二人并命，不更惨欤！乃纳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辽左。其后理孙竟以痛弟，郁郁而死。而祁氏为之衰破。然君子则曰，是固忠敏之子也。”

⑩ 赵东潜《九方集·旷亭读书图歌》：“山阴祁氏华族良，蓬莱清浅驹隙忙。翩翩公子年少郎，自许忠义酬先皇。一朝运去势难挽，弟兄争坐甘斧戕。竟

遣其季戍辽阳，从此林亭日益荒。旷亭无复曩时望……”

⑪ 赵一清《东潜文稿·重书旷亭记》：“旷亭者，山阴祁氏旷园之亭也。王百谷为夷度使君书。使君讳承燦，世所称澹生堂主人者也。再传而为忠敏都院，是余王母朱太君之外祖。又传而为理孙、班孙，世所称祁五、祁六两先生者也。班孙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殉节，六先生遣戍辽阳，已而毁服为僧。”

⑫ 赵一清《东潜文稿·外氏世次记》：“浙东朱氏，有明望族。少师尚书，余王母曾大父也。公之孙子升公，余王母所自出，娶同邑忠敏祁公女。故余王母实为祁氏甥。朱氏自少师以勋伐起家，名垂竹帛。而祁氏之先参政公讳承燦者，构澹生堂，藏书甲海内。忠敏公以儒雅饬吏治，婚姻是缔，阀阅侔高。公子理孙、班孙，文章世德，号称学者。王母尝为某辈言，少时见诸姑伯姊，岁时过从，笺题酬唱，娴令有则。风规礼法，彬彬盛矣。暨乎忠敏殉节，六先生又坐事遣戍出关。向所谓寓山园者，已舍之佛徒。荒尘凝坐，遗像长悬。梵呗斋钟，空山答响。”

⑬ 旧抄本钱塘张槎云《琴楼遗稿》，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卷前有山阴商景兰撰序：“余七十二岁嫠妇也。濒死者数矣。乙酉大中丞公殉节，余不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辛丑岁次儿以才受祸，破家亡身，余不即死者，恐以不孝名贻儿子也。未亡人且老，乌能文，又乌能以文文人耶？但平生性喜柔翰，长妇张氏德蕙，次妇朱氏德蓉，女修嫣、湘君，又俱解读书。每于女红之余，或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遇才妇淑媛，辄流连不能去……”

又山阴朱德蓉赵璧氏撰《张槎云诗集后序》：“……因念余生不辰，罹十六年颠沛迍邅，极人世所未有，今且茕茕称未亡人。昔日之触景增悲，间或托于词章以志慨者，虽未敢以诗自名，然亦余志之所在也……”

按：此两序撰于康熙丙辰，辛丑后十五年，乙酉后三十年，景兰年七十二，与《明诗综》所记适合。班孙生崇祯壬申，辛丑年廿九岁，遣戍出关。下推丙辰，正十六年，张序所谓十六年颠沛迍邅者亦正合。据全祖望记，班孙逝于癸丑，朱氏撰此序时，已在四年以后，因有“茕茕称未亡人”之语。

⑭ 《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当是时，禁网尚疏，宁古塔将军，得赂则弛约束。丁巳(?)，公子脱身逃归，已而里社中渐物色之，乃祝发于吴之尧峰。

寻主毗陵马鞍山寺，所称呪林明大师者也。荐绅先生皆相传曰，是何浮屠，但喜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及先朝，则揜面哭。然终莫有知之者。尝偶于曲篷座上，摩其足而叹曰，使我困此间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绕堂曰，我将西归。入暮跏趺垂眉，久之，既又张目，久之始卒。发其箧，所著有《东竹风俗记》、《紫芝轩集》，且得其遗教欲归祔，乃知为山阴祁公子，自关外来者。于是得归葬。”

按：丁巳当作丁未。

⑮ 《水月斋指月录》三十二卷，万历辛丑严澂刻本。祁理孙、班孙朱墨蓝三色笔批注几满。藏印有“藏书楼经籍记子孙世守”（白文大方印）、“智昙”（白文扁方印）、“钵公”（朱文扁方印）、“奕庆藏书”（朱文方印）、“法名智昙”（白文方印）。卷二十五“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条上朱笔眉批云：“读楷师章不禁潸然泪下。忆我昼林林，遭无妄，远流绝域，事虽不同，非其罪一如楷师。得法开堂后，隐居之所亦名芙蓉湖。四众问道听法，不期而至者日益众，亦一如楷师。第法语应机，较楷师更觉隽永耳。湖四面皆水，非隔水呼舟不能渡。中唯小屋三间，供佛一亭在右，可容五六十人。故来学者多露处。晚则仍以舟渡彼岸，寄宿村民，次日又至，以为常。林自题其亭柱曰，本是潇湘钓客，自谓羲皇上人。盖取师子端自西自东自南北渔父词中意也。噫，其心固了彻旷达，其言则怆然可痛也。”

⑯ 祁理孙手批本《水月斋指月录》卷九，“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条上朱笔批曰：“壬子夏在夫山，偶与昼林和尚阅《五灯》，昼公忽掩卷问曰，丹霞烧木佛一则，阿兄作么看？予口占一偈曰，木佛一时烧却，千秋庆快非常。管取院主须眉，莫乱时人眼光。昼公曰，美则美矣，忒煞明破。予曰，某只如是，和尚作么生看？昼公亦口占一偈曰：丹霞烧木佛，天阴赤脚行。院主须眉堕，生铁变黄金。彼时互相酬唱，不以为乐，今乃不可复得矣，能不悲夫。”

⑰ 化鹿山，祁氏茔墓所在地。有寺名化鹿寺。承燦既逝，彪佳守制家居读书，每于卷耑有“读于化鹿寺墓舍”纪事。

⑱ 赵昱《春草园小记》：“吾母见之，复凄然曰，六舅父坐事遣戍沈阳，旋出家为僧，终于戍所。五舅父暮齿颓龄，嗜书弥笃。焚香讲读，守而不失。惜晚岁以佞佛视同土苴，多为沙门赚去。”赵东潜《九方集·旷亭读书图歌》：“五先生者实家督，守兹群典侔琳琅。学佛成仙学道死，鸾骖雀驭双翱翔。桀黠

窥伺谋夺之，儒林欢咋滋纷争。”

祁班孙《紫芝轩逸稿》有《奉和雪窦顾五兄藏书楼（时兄专攻禅诵，精辨梵文）》一题。又《祁忠惠公遗集》沈复粲跋引魏雪窦《今诗粹》中语：“雪窦尝曰，予每至梅市，与奕喜读书紫芝轩，而奕庆不一省顾。作画之外，唯焚香瞥佛。向作诗千余篇，悉毁弃之。不欲堕文士习。盖沉冥不返者，宜其流传较少也。”

⑲ 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东都事略》，山中所存惟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厨也。”

⑳ 康熙吕氏南阳讲习堂按真迹抚刻本《晚村家训》卷四有诗帖一幅。题“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祁氏参临济宗）。”

㉑ 《鲒埼亭集外编·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吾闻澹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人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社学究尚有推奉之，谓足以接建安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矣，而潭未清。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澹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之一笑者也。然用晦所借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

㉒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二：“参政（承煠）藏书，将乱，其家悉载至云门山寺。惟遗元明来传奇多至八百余部，而《叶儿乐府》不与焉。余犹及见之。其手录群书目八册，今存古林曹氏。寺中所储，已尽流转于姚江御儿乡矣。”

㉓ 《明诗综》：“商景兰字媚生，会稽人。吏部尚书周祚女，祁分彪佳之配。祁、

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莅、德渊、德琼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

《吴越诗选》二十二卷，顺治中冠山堂刻。题慈溪魏耕雪窦、山阴朱士稚朗诣、归安钱缵曾允武仝选。卷二十二为“名媛诗”，选商夫人景兰（彪佳室）、祁德莅（字湘君，彪佳女）、张德蕙（字楚缜，祁理孙室，彪佳冢妇）、朱德蓉（字赵璧，祁班孙室）、祁德琼（字修嫣，彪佳女）诗。

《两浙輶轩录》卷三祁鸿孙下引孙度云：“梅市祁忠敏一门，为才子之薮。忠敏群从则骏佳、豸佳、熊佳，公子则班孙、理孙、鸿孙，公孙耀征；才女则商夫人以下，子妇楚缜、赵璧，女卞容、湘君。阃门内外，隔绝人事，以吟咏相尚。青衣家婢，无不能诗。越中传为美谈云。”

㉔ 周亮工《读画录》卷一有“祁止祥”一条：“祁止祥豸佳，山阴人。行五，世培中丞之从兄，予同门文载之胞兄也。丁卯举于乡，数人春明不得志，常自为新剧。按红牙，教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箫和之。借以抒其愤郁。甲午冬，送予北上，过金陵，留予家一月。至维扬始返。舟中为予作山水花卉四十叶，又别为数小页，留一诗别余。曹顾庵曰：止祥书不在董文敏右，画则入荆关之室，诗文填词皆有致。能歌能奕，能图章，以至奕钱蹴踘之戏，无不各尽其致。以名孝廉隐于梅市，盖异人也。”

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踘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谓此西方迦陵鸟，何处得来？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榄，咽涩无味而韵有回甘，如吃烟酒鲠饷，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阿宝辈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归。遇土贼，刀剑加颈，性命可倾，至宝是宝。丙戌以监军驻台州，乱民卤掠，止祥囊箧都尽，阿宝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归，刚半月，又挟之远去。止祥去妻子如脱蹝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

祁彪佳《归南快录》，崇祯乙亥八月十一日条：“止祥兄于灯下作鬼戏，眉面生动，亦一奇也。”

祁彪佳《甲申日历》正月十三日条："举酌四负堂，观止祥兄小优演戏，诸友亦演数出。"

祁彪佳《乙酉日历》六月初一日条："薄暮抵寓山，知止祥兄已从南都避难归。亟至旧宅看之。止祥兄尚有歌者携归。时文载弟留酌，遂欲演戏，予力阻而罢。"

张岱《琅嬛文集》，祁奕远《鲜云小伶歌》："世间何事堪搔擎，好月一轮茶一碗。更有清讴妙入神，三事虽佳难落款。鲜云小傒真奇异，日日不同是其戏。揣摩已到骨节灵，场中解得主人意。主人赏鉴无一错，小傒唤来将手摸。无劳甄别费多词，小者必佳大者恶。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无其精。老腔既改白字换，谁能练熟更还生，出口字字能丢下，不配笙箫配弦索。曲中穿渡甚轻微，细心静气方领略。伯骈串戏噪江南，技艺精时惯作态。铜雀妙音今学得，这回真好杀罗二。"

㉕ 《祁忠敏公日记》中有关戏曲纪事，汇录如次：

《涉北程言》（崇祯辛未，在北京）

十一月初十日："步至前门，买《历朝捷录》及传奇二种。"

十一月十四日："予方危坐，阅《犀轴记》，有感于沈公青霞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炉坐有感，因与圣鉴、安然言，古人有以爱妾换马者，予昨得王觉斯诗，不忍释手。倘挟艳姬，便当易此。安然以题极佳，不可无词，乃刻烛共搆《渔灯儿》一套。漏下三商，已可歌矣。安然次成之，圣鉴又次成之。"

闰十一月初五日："沽酒御寒，觉余兴未已，乃忆予初度之日，郊游颇畅，作《字字锦》一套记其事。韵险而调复涩，成半即就榻。"

闰十一月初六日："灯下始理前曲，不一鼓卒成之。"

闰十一月十七日："姜仁超来访。姜言其乡有徐君迎庆，徐相国之孙，善词曲，其所蓄甚富，当为予构之。"

闰十一月十八日："怂恿圣鉴、安然两兄作北剧，以资谐笑。盖两兄以能词啧有声也。偶阅蔡文姬传，因以《胡笳十八拍》令安然谱之。"

闰十一月廿九日："圣鉴思作剧，苦无佳题。乃就陈伯武借《艳异编》阅一过，皆儿女子态。圣鉴以其非英雄本色也，乃别为《桐江老》一传。"

闰十一月二十日："拥炉谱牛秀才《周秦行纪》一事未成。"

十二月二十五日："柳白屿至，出《乘槎》剧示余，读未竟。"

《栖北冗言》(崇祯壬申，在北京)

正月初八日："欲观灯市，乃从长安门并辔行，至则市物尚未集，惟买《洪武正韵》及《雍熙乐府》二书。"

正月十二日："晚与子木阅《雍熙乐府》。"

二月十二日："王云莱以《离魂》剧见示，随手复之。"

三月十四日："门役云，叔度在邻家，遂邀之，方与评陈自营新作剧。"

四月十六日："余与(黄)王屋独酌，观韦南康剧。"

四月二十六日："阅《珍珠衫》剧。"

五月十二日："赴刘曰都席，观宫花剧。"

五月二十日："至酒馆邀冯弓闾……观半班杂剧。"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十六日所观剧：

《紫钗剧》、《琵琶记》、《玉盒剧》、《回文剧》、《彩笺半记》、《一文钱剧》、《西楼记》、《异梦记》、《宝剑记》、《蕉帕记》。

七月十九日："即赴朱佩南招，在净业寺之左，同席为何象岗、张三峨、张尔唯，观小戏如《弄瓦》等，技皆绝神，为之解颐。"

八月初三日至十二月廿五日所观剧：《教子剧》、《双珠传奇》、《教子传奇》、《拜月记》、《异梦记》、《祝发记》、《明珠记》、《散剧》、《春芜记》，《明珠记》、《香囊记》、《百花记》、《连环记》、《檀扇记》、《红拂记》、《彩楼记》、《八义记》、《石榴花记》、《牡丹亭记》、《合纱记》、《玉合记》、《桃符记》，《绣襦记》、杂戏、《马陵道》剧。

《役南琐记》(崇祯癸酉)

正月初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在北京所观剧：《红拂记》、《花筵赚记》、《西楼记》、《灌园记》、《唾红记》、《弄珠楼记》、《衣珠记》，《彩楼记》、《西楼记》、《梦磊记》、《石榴花记》、《鹣钗记》、《狮吼记》、《百顺记》、《雄辩记》、《香囊记》、《红梅记》。

五月二十日在绍兴所观：《望湖记》。

《归南快录》(崇祯乙亥)

四月十五日：抵天津，吴期生相邀，乘别舟往彼命酌，观《白梅记》，内有《东坡梦剧》，别时已二鼓矣。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在杭城观:《双串记》、《梅花记》、《秋箫记》、《宵光记》、《南柯记》。

五月二十八日:“微雨,汪彦旻携酌相饷,同王百朋观《黄孝子记》,优人搬演生动,能使观者出涕。”

六月初八日:“下午施淡宁邀酌于玉莲亭,观女梨园演《江天暮雪》数出。”

六月十六日观《题塔记》,以上俱在杭城观。

七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在绍兴观:《鹊桥记》、《千祥记》、《绣龙记》(祀神所演)、《麒麟记》、《牧羊记》、《画中人记》、《望云记》、《双红记》、《水浒记》、《千金记》。

《居林适笔》(崇祯丙子)

正月初七日:“薄暮始归,观童子演仙戏。”

正月初十日至十月初三日在绍兴观:《投梭记》、《幽闺记》、《水浒记》、《九锡记》、《鸳鸯棒记》、《翠屏山记》、《西楼记》、《花筵赚记》、《五桂记》、《拜月记》、《白兔记》。

《山居拙录》(崇祯丁丑)

二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初三日在绍兴观:《鹣钗记》、《荷花荡记》、《双红记》、《红丝记》、《玉鳞记》、《浣纱记》、《惊鸿记》、《千金记》、《四元记》、《双飞神记》、《绿袍记》。

《自鉴录》(崇祯戊寅)

正月初十日至十二月廿一日在绍兴观:《万寿记》、《金雀记》、《黄孝子记》、《连环记》、《彩楼记》、《石榴花记》、《香囊记》、《红丝记》、《望湖亭记》、《绣襦记》、《孝悌记》、《寻亲记》、《牧羊记》、《浣纱记》、《摩尼珠记》、《银牌记》、《霞笺记》、《鞭琴记》、《白梅记》。

《弃录》(崇祯已卯)

正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绍兴观:《孝悌记》、《双忠记》、《摩尼珠记》、《鸾钗记》、《红叶记》。

五月三十日:“是晚柯村又演《目连戏》,竟夜不能寐。”

七月初二日至十月十一日在绍兴观:《金印记》、《荆钗记》、《绣襦记》。

十月十四日:“赴钱德舆席。同席为王遂东、张芝亭、王莪云、姜玉舟、倪鸿宝,德舆尽出家乐合作《浣纱》之《采莲剧》而别。”

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绍兴观:《双红记》,《钗钏记》。

十月二十日:“举五簋于四负堂,遵鸿宝约也。演杂戏,尽优人之所长,子夜乃别。”

《壬午日历》(崇祯壬午)

三月三十日(在绍兴):“携眉儿拜张燕客,即同燕客至外父,观《西梅记》。”

十月十六日在武林:“至段桥赴元祥之酌,同席为吴弘文及闵、赵、任、胡、罗、石诸友,席半听胡、任二友北调,听石友南曲。”

十月十七日:“刘雪涛公祖见招,赴酌于湖舫,观《红梨花记》。”

《癸未日历》

九月二十九日在维扬:“永年邀酌,观《疗妒羹》,即小青事。但以死为生耳。”

十月初五日在吴中:“及舟则李子木张宴待矣,举酌,观《一捧雪记》。”

《甲申日历》

正月十五日:“抵家拜先像。至山,有村中人来演杂剧为乐。”

二月二十四日:“奉关神及金龙神,还戏愿,演《鸾钗》、《绣繻》二记。”

二月二十五日:“又演《连环》、《浣纱》二记奉关圣与金龙神。”

《乙酉日历》

三月二十七日:“午饭罢,潘楚张设酌,托蒋安然治馔。诸友如程尔瞻、张轶凡、王云岫皆至,听弦索数调,朱纯宇又唱南曲,极欢而散。”

四月十三日:“看优人演《永团圆剧》。”

四月十四日:“予还戏愿,王子屿、子树昆仲,王玄趾舅张季方皆来观。午后又还戏愿,奕远侄以纠资设酌,优人演《绣佛阁剧》,不能终,又演《永团圆剧》。”

四月二十日:“雨,予家还戏愿,观《衣珠阁记》。闻南都以左帅退兵解严。闽中林圣桢、郑季公来谒,午后与游寓山,仍归家观《绣佛阁剧》。”

㉖ 清渊王介锡美申纂,男王九游龙甫校《明才子传》二卷,补二卷,温故斋皮纸黑格旧抄本。有“雪香书屋”、“雕虫书屋储藏之印”二印,补传卷下收“祁彪佳”一条:

世培天纵之才,文章经济,无不敏妙。司理闽中,断狱如神。自作《玉节》传奇。擢御史,巡按苏松,击豪殆尽。墨吏望风引去。以苏松巡抚致仕,寻以

节称。

㉗ 道光刻《祁忠惠公遗集》杜春生后序："(彪佳)司理莆中，有《玉节》传奇，倪公《鸿宝应本》有序。"按：《玉节记》当为彪佳在莆阳时撰。惜今不传。《鸿宝应本》流转尚多，倪序不更录。《玉节记》和《全节记》可能是一部书的异名。

㉘ 《重定南词九官词谱》，又题《重定南词全谱》，吴江词隐先生原编，鞠通先生删补。《凡例续记》中有："先是甲申冬杪，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江城。(祁公前来巡按时，托子犹遍索先词隐传奇及余拙刻，并吾家诸弟侄辈诸词殆尽。向以知音，特善子犹，是日送及平川而别。)……时丁亥秋七月既望，吴江沈自晋重书于越溪小隐。"

按：子犹，冯梦龙也。丁亥为甲申后三年。鞠通先生即沈自晋别属。

㉙ 祁彪佳《日记·归南快录》(崇祯乙亥)十一月初四日条："予坐书室竟日不出户，整向日所蓄词曲，汇而成帙，然顾误之癖，于此已解，终不喜观之矣。"祁彪佳《庚午元旦勖语》："乃假归一载，多为音律所误。"

《天一阁被劫书目》前记

宁波天一阁藏书的编目，可能明嘉靖中范钦自己就已有手订的草目了。焦竑的《国史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四明范氏书目》应该就是此本。稍后就有《澹生堂书目》所著录的二册、四卷本。这是一个万历中的写本。从祁承㸁《澹生堂集》卷十三的《戊午历》(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 四月十五日。得范元辰年兄寄示天一阁书目，并见贻司马文正公稽古录。

可见这个四卷本书目也是从范家流传出来的。其时阁书陆续有所增益，内容当比二卷本更为丰富。当时祁承㸁正在进行《两浙古今著述考》的编写工作，这四卷书目应该是他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再少后，黄氏《千顷堂书目))也著录过一本，内容不详。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登楼观书，曾“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这只不过是一个简目，“凡经史地志类书、坊间易得者，及时人之集，三式之书，

皆不在此列”。黄宗羲的这几句话，很能代表历来正统派藏书家的看法，他实在很不能理解范钦的收书原则。这个简目很快就流传开去了，只是徐乾学就誊去了好几本。后来范家又据这个简目增补重定，写为一目，请黄宗羲在前面写了一篇《藏书记》。这是范氏自己所订的第三个书目。

以上四五种书目，今天都无法看到了。《玉简斋丛书》二集有一个不分卷的《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底本是个旧抄本。内容近于按厨登记的书账，但所收颇富。《西谛书目》又有清宋氏漫堂抄本《天一阁书目》一册，应该也是康熙中的抄本。看来它们都和黄宗羲的《简目》和据以丰富补充的范左垣重编本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个玉简斋本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第一个阁藏重要目录。再往后就更有：

（一）嘉庆十三年（一八〇八）阮元文选楼刻十卷本（附碑目一卷）。

（二）刘喜海编十二卷本（有稿本和传抄本）。

（三）赵万里藏无名氏编，内容介于阮、薛之间的一本。

（四）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薛福成刻《见存书目》四卷本。

这四个本子中间有两个刻本是流通最广的。刘喜海本未见，据说是：

> 此目纂辑在阮薛二目之间，与二目多有异同，且足补薛目之阙。系刘喜海服官浙中时，登阁览书，所辑成者。（《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三、四期，三八〇页）

刘喜海是著名的金石家、藏书家，平生很喜欢传写书目，他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嘉庆道光之际，约略与阮元同时。如果试取

以上几种本子比勘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几个不同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阁书一直在那里减少、亡失下去。近两百年中间，那损失是惊人的。而其流散的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据赵万里先生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八卷一号）里所说，有这么几种原因：

（一）由于修《四库全书》奉命进呈而散落的。清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从范懋柱手里，提去了不少的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六百三十八部……《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还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盦，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我见过的此类天一阁书，约有五十余种。

（二）由于乾隆后当地散落出去的……卢氏抱经楼，为前清一代四明藏书家后起之秀。他的藏书里最著名的一批抄本《明实录》，就是天一阁的旧物。此外宁波二三等的藏书家，如徐时栋、姚梅伯之流，以及到过宁波做过官的，如吴引孙《有福读书斋》、沈德寿《抱经楼》，都有天一阁的细胞在他们藏书里称霸着……

看来这第二种因素的破坏性是更严重的。封建地主阶级，以皇帝为首，都一直觊觎着这个重要的书藏。他们用明暗种种手段，对阁书进行着掠夺。在这种大规模延续的进攻之下，范钦手订的极为严厉之封建的藏书规条，显然失去了作用。

“薛目”后面有范彭寿的一篇跋文，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

新情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天一阁藏书也陷入了新的不幸。掠夺者已不只是封建地主阶级，更挤进了凶恶百倍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彭寿虽然用仇恨的心情想把责任推在太平天国革命者的身上，但仍然不能掩盖事实的真相：

> 咸丰辛酉，“粤匪”踞郡城。阁既残破，书亦散亡。于时先府君（讳邦绥，咸丰丙辰进士，四川即用知县）方避地山中，得讯大惊。即间关至江北岸。闻书为洋人传教者所得，或卖诸奉化唐岙造纸者之家，急借资赎回……

事情十分清楚。“洋人传教者”不像封建地主的学究们那样冬烘，只着眼于正经正史，他们是特别看中了天一阁收藏的丰富史料、地志……的。他们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狠狠地插进手来。

这个新加入的掠夺者的“气派”越来越大，手段也愈来愈“巧妙”了。他们后来并不亲自出面，自有一批为之服务的代理人应运而生。他们的掠夺面之广阔也绝不局限于古籍，掠夺对象也不仅限于天一阁。天一阁新的不幸命运，就和这些“洋人”分不开来。

且看“薛目”以后出现的另几种目录。

（一）《目睹天一阁书录》四卷，林集虚编。一九二八年木活字本。

（二）《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杨铁夫等编，一九三二年油印本。

（三）冯贞群编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十卷》，一九四〇年铅印本。

如果用“冯目”和“薛目”对比一下，那损失是十分可惊的。

那原因，赵万里先生说：

（三）由于民国初年为巨盗薛某窃去的，这一次是天一阁空前的损失，至少总有一千种书散落到阁外。阁中集部书，无论宋元明，损失最多。即明季杂史一项，所失亦不在少。《登科录》和地方志，去了约有一百余部。辗转由上海几个旧书店，陆续售归南方藏书家……

这次的损失是空前惨重的。偷窃转售经过也有种种传说，曲折离奇。据说得到这批书的书店，本来是专门作日本人生意的，这批书的目录也已编好，准备寄出了。不料事情败露，只好就地卖给上海的几位著名的藏书家。这就说明，在当时某些书商看来，洋人才是第一流的好主顾，本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降至次要的地位。卖书给他们，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了。

在“薛目”和“冯目”之间，照例也应该有一个“桥梁”，那应该就是这次的被盗书目。

《西谛书目》著录《天一阁失窃书目》一种，缪荃孙撰，抄本，二册。前有缪序：

天一阁藏书，自明嘉靖间至今，几四百年。吾国藏书家当以此阁为最久矣。民国三年，有贼雇木工数人，夜登阁顶，去瓦与椽。缒而下，潜入阁中，为大规模之盗书。将书藏入皮箱中，至夜间运出。如是者数十日。将阁中藏书盗出约十分之八，售于上海各藏书家。其后范氏子孙获窃书贼根究，各书贾之买此书者，涉讼经年，一无所得。兹将调查此次天一阁所失各书，存其目录于左，以备参考。亦藏书

家之一掌故也。艺风老人志。

粗略地分析了一下这个书目以后就可以看出，它首尾完整，共收书一千三百余种。但真实性却是值得怀疑的。缪荃孙并不曾仔细说明他的“调查”经过。但照那目录的编制、内容，可以看出是以“薛目”为底本，把当时阁中劫余存书一一涂去，再加清抄而成。体例、小注，无一不与“薛目”吻合，甚至连每一类后面的“右××类××部，全×部，××卷，内×部无卷数……”也都照抄无误，并未清点已经去了几条，尚余几部。因而往往出现书目只存寥寥几种而结帐还是“薛目”原数的情况。这个看来相当完整的“失窃书目”，竟是不大靠得住的。

原来缪荃孙就是给窃贼和书贾带来了“麻烦”，使他们的罪恶勾当未能顺利进行的人物。

据说当时缪荃孙听见阁书被盗的消息，兴冲冲地赶到书店里去要求看书，却遭到了拒绝。他大怒了，写信通知了范家，这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查问、追究。这样，缪荃孙自然不可能从书商那里获得任何真实情况，他只能间接的采用上述办法进行“调查”，结果就是那两本“失窃书目”。

好几年前，偶然看到来青阁书店清理积年旧书堆时发现的一包有关文件。这是一大包书账，有写在红格账簿上的，有写在白折上的，也有有光纸的单篇零页。有的内容较详，记下了版本情况，完整与否，以至书价。但大半仅是简单的一个名目。此外，记得还有当时因为涉讼请律师的委托书照片。曾匆匆抄下了一份草稿。

经过研究，这一批书单上记的确是从天一阁楼上弄出来的东西。有些见于账单上的书，曾经看到过实物，账上所记的名

目、完缺……无一不与实物一致。有的书则见于各家目录。前引赵万里先生文，谈到这批书的下落时说：

> 当时以吴兴蒋氏收得最多，号称孤本的明抄《宋刑统》，就在里头。现在蒋氏书散，整批明别集，流归北平图书馆。其他登科录及明季史料书，则归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沪战起时，作了日本飞机队的牺牲品。此外我们认识的上海苏州几位藏书家，也都有少数天一阁的遗藏分布着。在我日记簿里载下来的，此类书已经超过了五百种。

赵先生所说的《宋刑统》，虽不见于这批账单，但先为吴兴蒋氏所得后归北平图书馆的大批明人别集，却十九在账单中。取校两家原目，正是若合符节。而赵万里先生在《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和《云烟过眼新录》两文中所记诸书，也都能在这里得其踪迹。这就证明这批旧书账确是当年匆匆留下的草目。自然，这些书账里记下的并非全豹。因为来青阁并非首先，也不是唯一收买这批赃物的书店。同时，各种书账并非抄于一时，其中重复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天一阁藏书往往有复本，有的甚至多至十许部。这种情况在这里也有所反映。我就曾前后看到两部嘉靖蒋孝移斋刻本陶集，一完一缺，却都是绝阔大初印的白皮纸本，验其书根款式，无疑都是阁中旧藏。鉴于这种种复杂情况，就根据这些书账陆续整理写成一个清目，稍加排比，大致以类相从。内容全照原样，其有校注或增益，别加〔 〕号以别之，册数、书价，也照样保留。因为这是进行鉴别时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能看出当时的古书价格和收藏风尚，不无史料价值。

这个书目虽然很不完备，但从中可以看出天一阁藏书的特

色和被盗劫损失的严重。明季的史料和明人别集——也就是范钦生存时期的当代史料和文学资料——特别丰富。这种特色，确是天一阁所独有的。在当时，甚至以后一个很长时期中的藏书家中很少看到。赵万里先生在《记略》一文中曾经说起：

> 当年范东明选书的标准，与同时苏州派藏书家，完全采用两个不同的方式，他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书籍，很少受他收容，除了吴兴张氏藏的宋小字本《欧阳文忠公集》是天一阁旧藏外，很少有此例外。惟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古籍，因他保存了不少。换言之，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料。

其实不只是苏州派的藏书家，就用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祁承㸁的看法来对照一下，也就很容易看出范钦收书的特色了。

祁承㸁《澹生堂集》卷十八《尺牍》中有《与潘昭度》一札，谈自己的收藏旨趣极详尽。他说：

> 所以每遇古人书，便须穷究其来历。大约以文献通考及艺文志所载者为第一格；次之则前代名贤之著述；再次之则近代名贤之著述。然著述之中，以表章九经为第一格；次之则记载前代治乱得失事；再次之则考证古今闻见所未及事。若只以诗文鸣于时，无论近时，虽前代亦不足甚珍。

这里所说的收藏标准是很明确的。它其实也代表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藏书家的普遍意见。就是说，首先要选取有来历、见于著录的；是前代名贤而非时人的著作；得到特别重视的是经部

书，其次才轮到史，而且还是古史。至于文集，则看作十分次要的东西。对汉、唐、宋、元人的集子尺度还较宽，至于当代人的文集简直就很少有收藏的价值。祁承㸁在这封信中有几句话说得很不客气，他说：

> 盖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处，惟听宇宙之所自为销磨，则经几百年而不销磨者，自有一段精彩，不可埋没者也。弟颇窥其深矣。

祁承㸁的话有他正确的一面，他指出了明人刻书之滥（但这也正好反映了当时雕版事业的兴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情况），也指出了只有经得起读者选择和时间考验的著作才有可能流传下来。但他还是以传统的政治和艺术标准来判断文集的价值的。他没有看到有许多政治、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却正保存在浩如烟海而并不“精彩”的别集之中。如果用天一阁、澹生堂两家书目试加比勘，就显然可见范氏收藏当代人撰著的丰富是突出的，虽然范东明未必就完全认识他辛苦收藏可贵的特色。

祁承㸁还在一封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起他从河南任上寄回的书籍：

> 发回书共八夹。内有河南全省志书二夹，不甚贵重，此外皆好书也。有一夹特于陕西三十八叔印来者。若我近所抄录之书，约一百三四十种，共两大卷箱。此是至宝，自家随身携之回也。

关于这些“澹生堂抄本”书，在此信开头他也曾说起：

此番在中州所录书，皆京内藏书家所少，不但坊间所无者也。而内中有极珍贵重大之书，今俱收备。即海内之藏书者不可知，若以两浙论，恐定无逾于我者。

从祁承㸁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一些情况。地方志，在他看来远不及他自己从人家（这里所指很可能是大梁朱睦㮮的万卷堂藏书）那里借抄来的抄本书珍贵。这和前引他给潘昭度信中的意见是一致的。八十年后黄宗羲和吕留良到化鹿山中捆载澹生堂遗书，最后弃而不顾的“下驷”，也正是这些。“山中所存，惟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厨也。”（《天一阁藏书记》）

其次。祁承㸁的话也为另一种疑问提供了解释。天一阁中那么完备的各省方志的搜集经过，也是可以推知的了。

看来，明代由于雕版事业的兴盛和地方人士锐意纂修的蔚为风气，方志的刊行数量是很大的。除了向中央政府机关呈缴和经常做为书帕进行馈赠借以流通外，需要者也可以通过种种关系，请求刷印。祁承㸁在河南做官，就不费力地搜到了全省的方志。范东明的搜集，很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方式。边远省份还可以通过朋友关系进行搜集。从版本上看，天一阁所藏大量的方志，绝大部分是正德、嘉靖时所刻。这在当时正是最新的版本。范钦并不是个古本方志的收藏者，那些新刻方志的板片大抵都藏在各地的官署里，可以随时刷印。不像古本，只能从书肆和藏家手里陆续收买。这恐怕就是他的收藏十分完备的重要原因。

天一阁同样收集得十分完备的历朝考试文献，也可以从祁

承燦给潘昭度信里的另一段话得到解释：

> 我朝会试廷试二录，自开科至今，其板俱存礼部。此昭代大典，藏书家不可不存。知兄亦须办此，并为弟刷印一部。但一科不可使缺，所刷者即留之都门，弟自差人来领，至嘱。

原来这种登科录的板片就存在礼部衙门里，同样可以请求全套刷印，而且手续并不十分困难。这些登科录，大抵都是半页十行，有一定的款式，因为这是官刻的规定格式。

明代中叶以后，编修私史之风甚盛。有些书还是坊间编刻的。像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许重熙的《五朝注略》、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等都是。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现象。涂山的《明政统宗》也是一种坊刻的当代史通俗读物，书前列有《参考书目》，共收书一百七十八种。自《皇明玉牒》起，举凡官私史料，笔记小说，九边，海运诸考，奏议别集，无所不收。其中极大部分都已不能看到。但拿来和天一阁所藏的史料对比，也还是很贫乏的。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晚明，野史撰著更是层见叠出。直至清初，也还余风未泯，有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书》，一直到庄史之狱，才告一结束。从此，知识界开始钻进古书堆里去“逃避现实”，学风为之一变。在那个八股文势力弥漫天下的时代，知识界这种着眼当代政治，研究实际问题的学风，是不容忽视的。自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是怎样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他们探索、总结的也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比起埋头于八股文或致力于繁琐考据，还是远胜之的。这种学风从天一阁藏书的内容上，也是充分反映出

来了的。

上面约略地就天一阁的藏书特色，进行了一些简单说明。在封建时代的藏书家中，天一阁是独树一帜的。但范钦到底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只是比起同辈来较少偏见，因之眼界和收藏尺度比较宽；崇古的思想不是那么浓重，因之注意力有可能比较集中于当代的文献。但他必然不可能摆脱封建士大夫的思想局限，对更接近下层人民和市民阶层并为之服务的出版物，是采取漠视的态度的。一般通俗实用书和大量出版的书坊本，就很少收集。这些大抵是被视为“陋书”而舍弃了。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是著名的，但大抵是从史料角度出发而抄存的，与《登科录》之类看作同样的东西，而并非为了它是戏曲作者的史料。元曲和明初戏曲，所藏就极少。小说更是绝无仅有。天一阁藏有明初黑口本的《鸣鹤余音》，但着眼点并不在它是散曲，只是因为它是道家之书；一些明人散曲和词集，也是作为别集收藏，而并非为了它是文学作品。如此种种，无一不鲜明地显示了时代和阶级的印记，不可能超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前面所说天一阁藏书的重要特色，是基于今天的认识提出的，决不可能是当日范钦收书的初意。整个书藏之足资今用的成分也是有限度的，更大量的却是封建性的糟粕，颇如祁承㸁所慨叹，是“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的东西，它们具有的也只是历史文献上的价值而已。

这个目录里所著录的书籍，很大部分已经流散毁失了。它做为“薛目”和“冯目”的一个“桥梁”，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封建文化的一个片段的侧影。过去曾经有过不少艺文志之类的著作，仅就明代而论，就有焦氏《国史经籍志》、黄氏《千顷堂书目》……这些都是我们据以编制

一代艺文总目的重要依据。但有些著作的科学性是不强的，有些书籍名目只是得之传闻或据传状而征引，真实性很值得怀疑。祁承㸁撰《两浙古今著述考》，收罗宏富。但那主要的缺点也在这里。比较起来，天一阁书目，包括书账形式的几种在内，就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书都是确实存在过的，虽然有许多今天不可见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二日重改

梅花墅

一

一九五〇年顷，江南故家的藏书一时大量流散。这是祖国典籍聚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藏书）聚散本是恒理”，这个事实，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本来也是知道的，这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并没有什么奇怪。它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侧面。但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这种“再分配”的规模就远非过去可比。

古代典籍，由于它本身也具有的经济价值，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本来已经逐步由地主阶级转入了半殖民地的新兴资产者的手中，流散、转移的过程也大大加快了。这中间还有帝国主义的插手与掠夺。但地主阶级藏书家的残余也不是没有。例如铁琴铜剑楼瞿氏、结一庐朱氏、旧山楼赵氏，就可以作为大小藏家的代表。但这些藏书家的历史都并不久，至多是太平天国前后兴起的，他们的兴起和衰败，都大致符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

在一般规律之中往往有特例。如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固然早在清初就流散了，但还有一部分精粹（多半是祁承㸁和祁彪佳的著述稿本）却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保存了三百多年。经过清初文字狱和禁毁的巨浪，保留这些遗书是要冒杀头灭门的风险的，然而却保存下来了。并于一九五〇年左右流散入市。此外，就还有甫里许氏世守的遗书，也是保守了三四百年的，也在这前后流出。知道的就很少。许氏遗书内容数量都远远比不上澹生堂祁氏，它的保存也没有那样的政治意义，但作为特例，还是值得注意、记述的。

许自昌是明万历时期苏州地区重要的刻书家，他很刻过一些书，如《太平广记》、李杜集、《唐诗十二家》、皮日休和陆龟蒙的集子以及佛经等等。他也喜欢藏书。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自然应该提到他。但奇怪的是叶昌炽对这位近同乡先辈的事迹知道得很少，就是在极简略的记述中也错误累累。许自昌还是个重要的作曲家。《橘浦记》（演柳毅事）和《水浒记》都有名于时。他还改订、刻行了王无功的《水浒记》、《保主记》（演赵子龙事）、《灵犀配》、《弄珠楼》、《种玉记》和《节侠记》（一题许三阶撰），有些著录或径题许自昌撰，或题“梅花墅改订”。近几十年他的受到重视，就是为了这个。郑西谛买到他的诗集一种，非常得意。《西谛书目》的前序中特予指出，这是不无原因的。收罗广博的《千顷堂书目》就不曾著录过他的一种著作。这样一个人，在万历时期生活活动于长洲甫里一带，有不小的影响，往来交游几乎网罗了当时著名的文士，可是他的生平却极少为人所知，确是有些奇怪的。

近三十年前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册书，是两种诗集的合订本，万历刻，分别用白棉纸、黄棉纸印。卷中朱墨

累累，校跋极多。这是我第一次买到许自昌的集子。

《咏情草》一卷，“茂苑许自昌玄祐父”撰。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有辛丑九月太原王穉登序，辛丑八月安国钱希言题辞，皆手书上板。后卧云居士许自昌自识。

《卧云稿》一卷，许自昌撰。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万历壬寅季秋之望娑罗道人屠隆序；万历壬寅季冬望后友人陈继儒序；万历壬寅季秋既望郡人钱允治题，皆手书上板。

这两册书中有许氏四世藏书印记：“许印自昌”、“许印元方”、“许虬私印”、“许印心扆”。此外还有“霏玉轩”（自昌斋名）、“万山楼”（许虬斋名）、“竹隐”（虬）、“丹臣”（心扆）、“高阳葵园藏书”（心扆印）、“东吴”、“结缘”、“美人兮天一方”、“吟诗一夜东方白”、“半亩梅花”等印。

《咏情草》中有许元方崇祯乙亥跋一通，许心扆跋二通。《卧云稿》中有许心扆手跋五通。

就在买到这两种诗集以后不久，我又在上海徐家汇一家旧纸铺中得到明末抄本的《百花杂咏》，《霏玉轩草》也是许自昌作，有许心扆图记。据说这是船上装来的，此外还有一大堆破烂书，其中就有许自昌所刻的《皮陆倡和集》等，卷前都有许自昌的名印。

这以后不久，苏州文学山房给我送来许自昌诗三种，却不肯说出书的来路。它们是：

《唾余草》一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写刻。前有万历庚申中秋残月下朗道人沈颢小引，手书上板。

《秋水亭诗草》二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邢炯序，王穉登序，万历壬寅屠隆序。此书卷首有“玄祐”、“许自昌印”二印。

《樗斋诗草》二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邢炯序（沈永昌隶书上板）、陈继儒序。

这无疑也是同出一源的甫里许氏世守之书。这以后，文学山房又给我送来了万历刻的许氏墓志传状一册：

《明故四川龙安府照磨怡泉许公墓志铭》（陈继儒撰）、《行状》（长洲钱允治撰）、《先考怡泉府君行略》（许自昌撰）、《许公元配沈孺人墓志铭》（董其昌撰，赵宦转光篆盖）、《行状》（陈继儒撰）、《先母沈太孺人行略》（许自昌撰）。

最后买到的是《甫里许氏家乘》十卷二册，也是文学山房送来的。题“三叟斋藏本”，“长洲甫里许之先人华甫手辑、兄许王俨孝酌甫同校、侄孙许时乘龙友氏增订”，有许时乘印记，又“高阳许氏藏书”印。家乘有刻有抄，都在康熙中，版心下或刻“梅花墅”或题“笑读轩”。最后的“世系”还没有写完。有许心扆跋，于康熙三十八年重新抄写整理。最晚的纪年是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以上是我在两三年中间，在不同场合买到的许自昌家的遗书。可以断定，这些书是从一个地方流散出来的，而且都是作为废纸论斤秤出的。

这批书藏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但保护得很不好，水湿虫蛀，比比皆是。好像没有什么较旧的版本，但下限则在康乾之际，更新的版本是没有的。这个结论是我偶然在上海的地摊上发现了另一批书以后得到的。那真是一堆破烂书，但却很有特色，一看就知道是同一书藏之物。水湿虫蛀的样子宛然如一。一打听，知道是昆山叶家的东西。再问是否还有什么较完整的书，回答是已经秤光了。过了几天，又找来了几本，只记得其中有明刻残本《词林逸响》一册，康熙刻《红萼轩词牌》一册而已。

这样我才知道这批书并不出自甫里，而是从昆山叶家流出的。许心扆妻是昆山叶国华的孙女。“高阳葵园藏书”就是他们的藏书印。他们所藏的善本，早就流散了。缪荃荪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中曾经著录过不少。许氏遗书后来是由心扆寄藏在昆山外家的。叶九来的半茧园，可能就是藏书之所。这是我的推测，以后也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

就在这前后，我从上海修文堂孙氏还得到过两册书，名目十分特别，是《烟花小史》，共八种。其中有澹云王路的《花史》，但并非曾见著录的《花史左编》，又有秦淮四嫩的诗集、唐薛涛的诗集……是万历刻本，卷中有收藏印记不少，其中也有“高阳葵园藏书”印。修文堂见告这书是从苏州文学山房得来的，索价极昂，我用艺芸精舍旧藏的元刻《伤寒论》四册换得。

遍查所有的目录，都不见《烟花小史》这名目。八种书的行款、版式也不尽同，但可以确定，是同时所刻。《秦淮四嫩集》收郑如英、朱映玉、马湘兰等四人之作，每人不过寥寥数叶。她们是秦淮名妓中的前辈。“四嫩”这种名色，大抵在万历中就出现了，曾一代代地传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原非某四位女士的专用头衔。而加以品评，搜罗诗作，刊刻行世的则是当时的才子，和后来上海的才子们评选“花榜”的把戏是一样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中曾经讲过清末上海滩上才子们的业绩，正是澹云王路等人的嫡派，一些都不错的。八种之中就收有某明代才子(可惜我已忘却他的名字)缠绵悱恻的情诗和情书之类，确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人物。一个是明末，一个是清末，每逢“世纪末”，大抵总要产生这样的事物。我看这就是《烟花小史》这样的书的价值所在，因为它的确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某一时代社会的面貌，虽然只不过一个

侧面。

也是文学山房送来的一册《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同样是值得珍重的作品。不过时代更早，作者也更有名。这也是明刻本，看样子是刻于万历以后的了。开板是草率的，是所谓“坊刻”，和家刻的《祝氏集略》不可同日而语。书只四种，名目是《窥帘集》、《醉红集》……每集都各属一个笔名，如《异香仙缘》，绝不见祝允明三字，这也难怪。书中所收全是狭邪投赠之作，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少有如此勇气坦率承认曾经写过这种不正经的文字的。在这一点上，祝允明就比不上他的晚辈。其中有诗有词，有文章，有小曲……就艺术水平而论，比起王路之流是高明得远了。祝枝山相与的都是苏州的妓女，他的“风流事迹”几百年来是与唐寅齐名的，过去只能从《三笑》中得其涯略的，现在就能直接接触他自己的文字记录，不能不说是十分难得的。而且这也绝非伪作，在《千顷堂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不过全书应该有七种，而现在则只剩下了四种。

当我陆续买到许自昌的多种遗书以后，才恍然大悟，文学山房的这些书原来同样出于许氏。不过原本大抵都已残缺不完，书店则剔去了序目或残断的痕迹，重新装潢。为了说明是全书，还各刻了一张“扉叶”，什么《烟花小史》、《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全是新刻的，但字体仿照明刻体式，纸也用了旧纸，一时不易辨识而已。《小集》的扉叶，还特别刻上四种名目，下面加上一个葫芦形的牌记，中题“四全”二字，这就直接了当地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同样的书我还见过一部《陈大声三种》，是万历刻的陈大声的散曲，那扉叶也同样是新刻的。这书没有能买得，因为已经预先卖给北京碧蕖馆傅氏了。据说郑西谛还因没有能得到此书而极不高兴。凡此种种都可以列入《书林逸话》，但我看也并非全

无意义，它确曾使我增长了一些知识。书坊的这些把戏也的确有些可恶的，特别是因为它为了作伪，破坏了文献资料的完整与真实。但估人能从甫里许氏这种旧家论秤而出的“废纸”中间，拣选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也还不能不说是做了好事。

二

虽然买到过许自昌的六七种诗集，但我却不想研究他的诗。坦率地说，那不是很高明的。这只要看《咏情草》和《卧云稿》两种卷中都有许虬（竹隐，自昌孙）朱墨笔大量的批抹改定就可知道。许竹隐自己的诗也同样的不高明，他的删改也不见得就胜于原作。他的儿子许心扆在题跋里就表示了意见。“丙申年七月十六日，紫逊弟申刻来霏玉轩诵之，云照原稿刊。”许自昌的曲本，原刻未见，《古本戏曲丛刊》中有影印本，可惜不在手头了。也无从研读。只记得一直流传在昆曲场上的《借茶》、《活捉》就出于《水浒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此外他还有一种笔记《樗斋漫录》，应该是值得一读的。不过我没有见过。翻阅《家乘》，大量出之于同时名辈的传状诗文却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可以从中认识许自昌和他的家族的概貌，这倒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许自昌是一个很阔绰的地主。他的祖辈“以积箸起家”，后来曾一度中落，到了自昌的父亲朝相，“用计然策，家渐振”。终于成为吴中巨富。“吴役最巨者，增郡城，修郡学，豪有力者皆逊谢不敢当……公锐身骈剧，役竣而损帑不赀，公无几微见颜色。”能经办修葺城池、郡学这样的工程，没有雄厚财力是不行的。朝相自然是一个极精明的商人，“握算不假筹籍，能腹贮之。即日月锱铢无爽”。朝相加意培养自昌，希望能改换门楣，说：“是当

亢我宗。乃延大儒课督之。”鼓励他和名人来往，“公倚屏幕间听其议论……私心且喜且语曰，‘儿不意倾天下士如此’”。对自昌的“广募剞劂氏”刻书，非常高兴，说：“捐数千金藏书万卷，何如扃金穴中，散之六博格五，而更付于展转不可知之子孙乎！”自昌四上公车都失败了，归家请罪，朝相毫不犹豫让他进京纳资，“拜中书舍人”（以上俱见陈继儒《怡泉许公墓志铭》）。

从这些记叙中，可以看出许自昌是生长在一个大商人兼地主的家庭里，他有一个一心摆脱商人地位、挤入上层统治圈子的“雄心壮志”的精明的父亲，十分醉心于地主阶级的文化，尽力培养儿子这方面的兴趣并予以赞助。

关于许自昌，陈继儒为他写的行状里说：“玄祐不屑问家人生产，而部署家政，会计内外上下吉凶出入之数，皆犁然且有案检。”可见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继承并经营着父亲的事业，这是主要的一面。自然，他也十分“风雅”，这是许多名人尽力称说渲染的。举陈眉公的话为例：

> 玄祐好闲适，治梅花墅于宅址之南。广池曲廊，亭台阁道，石十之一，花竹十之三，水十之七。弦索歌舞称之。而又撰乐府新声，度曲以奉上客。客过甫里不访玄祐不名游；游而不与玄祐唱和不名子墨卿；玄祐亦以榻不下、辖不投，不十日平原饮不名主人；主人能具主礼，而不登骚坛，则主客皆伧父，不名天下士。

许自昌的生活面貌，这里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梅墅诗》中有蒋铉所作一律，诗题云：《癸亥上元前四日，许中翰张灯梅花墅，岩阿竹树，庭榭廊庑，悬缀皆满。檄两部奏剧，昼宴夜游，极

声伎灯火之盛。予适归里中得与斯会。腊月先闯剧场，并及之。》癸亥是天启三年，自昌即于是年卒。这一诗题所透露的地主生活豪侈之状，实在是可惊的。其时距朱明覆亡，不过二十年。

梅花墅是许自昌精心建造的私家园林。陈继儒撰有《许秘书园记》，钟惺撰有《梅花墅记》，祁承㸁撰有《书许中秘梅花墅记后》，描写极为细致生动。钟伯敬说："园于水而稍异于三吴之水者，则友人许玄祐之梅花墅也。"祁承㸁更就吴越造园的区别加以论列：

> 要以越之构园，与吴稍异。吾乡所饶者，万壑千岩，妙在收之于眉睫；吴中所饶者，清泉怪石，妙在引之于庭除。故吾乡之构园，如芥子之纳须弥，以容受为奇；而吴中之构园，如壶公之幻日月，以变化为胜。

祁承㸁不只揭出了许氏家园的特色，也说出了一些造园的意匠。林云凤有《梅花墅二十二咏》，历记园中诸境：梅花墅（董玄宰书）、杞菊斋、映阁（林乐善书）、浣香洞、小酉洞、招爽亭（李长蘅书）、锦淙滩、在涧亭（文震孟八分书）、转翠亭（李流芳书）、流影廊（陈继儒书）、碧落亭（娄坚书）、维摩庵（钱允治八分书曰"三止庵"）、漾月梁（严澄书）、得闲堂（赵宧光篆书）、竟观居、浮红渡、鹤篠、蝶寝、涤砚亭（文震孟书）、湛华阁、莲沼、滴秋庵（王穉登书）。

得闲堂是此园的主要建筑，陈眉公记云："闳爽弘敞，槛外石台，广可一亩余，虚白不受纤尘，清凉不受暑气。每有四方名胜客来集此堂，歌舞递进，觞咏间作。酒香墨彩，淋漓跌宕，红绡于

锦瑟之傍，鼓五挝，鸡三号，主不听客出，客亦不忍拂袖归也。”许自昌的家乐演出自作传奇，也就在这里。

《梅墅诗》一卷，收陈继儒、钱允治、钟惺、管珍、庄严、僧大止、蒋铉、朱之藩、薛寀（以下皆自昌晚辈）、侯峒曾、陈子龙、徐汧、张采、郑敷教、陆坦等人作。薛谐孟以下四人所作都是题《梅花墅图》的诗，其时自昌已逝，名园也已渐露衰象了。侯广成诗有“浮白奏来天上曲（先生有家乐，善度新声），杀青搜尽世间书（先生雅好刻书，行世甚多）”的句子。薛谐孟（寀）一诗写得最有感慨：

展卷犹疑捧杖余，锦霞队里驻柴车。家风剩有名园记，水榭惟藏国士书。地僻昔曾罗竹肉，时艰今暂注虫鱼。钓船茶具寻常供，斗鸭疏狂尚未除。

三

许元溥字孟宏，号鸿公，是自昌的长子，崇祯庚午应天举人。出熊开元门下。是个书呆子，“多收辑遗书，每过市井，辄命奚奴囊贮青蚨以随，见则随收。然缥缃璀璨非所好，每于残缺废简中留意搜阅，是以往往得奇书，蓄储既富，多世人所未见也，遂自号曰千卷生。”（卢纮撰墓志）他又是应社、复社的重要成员，和徐勿斋、杨维斗、张西铭、张受先都是知友。他立“高阳社”，选辑《古文佚》，张采、张溥作序。对经营商业田产则全然外行，“视河干偃室、仰面折腰，一切户屦外事，若虺螫堤溃，力窒远趋，虑不及也”（桐庵郑敷教撰《小传》）。许氏的衰败，就从他手里开始并完

成，先后不过二十年左右。郑桐庵说："时四宇不靖，吾地议募兵，议蓄丁。群喙如猬，公独无语，退与余私忖成败，无不悉中。"说他料中了成败，不过是事后的夸饰。事实上是书呆子遇到了非常的事变，束手无策，呆若木鸡，比起他的祖父的担任修城的气魄、才干来，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雄据一方的富豪乡宦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齐崩坏了。最后，"世变后，以梅墅作灵隐下院，名海藏庵"。卢绗说得更为详尽：

> 甲申值鼎革，乙酉南中尚未竣，师旅旁午，所居迁徙不常，赀悉耗散，妇若子茕茕失所依。先生惟挈图书数箧，随所至无少离……从此家业益落。或劝曰，梅花墅去而复还，已见君志。今若再售，尚可支朝夕。何乃坐而食贫耶？先生曰，吾先人一生心力悉注于此，何忍弃之。爰仿虎丘短簿例，施园为寺，肖先人象祀之，延有行僧为主持。铃铎声彻四外，以最胜闻。今甫里之海藏庵，即梅花墅旧址也。

看这光景，和山阴祁氏后人的将寓山园舍为寺，肖彪佳像祀之的办法如出一辙，正是甲乙之际南中旧家巨族的典型出路。所不同者，祁氏子孙还曾作过最后挣扎，受祸也更烈。许孟宏则是默然地接受了必然的命运而已。不过他到底还是不忘故明的，归元恭（庄）作《许孟宏先生六十寿序》说：

> 先生先朝所取士……顷遭世故，惨澹悲凉，殆不可言。高天厚地，无所容足。此其情宜何如者，而颂大年，介眉寿，亦何心哉！或以先生怀才积学，老不得一试，比多无妄之灾，家业日圮，是以忽忽不乐，为此言者浅之为丈夫耳……

昔年与先生同时之友，有擢巍科受异数，回翔馆阁十余年而不难，一旦反面，居然高位，方以为荣，而不知耻。先生未尝立朝，乃能不忘故国，虽享高年，而不以为乐。悬弧之日，不召客，不设宴。嗟乎，贤不肖之相去，岂不远哉！

归元恭不愧是明遗民中的佼佼者。他用民族意识这个当时的最高标准衡量了士大夫的不同表现，痛斥一大群新贵，表彰了许孟宏。此文收入《家乘》，是抄本。大概是许丹臣在整理时所校改的吧，有些字眼如“而不知耻”、“反面”都涂去了，“故国”两字则在一侧画了方框，可能是拟改而没有想出适当的字眼。三百年后，看到这些去而未尽的遗痕，犹凛然感到文字狱的阴寒气息。大概这也是“版本”之学不可不讲的理由之一吧。

归元恭文中还提到“无妄之灾”，那详细已经无从考索，总之不外乎在清师铁蹄之下的种种苦难。凡可讲的，大抵也都讲了，如许孟宏在离乱之中，遇到散兵，藏书尽失之类。此外，更多的则是不可讲的，就包括在“无妄之灾”四字之中，我们应该感到它的分量。

《家乘》中还刻有郑敷教给许孟宏拟的《许孝文先生谥议》，时在“皇清顺治十四年丁酉”，有趣的是“公谥姓氏”。首列“年家眷弟”钱谦益、王时敏等四人；次“年眷弟”吴伟业、杨廷鉴、杨枝起、蒋棻等八人；“年眷侄”宋德伊等四人；“年家眷侄”宋实颖、尤侗、徐乾学、徐枋、计东、侯玄汸、叶方恒、钱陆灿、盛符升等二十八人；“门下晚生”八人。这是一张合二而一的名单，收罗了当时三吴的一大批名人，连归元恭所痛斥的一些“两截人”一起收了进去，而元恭却没有列名。自然，这也是一张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家乘》共十卷，计分碑记、三节文诗、著述刻书序、梅墅诗文、黄杨诗、寿祭文、尺牍、投赠诗文、敕辞祠碑等部。这些文献起于万历中叶，讫于康熙中，共一百年左右。文献作者除前文已引者外，我还想抄下一份名单来：

李维桢、焦竑、管珑、范允临、袁之熊、夏禹锡、张大复、夏之鼎、黄汝亨、曹文衡、王志坚、钟震阳、尹珩、钱希言、张献翼、胡汝谆、陆培、王志长、顾有孝、李宜之、张崍、顾于玉、颜茂猷、曾文饶、陆运昌、黎遂球、余日登、陆符、刘曙、朱隗、萧大亨、诸寿贤、陈仁锡、沈几、姚希孟、刘锡玄、张立廉、马万、姜元衡、张埙、宁云鹏、陈履端、申时行、马玉麟、钱朗、邓云霄、冯时可、陈旃。

这张名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一百年中间，许自昌家族社会接触面之广。陈眉公说，自昌“凡可为不朽亲行者，捐橐无所悔”，他为了请名人给父母写寿序、祭文、墓志、行状……是花了大量的“稿费”的。照黄宗羲的说法，钱牧斋身后的丧葬……费用，就靠了他为人写的三篇文字的“稿费”。大致可以估计许自昌和诸子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此外，在梅花墅中，得闲堂上，日夜大排筵宴，演戏招待了无数达官贵人、山人名士，他们的名字也在这张名单中出现，当然不可能是全部。

四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隐士》，鲁迅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古今隐士的实质、真相，并提到陈眉公，作为标本。和许自昌关系最为密切的名人，要算是眉公了。他为梅花墅所写的记，为自昌父子所写的墓志碑版，都是非比一般的“力作”。自昌死后，他和许元恭仲谦（自昌次子）来往很密。《家乘》尺牍一卷中

就保存了陈继儒给自昌、元恭的十六通手札。这中间，就很透露了一些隐士的秘密。眉公是广交天下士的。这中间有达官贵人，地主乡宦，骚人墨客，女史缁流。在众多对象中间，必然更有重点。像许自昌父子这样富而好风雅的人物，无疑是重点的对象，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家乘》所收的陈眉公的十来封信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与许自昌在刻书中的关系。从许多迹象看来，许自昌刻了许多书，而陈眉公则是他的顾问。此外，许自昌大量刻书，是纯属风雅好事，抑或另有目的，这事实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 吾兄既居甫里，何不刻《陆鲁望集》？集不下数卷。并其传刻之。又得觅《皮日休集》附于后。曾读皮陆唱和诗，二公真劲斗，晚唐之奇思险字，不逊玉川子也。此集若行，发幽阐秘，犹胜为李杜拈一瓣香耳。吾兄谓何？

这说明，许自昌的刻皮陆集，是出于眉公的建议。出发点则是表彰乡贤遗著。后来谈到有关刊刻《唐类函》的问题时，着眼点就不同了。

> 其书局促不甚利益，弟半置之高阁。即使纂续，雅俗参半，前后糅杂，操翰之人，反多掊击，不如姑止之。即刻不行，即行不广。

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编书、刻书必须顾到读者的趣味、需要，以及能否畅销。因而也就解除了人们的一大误会，以为陈眉公大刻其《宝颜堂秘籍》，许自昌大刻其李杜集……都是雅人韵

事，捐了家赀来流传文化的。其实《秘籍》云云就带有浓重的广告宣传气味。《秘籍》中所收，多数并非罕秘，倒往往是无卿之作，而校刻草草，底本欠佳，为了节省刻资而割裂删削，更是所在多有。过去不能理解，以为陈眉公所以刻了坏书，无非是由于“山人好名”之过，现在明白，还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作用的。

中国的雕版印刷事业，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五代时刻历本，就因为它是广大人民需要的日用书。北宋南宋都有专营出版的书铺，到了明代，营业性的出版商就更大量地出现，人们所熟知的建安余氏就是规模甚大、历史悠久的书坊。但对一些藏书家或山人名士的刻书，却总是另眼相看，不列入书商一类，现在看来这看法是错误的。著名如毛子晋，人们看到汲古阁刻行的书，知道那是营业性的，但遇到毛氏的“珍藏秘本”，就充满敬意地尊为藏书家。其实藏书家的毛子晋，同时也就是出版商毛子晋。他搜求了那许多善本，其目的是为了翻版。正与商务印书馆和涵芬楼都属于同一个老板的情况相同。

自昌逝世之后，次子许元恭仲谦继承了父亲开创的刻书事业，和陈眉公交往更密（元恭次女，嫁眉公孙陈仙觉，陈、许遂为亲家）。提供素材，指点门径，眉公着实出了不少主意。

小孙经书已完，今读《化书》。字字皆灵，句句皆有益于身心家国。此学士大夫未尝教儿读者，节短转快，此举业之径路，容寄老亲家刻之。盖出于道藏，不甚流通也。

《国策选》觉是举业书，非好古者所贪购也。叙文亦同请政，惜此书并惜此序，一笑。

承惠《读书后》，又得闲仲重校跋之，妙甚。但目录须列在前，使读者一览，见所未见，生歆艳心，千万即易之。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读书后》以校正差落数次者奉览，乞编前后刻之……尚可抽其论经论史者共为一部，则远可行、久可传，只恐翻板耳。

如非旧抄仅存，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些信札是出自山人隐士陈眉公之手的。为了吸引买主，连目录如何安排都考虑周到，千叮万嘱。陈眉公对读者的心理摸得十分清楚。所谓《读书后》，其实是从王世贞的遗稿中凑集成书的。还不满足，更进一步计划抽出弇州其他著作论点，更编一书。已经十拿九稳，书必畅销，只怕翻版了。连出版界的用语也和晚近一般无二，实在是极好的史料。晚明此种书一版可以刷印数千部，这也是不见旧记，绝难想象的。许自昌的成为巨富，和经营出版事业必有关系。

陈眉公披着山人的华衮，是讳言其留心举业的。连写一篇叙也痛感是一种牺牲，惟恐玷污了“山人”的招牌。但在教孙儿读书时，却又极精明的选择了《化书》这样的课本，并认为无妨一刻，理由是罕见流传，可以吸引买客。

看了这些手札，使人恍然如见三百多年前一个出版商人的精心算计，简直和旧日上海滩上的书商毫无二致。剽窃名人著

述，改头换面，大作广告，意图骗取读者的金钱，还提防着同业的翻版竞争。不仅贩卖古人的名著，也不放过当时的“教科书”（所谓“举业书”）的生意，因为这到底是畅销的货色。对长期销行和应时品种，都有全盘周密的考虑。如此看来，陈眉公不仅是马二先生之流的先辈，而且手面、眼光都要好得远。特别是能拉住许自昌这样的豪有力者作为经济支柱，那手腕就更非马二先生所及了。

“山人”行当之见于书札中者，还有为人撰写志状、序文……这也是一大笔收入来源。

弟一病百余日，今虽强起食啖，犹人腊耳。且客履笔砚相踵而至，未免力疾应，气啜啜无静时。承远使捧币，名药代医，非义敦金石者，何以有此岁寒之书问哉。感切。（致自昌书）

此外，就又有官方临时委托的编纂任务，《与仲谦书》云：“写尊公状，日夜在心。缘两日有当路见咨荒政，因入山简考古今可行之事，条缕而折衷之，渐已成帙，非荒唐迂腐之谈，得谕正合鄙心，读之真一卷流民图也。”可见所谓山人，有时正是统治者的“智囊”。眉公在这里发表了他的政治见解：

旧水未消，新水复横。正如旧赋未足，新赋复征。东南民力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若枵腹之莩与横目之徒，相挟而起，且将莫知所竟。巧妇无米，廉吏甑尘，须破格接救一番，于拯溺救焚之中，寓防微杜渐之意。大约饥民必济，乱民必斩，八字以外，无荒政矣。

山人是并不超然于政治的。眉公入山数日，鉴古按今，为荒政作出了八个字的总结，实在说尽了漫长封建时代统治者治术的精髓，其实也还是“王霸之道杂之”的老谱。对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山人多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则不能说不是意外的收获。

一九七六年

后　　记

一年将尽，将积下的旧稿整理了一下，编成了这本集子。和《榆下说书》一样，所收也大抵是同类性质的杂文。除了近两年所作之外，还编进了一些旧文，有的还是三十多年前的陈货。

一九四七年初夏，我工作的报社被封门了。同时得到关心我的朋友通知，说是有人看见过一张黑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劝我最好还是避一避。避到哪里去呢？先是躲到在大学里工作的一位朋友的宿舍里去住了两夜。朋友比我低两班，这时留校在当助教。这大学是我的母校，但这校舍我却从来不曾进去过。这回算是第一次真正领略了大学校园的气息与风光。晚上在校园里漫步，望着亮着灯火的图书馆的窗子，曾着实产生过一种羡慕的心情。总住下去也不是事，于是商量好，拉了另一位同学一起出门去。远处去不成，于是就选定了嘉兴。到了嘉兴免不了要游南湖，到了烟雨楼上去喝茶。这就是《鸳湖曲笺证》最初的写作契机。

今天想来也不能不惊异于当时的大胆、狂妄，竟自要动

手写这样的考证文章。感谢吴晗和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都极力劝我动手。不只是口头上鼓励，还借给了必要的参考书。在郑西谛庙弄灯光昏暗的书斋里，他从四周的“书山”中抽出了明刻的张溥文集和几社文选塞到我的手里，吴晗则从北平寄来了《霜猿集》。

文章写成后在《文艺复兴》上发表。自己很不满意。这是必然的。后来见书渐多，时时碰到过去没有发现的新材料，就觉得更不满意了。曾几次下决心重写，但几次起了个头就住手了。这使我懂得改写旧文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会破坏尽执笔当时的一切兴会与情怀。也许改作科学论文是不会遇到这种困难的吧，可我写的又并不是科学论文。有人主张写论文要保持纯洁的“科学性”，要像科学家在恒温消毒密封的试验室里工作一样，避免与外界一切接触。不许说“题外”的话，无论“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都不行。这是很难很高的标准，可惜我做不到。无论做题目如何正经的文章，总还是不能不时时夹杂了大量世俗感情。这就证明我是不会也不能写“论文”的。《鸳湖曲笺证》也不是正宗的论文，因此也就不好改，只能以原来的模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把几篇有些关联的旧文安排在新作之后，目的只是想提供多一些材料，并使读者知道自己许多年来考虑这些问题时曾有过哪些想法。

在六十年代初，曾经有过一种野心，想关起门来研究几个有兴趣的历史问题。记得曾开过一张目录，寄给吴晗请教。他又热情地给予鼓励。记得其中就有这样一些题目：清初明遗民的生活与思想，他们与新朝统治者的微妙关系，

以及通过像曹寅这样的人物体现出来的清初文化政策……通过毛晋、许自昌这些地主兼“出版家”的活动，反映出来的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消息；通过他们与一些“大知识分子”如钱牧斋、陈眉公之间的关系，看党社集团与山人名士的真相。又如“扬州八怪”、“西泠八家”这些画家诗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掩盖在“高雅”表象底下他们的真实面影，“清词丽句”背后的愤慨牢愁。还有在扬州盐商马氏兄弟、天津水西庄查氏周围聚集着的以厉鹗为首的一大群文士的踪迹。这许多，都是想了解三百年来文化史的人所必需认真弄懂的。研究这许多饶有兴味的重大课题，不是我的知识、素养所能承担的。开始时只不过是读些书、作点笔记，写一点简单的札记。没有好久就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计划、设想、材料理所当然地都在“扫荡”之列，无从说起了。但也还剩下了一点零章断简，现在就一并收在这里。

因为买旧书，有机会接触像四明天一阁范氏、山阴澹生堂祁氏、甫里梅花墅许氏这些藏书旧家的藏书。这就引起了对他们的兴趣，因而写下了有关的一组文字。这些都不是正宗的藏书史论文，与《藏书纪事诗》、《书林清话》这样的著作着眼不同，多的是“题外”的话，在版本目录学家看来恐怕是不合规范的。

近几年来，读书的风气确是空前地盛起来了。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以论书为题的作品出版得也很不少。我曾写信给一位喜欢读书的朋友说，能够想出来的嵌进一个“书”字的书名恐怕已为他人用尽了。就像大观园里的诗人

梦”，许多诗题都被快手的林姑娘拿起笔来一下子勾掉了，简直使后来者无从措手。因此想书名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这里用了一个《银鱼集》的名目，也无非是偷懒讨巧的办法。古时读书人对蛀食书籍的小虫抱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痛恨，但另一面也很羡慕。据说有的虫三次吃掉了书叶里的“神仙”字样，自己也就化为神仙，这就是“脉望”。真是值得羡慕的虫子。明赵清常就把他的书斋名为“脉望馆”。但这名目太冷僻了，要查字典才能知道，对读者很不方便，现在就使之化为“银鱼”。这并非“学名”，想查也查不到。但前人是用过的，记得在什么人的题跋里就看到过“银鱼乱走”的句子。这“乱走”的实况我也常常见到。有时打开一本旧书，会忽地发现一条两三分长的银灰色的细长小虫，一下子就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幸而捉住，用手指一捻，就成了粉。书虫有许多种，它们能干出种种花样来。有的能打一个细眼，笔直到底，和钻探队打探井一样；有的能把书叶吃得像蛛网；有的在书口、书根结一个壳，像小孩子捉来喂鸟的“皮虫”……这当中，这“银鱼”恐怕要算是最“可爱”的了。

一九八三年元旦写毕